

日本歷史講話



著 夫 科 茹 · E

譯 明 胡

耕 耘 出 版 社 印 行

一 九 四 三 年 十 月 初 版

MG
K3B.0
5/2

日本
史
講話

野村胡堂著
三科明味
胡堂著



目次

第一章	氏族制度.....	一
第二章	日本封建制度的發展.....	一一
第三章	封建制度的日本求統一的鬥爭.....	五四
第四章	德川幕府（封建國家）.....	八〇
第五章	一八六八年的革命與資產階級的維新.....	一二九
第六章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	一七三
第七章	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	二二五
第八章	世界大戰時期的日本.....	二六三
第九章	資本主義危機時代的日本.....	二八〇
第十章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新階段.....	三一五

第二章 氏族制度

君

日本歷史的繩文時期，這個時期約對應西元兩世紀或甚至三世紀以前，都不過僅係原始上或其他極有痕跡的歷史文獻。在日本公式歷史學上有着關於「神代」的神話史，提供了解許久以後的時期某些因素的匙鑰，後來的這時期，氏族制度已經崩潰，並且開始分解社會為階級。中國所有的歷史文獻，也提供了關於日本初期歷史極曖昧的表現。

文獻中所有的一切資料雖然是很少的，却能够得出這樣的結論：現代日本人最初的祖先，是各個單獨獨和零碎的種族。他們住在現代日本本部領土的南部和西南部（日向國九州島的南部，是數次對九州島的北部，又和國親在的奈良縣，紀伊國，現在的和歌山縣及其他等地。）當然這這南部並非是日本的土人，關於日本領土最初居民的人種構成，研究這種問題的歷史學者中間有着不同的見解。大多數人都認為日本羣島上最初的居民是蝦夷族，倭奴——是較後來的新侵入者。這到了北部的民族，假使較的殘餘現今仍在北海道的北部和薩哈連島的南部（樺太）保存着。和國民族或倭人，蝦夷族是由馬來羣島起頭的種族，住在九州島上。

依照學者們的意見，現代日本人的祖先，是由亞洲大陸來的移民（不知名的蒙古族）和由南方海島上來的移民（馬來族）的混合產物。這些種族移住到日本來，是經過各種特期的，並且顯然是經過若干次移民的波瀾的。

古代居民的主要事業，是捕魚和狩獵。考古學的發掘，提供了捕魚對於居民生活有特別意義的表象。找到了許許多多的貝殼，用貝殼做成的簡單物件、骨製的和石製的捕魚器具、魚骨的殘餘。根據專家的研究，日本古代的居民曾經捕獲了大量的（達到了二十種。）捕蟹和捕蝦起了不小的作用。

狩獵主要是捕野豬和鹿。捕獲、兔、熊、猿起着不大的作用。狩獵的主要工具，是使用弓、石斧和矛。

和把捕魚與狩獵的生產品用做食料的同时，也把樹上的果實、某種積草和草根用做食料。移動的漁獵時期，是這個原始社會發展的第一階段。

農業很久——雖然也是很古的，出現了農業時代，農業把漁獵逐退到了次要的地位。如同考古學發見的結果所指出的，古代日本的居民，起初主要是住在海岸一帶，以後才推進到了內地，並且移往到了平原上。這些平原的自然環境，是適合有成效的農業勞動的，尤其是適合培植米穀的。

。但一切農業文化（這裏是也說到穀物的選擇，也說到灌溉的制度，）都是移民由大陸（從現今朝鮮的領土上）帶到日本來的。

問 據在從大陸來的、帶有更高級文化的移民道路上的種族，他們或是在和新來者強制同化的結果中接受了這和文化（首先是農業的文化，）或是同時保存自己孤立的存在。

關於這個遠古時期的社會制度形態，我們沒有或種確實的報告。後來很久才發生的日本的神代誌，含有許多重要的這種暗示。這個原始社會一定的發展階段上，曾經有過妻婚制度。日本公式的歷史科學所接受的更多的傳說，是關於日本國家起源的傳說，這種傳說認定：日本國是太陽神天照大御女神的子孫所創建的，這種傳說含有女權時代的餘味，顯然，女權時代似乎在日本是存在過的。

關於這個時期，有着多少可靠的歷史材料，說明了當時日本的社會，已經走上了分解為氏族制度的階級。出現了有着社會細胞性質的氏族，這種氏族是以他的成員的共同血緣為基礎的。氏族的首領站着氏上（氏長，）他對於氏族其餘的成員（氏人）有着一定的權力；這種權力，在最初的時期，是和調養氏族各個成員所進行的活動的需要聯繫着的。

氏上所取得的權力，起初帶有祭祀的性質；他和原始的農業大大地依賴於神化的自然力，是有直接聯繫的。所以從最初，氏上和主祭者就是一個人。氏上的職能，還要依照年歷來監督着一定時期農

種的需要。他也施行反對旱魃和歉收的咒法。有着許多資料說到：古代日本，以祈求價值的神的祀者為目的的種種祭祀，起着極大的作用。

氏族漸漸地成一個更大的組織，這種組織所聯合的成員，已經不僅是一個共同的血緣的了。

第一，各氏族常常進行氏族間的武裝鬥爭，更強盛的氏族撲滅了更衰弱的氏族，強迫他們取消自己獨立的存在，並且使一部分戰敗者加入戰勝者的氏族中。在稍後的時期，戰敗者氏族的成員，通常變成戰勝者氏族的奴隸，或是在種植情況下，成為戰勝者氏族中沒有完全權利的成員。第二，不斷地發生了從大陸上和從鄰近的南方海島上來到日本領土的移民的奔流。更後的移民，通常都比最初來到日本的移民是文化更高的（他們知道手工藝，曉得耕種土地的方法，會應用灌溉制度以及與他等重要的）如果他們還沒有力量，因為自己的人口不多，使當地原有的居民服從自己的話，那末他們就加入在當地的種族的氏族裏，並且在重要起着重大的作用。

需要氏族的統一，被氏族祭祀的統一，強化起來了。氏上利用氏族神的威望，努力創造氏族全體成員之間血緣的幻覺。

神前（每個氏上都要用稻米）的特權地位，把獨特的稱號佔為己有，努力把這種稱號變成繼承的。起初，這些特殊的稱號，不過單純地表現着氏上的概念，這些概念是和氏上的身份適合的：巨、連、首、

門爲根據的氏族的稱號。例如有丁弓削氏（製造弓）、金作氏（從事織治事業）等等。凡此工業

因爲各氏族之間常常發生的戰爭以及與土人（蝦夷族和熊襲族）不斷的鬥爭，出現了奴隸制度。

起初，奴隸都是俘虜。

氏上設法加強自己的權力，努力使奴隸也和手工業者（部曲）一樣，直接隸屬於自己。奴隸被一奴，也形成了氏族內部的第四階級。這是顯而易見的，屬於戰敗氏族的手工業者集團（部曲），首先變成了奴隸。

和土人（蝦夷族及熊襲族）共同鬥爭的需要，促使同種的各氏族之間的聯絡鞏固起來了，並且加強了形成種族同盟的過程。關於日本帝國創始者神武天皇的神話，說到這位天皇是酒磨紀元前於公元前日本種族的首領，這個種族從九州島移到日本主要的島嶼到本洲上，並且在本洲的中央部分（大和國）奠定了基礎，在這個地方和野蠻頑強鬥爭的結果，確定了自己的統治權。這個神話無疑是很久以後創設種族同盟的過程的反映。這種種族同盟，是在極強盛的氏族之間進行的環境中發生出來的。在中國古代到唐朝的史料中，能夠找到關於到島東漢的記載，討論遼東南方海上有島嶼，其中聚居百餘國。中國人關於日本島上有許多國家的這種記載，顯然是因爲大陸的居民和日本多數不同的氏族有了直接聯絡的期間下發生出來的。

日本島上的居民，和中國及朝鮮文化更高的大陸居民之間的接觸，在這個歷史階段（公曆五世紀和六世紀）上，已經以各種的形式進行了。由彼此相互間的海盜的襲擊起，以至中國的佛教僧徒派去日本的宣教師行此。

古代日本的蘇我氏（本州島）最先接受了中國和朝鮮的封建文化，成了相當有勢力的氏族，起來努力實現強制形成以蘇我氏為首腦的全種族的氏土同盟。氏土的聯絡勢力，並其他更落後的和保守的氏族傳統，曾經用軍事力量來抵抗。但上述的蘇我氏，是更先進的氏族（處在中國和朝鮮封建文化的影響下），經濟上也是更加異常有勢力的。由朝鮮被攻過來了灌溉的技術和方法，這些方法對着對自然盲目的絕對依存性，當然也就會減小神官（神祇）及其他等等的術士（巫）的作用。因為照中國的樣式所製造出來的年曆的精密性的結果，也發生了同樣的作用。在這種影響下，氏土的義務和地位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神的命令官和最高裁判官的職能，推進到了第一位。按照經濟複雜和分工增長的程度，經濟的直接的選擇轉移到個別家庭的指揮，專門的集團（部曲）也是和這一樣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更有勢力的氏族，自然也這就是對於各種實質地位地位的強有力的爭奪者。進到了為反對蝦夷族和熊襲族而結合了的各氏族兵士同等的地位，有勢力的氏族的氏土，就全國儘可能更妥當地保有種族領袖的特權。這從其他強盛的氏族的氏土方面惹起了自然而然的反抗。這些強盛的氏

日本歷史講義

族的上，也是要想奪取首領的地位的。因為這戰爭統治權的不斷的顯強，要與及和這種要與有聯繫的爭的結果，每個強有力的氏族，都企圖確保自己所固有的某些項以全種族為規勸的職能。如果不能支配的部末也要在種種情況中，對自己的深入顯出重大的影響。這種固定地握在一定的氏族手中的獨佔權，在很大的程度中，也就是各氏族空間增長着的經濟聯繫的表現，並且也是社會分工進步的結果。以氏族在某一項職業上及和這有聯繫的職業業務上專門化。但從另一方面，氏族之間職能上的劃分，不僅是按照生產的標誌來實行，而且也是以實在的勢力範圍為根據的。氏上握有軍權勢力，並常常把別人手中的種族司官的權力佔為己有，把這些軍事職能結合在自己的氏族的手中。國家都道，例如物部氏，在很長的時期就是這種「軍事」的氏族。三齋部氏把神官的和祭祀的職能佔為己有。自然，在這種情況下，首先要說到氏上及其近親的特權。這些特種的氏族的「下部」其他大多數氏族都一樣，是那種普通的農業氏族，但這些特種的氏族，即正是被權的主要繼承者。由其他職能指導地位的強有的氏族中，有蘇我氏、大伴氏、中臣氏、近衛氏、天皇氏。

日本古代的歷史科學，承認有過這些強盛的氏族及他們爭領導地位的事實，然而却作出了完全歪曲的敘述，認為和這些氏族同時，還有着難的皇室。這好像這個「皇室」從公曆紀元前七世紀直到現在都在日本脈斷地和一地實施着自己被權。精細地分析日本古代史書中所列的年表的

資料，就證明了一切關於第一位天皇的生活和事業的「確實」證據，都是想像出來的。都是在很久以後的時代虛構出來的。日本雖有九州崩潰氏族制度的過程，大概發生於公曆五世紀的阿蘇七世紀的「中葉」。在這個時期，全種族的聯繫已經達到了最高階段，種族因固定的領神而團聚起來了。這種領神的地位，事實上是被最有勢力的氏族的氏上佔有着。但擔任種族領神的人物（種族的領神在神代以前才叫做「天皇」）却絕對不是日本公式歷史敘述成了「萬世一系」的「天皇」的「代表」。用不着懷疑，在很長的期間，全種族的「皇」位是被物部氏的氏上佔有着（他是最高的司令官和執政官，但不許干涉個別氏族內部的事務）。這個族長制的老氏族，在長久的期間，都保有着自己的特殊地位，這種特殊地位是以軍事權力為基礎的，而軍事權力，却很早以來就是這個氏族的特權。成爲指導種族同盟的充分根據。在舊的編年史中有着這種暗示：物部氏推翻了以前屬有領導地位的齋部氏（神官的氏族的「從神代末了的時候起（神荒的作用完全掃地，）最高權力自然應當轉到擁有軍事勢力的氏族的氏上手中。」

以後，族長制的物部氏，却又被蘇我氏所排除了。蘇我氏在吸收中國封建文化的道路上，比其他的氏族前進得更遠。舉出這樣的例子來說明：蘇我氏的氏上，最先採取了這樣的制度，要那些加入氏族的構成中的家族，納稅。扣除米穀的一定數量的收穫，拿來用作不可侵犯的得錢基金（釀酒稅是

發的倉庫，)以這樣的形式來收集這種租稅，氏上本人就是單獨的管理人，因此在蘇我氏首領的家中，積聚了大量的財富，使他能夠維持那些以當兵為職業的親兵。蘇我氏用這種方法，事實上成了最有權威的氏族。切實說來，蘇我氏不僅事實上，而且法律上(相當地能夠使用這個字)實現了氏上擁有種族同盟領袖的政權。物部氏和蘇我氏的鬥爭，在歷史資料中有着顯明的痕跡，表面上，是以更進步的蘇我氏所接受的中國佛教文化，和用做舊氏族聯絡基礎的族長制(神道崇拜(把死去的祖先神聖化)，)相互鬥爭的形式進行了。

上面說過的創設積蓄米穀的倉庫，是強有力氏上所確立的私有財產的典型。和這種取得了也倉的名稱的倉庫，同時更發生了這種事實：土地的所有權不直接屬於屬氏族，而屬於氏上。

在六世紀的時候，已經知道有三種土地領有權，這些土地領有權是由氏族公共的領有權中分化出來的：(一)「御名代」和「御子代」，(譯者註：「御名代」是供奉天皇的土地，「御子代」是供奉皇太子的土地，)這是由氏族所有的土地中分割出來的地區，是用來供「執行各種族領袖的職能的氏上的(這些御名代和御子代，分佈在日本種族所佔有的領土的各部分上，在這個時代，不僅變成了佔有着並努力保存着各種族領有權的氏族政權經濟上的堡壘，而且成了她的政治上的堡壘。：(二)

(一)田所，「這每個氏族，為着供奉自己的氏上，而分割出來的地區(按照氏族的上層階級氏族的

其他部分而特殊化的程度，這種田所有權增大的趨勢，田所是用奴隸來耕種，像這樣，他們由全氏族的所有物，變成了氏上的所有物；（三）「未墾田」，這是因為開墾新地而取得的地區。（未墾田是用奴隸或半奴隸（部曲）來耕種，也是由那些屬於氏族所有的土地總數中分離出來了的，這種地區是奴隸的領地，他的近親或地方上的貴族所享受。）

這些私有地區的分化，伴來了奴隸和半奴隸（部曲）人數大大的增加，他們的勞動在農業中極廣泛地利用了。如果以前奴隸主要是執行家僕的義務並且不看作田場上的勞動力的話，那末現在氏族的土地上，却關心擴大從事農業的奴隸的人數，使這些奴隸附屬在他們私有領地上。因為奴隸是由俘虜中募集來的，而大和族和蝦夷族及熊襲族的鬥爭，却不能保障充分人數的俘虜，致令奴隸不敷了，所以出現了使半奴隸的部曲附屬於土地的趨勢，甚至使一部分有完全權利的氏族成員（氏人）也附屬於土地，把他們強迫變成「田部」，這種「田部」是預定用來耕種貴族的土地的。

蘇我族特別努力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一方面利用佛教思想的影響及佛教所倡導的臣屬在一個國王面前平等的宣傳，另一方面賄賂對於他最危險的其他貴族的氏上們，把未墾田和屯倉讓給了他，並且佔有了表示敬意的稱號。那些起初是在每個氏族的內部發生起來的，並且不過是用來表示氏族的，經由蘇我族全體大業有區別的個人的稱號（姓），漸漸地獲得了表示敬意的尊稱的意義，這種尊稱

，是由最高政權——種族的天皇，賜給那些在自己的氏族中，有力量取得氏上的地位，而對全種族却有特殊的功績，更確實地說來是對皇族有功績的人們的。佛教的僧徒，大批地由朝鮮和中國來到了日本，他們同時也是早就形成了的更高的封建文化的担当者，要充分說到他們是中國文學最初的教師，這種文化漸漸地貫入，日本社會中階級的最高級的階層，並且是發我於政治上的代理人，蘇我氏爲着摧毀地方上氏上的勢力和影響，利用他們來計劃在這種內部鬥爭中的種種密謀。佛教僧徒們的這些服務，自然不是沒有代價的。對他們賜給了未墾田、屯倉。替他們創立了寺院，對這些寺院供給了奴隸，並且專門把一些土地賜給了他們。這些在日本領土上建立起來的佛教的寺院，以後判官起來，他們會經演了封建制度極重要的堡壘的作用，協助了個別氏族之間交換的發展，促進了手工業，輸入了灌溉和耕種土地的先進技術，帶來了養蠶業和茶樹的種植，僧徒們和中國一般的移民（在一切場合幾乎都是和佛教有密切聯繫的），是大大地加快了氏族制度崩潰的因素。

到了西曆七世紀的初葉，日本氏族制度中所發生出來的社會分化的過程，已經進行得很遠了。氏上，變成了把大部份奴隸，半自由的和甚至自由的氏族成員的勞動生產佔爲已有的領主。奴隸成了社會制度最重要的構成部分。不僅土地被統治的蘇我氏所佔有，移住的田部是附屬土地，而且那些原來是替貴族收集米穀的倉庫的屯倉，也變成了有着大量依賴主人而生活的勞動者居民的廣大領地。和

奴隸及敵由同時。更務在于自由的農民階級。先前的兵火及貴族階級。武士及其家屬。皆曾與武士
 主人階級。為着保護和維持屬於他們的財產及社會特權。有自己組織起來的需要。於是便有了
 種族集中的趨勢。以獨立強固的政權。這種政權已不是由組織者們共同利益下的職能所執行着。雖然
 執行軍事和裁判的職能。而是保障本族的利益。在氏族制度的廢止上。出現了國家
 組織。是以大和族的領袖為首腦。日本公式的編年表把他叫做「天孫降臨」。以前由強盛的「氏」上。中所推
 選出來的。全種族階級的首長。現在成巩固的君主。這可說「創設」和政府的。這種政府。是由君主的
 親族及那能變成高貴階級的。除他而外。組成起來的。武士。邊在個別武士輔助下。當有必須在一定的
 領土上確立統治權的場合。能夠調集全種族和軍隊。這時候。無論是反對所謂的新貴族。或
 能與族敵反對自己的氏。人。才。農民和奴隸。及都是沒有區別的。

西曆六百四十五年。日本的生活發生了一種重大的事變。是在於大化改新。的名稱下。於歷史上
 著名的。這大改革。是長期保宥統治氏族的指導地位的。蘇我氏。在和乎臣氏與天皇氏相互提攜的聯合
 而試我情爭中。達到了完全的失敗。指導這次聯合的著名領袖。是乎臣氏。他成了更有勢力的。
 並且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對地獄守。此蘇我氏演變常權定的國家組織形態。乎臣氏把形武止的政權。
 才。天皇的。一。功。特。權。一。讓。給。了。天。皇。氏。而。獲。得。了。實。際。上。的。統。治。者。的。地。位。一。直。權。續。到。了。六。百。六。十。

九年冲巨錄足死的時候。爲着確保自己勝利而成果。他很明確地按中國模式的中央集權化實行了改革。和指導中心的中國化及建立有着中國一切象徵的皇朝同時，更肅清了氏族制度在法律上的殘餘，取消了許多多和新的狀況不適合的社會設施。氏土因，握有氏族的最高權力而佔着的一切尊號，也都被廢除了。曾經特別取消了「臣」的稱號以及「臣」的稱號以及「臣」的稱號。田所，上的權利而給予了和這類似的稱號。在這些地土工作的部曲和奴隸和農民，都被宣佈解除對於先前注人的義務，並且僅僅隸屬於天皇。天皇又被尊爲是全國土地唯一的主人，曾經實行了全日本新的行政劃分。已經不是按氏族標誌而是按領土的標誌來進行。誠然，實際上，事情不過是達到把先前的氏土改名爲地方官和治理人吧。制定了的官職，有京都的警務長官（警司），省長（國司）和郡長（郡司），主要是分配於擁護中臣氏的各氏族的貴族階級中間。廢止過去曾經在的諸相的稱號，而採用子唯一時稱號。先前的貴族，由天皇取賜了俸給，他們以前稱號，在大多數場合中，都用朝廷的爵位來代替了。這種稱號，是以前種由中國借用過來的官階爲基礎的。在六四五五年以後，直到七〇二年，實行許多徹底的改革。七〇五年的時候，頒布了部法典，是在大寶律令的稱號。這部法典包括了整理國政的一切部門，並對於中央政權十分困難的變遷中實行了。中央政權首先關心的是，是以前氏族的貴族們，被小團體的稱號，這些人，準備直接國衆在天

是周朝大夫庶民和士庶民的勝利者。並未真正確據說來是他們的左右。全盤整地。把絕大部分的土地歸還。歸還在自己手裏。固然充分實施中央集權的官僚主義的國家原則。這種原則曾經近古以來作極端改革。漸的基礎。既前的氏族貴族們爭中的地方政權。服從這種原則。言大體都。是出於自己願望。而是因爲。自己的軍事實力。經濟此處衰弱的。這故。他們所關心。固然是利益相反的方向。他們努力使自己在地方。上的實際政權。不致因中央監督過度的。而花而受損。而把改革。引導使家。使。士。氏族制度的。結。合奴隸所有。制度的因素的關係。合法化。奴隸所有。者制度的因素。是士。族堅固地。實入。新形成的行政。區域。國。內部的。此。

這些傾向的衝突。不可避免地會採取。競爭的形式。而官。錄。足。的。死。及。因。這。事。所。惹。起。的。權。的。朝。廷。種。種。者。變。的。階。級。或。了。這。種。鬥。爭。的。動。機。亦。是。這。種。階。級。這。種。鬥。爭。以。錄。足。的。親。族。之。上。半。半。階。級。不。比。等。的。勝利結束了。他。階。級。了。自己。階。級。的。政。策。

大。改。政。新。最。重。要。的。權。成。部分。是。土。地。的。改。革。這。種。改。革。在。大。實。律。令。中。取。得。了。繼。續。向。前。的。發。展。並且。在。所。謂。的。中。央。由。政。府。制。度。的。樣。式。中。得。到。了。最。後。的。形。成。等。日。

一。根。據。大。實。律。令。注。地。被。認。爲。是。國。家。專。有。的。財產。免。稅。地。分。給。利用。的。期。限。不。得。超。過。六。年。認。爲。一。戶。是。社。會。的。單。位。每。戶。鄉。適。合。自。己。一。戶。的。人。數。來。領。取。土。地。每。人。的。份。額。一。口。分。田。一。畝。是。每。一。個。男。子。一。錢。

基礎，這種封建階級，是在以完成的形態組成奴隸所有者社會以前，就從日本發展了階級奴隸制度。奴隸所有者制度不能保障統治階級的經濟勢力，因此賜給某個貴族代表者（形式上是說官階表所規定的）的土地及由的農戶的數目，比屬於這個貴族的奴隸的數目，在更大的程度與決定着這個貴族的實力。以事實的本質說來，「賜田」是封建階級對農戶的恩賜，在這種地方，採取奴隸的勞動起着重要的作用。「賜田」的規模與天約是在，「田所至五百戶」的範圍內，賜田的規模與使農戶喪失土地是政治和經濟權力唯一來源的特權。

除上面指出了的，大寶土地律令中所破壞的封建土地國有的公式原則的各個以外，還有許多許多這樣所。法規：牠們無疑地促進了地方分權，並且幫助形成了地方府封建貴族階級對身分田以外，貴族還取得了所謂的一「位田」，位田的規模是被朝廷所制定的官階表來決定的。除這些「位田」以外，還規定有一「功田」，即是那種因為特殊的功績而賜授的地區。朝廷的官吏，除此以外還取得特殊的「職田」。

末了，律令還預定了「一種個人的份額（賜田）」，是由天皇按階級的原則賜給其完全私有的財產。賜田（亦稱賜田）即令把其中一切法律上派生出來的事務除去不算，需要大量的幹部官員，他們以「班田」制度（即令把其中一切法律上派生出來的事務除去不算），需要大量的幹部官員，他們要適當地測量土地，每經過六年把這些土地分配一次（事實上却遠不止相隔六年），登記參數得種種土地，根據律令監督租佃的事項，以及其他等等。公式上，這些職務應當由國司來實施。然而

事實上，爲着這事，却必須創設由京都管理的很大的行政機關（西曆七一〇年曾經正式奏部奈良，）因爲國司主要關心的人是屬於他自己的地方的利益，並且不去催繳那些京都應得的，「根據法律」是屬於中央的，十分巨量的米和其他的貢稅。

這種在軍事勢力援助下的機關，是施行班田制度的工具。

佛教的僧徒，對於日本封建化的過程，顯出了巨大的影響。這些僧徒把寺院和佛堂，變成了自己經濟勢力的堡壘及種種政治陰謀的策源地。這些陰謀，主要是傾向奪取京都朝廷的及各地大官僚貴族「小朝廷」的指導勢力。天皇氏和中臣氏反對佛教以前的保護者——蘇我氏同盟，促使孔教在日本有了相當的成功，但還却沒有阻礙皇室和寺院之間樹立良好的關係。

天皇氏的宮廷，不久就起來，甚至更熱心地幫助僧徒們的活動。這時候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大和族各氏族原有的崇拜（神道）和佛教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早就得到了妥協的解決。曾經宣佈這兩種宗教彼此並不矛盾。和這些事件相適應，大寶律令中包括有特別的指示：無論是對佛寺或神社的土地，都是保險的。把佛寺的土地叫做「寺田」，把神社的土地叫做「神田」。

如果除這些神社和寺院專有的份額以外，還計算到寺院所領有的多數半自由民和奴隸（對他們也享有土地）那末，七分自來，他們的數目是危完全沒有因實施計口授田制度而受到損害的。後來隨同

國內封建制度的發生和發展，寺院也就變成了巨大的政治勢力。以後日本歷史的室町時期，都是寺院對實際政治生活加大干涉的標誌下進行，這使他們有了褻取全部政權，製機及這種奉獻。主要是通過把自己的像像，物據上貴僧的手段實行，他的幕後的寺大却是極教僧徒的代表。

第二章 日本封建制度的發展

一六化政維新以後所確立的制度的結果，使令京城奈良（事實上說來唯是日奉唯一的城市）和全國其餘一切部分之間，發生了重大的差異。奈良是天皇朝廷的所在，這一個點點變成了全國的「文化生活的中心」。雖然文化為著是對於京城所特有的奢侈品，奈良是朝廷的及那部分住在奈良的「客民」階級與階級極狹窄的社會層的采地。京城廣泛地接受了中國宮廷的傳統，這是：天皇的左右「閑服」的時候，京都去研古讀經和文學，由各層有金額的資金送到奈良，用來建築宮殿、豪華的園圃和寺院。他們都去京城的裝飾品。幾乎一切新的建築工作，都是用奴隸的兩手來實行。對於擴大京城中奴隸的人數，也給予特別的注意。在外畿各國（省）奴隸制度沒有重大的發展並且因為施行班田制度反而漸漸地在消滅下去。地方的貴族領有自由的農民是更加有利的，因為這能將大大地擴張他們的土地領有權。的時候，天皇的政府却頒佈了許多法令，這些法令的意義，都是在於協助擴大二階奴隸的人數，尤其是那些受朝廷直接支配的國有奴隸的人數。

全體奴隸分為五大種類，第一類的奴隸是皇親的後裔，譯者註：這是所謂的一陵戶也。二也他們

平等。國家的官吏，第二類的奴隸是國家機關的僕役（譯者註：這是所謂「官月」）。第三類的奴隸是國有的奴隸（譯者註：這是所謂「公奴隸」）。第四類的奴隸是替私人充當家僕的奴隸（譯者註：這是所謂「家人」）。第五類的奴隸是私人的一種奴隸（譯者註：這裏是指所謂的「私奴隸」）。目的是要增加奴隸的人數，法令獎勵他們之間的結婚，而且把奴隸和自由民混合結婚的後裔，也認為是奴隸。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把自由民和奴隸結婚所生的兒子，認為國有的奴隸。在西曆七世紀的九十年代，曾經頒佈了法令，指沒有支付能力的債務者，也都判為奴隸。也會經允許自己賣身為奴隸。把罪犯編入奴隸階級，也是一項擴大奴隸人數的補充的泉源。特殊罪犯的全體家屬都變成了國有的奴隸。

奴隸的法律地位，依於他們的類別而各不相同。第一類和第三類國有的奴隸，比舊法中固有的「奴隸」，尤其是比私人的奴隸，佔有相當較好的地位。雖然形式上曾經禁止殺害奴隸，但殺害而奴隸却不致受到任何的刑罰。奴隸能够拿來買賣，有過許多這樣的事情。當時曾經把奴隸拿來「獻給」神社，贈送，讓給國家來代替償付規定的租稅，或簡直拿他們去做商業行為的對象。逮捕逃亡的奴隸，要付給相當的報酬。盜竊奴隸，要担負如同盜竊別人的貴重物品的責任。

在西曆八世紀的時候，奴隸的勞動就在日本大大地普及了，然而在經濟中却不會起着決定的作用。

一、倭這樣。這時天皇的政權。絕對不是握在天照大神以後嗣的手中，而是屬於藤原族。這個家族。是由最大並最有勢力的重臣氏的代表者。繼承了自己的權利。中臣氏以前是等次和族全體族輩的參加者之一。藤原氏的代表們，把攝政一種。關白一種。等於宰相的尊號佔據已有。在西曆八世紀至九世紀的期間。藤原朝是事實上的權柄者。這是使用強迫天皇由藤原族中選后的方法來達到。像這樣。構立了事實上的權力者和天皇氏的經常的親戚關係。因天皇氏的代表者在意志薄弱的。溫柔的和放蕩的貴族們的包圍中。墮落下去了。他在最好的情況下。也祇能受到中國朝廷。對建國的。嚴精細細性的教育。而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却都染上了。一切可能的惡習。不問如何。退而論之。

在這時期。佛教的僧徒取得了巨大的勢力。藤原氏不得不經常地考慮到寺院的勢力。要考慮到他們的物資財富。同他們甚至要對最有勢力的僧人獻媚，以教師和顧問的名位來拉攏他們。貴族中間也曾及至自動出家做和尚的習俗。然而就一般性說來。這却絕對不是表示放棄對塵世的事務。相反而是動員佛教強有力的機體。以求個人的功名。實獲最優越的成就。因此。日本法皇的朝中。與史書以外。佛教僧徒們的勢力在京城顯赫化。在設立取者。一院政官。寺院政治。的特別管理制度。與表現出來。曾經有了這樣的習俗。當天皇達到了成年的時候。就強迫他。拋棄塵世。剃度為僧。不再缺的。新皇位。必須選擇幼年在人來擔任。站在這位年幼的天皇後面。事實上是。由朝臣和僧人。爲將來統治的。

日僧次郎對半慶的作用。因為天皇厚賜銀錢，所以在他的刺殺論議的時候，通常都有阿後代。因此進行了寺院的時候，皇宮僧侶都將皇位轉給自已年幼的兒子。在這時候，前任的天皇在刺殺以後，手中取得了實際的政權與法律上他却是攝政或保護人。這種特殊制度的意義，就是要事實上指導權，集中在佛教僧侶信徒的手中。這些僧徒們，和歐洲中世紀的天主教一樣，認為自己是一股政權的主要泉源。在西曆十世紀，尤其是十一世紀的初葉，院政制度達到極盛期。

在「自由民」的主要居民大眾及教養奴隸的人數跟着莊園的發展迅速地減少了。這種貧窮的背景上，發生了貴族的豪華，佛教寺院的奢侈，並形成封建地產。在莊園。官廷的費用，需要大量的資金。地方上的封建領主的慾望，也和這平行地擴大。這些款項，當然要毫無權利的農民大眾來償付。為着表現這個時期權取日本農民的殘殘忍忍的形態，反映的是那種取名「田舉」的公米借貸制的擴張。表面上這種借貸好像是天皇在對自己的臣民做善事，每年春天，天皇的官員們接借貸的形式，把米穀分給農民。直到農民收割定期的收穫的時候為止。到了秋天，這些借貸的米穀，就要加上百分之五十的年利來收回。如果出借米穀的不是國家而是私人，那末法律上規定要支付百分之百的年利。春天借一袋米穀，秋天還兩袋。西曆八世紀的末葉和九世紀的初葉，田舉是朝廷和地方官吏對的一項主要手段。農民窮到了這裏的極度，雖然春天接受了借貸，在秋天償還的時候，依然幾乎

不免完全破產和奴隸化。地方官吏常常隨意增加公米借貸的利率，把差額佔為己有。當時破產的農民，在次年春天拒絕受新的借貸，那末法律就宣佈，接受借貸是個人的必然的義務，因此變成了一種特別的貢稅。公米借貸制惹起了農戶不斷的騷擾，沒有能力繳付利息，就把農民可憐的財產沒收。公米借貸制的惡迫是如此連本的，編年史中曾經記載有農民暴動的事件，公米借貸制度就是這種事件的原因。天皇的政權，甚至不得不親自頒佈這樣的勅令：減低公米借貸利息的百分之三十。有時在飢饉地方大衆暴動的威脅下，藤原氏也會佈宣佈，取消農民因未繳納公米借貸而來的債務。然而在一有可能夠的時候，這些「寬答」又重新取消了，並且公米借貸制又漸漸地活動起來了。採取這種公借貸和私借貸的直接結果，是農民的暴動，大批農民拋棄土地而逃亡，他們變成了流浪人。例如在九世紀的下半葉，就曾發生過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在日本的編年史中曾經記述過：暴動的農民軍隊，甚至進攻京城——平安。這樣的暴動的結果，是曾經破壞了許多多官邸和寺院，許多貴族階級的代表們都被暴動者殺死了。

採用公米借貸制，別一種結果，是使土地集中到了封建領主的手中，莊園有了發展。對於莊園，無論天皇的那一種勅令，其中並沒包括公米借貸制的勅令在內，實際上都是不適用的。大多數的莊園因為開墾新地，墾田，而發生起來了。因為把奴隸用來開墾新地，感覺人數太少，所以

封建的度制是與封建的農奴制相適應的。在封建社會中，土地是生產的基礎，也是權力的基礎。地主階級通過對土地的壟斷，控制了生產過程，並從農民身上榨取剩餘勞動。這種生產關係的實質，就是農民對地主的依附關係。農民為了獲得土地，不得不將自己的人身自由抵押給地主，成為地主的農奴。地主則通過地租、勞役和賦稅等形式，剝奪農民創造的財富。這種剝削關係，是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基石。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封建制度逐漸瓦解，農民擺脫了對地主的依附，開始了新的社會階級鬥爭。

封建的度制是與封建的農奴制相適應的。在封建社會中，土地是生產的基礎，也是權力的基礎。地主階級通過對土地的壟斷，控制了生產過程，並從農民身上榨取剩餘勞動。這種生產關係的實質，就是農民對地主的依附關係。農民為了獲得土地，不得不將自己的人身自由抵押給地主，成為地主的農奴。地主則通過地租、勞役和賦稅等形式，剝奪農民創造的財富。這種剝削關係，是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基石。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封建制度逐漸瓦解，農民擺脫了對地主的依附，開始了新的社會階級鬥爭。

於收集這一捐稅的吏官意旨，那末跟着時間的經過，地方的封建貴人們——大莊園的原有者，一部分是用暴力奪取——一部分是說法律誘——自由的，——在「分地」上居住的農民，完全忽視國家（即京城）的利益；常常發現個別的強有力的封建領主，持有勝過中央政權而求完全政治獨立的趨勢。西曆十世紀，就開始了大封建領主公然武裝反對京城的藤原氏的優勢。朝廷動搖到了這樣的程度；只有在其他封建領主的援助下，才有可能稍當延緩自己滅滅的沒落。藤原氏在這個對於他們自己感覺困難的時期，以政策，幾乎專門發動那些對於他們有危險的、最大的封建領主之間自相殘殺的鬥爭。在一切情況下，就軍事關係說來，朝廷都不能和天封建領主競爭。朝廷——對大封建領主尚唯一有力壘壘，是佛教的寺院。這些寺院也是最大的封建制度的機構，努力利用中央政權來加強自己的勢力。曾經散滿全國的這一寺院，有着很大的實力，唯在成長或短的時期以前，援助了藤原氏擁有對於全國的名義上的政權。

但在西曆十一世紀，藤原氏的統治權受到了巨大的打擊。這種打擊從東方來的。日本那些位在畿區的區域。和所謂的野蠻人（在東北方和南方的）進行了不斷的戰爭，因為在地方的封建統治者的手中集中了很大的軍事力量。以前的各階級都是脫離中央政權而獨立的。這些區域的前衛都是位在東方。關東區（現在的東京——橫濱區），在西曆十一世紀的時代，就是封建領主的本氏和源氏常常圍襲

用武力肅清中央諸郡平安的根源地。

白河平氏的代表者之一平將門，在西曆九三九年的時候，就召集了很多的軍隊，來撲滅反對的封建領主，並且使藤原氏的皇軍受到了多次慘敗。他自己宣佈自己為皇帝。將門把位在日本西北部的各國併入了自己的統治下。以藤原氏為首領的統治轉變，很艱苦地才最後壓潰了這次進軍，並且在相當的期間保持了自已的統治權。從西曆九九九年起，封建領主的平氏，成了事實上脫離中央而獨立的。在西曆一〇二八年的時候，再度爆發了反對平安的暴動，這次暴動是平忠常所領導的，藤原氏和他還沒有決定勝負。然而自此以後有勢力的封建重鎮的壓迫却成了如此強大的。藤原氏和熱心扶助他們的佛敎寺院的聯合兵力，已經不能繼續延緩平安朝腐敗政體的破滅了。目的是在於保護自己逃脫不可避免的滅亡。藤原氏對這位最有勢力的爭奪政權者——平氏——降伏了，希望這個危險的敵人能夠馴化。對這位敵人封給了高官厚祿。在經濟關係中，平氏早就比藤原氏要強好幾倍。平氏並且全然不以表願承認他們的勢力為滿足。

西曆一一五六年，嵯峨而且放肆的封建諸侯平清盛，把京城奪到了自己的手裏，完全罷免了藤原氏的政權，並且樹立了自己個人的獨裁。然而沒有廢除形式上的皇室。由京城逃出來的藤原氏的一部分人，企圖和平氏最有勢力的封建敵人——源氏建立反平氏的同盟。西曆一一五六年至一一五八年，平

是受其國民的歡迎而由新政府所任命及後由新的憲法所規定而來。聯邦軍的成立。即此其時也。

日本這個國家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

歷之來表現了。他使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

之。這在許多方面。他使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

足。他使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

級。他使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

的。他使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

其。他使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國體與政治制度。皆與歐洲各國不同。

完全代理權。「守護」和「地頭」的位置，完完全全是被源氏的家臣所佔有，他們取得了「御家人」的名稱。以前朝廷的貴族階級，都漸漸地被除去了政治上的勢力。鎌倉政治制度的支柱是「御家人」，「御家人」的數目隨着新封建政治制度的鞏固而加多了。

源氏沒收了反對者的土地，把這些土地按封建從屬的原則，分贈了自己的親兵。不久以前還是沒有財產的農民、武士，現在變成了享有特權的土地所有者的特殊階級——全能的將軍的直接臣屬。

源賴朝在政治上的地位，完全是依賴他自己的軍事勢力。他的敵人中間，有許多人在最初的時候經濟上是非常更有力量的。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保存着的關於賴朝的生活方式的資料中，他表現出來了粗魯的士兵的風貌，他責備奢侈，這種奢侈是在朝廷中及政權上的他的先驅者左右起著支配作用的。代替在京都所培養出來的中國優雅的娛樂（音樂和詩歌），鎌倉的主人却在日本獎勵地釋軍隊的和運動的娛樂，比如狩獵、跑馬及其他等等。因此，在這種基礎上，幕府的新貴們，和以前貴族階級之間，從最初一步，就發生了相互的鄙視和疏遠。京都的顯貴們把源氏的左右看做「粗野的蠻人」，這些「蠻人」也嘲笑朝廷顯貴們的柔弱和怠惰。

源賴朝自己宣佈自己是將軍，名義上沒有侵害天皇的政權，並且形式上也是以天皇的名義來活動。對待以前的政治制度中最有實力的堡壘——寺院，源氏仍然實行了很慎重的政策。他沒有侵害這些

寺院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獨立。可以看得出來，造成這種政策的主要原因，是源氏對於自己的力量沒有充分的確信。他對自己的左右十分懷疑的。賴朝的親兄弟義經，他統率過賴朝反對平氏的軍隊，並且博得了光榮的軍司令官的聲譽，成了種種犧牲的犧牲品，並且還以賴朝的命令而被殺死。這位第一代將軍的許多別的最近的親屬，也都遭到了和這同樣的命運。

賴朝在西曆一九九年死後，致令樹立了北條氏的個人獨裁，第一代將軍的妻室是北條氏的女兒。北條氏的執政者、即所謂的「執權」，以將軍未成年的後嗣的名義來統治。（北條氏的支配，是從一二〇五年正式開始。）然而源氏所樹立的幕府制度，却依然毫無變化。封建領主分爲「公家」或公卿（他們處在對將軍政權消極反對的狀況中）和「武家」——將軍的家臣，這種分化是根深蒂固的。將軍和「執權」的政府，特別注意鞏固自己臣屬實際上所握有的那些領地。爲着阻止這些土地轉入「公家」、寺院和農民的手中，曾經以徹底的形式制定了一種法律：使農民附屬於土地，並且曾經頒佈了一種法律：絕對禁止把土地以任何的方式轉賣給別人。也會經禁止把土地來抵押，或因無力償還債務而把這些土地沒收。

西曆一二三二年，曾經頒佈了新的法典，一部法典取名貞永式目。這部法典和大寶律令不同，是以劍和其他的「武士德行」爲主要原則而確立的、封建制度的世界觀的典型的模範。主要是作爲調整

封建領主和臣下的相互關係的規範集，這等規範了的身世式目，軍事，及在「禮法」中，也尋求了實際應用的。

北條氏執權時期的特色，是把將軍（這個時期將軍繼續存在，並且從一二二六年起，為着利便的合法化，而由蘇我氏中來選任）變或了如阿蘇我氏統治年間天皇所保留的那種名義上的職位。延保不斷的陰謀，有時採取叛亂的形態，或是藉口為「復興」天皇的政權而鬥爭，或是藉口為將軍的「利益」而鬥爭，在北條氏政治制度存在的全時期都繼續了。

互相競爭的封建領主，彼此間進行了不斷的鬥爭，並且常常藉自己私人的利益，而僥倖用朝廷、將軍及實際權力者——「執權」的左右。所剩餘小的家臣破產了，若其促進了全國農民的貧窮。甚至「御家人」都陷於不足羨慕的生活，沒有力量保存自己的地區，並且不得已而把這些地區來抵押，或是秘密地把自己的土地來出賣，雖然這真是城當時的法律所禁止的。

在這個時期，商業和手工業開始起着重要的作用。稱家時期不同，她們已經不是帝都特有的附屬物，而在全國有極大的擴張。京都已經不是日本唯一的城市。大伴建領主，散發在利用手工業和商業，自前是要使自己的領地富足起來，對手工業和商業，這些封建領主對於工商業都是在能夠擴大捐稅。眼光下，來觀察的。在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事中，寺院也起了影響。

岸，佔領了對馬島和壹岐島，並且登上了九州島的海岸。比日本兵的人數更多及有着更高的軍事技術，保障了蒙古人很容易就戰勝了日本地方的封建領主。然而無情的颶風，却出人意外地毀壞了蒙古人的船舶，因此致令對日本頹利的侵略不得不中止了。顯然，這次失敗對忽必烈汗發生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在以後幾年，重新轉上了和日本外交談判的道路。但日本人口看到自己異常值得興奮的意外的「勝利」，執權北條時宗，把蒙古的使者斬首了。戰爭在一二七八年又重新爆發起來了，並且大約繼續了兩年，有着變化不定的成功，主要是因為忽必烈汗沒有直接參與這次戰爭，而是特派高麗人來進行。在高麗國王軍隊中開始的流行病，助成了日本人的最後勝利，甚至實行了部分的反攻（日本的陸戰隊登上了高麗的海岸。）交戰的兩方面都疲憊不堪，戰爭在一二八一年結束了，這次戰爭對於蒙古族侵略者是毫無結果的。

這些事件的最近結果，是全國更加貧苦和北條氏的中央政權更加削弱。和蒙古人作戰的主要負擔，都加到了農民和小的武士階級的肩上。而且，同時，戰爭大大地減少了鎌倉幕府的經濟富源，使他更加要依賴大的封建領主了。北條氏漸漸地喪失了在中央機關獨佔的指導地位，此外，執權的職位成了沒有實力的傀儡，喪失了管理國政的一切實際的勢力。

如同天皇一樣，以後，將軍也喪失了自己的實際政權，把這種實際政權，讓給了「自己的所謂

執行機關，最後，北條氏的「執權」也成了自己的臣僚手中的玩具。宮廷上關房的娛樂，這種娛樂在鎌倉幕府存在的初年間は嚴厲禁止的，現在成了北條氏第九代的執權高時宮邸下必要的附屬品。

中央政權的一般的削弱，是被這些深刻的原因所造成的：因為和蒙古人的鬥爭而來的普遍的破壞，日本西南部有勢力的封建領主團體的鞏固（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在擊退蒙古人侵略的事件中起了顯著的作用，一部分是因為手工業和商業在西南部有了迅速的和更成功的發展，尤其是商業航路的發展）；指導政權的那些要人們的墮落、僅僅加快了宿命的危機的爆發。鎌倉幕府的全部政治制度都遭到了這種危機。

對幕府普遍的不滿，因為「執權」的孤立無援和毫無權力，而加快地爆發了；執權的這些弱點，是在全國許許多多的天災、大量的歉收和時疫的聯繫中而暴露出來的。政府處理農民暴動的事件稍稍有點成績。母所造成的情況，却被敵視鎌倉幕府的那些封建領主的團體利用了。他們和京都的朝廷發生了關係。京都在這個時期，成了前任的天皇、僧人和未來的天皇、太子之間，循環的內部陰謀的糾結點。在京都，同時聚集有五個退位的天皇，他們都以某種程度，參加了個個封建領主之間的、自己之間的及和幕府之間的複雜的鬥爭。陰謀的中心是後醍醐天皇，他在自己退休的時候，強求把皇位讓給自己的兒子，這遭到了鎌倉幕府方面的反對，並且在短期的鬥爭以後，就被流配到了隱岐島。把

三個封建氏族：斯波、細川和畠山。一三九二年，肅清了在吉野的南朝以後，足利氏的主要改革，是傾向鞏固封建領主階級的地位，尤其是在經濟上使政府及他的支柱——封建王侯強盛起來。商業——高利貸份子活動的合法化、獎勵商業、保護商人免除個別武士的專橫，是經濟上鞏固封建政權的很重要的手段（因為根據那時施行的法典，武士比「商人」的地位高得多，並且在種種方便的情況下，武士都能夠擺出自己的特權地位，甚至搶劫和殺人）。足利氏的政府，自願地容許手工業者和商人的行會（座）和商號（問）存在，這些商號使大規模的批發商業發達起來了。

政府保護大商人，自然完全是由封建領主的利益出發的。獎勵商人，政府就有了這樣的可能性：商人們的財帛，無論什麼時候都能拿來對政府服務。而且，大封建領主也就有這樣的可能：依靠新產生的商業資產階級，來解決自己經濟上的困難。交易的業務，漸漸的停止了那種完全帶有自然的性質，而且發展了商品資本與貨幣的關係。

在這個時期，城市有了巨大的成長，這些城市執行着全國主要市場的機能。勸和兵庫，最先發達了所謂的放款業務。這種業務經過兩三百年後（在德川幕府時代），在日本有了巨大的擴張，他是在這種事務中成立起來的；個別的封建領主預先由商人取得一定數額的貨幣，這種數額足夠用來繳付中央政府的納稅及維持封建領主自己的開支。這位封建領主就允許商人，有權代理在他統轄的全部領

土上，由農民收集歸屬他的。一切封建捐稅。這種辦法，在足利將軍直轄的領地內，也照樣實施了。在封建社會的發達長出來的並且是被封建地主所擁護的商業資本，利用這種方式，十分殘酷地榨取了農民。被徵者所付出的數額，比再剝削農民而來的。哈法的。對地捐稅，要少五到六倍。在這下面，最效後的方式的商和貨幣，取走了空前的發展。因為封建權力者把地稅而和農民那裏奪取了全部收穫的放款者，又來對破產的農家，供給種子，以便在下一年裏再來奴役他們，放款者漸漸地變成了處分農民全部剩餘財產的事實上的主人。（日本封建社會的變遷）

商業資本的出現也在對外貿易上有了反映。以前日本海賊船襲擊大陸，主要是在高麗海岸一帶，這時已經不能滿足日本人了。建造了更大的艦隻，這種大艦能夠担任更遠的航程。日本的商人，也在中國成了常常到來的遊客。他們甚至到台灣、菲律賓及印度支那（安南和暹羅）有訂聯絡。大封建領主儘量獎勵海外貿易。足利將軍是一個商業資本的平個實例。他甚至同意在形式上減低自己的威望，奪權的更大的粉飾。並且要對自己的保護者允許信用放款。

商業資本的出現也在對外貿易上有了反映。以前日本海賊船襲擊大陸，主要是在高麗海岸一帶，這時已經不能滿足日本人了。建造了更大的艦隻，這種大艦能夠担任更遠的航程。日本的商人，也在中國成了常常到來的遊客。他們甚至到台灣、菲律賓及印度支那（安南和暹羅）有訂聯絡。大封建領主儘量獎勵海外貿易。足利將軍是一個商業資本的平個實例。他甚至同意在形式上減低自己的威望，

封建諸侯的富有，尤其是那些領有城市和港口的及知道有利地利用手工業和商業的諸侯們的富有，超過了將軍自己的經濟強化的速度。强有力的「座」和個別的商號，對於兩個主人的存在是沒有興趣的，因為他們要對這兩個主人納稅，並且他們不得不爲着自己的利潤而對兩個主人放款。這兩個主人就是將軍和地方的封建領主。那些住在京都並且受到將軍的照顧的商人們，妄想鞏固將軍的政權知識迅速地消滅全國封建的分裂性，確立統一的市場，制定一律的捐稅制度、貨幣制度、度量衡制度及其他等等。反之，那些把自己的福利建築在地方封建領主的扶助上的商人們，却堅決地鼓勵地方封建領主的地方分權的傾向，直接關心把自己的領土脫離將軍的支配而獨立化。一切商業資產階級代表們的命運，都和他們所服務的封建領主的命運有着密切的聯繫。

某些機械的封建諸侯的財富和權力，不斷地增大了。將軍由代表和保護他們的利益的「人物」變成了他們更加繼續強盛的障礙。正是在這種基礎上，漸漸地崩解着足利將軍的支柱。這種支柱起初是某些大封建家族，他們積極地幫助足利氏肅清了「南朝」，並且對於幕府政治行程有着顯著的影響。這些封建諸侯分立起來了，他們憑藉自己的實力，在很大的程度中，都不再尊重將軍的中央政權了。

最後，足利朝的將軍，幾乎沒有了支配全國的政權。新到日本來的外國人，這時期就在自己的掌

記中寫道：「在這個國度裏，有着若干頗大的王國」，證明了許多封建權侯事實上都獨立，就其地那些港口——和外部世界的門戶，領有着。和斯波、細川及畠山三大諸侯同時，一般承認的還有這些諸侯：山名、大內、土杉及其他等等。

，消解着足利氏的政治制度的別種同樣重要的因素，是農民階級主要大眾的叛亂和騷亂，除少數以外，他們都是二重地被剝削者：商人和高利貸者侵入鄉村及封建土地新所有者剝削和商業資本的利益與部結合。因此是到時期也奠定了長期農民戰爭的基礎。她是在十五世紀達到最高點的。除益田一人

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是在一四二八年在京師的暴動，這次暴動以後傳播了奈良。經過一年

在伊勢國、攝津國、丹波國、播磨國也都發生了同樣大規模的暴動，而且這些暴動都是在下述的日就下進行的：「國中不應當有武士」。暴動者擊破了封建領主派來反對他們的軍隊，僅僅最後，他們才得到了失敗；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充分的團結性和組織性。山城國也發行了類似的暴動。

西曆一四四一年，又捲起了農民暴動的新波濤，在暴動中，和農民大眾同時的領袖由武士們來的個別的逃亡者（浪人）。在浪人的指揮下，創立了許多有組織的軍隊，這種軍隊的名稱叫做「是經」，在反對封建領主的鬥爭中，他們是以極大的機動性和鞏固性而特別顯著。

不僅封建領主赤裸裸的壓迫引起了被壓迫的農民的騷亂，而且很多農民的暴動是實行反對封建

榨取的殘酷的形態的（例如由高利貸者方面來的榨取）；這些暴動，有的時候是在封建的口號下，在種種場合中都是在封建的表皮內，自然而然地發生出來的。

大多數農民從而走險的直接原因，是那種由高利貸者方面來的壓迫，高利貸者爲鞏固自己在鄉村中的權力，而實行加重農民的捐稅負擔。因此暴動的農民一項極普遍的口號，常常就是要求頒佈新的德政令，即是頒佈那種取消債務的法律。如果在過去，德政令的直接目的，是保護失去了土地的貧窮的小武士的話，那末在新的條件中，這種法令卻是和更加十分廣大的社會階層有利害關係的，這是那些受着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的榨取的階層（商業和高利貸資本在封建國家的庇護下繁榮起來的），自然首先暴動。大多數農民暴動的自發性，沒有力量正確地認識自己的階級利益，致令農民羣衆常常向封建國家（或甚至向個別的大封建諸侯）請願，要求保護他們免除更直接的，因此也就更可怕的壓迫者——高利貸者的專橫。在要求頒佈德政令的羣衆運動中，因此和農民同時，自然也參加了小的武士，有時甚至參加了城市的商人（小手工業者），這些人都是商業資本經常榨取的對象。因爲將軍不能，自然也不願意和商業資本發生衝突，頒佈新德政令的要求，普遍都是沒有得到滿足的。這種的時候，運動就採取了廣泛的革命鬥爭的性質，封建的軍隊也和武裝的教徒們進行了真正的戰爭。

西曆一四四七年，一四五一年，一四五七年和一四六一年內農民戰爭，取得了巨大的規模。暴動的農民焚燒了壓迫者的莊園，並且首先焚燒了各種的債券和借據。農民常常燒毀了和縣廳寺寺院與神社。

一四六七年，在內戰最高的時候，山城國有封建領主織田氏的兩個代表，因為大多數農民（如土上部分小武士、手工業和商人）組成了軍隊，來進攻這兩家畠山氏，把這一國攻破了，並且對他們提出了最後通牒：（一）把兩個敵人的軍隊由山城國撤去；（二）把土地發給人民；（三）把妨礙國內各區之間的交通的關哨撤銷。這些要求被拒絕了，暴動者就擊破了這兩家封建領主，並且在一四六八年樹立了農民的政權。以這種目的，在山城國的一個神社中（宇治平等院），召集了全體成年男子居民，選舉了山城國的管理者（總國御行專），規定了他的權利和義務的範圍，尤其是課稅的比率，確定了法律，設立了含有固定性的國民軍，來保衛這一國免除由封建領主方面來的外來的危害。雖然這個人民政權，從最初第一步，就是被內部的動亂削弱了的，顯然，這種動亂，因運動的參加者（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小武士階級）的社會異同性而惹起的。但山城國却在丹雫年（大概經過了七年）的期間，不知有封建諸侯和官吏，並且有有效地抵禦了自己的敵人。自然，這證明了封建制度的極度不安定和事實上沒有充分鞏固的中央政權。幕府不得不着手和暴動的山城國談判，並且最後說服了他們，承認了由京城所任命的守護。

說到這種事情是很有趣味的。有時農民也應用了這樣的特殊方式，來和封建的專橫鬥爭。比如如新

經京城和佛僧（國）的聯絡，用完全禁止輸入生產品的辦法，來組織一種的封鎖。

如同日本的編年史所指出的，所謂的宗教色彩而發動的「士一揆」，也有過相當的擴大，這些暴動的組織者，是多數宗教上的派別（這是大家知道的，佛教到現在有着特別多種的派別）。伴隨這些暴動而來的是搶奪寺院，但在最後，也發展到了制裁最可惡的封建領主及高利貸者，因此也能够看做是變相的農民戰爭。

農民發動極重大地削弱了足利氏的封建制度，在各城市及將軍的京城中所表現出來的外表的進步，不能不說全國巨大多數。民河伯的貧窮的情況。飢饉和流行病是日本幕末的實態。爲着表現社會的「瘡」在一個時期的割斷的情況，要充分引用日本的編年史正式承認的事實。這種事實是飢荒年間在將軍的京城（京都）發出的。一四五四年，在京都的街道上，每天發現了七百具死屍，這些人都是死於飢餓和流行病的。一四六二年，京都兩個月間大約死了八萬人。米雖設想出來，京城有着怎樣的景象。致死嬰兒的事件有着巨大的規模。買賣婦女和兒童的商業很繁榮。把女孩賣給娼家，把男孩賣給寺院，寺院中難產的事件是很流行的。

封建領主之間的鬥戰，在十六世紀有着特別大的規模，甚至達到了這件事情上是被充分分離的封建

政權，這種政權，以大封建巨頭為領袖的，他們除自己的政權以外，不承認任何的政權。在這時期，封建領主之間的鬥爭，顯然可以看出来，甚至他們的目的，都不是想佔領京城和獲得全國政權的外表。反之，每個封建領主都努力使自己的領土獨立起來，並且儘一切可能的辦法，藉犧牲自己的鄰人而使牠擴大起來。日本歷史中這個時期（十六世紀）叫做「戰國時代」。

早在一四六七年，就開始了封建領主反對足利氏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這次軍事行動，是在應仁元年的亂鬥的名稱下著的。這次軍事行動的外在原因，是因為排定輪流担任將軍繼承權的次序而來的爭論。整個封建的日本，事實上分成了兩大敵對的陣營，牠們之間殘酷地相互鬥爭了十年（直到一四七七年）。在應仁年間的亂事以後，日本澈底分成了若干彼此各自獨立的部分，雖然足利將軍名義上還存在到一五七二年，直到推翻了最後一代的將軍足利義昭為止。至於說到天皇，那末他們完全沒有提出表示自己還在活著的標誌。

強有力的封建諸侯中，到十六世紀中葉的時候，特別值得注意的有兩個，這是上杉和大內（山口的諸侯）。法國的耶穌教徒薩維，他是一位最初到日本的宣教師，在一五五一年到達京都的時候，寫過這樣的話：「日本那時最強大的權力者，是山口的王（大內）」。

個別封建領主之間的不斷的內戰，無終結的流血的衝突，這些事實，在那時日本生產力的狀況上

，有了極悲慘的反映，農民達到了極度的破產，耕地面積大大地縮小了，城市生活完全腐爛了。在這種狀況中，在封建的日本內部建立起來的商業資本的經濟地位，大大地動搖起來了。以前有一個時期，曾經被一部分大藩號所支持的個別封建領主的離心傾向，這時在商業資產階級中已經找不到大藩的擁護者了。因為封建諸侯如果無終結地進行戰爭，商業資本就不得不對這種戰爭，融通資金（首先是因為畏懼封建領主）所以就會喪失由於封建「王國」獨立存在而來的利益。這些封建「王國」是以前被商人所利用的，而離中央政權和在這個「王國」的範圍內絕對獨佔。這種獨佔不是變成商業資本活動的優許權，而是變成它的活動的障礙。爲着說明商業資產階級在日本這個時代政治上的薄弱性，必須去分指別這種事實。雖然有了幾十個城市，僅僅其中一個叫做堺的城市，有着西歐中世紀商業城市的樣式的獨立和自治。其餘一切城市，都不過是落後的，農業的諸侯領域的附屬品，並且具有任何的特權。

然而，爲着要對歷史過程的進行繼續地壓力，協助漸漸地消除因內戰而破壞的和崩解的日本的分裂性，商業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還是過於薄弱的。封建的日本求統一的鬥爭，這種鬥爭發生於十六世紀的後半葉，如果要想由薩長中間來找尋那種推動力，這却是不能理解的。「市場的需要，商品——貨幣關係滲透入日本社會內部的程度，都不能算是惹起了所謂的「日本統三者」的集團生活的主要原因。

因，這些『日本統治者』是三位封建的司令官：織田信長（一五三四年—一五八二年），豐臣秀吉（一五三六年—一五九八年）和德川家康（一五四二年—一六六六年）。

十六世紀末葉，日本所發生的『統一戰爭』的歷史過程的基礎，是封建階級和農民大眾之間的鬥爭。（顯然，這也不能除外，商業資產階級，在一定的階段上，他們也少積極地支持了封建司令官所實行的統一過程。）

早在十五世紀的時候，尤其是在十六世紀半前葉的時候，農民的革命勢力反抗封建領主（及和他相聯絡着的高利貸者與商人的寄生階級）的野蠻專斷的力益，跟封建國家趨於崩解，跟國內戰的發展，而同時並且平行地成長起來了。分裂的並彼此敵視的封建諸侯，繼續壓榨着他們統治下的農民。但遭到了由農民方面來的革命的反抗，這些封建諸侯顯得比以前更脆弱了，在以前的時候，他們能够憑藉那種在國家中具體化的全體封建階級的力益。大內、小杉及其他封建諸侯雖然富強，但他們却不能保障全國封建秩序的安定，不能應付一切的農民暴動。

封建的日本崩解了。戰爭、流行病、飢饉，不斷地蹂躪了這個國家。然而不是國民的不幸終結了封建領主，是封建制度本身的基礎潰壞了。

三個封建的『日本統治者』——信長、秀吉和家康，成了使封建的日本避免那種滅亡地死的危

檢的援助。他們當然要削弱那些對封建領土雜小的領地，使他們服從封建國家的利益。他們當然要使國家機構，要這種種小機關能用封建階級集中的力量來對付農民。

他們作爲封建統治階級代表的任務就是這裏，這個階級是逐漸有歷史舞台下來的。

第三章 封建制度的日本求統一的鬥爭

一 織田信長

織田信長生於一五三四年，是日本中部尾張國不大的采地的領主。這個采地的中心，是一個小城及其隣接的港市。采地的規模不容許這個小封建諸侯維持更有力量的軍隊。然而織田信長的親兵，却不僅是由小的武士——土地所有者所構成，而且也包括有叫做「足輕」的。即是由農民中所募集的步兵。雖然在別的封建領主的軍隊中也有「足輕」。但在他們那裏是純然看做補助的非正規的部隊。

在織田信長開始反對自己隣近的封建諸侯的戰役的時候，很難看出他有必須爭取統一日本的任何顯明地自覺的思想。很快就能夠看出來，織田氏出征的最初的動機，是個人的野心和擴大自己的領土的慾望。織田氏和個別的封建領主及大寺院進行了殘酷的戰爭，在這種戰爭的過程中，把那些反封建的份子吸收到了自己方面。商業資產階級並且甚至有一部分農民都擁護織田信長，認為他的侵略，是努力肅清日本因個別的封建領主而來的分裂性，並且認為這就會停止不斷的內戰及和內戰有關繫的人

民的災難。這種擁護就是織田氏成功的祕密，當時，織田氏從最初以比較更小的武力反對自己的隣人的行軍起，幾乎時時都得到了勝利。

西曆一五五八年，織田氏在自己的家臣及戰友豐臣秀吉（豐臣秀吉是由農民出身的氏族）的幫助下，出兵反對自己隣近的封建領主，並且因為軍事的迅速成功，而驚駭了所有的同時代的人們。在這裏，必須指出這種事實：織田氏是最初理解應用火藥發射的武器的利益的一個人，這種軍火，是一五四二年葡萄牙人帶到日本來的。西曆一五五九年，美濃國就被尾張合併了。以後，一五六〇年，織田氏殲滅了大封建領主今川氏，並且不久就征服了伊勢國，撲滅了更有勢力的敵人——北川氏。在這以後，織田氏勝了許多封建領主，織田氏攻入了近江國，一五六八年奪得了京都，經過相當的時期就把將軍貶黜了。

織田氏費了許多的時間肅清在京畿附近區域的敵軍的殘部，以及經營日本主要的島嶼——本州的中部，織田氏於是和那時最有勢力的封建諸侯——武田氏和毛利氏——直接對立起來了。

但織田氏在和這些敵人的勢力實行較量以前，他把不下的兵力，用在和另一個對他同樣危險的並極可惡的敵人的戰爭上，這個敵人是佛教的寺院。在織田信長走上積極政治活動舞台以後的最初時期，就對佛僧徒的關係說來，他早就懷有強烈的敵意，佛僧徒們是他的中央集權計劃的道路上障礙。

。如何。們以後看到的，織田氏在和寺院及牠們的勢力的鬥爭中，甚至利用別一種外來的宗教，基督教來和佛教對抗。基督教，是以克薩維魯首領的歐洲宣教師團於一五四九年首先帶到日本來的。

織田氏和佛教寺院的鬥爭史中，最有戲劇性的，一幕插話，是用突襲的手段奪取位在北叡山上的著名的佛。寺院。這個寺院有着巨量的財。並且就那時說來幾乎是不容攻破的軍事要塞，使他的任持能够統治周圍領土上的居民。北叡山寺院的僧徒，犯過寄生的僧徒們所固有的一切罪惡，這些罪惡是和對待農民的令人難信的貪暴有連帶關係的。因此當織田信長圍攻寺院的時候，附近鄉村中的全體居民，都把他當作救世主頌揚着，勸令這些僧徒們降伏。這種要求被僧徒們所拒絕，織田信長就於一五七一年，放火焚燒了這個寺院以及他的全體僧徒。

織田信長進行了勝利的戰爭，同時他也是一位非凡的行政長官，他是和利氏的制度下腐敗的行政長官大不相同的。在這裏，要特別說到織田氏的政治活動，是首先傾向保障商業的發展。他毫不寬恕地懲罰了搶劫和平的居民的士兵，這些士兵染有內戰時代的惡習的，他對城市加給了特別的注意，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在織田氏的時候，除以前原有的自由的城市——堺以外，出現了更多的，享有相當自由的城市，這種城市，承認織田信長的最高權力，並且在織田信長和其他封建領主的鬥爭中，織田氏給予了心甘情愿的金錢上的援助。屬於這一類的城市有堺、多、和長崎，這些城市後來對於日本

和西方各國之間的中介事業，起了重大的作用。織田信長關於城市的經濟政策，特別值得指出來的，是他傾向削弱大商人的商業公會（座），並且廢除他們的獨佔權，因為這種獨佔權第一會損害封建國家的最高政權，第二是商人資本束縛個別封建諸侯的輻輳。這些諸侯和商號締結了互相維持的協定（一方面，商人對諸侯融通資金，另一方面，諸侯許給他們在一定的領土上的商業獨佔權，或甚至把一定的領土拿來抵押。）織田信長在自己和商業獨佔制的鬥爭中，前進得相當遠，諸侯和小武士階級中間提出了這樣的極普通的口號：「自由貿易」。用不着說，這種「自由」當然要除外對封建制度土地所有權的一切損害，並且一般都不適用到土地上面。織田氏取消了大商人商業公會以前所享有的一切特權，撤除了起着稅關作用的地方上的關卡，頒佈了許多無情地懲罰高利貸業的法令。同時，織田信長更開始有成效地建築聯絡各國（有）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中，顯然，他是被兩種理由所指導：（一）這有很好的道路，織田氏就取得了這種可能性；能夠有成效地對地方上的封建諸侯加給敏感的打擊；（二）這路能够保障國內商業聯絡的發展，消滅日本各個部分的孤立性，這種孤立性是使封建諸侯相對鞏固的一項最重要的原因。這着進行戰爭，需要大量的資金，織田信長對於採金事業加給了特別的注意。這時候擴大了金銀礦山的開採，航運有了很大的發展，誠然，主要是爲着軍事的目的。織田信長和大多數城市商業資產階級（除去資產階級的上層份子——大商家，他們的命運是和封建諸侯的命運

有連帶關係的)的利益有一部分是一致的，也就創造出來了他們互相援助的前提。

然而，和這同時，織田信長却没有容許城市和城市商業資產階級有極小程度的這種可能性，避免履行他所給他們身上的一切的封建義務。織田氏對於一切破壞他的法令的人們，都毫不遲疑地嚴厲制裁了。這把最有勢力的城市——「日本第一個自由的城市」——堺拿來做例，尤其明白地表現出來了。

堺和外部世界自由商業交往的很古的傳統。早在西曆一三九〇年，最有勢力的封建諸侯不內，他堺堺的形式上的主人，承認了這個城市有權和中國及高麗進行毫無阻礙的及毫無限制的聯絡。很有信用的商號，他們是堺的真正的主人，常常把貨幣借給大封建領主，而獲得承認自己的權利並保持獨立，他們不希望把出外堺市的捐稅總額，按這樣的制度「來分配」，即是和封建領主管轄下的普通土地一樣來征收。

織田信長因為大商人資助他的敵人而憤慨，宣佈不容許這種狀況存在。他對堺市要求立即付出一額一萬串的貨幣捐稅，這個城市的事實上的主人拒絕了，並且知道馬上就有軍事壓迫，宣佈了動員，設法創立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是要有力來保衛城市的權利的。這是非常果敢的步伐，顯然，指導者確信：織田氏要去對付更重要的和更危險的敵人，因此堺就能够鞏固起來。事實上，織田信長這時正

在和封建諸侯三好氏進行頑強的戰爭。

織田氏以最後通牒的方式再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把捐稅的總額增加到了三萬五千兩。同時，他把自己的部隊向堺市推進，並且預先警告：只要不馬上繳付捐稅就準備燒城。面前斷絕的直接威脅不僅是自己的權利，而且其堺市本身的存否，商人們聽取了並且付出了所要求的數額。

然而，織田信長對這還是不滿足，並且提出了新的要求，這次要求是對「這個城市的父老」——最富有的和最有力度的商人提出的。這些商人將來每年應當繳付巨額的捐稅。這種捐稅是帶有經常的性質的。十個最富有的商人，認為自己是這個城市舊有的特權的發言人和保護者，反抗這種「專暴」，並且把他們的代表派去見織田，到了織田的城堡——安土——對裏面，爲着保護自己的利益。織田把這些代表們關進監獄裏。監禁了一個短時期，在他們企圖由監禁中逃出去沒有成功以後，就把他們完

完全判處了死刑。

西曆一五四二年，在九州島的南部海岸（種子島）附近，出現了第一艘歐洲的（葡萄牙人的）船，這艘船由當地的封建領主方面，受到了很好朋友誼的接待，這能够用這種原因來說明：在足利時代的末葉，對於國外貿易的關心，就在全國取得了太大的普及。把京都拿來做例，當地的封建諸侯，甚至不顧自己的危險和恐怖，企圖組織探險的探險隊，來搜尋對於海外貿易有利的對象。另另

面，葡萄牙人對日本也「很熱心的」，要想到這種情形：西曆一四九八年，即是在上述的事件發生以前的四十四年，葡萄牙人就發現了印度，並且在亞洲各國確立了自立的殖民霸權。）

在若干年的期間，葡萄牙船隻有系統地訪問了日本，已經不限於九州的海口。他們由日本輸出黃金，把軍火輸入日本。一五四九年，法國的某督徒克薩維，以替葡萄牙服務的宣教師的資格來到了鹿兒島，薩摩國的封建諸侯特別恭敬地歡迎了他，企圖他應允這事：葡萄牙替日本裝運商品的船舶，將來時常經過鹿兒島。

克薩維不能把這種保證給予鹿兒島的諸侯，對待他和他的同伴——宣教師，也就顯而易見了。薩摩國的諸侯禁止宣傳基督教，克薩維也就走向九州的北都去。到了平戶港，葡萄牙的商人早就把平戶選做自己的船舶的停留處。在平戶，克薩維的活動一下子就獲得了廣大的規模。他和當地有勢的封建領主發生了友好的關係，並且有幾十個日本人受了基督教的洗禮。信奉基督教的人們，成了葡萄牙商人的代理人，積極地協助了歐洲商品的推銷。克薩維甚至企圖在全國規模中獲得對自己事業的扶助，他曾經計劃了到京都去旅行。然而因為佛教僧徒的影響，這些僧徒把基督的宣教師看做危險的競爭者，克薩維到京都去的使命也就沒有成功。他僅在豐後國（在九州島上）建立了相當鞏固的基礎，他在這裏一直住到一五五一年。替代克薩維，根據他的號召，並且是以他關於日本有遠大前途的誇大

了的報告爲基礎，來丁人數很多的修道士，他們恰好碰到了對處他們特別順利的環境。織田信長和佛教的寺院進行了戰爭，並且在尋求同盟者，對於利用基督教的，思想很有很好的傾向。西曆一五六十年，在長崎，根據當地的封建領主大村的倡議，曾經建立了教堂，並且因爲希望一定的物質財富，和葡萄牙人的貿易，大村以限制的方式，迫使自己的臣民去接受基督教的洗禮。一五八二年，九州本地的基督教徒，計有十萬人以上。在這個時期，耶穌會的教徒華倫揚來到了京都，建議締結日本和天主教會之間的友好關係，派遣日本的專使到羅馬去進謁教皇。在這個時期，韓海外貿易發財的慾望成了織田信長的，九州的一個封建領主有馬，美嘉鄰近的港口長崎的繁盛，長崎因爲歐洲船舶到來，顯赫帶來了商業的繁盛及和道事有關的人口增加（達到了三萬人），這位封建領主親自加入了基督教，並顯取名安德列。耶穌會的教徒維列爾的傳教事業，有了很大的成功，他特別了辦日本封建領主的心，並且知道使基督教的教義適合日本人的見解，這種見解的形成，佛教起了主要的信用。佛教的權術們，多次企圖對基督教的宣教師實行斷然的反攻。他們獲得了頒佈禁止新宗教的法令，但在織田信長攝攝的時期却失去了效力。四個日本人和耶穌會的教徒華倫揚，曾經派到歐洲去，在梵蒂岡和利薩邦和馬德里晉謁了教皇，梵蒂岡正地關心日本，抱有廣大的計劃，使這個遠方的國家，和本地服從「教皇神聖的王座」。然而這些妄想却是徒勞無功的。甚至保護基督教的顧問們，也極

何一分鐘都不懷疑這裏；他們是起潛在他們手中的一定工具的作用，決不是和這相類的友誼。顯取了基督教師們所帶來的歐洲文化的某些成份，織田，尤其是他的最親近的左右，對待基督教也是和對這一樣完全輕視的。

織田信長的封建制度的獨裁，繼續的期間比較上不很長久，不過十四年。

織田信長十次最大的軍事勝利，是他的軍隊（是和德川氏共同實行的）殲滅武田信玄的兵力，武田信玄是日本一個極大的封建諸侯，武田氏因爲自己非凡的軍事才能而著名，也就認爲是優秀的封建制度的行政長官。不久以前，他殲滅了武田氏的競爭者和共戴天的敵人——上杉謙信的織田信長，也是把武田氏作爲軍司令官和行政長官而估計得非常高的。然而在軍事準備的最盛期，武田信玄却死去了，這使織田信長殲滅武田氏的優秀武力的任務非常容易起來了，因爲武田氏這些優秀的武力沒有了適當的領導。

和武田氏決算了的織田信長，立即開始準備和最大的封建諸侯毛利氏的鬥爭。織田信長已經成了日本三十國（由六十六國中）的支配者，但他還不能向前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確立對整個日本的指掌權，甚至也不能十分鞏固自己佔領了的領土，當時地平線上可怕的暗雲還繼續存在，這是毛利氏不可動搖的勢力，毛利氏，如同耶穌會的教徒所說載的，是一位「日本的國王」。這一類的鬥爭當然是更

困難的，因為毛利氏和那些織田死敵——佛教的寺院，締結了許多同盟的條約。撲滅和焚燒比叡山上的僧人的墓穴，對寺院加給了第一次嚴重的打擊。然而，織田氏對佛教別一個壘——大阪附近的——個非常繁盛的寺院——的攻擊，卻沒有得到決定的成功。防守着的僧人中間，發現了有才德的軍事指揮者，他保證了擊退織田氏的一切進攻，使織田氏不得不採取長期包圍的戰略。織田信長雖信毛利氏所以強盛的原因，不僅是因為他的鬥爭手段，而且也是因為他得到多數同盟者的擁護。所以織田信長就委託豐臣秀吉先去攻擊這些同盟者，並且把豐臣秀吉的軍隊推進到了備中國（岡山區），以便和長州的諸侯鬥爭，他的領地是位在戰略關係上最重要的下關海峽附近。然而正在最實際地準備和自已的敵人決鬥的時候，即是在西曆一五八二年，織田信長却意外地被謀害了，死在他自己一個最親近的戰友和司令官明智光秀的手中。明智光秀的部隊是去援助秀吉的，突然開回來了，並且遵照明智光秀的命令，來襲擊京都的本能寺，本能寺這座正用做織田信長的行轅。織田信長被害的同時，他的次兒子也被謀死了。

殺死織田信長的動機是不明白。大家都知道，明智光秀享有織田氏的絕對信任，因為織田氏信任原故，明智光秀才能由一個普通的武士，成了富有的封建軍隊的司令官。因為織田氏的死，暫時停止了剛剛開始的軍事行動。豐臣秀吉急速地回到了京都，並且做全力和毛利氏暫時妥協了。在這事成

功的同時，豐臣秀吉就推動自己的軍隊，來追擊織田氏的謀殺者——明智光秀，趕上了明智光秀的部隊並且把他消滅了。

一 豐臣秀吉

雖然豐臣秀吉是由農民出身，他的儀表，以封建原則的觀點看來，担任國家的指導是不相稱的；但對於織田信長的全面戰友却是明明白白的：豐臣秀吉担任他們領袖的繼承人，是最優秀的合格者。豐臣秀吉的軍事才幹是十分著名的。此外，大家也都知道，在政治能力的關係中，豐臣秀吉不僅不會比織田信長更拙劣，而且大大地勝過了織田信長。末了，豐臣秀吉本人也不想把優先權讓給任何人。消滅了明智光秀，豐臣秀吉就召集織田信長以前一切親近的家臣會議，並且提出了這樣的草案：利用任職織田信長的幼孫為將軍的方法。來確立自己的政權；織田信長這個幼孫，是在他的父親和祖父被殺以後保存着生命的。自然，豐臣秀吉預備担任這位幼年將軍的保護者，來獲實際權力者的地位。這當然不可避免地惹起了豐臣秀吉和織田信長其他後嗣之間的鬥爭，除織田信長的長子和織田信長一向託養明智光秀的手裏以外，織田信長還有兩個成年的兒子，他們都有自己的軍隊，並且領有廣闊的土地。這些土地是他們的父親分給他們的。

織田信長的第三個兒子織田信孝，和他父親的一位最老的司令，柴田家聯合起來，首先發動了反對豐臣秀吉的軍事行動。豐臣秀吉沒有調養特別困難，就撲潰了這次聯合。但因為預先得到以後的糾紛，他趕快由封建領主中來尋找自己的同盟者，甚至再由那些已經有了一塊根據地能夠做是自己的敵人的封建領主中，來尋找自己的同盟者。

西歷一五八三年的年底，豐臣秀吉在大阪建築了城堡。這個城堡就那時說來幾乎是不能攻破的。這奠下了現在日本最大的城市市長的最初基礎。目的是要把貨幣吸收到這個新的首府中來，他特別注意那些在舊港市場和博多的大商人，誘引他們遷移到大阪來。帶着這種目的，豐臣秀吉和那時著名的商家小西（在堺市）及神屋（在博多）進行了實際的談判。許給了他們許多特權，他由這些商業資本著名的代表者方面，認得了經常的資金融通。他而且承認了住在「自由」城市——堺的居民所享有的一切優惠，將來在大阪也絕對遵守。能够把這事提出來作為有興趣的描寫：豐臣秀吉在新的城市——大阪建築了新的街道（這地方以前是小得可憐的漁村），把這些街道按著名的商業地點的地名來命名，叫做：堺街、伏見街以及其他等等。

恰和預料的一樣，不久就結成了反對豐臣秀吉的新的聯合，這次聯合是以織田信長的第二個兒子——織田信雄為首領的，特別危險的是參加了德川家康，他是有勢力的封建領主和將軍司令官，在

織田信長時代曾經是信長最親近的戰友。所進行的軍事衝突，暴露出來了豐臣秀吉沒有充分的力量來獲得勝利。由自己的敵人方面受到了重大的損失，因此他愈來愈尋求光榮的妥協，這種妥協終於得到了，同時，他承認了自己的敵，享有名義上的「平等權利」。

在這以後，開始了豐臣秀吉多次有成績的侵略戰爭的時期，這些戰爭，是反對那些封建諸侯，他們事實上是還站在脫離中央政權而獨立的狀態中的。他連續地進行了四次大規模的出征，這幾次征戰把他造成了日本的主人。完成了織田信長開始的統一的過程，豐臣秀吉肅清了四國島的獨立，剿滅了封建世家長會我部。以後，他計劃了對南方的更大的征討，在南方，掃蕩了毛利氏的強有力的同盟者——薩摩的諸侯島津氏。豐臣秀吉第三次大規模的征討，是一五九〇年在小田原附近的戰鬥中，撲滅封建領主北條氏。第四次是對奧羽國的大規模的北伐，徹底粉碎了封建世家伊達氏。

早在自己南征薩摩的諸侯島津氏的時候，豐田秀吉就碰到了所謂的日本基督教問題的危險。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九州島，因為關心葡萄牙的商業的南方封建領主的態度，對是從西方來的宣教師是特別順利的場所。耶穌會的教徒在商業、賄賂、一切可能的陰謀的幫助下，獲得了巨大的勢力。在九州，耶穌會的教徒和佛教僧徒競爭沒有不勝利的。

織田信長的死，沒有立即改變豐臣秀吉方面對基督教徒的由宣教師的友好關係。豐臣秀吉曾經是

織田信長和佛教寺院鬥爭中的有力參加者，他比織田信長更加功利地處理了宗教問題。把葡萄牙人看作是看做有利益的商業當事人。因此豐臣秀吉設法和佛教寺院調和，不過是希望由他們那裏，消除那種企圖和敵視他的封建領主同盟來反對他的熱望，但同時却又獎勵了基督教徒，是視有利地來利用他們。然而在南征的時候，豐臣秀吉首先和「信奉基督教」的稠密的居民衝突起來了，這些居民真目地信仰耶穌會的教徒，公然表示自己不願尊重日本的風俗，並且拒絕服從「異教的」政權。結果，豐臣秀吉對南方各國的權力者，提出了五項著名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和基督教在他們那裏流行有聯繫的。這些「問題」據說是：（一）耶穌會的教徒會否強迫日本人信奉基督教？（二）耶穌會的教徒因為什麼唆使自己的信徒破壞日本的神社？（三）因為什麼迫害佛教的住持？（四）基督教徒因為什麼把對人類有用的動物，尤其是耕畜的內用做食品？（五）因為什麼允許葡萄牙人由自己那裏把日本人拐運出去，並且把這些人在印度變成奴隸？對這些問題的答覆，豐臣秀吉認為不滿意，西曆一五八七年，頒佈了這樣的命令：在二十天內，驅逐耶穌會的教徒及歐洲別國的宣教師出境。這種命令對商人不用。

但要去掉基督教徒却不是這樣簡單的。耶穌會的教徒實行發動了自己一切的手段，使豐臣秀吉的命令歸於無效。教士都來極緊張地從事商業活動，以便避免受到傳教和違犯日本法律的檢舉。事實上

不過封閉了一部分基督教堂。

這一切不過表示延期吧了。西曆一五九三年，一羣西班牙人——佛蘭茨克派的教士——來到了日本，這是不斷的政治陰謀的起始，西班牙人企圖用這些手段來恢復豐臣秀吉政府對自己的競爭者——耶穌會教徒的反對，藉這些陰謀來證明耶穌會教徒對於日本的不忠實。相互指摘的結果，在這種指摘的過程中，曾經揭發了：歐洲人在基督教宣傳的幫助下，準備開來軍艦並佔領日本，這種計劃是確實存在的並且早就進行了。在朝鮮從軍重大戰役的豐臣秀吉，命令與基督教徒——叛亂者和反逆者——斷絕關係。西曆一五九七年，他頒佈了斷然禁止基督教的命令，並且基督教兩大陣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中的每一個陰謀家，都被許多的鎮壓所壓服了。大約有八十個基督教的傳道者，曾經被判處了死刑，教會都被破壞了。封建諸侯在處刑及沒收財產的恐怖下，禁止信奉新的宗教。全體耶穌會的教徒（他們的人數在全國有一千五十個人以上，）都被限令即時出國。

豐臣秀吉事實上統一了整個日本，以專制君主的資格統治了日本，但對於他最特別的，是傾向於免和封建諸侯的關係尖銳化。他由封建領主方面獲得了對自己的最高權力的承認。豐臣秀吉努力獲取對自己事實上的指導權的普遍承認，用不着佔有國家政權的外表的標誌。豐臣秀吉最特別的，是以宰相（關白）的地位為滿足，並且不自己宣佈為將軍，他樹立了一種最高的協議式的管理制度，這下面

參加了最大的封建領主的代表者。中央行政機關，首領，是站着兩羣「五大臣頭」：一、所謂的「五大老」和「五奉行」，他們有權監督官吏的行動，及以這樣地觀點來監察封建諸侯的行動；他們是否違背中央政權的命令。第一羣五大臣頭（五大老），是由一些對於豐臣秀吉危險的封建諸侯的代表來擔任，這是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輝元、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第二羣五大臣頭也都是幕僚的諸侯。（譯者註：「五奉行」是前田玄以、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淺野長政。）顯然，豐臣秀吉認為這種制度，比較無掩飾的個人獨裁，更加能夠充分保證他所創立的封建秩序的鞏固。豐臣秀吉唯一熱心保護自己的獨佔權的，還是靠據駐在京城區域的軍隊的指揮權。京都一切軍事的和行政的權力，都整個地由「關白」掌握。豐臣秀吉實行了許多內政上的改革，這些改革都是織田信長的重要政治方針的繼續和深入。（激勵日本各區域之間的聯絡，和各國（省）的獨立性及隔閡性鬥爭。）他着手準備自己所策劃的對亞洲大陸的遠征。

關於豐臣秀吉出征朝鮮的原因，文獻中有着若干推測。在一切情況下，僅由豐臣秀吉個人所渴望的侵略者的光榮中，來尋找這些原因，這是不夠的。日本在豐臣秀吉很早以前，就把朝鮮看做是容易獲利的可喜的泉源。日本的海盜常常掠朝鮮的沿海區域。港市堺和博多，不僅是在和海外貿易的，正直的，商業基礎上成長起來的，而且也是海盜凶猛地侵入朝鮮領土的倡導者。朝鮮（譯者

註：西曆一三九二年以前叫做高麗，常常起着強盛而且文明的中國和比較野蠻的日本之間的緩衝地帶的作用。然而朝鮮在軍事關係中，却也不是有力量大的國家。在忽必烈汗的時期，當時的高麗國王，曾經在蒙古人軍事征服日本的事件中，被迫做了中國的藩人，日本人確信戰勝朝鮮是不困難的。朝鮮對中國經常的臣屬，把朝鮮的國力更加削弱了。日本海盜的襲擊，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過去都是沒有受到懲罰的。之，他們却常常引到了這種狀況：日本人能够暫時在朝鮮的沿岸一帶鞏固起來，對當地的居民加以威脅。日本流行很廣的征服朝鮮（譯者註：那時的朝鮮是有着三個國家——新羅、高句麗、百濟）的神話，這次淨延好像是日本的女皇神功皇后所實行的，（在日本歷史的曙年期，西曆二世紀）這種神話，是有欠以後日本人盜賊般的侵入這個「最初平靜的國度」的意識形態的創始。因此豐臣秀吉決定實行封建領主和封建商人早就想念的對朝鮮的出征，（朝鮮是比較更富足的，因為他更加十分接近地接受了中國的文化）引起了豐臣秀吉屬下的絕大多數諸侯的擁護。

然而，除這些總的原因外，對於豐臣秀吉非常重要的，是利用把封建諸侯引入侵略外族的遠征中的方法，來鞏固他所達到封建領主對中央政權的服從。豐臣秀吉預定在對外戰爭中，來替那些意願的，但對於他還是危險的諸侯，找尋他們的那種「武士本性」的出路，這會使諸侯們衰弱下去（無論戰爭有着如何的結果）並且會更加比任何時候都服從中央政府，即是服從豐臣秀吉。

特別值得指的，是豐臣秀吉選擇了「經濟的」理由，來用做和朝鮮戰爭的直接根據。他把使者派到了中國皇帝那裏，是爲着締結對於日本有利的通商條約，得到了拒絕，他就把同樣的提議送達了朝鮮國王，主張說：因爲朝鮮是和中國聯絡的屬國，所以應當負責調查中韓日間的談判。朝鮮國王誠懇自己的宗主國君主——中國的皇帝（明神宗）發怒，斷然拒絕了豐臣秀吉的挑撥的要求。

這時，豐臣秀吉就於西曆一五九一年一月，宣佈開始出征朝鮮。並且召集了他自己的軍隊，以及那些由個別的封建領主的親兵所編成的軍隊。他對封建的諸侯們宣佈了：出征的最近目的是佔領朝鮮。

然而，最後，在日本的面前，是立着征伐整個中國及把中國領土分給日本諸侯的任務。豐臣秀吉親自參加了出征，把政務交給了自己的養子秀次，由他來代理關白的職位。豐臣秀吉自己領有了新的職位——「太閤」（總理大臣），他是在這種名稱下在日本歷史中著名的。

在封建領主宇喜多秀家統率下的十四萬日本軍隊，在朝鮮的海岸釜山附近登陸，並且開始進攻，把小西行長和藤清康指揮下的兩支軍隊派做先鋒。日本兵很快就達到了朝鮮的國都京城，並且佔領了全國的大部分。然而在海戰的時候，豐臣秀吉却遭到了嚴重的失敗。朝鮮的艦隊是由十分大和和裝備得很好的船隻所編成，艦隊的統領是有名將的海軍大將李舜臣。朝鮮之道的封建諸侯（譯者註：朝鮮的水庫大將是李舜臣）他在東江口的海戰中所殘滅的日本艦隊的船隻，約有一百多艘小船。然而日本海

軍的這種以托，却没有決定的意義。

當日本人擊斃了人數不多的中國軍隊的時候，這些中國軍隊是派來對抗日本軍隊的，是派來保護屬國避免「野蠻人」的侵擾的；這時候，不與朝鮮，而且中國也已經引進了軍事行動裏面了。

朝鮮——中國軍隊的失敗，末了，使那些不願從專長戰爭的中國封建領主，不得不預行和平談判。在這些談判的時候，事實上是在日本和中國之間來進行，豐臣秀吉提出了許多掙扎性質的要求。尤其是要求把朝鮮一半的領土（八道中的四道）割讓給日本，在這以後，日本爲着「表示對中國友好」的情感，「把朝鮮的京城及其一半的領土，交還朝鮮國王。這些狂妄的要求，是帝國主義的日本帝國承認的那些類似的要求的最早的標本，這些要求被朝鮮政府拒絕了，也被中國政府拒絕了。談判拖得很久。豐臣秀吉離開了朝鮮，並且回到了日本。戰爭依然繼續了一個時期，是有着變化不定而持續的。然而在最後，日本人的軍事「遷變」了，朝鮮的軍司令官之間發生了爭執，這逐漸加上那種由於戰爭的拖延性質，及和這有聯繫的種種情況而來的軍隊的疲勞，召集了大量的兵力，中國軍隊在鴨綠江上，對日本軍隊加給了重大的打擊，結果竟殺滅了小西行長師部隊。這成了佔領者廣泛地退却的標誌。日本人「關了朝鮮」，將分兩領土，並且退出了京城。

西曆一五九六年，中國的使者（譯者註，是沈惟敬）在豐臣秀吉的駐城大阪，會見了豐臣秀吉！

並且對他交給了一封中國皇帝（神宗）的國書，中國皇帝同意了許多新的並且一般都是對日本有利的和平條件，對豐臣秀吉為日本國主，在這裏，就對日本一國王位的關係說來，中國皇帝是站在宗主國的主動地位，如同他對朝鮮的關係一樣的。也許是因為這種原因：中國人預備用種種手段來救豐臣秀吉，承認他在日本唯一的權力者。然而，豐臣秀吉却認爲中國這種把他作爲臣屬建議，是把他侮辱了。他斷絕了談判，並且宣佈重新對朝鮮進兵。派小早川秀秋擔任空軍的總大將，在作戰半年以前，日本方面發展了很大的優勢。然而，對朝鮮的出征當然不久就結束了。他的主要的鼓勵者和組織者豐臣秀吉，在西曆一五九八年九月十六日突然死去了。

豐臣秀吉的入格，在日本，時常都從資產階級陣營中多，歷史家、文學家、經濟家方面，引起了特別的注意。他們試圖在某種程度中，把豐臣秀吉看做未來一個偉大的帝國主義日本的前任者。他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就奠定了日本大陸版圖的根基。大家相信豐臣秀吉的計劃，不僅要使朝鮮和中國服從日本的統治，而且準備佔領台灣和菲律賓。他曾經發出了建造大陸版圖下分證種的計劃。在這些條件幫助下，日本軍隊能够達到上述的海島上去。

豐臣秀吉雖然是一個農民出身，但是封建武士貴族的日本顯著的代表者，他使封建上貴族的日本進到了鼎盛，並且爲着鞏固封建武士貴族階級的統治，而創造了強有力的中央政權。

豐臣秀吉造就自己的出世說來是農民。他從很早的童年就過着軍隊的生活。他個人對於束縛在小的可憐的地區上的，因為主人的壓迫而不等的零落下去的農奴的命運，沒有深刻的印象。和封建關係鬥爭，豐臣秀吉任到一分錢也沒有企圖傷害封建社會關係的基礎。之，他却努力鞏固和扶植他們，關心封建制度的安祥。城市和大商號商業資本的代表者，由豐臣秀吉方面所享有的那種同情，首先是被這種事實說明出來了。豐臣秀吉理解了貨幣對於創造鞏固的，多少中央集權化的封建政權的力量。

豐臣秀吉在自己的城堡附近建築城市，不僅是渴望商業和手工業的興盛，以及用商人的財帛來保障封建領主，而且利用城市的文化來改善他的部隊，武裝和供應。沒有別什麼事情，能够比這更鮮明的表現豐臣秀吉的社會思想：他對農民，手工業者以及一切他不屬於封建階級的人們，發出了不只一次的和嚴厲的命令，禁止他們攜帶和保藏武器。毫不留情他制裁了對於他的危險性的競爭者。封建諸侯，豐臣秀吉卻常常表現了那種溫和，就性格說來這是對他毫不相稱的。寬怒，甚至讓他自己不久以前的，但是衰弱了，和沒有了危險的敵人。如果他們是屬於封建貴族的話，在這種關係中，豐臣秀吉甚至在自己權威極盛的時候，也表現了尊重封建領主的情感。大家都知道，例如，有過這樣的

情形：豐臣秀吉曾將建築紀念碑，來祭奠被他本人所殺死的封建諸侯島津。……

豐臣秀吉在出征的狀況中是很豪橫的。他自己的邸宅的豪華却蓋過了是利時代，並且在盛唐上。

密地保存了和維持了封建的傳統習慣。

豐臣秀吉突然患病和死亡，極嚴重地提出了關於他的繼承者的問題。集中在他手中的巨大的權力，他臨終曾經吩咐讓給他的年幼的兒子秀賴，在秀賴成年以前，應當由五大老的會議來治理。出征朝鮮的時候，豐臣秀吉曾經派定自己的姪子秀次做他的代理人，起初他預備把秀次做自己的繼承人。由朝鮮回國後，豐臣秀吉和豐臣秀次發生極激烈的衝突，結果，秀吉把秀次殺死了。由「儀式上」來判斷，這次行為曾經採取了遺囑的形式，秀吉命令自己的姪子「自殺」。這事發生的不久以前，秀吉的許多妻妾中的一位，生下了他的兒子，叫秀賴。秀吉決定把秀賴做自己的繼承人，並且編製了養育這個嬰兒的詳細的指示。豐臣秀吉在自己臨死的時候，委托秀賴的母親和五位最大的諸侯來監督他的兒子，嚴格地吩咐不准離開他所給予的指示。

這五位代理執政者中間，最有勢力的和最有權威的是德川家康。

三 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織田信長的一位戰友，並且被認為是豐臣秀吉最早的競爭者。

豐臣秀吉能够保障自己個人的權力，避過德川家康方面來的危害，因為他承認了德川家康是日本

東部各國（所謂的關東）近於獨立的領袖爲代價。德川家康在東部各國集中了大量的財富，並且建築了（西曆一五九〇年）城堡——江戸這個城堡就那時說來是幾乎不能攻破的。

德川家康早在豐臣秀吉活着的時候，就成了日本最富有的封建地主。在豐臣秀吉統治的最後年間，全日本的穀米收入，大體約有一千一百萬石。由這筆總數中，有三百萬石以上的米穀，是用自德川家支配下的各國。因此，當豐臣秀吉臨死的時候，特別讓打德川家康做他的兒子的保衛者和庇護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如果沒有這種讓托，德川家康就會照自己的倡議，而成爲死者「遺囑執行人。」如何預先料到的，在豐臣秀吉死了以後，五大老中間很快就發生了重大的爭議。德川家康立即要求其餘的各大老服從自己的特殊勢力。死去的豐臣秀吉的一位最有才能的職友——石田三成，起來反對德川家康的這種行爲，責難德川家康破壞了豐臣秀吉的遺囑。西曆一六〇〇年，形成了兩個敵對的團體，這兩個團體是以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爲首領的，他們都各有一羣封建地主做基礎。

一六〇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在美濃國關之原附近的戰鬥中，德川家康完全殲滅了自己的敵人，並且實際上確立了自己的獨裁。

經過了相當的時期，表面上依然保證豐臣秀吉一法的繼承人——豐臣秀賴。但不久以後，德川家康就拋開了種種假面具，並且在西曆一六〇三年，自己宣佈自己是將軍。

這個日期，在日本歷史中，算下德川幕府的封建幕府統治時期的始基，德川幕府在日本的統治期間，大約經過了兩個半世紀。

經過了兩年，西曆一六〇五年，德川家康讓備地放棄了政權，把政權交給了自己的兒子德川秀忠，藉自己的退位，來鞏固自己的家族所得的統治權。形式上，這是藉下述的事實來辯解：德川氏是和姓源氏的氏族有着親屬關係，而源氏却是日本第一次幕府的創始者。

這不但是全體幕府領主都對這件事情滿意：許多封建地主，都期待豐臣秀吉的兒子豐臣秀賴成年的時候，起來和德川氏爭奪政權，而德川氏獨裁的不滿，因為德川家康所實行的一攬子自己個人的封土，而愈其加強起來了，這種擴張，在他勝利以後馬上就開始實行了。年幼的豐臣秀賴的姓名，被德川氏的人們，用德川氏自己力量而抹殺了。秀賴和家康的公開衝突，由於德川家康禁止豐臣秀賴舉行新神社開光的儀式，而爆發起來了，這座神社，是秀賴建築起來紀念父親的。豐臣秀賴和他的同謀者逃到了大阪，設在大阪的城堡裏，準備和自己的「保護人」進行嚴重的鬥爭。而曆一六一四年，德川家康用突襲的方法，攻陷了大阪的城堡，並且在這一年的年底，徹底毀滅了對自己不順意的那些封建領主的反抗。豐臣秀賴自殺了，德川氏的政權徹底鞏固了。當初日本軍閥強國頭人而到而官求都德川氏最親的政策，是努力儘快地結束朝鮮的戰爭，這是沒有什麼困難的，因為中國和朝鮮也都

豐臣家停止這次戰爭

雖然豐臣秀吉的死是在朝鮮戰爭最艱苦階段的時候，（當時日本軍隊遭到敵人的壓迫而有系統地退却了），雖然這次戰爭致令日本全國七分疲憊，（這次戰爭起初是順利的，但是拖延得很久），並且是有成天敗的危險的，然而豐臣秀吉所留下來的遺產，却不能說是很困難的。豐臣秀吉偉大的行政改革，使日本頭一次在歷史上形成了有組織的國家。這個國家有着中央集權的官制機關，有着多少關聯于財政——租稅的經濟。德川家康能享受豐臣秀吉所進行的這些工作的成果，規規矩矩地收地，在農林、手工業者 and 商人之間課稅，也能享受豐臣秀吉所施行的一切最精細劃分的總結果。這種經濟及社會生活一切方面，都形成了極其嚴格的組織，後來成爲德川幕府政治制度的一項特徵。這種政治制度，是豐臣秀吉的政策中早就奠定了基礎的。他對農民、手工業者及商人的分工許許多多的限制，設立了二級制度——以階級（武士階級）、農（百姓）和「民」（町人），町人是說商人和手工業者。

德川氏的對內政策，沒有超過在豐臣秀吉時代就有了發展的計劃的範圍以外。德川家康是絕對不及豐臣秀吉的人物，日本許多資產階級的歷史學者，僅僅根據在德川家康時期形式上完成了創造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過程，就把封建制度日本「組織者」的資格完全歸功於德川家康，這似乎是弄錯了的。

這種過程的完竣，是被歷史發展的一切先驅行程準備好了的。如同歷史唯待論者所指出的，德川家
藏瀨川的財力，此種將軍官制而政長階的整頓，在更助大變化的程度中，並幫助他成爲幕府政權的
並著，此種至關之原形，並助其成爲幕府政權的基礎，並助其成爲幕府政權的基礎，並助其成爲幕府政
上供用的才力，並助其成爲幕府政權的基礎，並助其成爲幕府政權的基礎，並助其成爲幕府政權的基礎。

第四章 德川幕府（封建國家）

德川家康所建立的、在第三代的將軍德川家光（從西曆一六三二年起掌握政權）時代取得了充分發展的、德川幕府的政治制度的基礎，是保存鞏固的封建關係，這種封建關係確定了農民的被壓迫地位、商業資產階級的從屬作用、貴族階級的絕對統治權。

有二種主要的因素，確實威脅了這種封建制度的安定性：（一）農民反對封建領主的階級鬥爭，這種鬥爭常常採取農民武裝暴動的形態；（二）從可能的外國人身上侵略者方面來的外在威脅，這些侵略者是利用商業和宗教來活動的；末了，（三）封建領主陣營地的內戰的危險，這種危險會使他們在農民革命暴動的襲擊下而削弱下去。由於考慮到這些危險，所以豐臣秀吉以及德川氏的政策是：（一）儘量把農民約束起來並且不許農民有組織起來的任務境容；（二）嚴厲監視外國人，並且把他們的鬥爭關係起來；（三）禁止武器、騎馬、封建建築等這些關聯以及取他們的和政府的密切的相互關係等不許在河一個封建諸侯推測極重要的地位中，並置把地與領土的獨立權保持；（四）在幕府強納封建世家與武士的手中。

四川紙的政權，對農民問題加給了極大的注意。曾經實行絕對禁止各種類別的人民攜帶和保有武器，但後來由於階級除滅而面這不止這些事情，對建領主努力把農賦變成絕對無差別的賦款，叫這些賦款

雖然種種土地稅，但向農民他們徵收各種可能的捐稅，這就使建領主認為，如果使農民終於在較好的生活，使

他們因為艱苦的勞動而疲憊不堪了，那末就會損害他們的反抗的意志，並且社會（武士階級的社會）

也就能够太平地存在下去。如果發生了農民的動亂，那末因為這就一般的意味，對付他們也是很容易

的。

爲着達到這種以封建領主的觀點看來的理想的狀態，曾經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手段。他們一方面用

加着各種可能的納貢和捐稅的方法，來降低農民一般的生計，來減少農民的反抗，用這用政治的法規制度，來

直接干涉農民的經濟和經濟生活，並用種種方法，來減少農民的反抗，亦或用武力來回擊農民的反抗。

（一）請儘法制的關係，對封建領主的切方面，禁止農民把茶田做食糧，或爲着修葺。他們應當去

吃硬糧，吃硬飯，吃硬的日子，是例外，這些硬飯硬吃，硬日難做，則糧食的米飯。禁止農民穿絲綢或

麻布衣服，他們僅僅能够穿棉布做的衣服。這種限制，被以後的將軍更進一步地規定了農民用的布疋

的格紋和顏色，都是做法律嚴格地規定了的。這些對禁止農民建築舒適的積欠的住宅，禁止用油澆及喇

喇者多起來，修繕住宅。禁止農民做廣樣的娛樂，演劇，肉肉及其他等，禁止農民互相訪問，舉行禮

種的儀式(婚禮和喪禮)都必須遵守舊有的規則。例如其嚴禁結婚使用花錢。在凶葬或病某種
 天波的時候。這法律就成訂更如嚴厲的。在這種情況下禁止製法和買賣米酒。種種不同的點心而
 種的必因為這法律而致其不獲守規則的損失。這證明值得想思知。是封建領主們在保護其農業
 和商業。雖然詳細地制定且其各種成層的活動範圍。並且採取種種方法。努力使農民不致變去其
 的「特點」他們是除舊封建領主的收賦和苛捐的。全類农民的經濟實質就是農民之。在這種狀態
 而並不論於封建統治階級的居民的其他成層。他們的地位比農民的地位。在法律上是同樣沒有權力的
 然而事實上對商業家階級的經濟的善後地。他們應其其階級和統治階級。能影響其階級而影響

變。

日本農業的經濟地位

德川氏和豐臣秀吉不同。不是把全體居民分做三種等級。而是分做四種等級：武士、農民、手工
 業者和尚人。在這時候。商人階級在封建階級中最低微的。然而事實上對封建階級最重視
 他們的利益。在這種關係中。德川氏的政策。是豐臣秀吉時所不能確定的。階級的階級(地位)
 城市階級是德川氏的階級。階級(地位)被時。這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
 的階級
 們經常必要的是款項和代腳收稅人。也是這階級比較重要的原因。這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

隨，依附清寡解，他們對於自己的活動沒有發言權也沒有廣大的範圍。和江戶箱板，把經有了相當的
 「自由城市」的傳統精神的狀態。雖然形式上自由無條件的。大阪都本會是和縣類似的自由城市以
 免成了努力保護自己的特權的更迫注的頭人階級的堡壘。結果，大阪很快就成了全國一切商業活動的
 中心。大阪有最有勢力的批發商人的聯合會，重要的商品堆棧，他們不僅屬於商人，而且也屬於封建
 諸侯。這些人們都把自己的商品生產，採，漆，漆製品，紙，紙其他等等。而到打大阪是為隨在產
 中心市場上來觀看，雖然物價的基本標準依然由米，但着幣知比是利時狀取得了很大的普及。這些人們
 對於封建領主地，都努力把自己一部分的收入變成貨幣，這些收入當他們收來的時候却是米穀。
 因此大阪商人的對批發商人的業務，取得河游湖重要的意義。他們把貨幣付給封建領主，來
 換這些封建領主由農民那裏收集來的米穀。這也就使同商人的「賦性階級」的親自去從事解體的。
 以法律上封建主義的體面的觀點看來，商業任務。而商會與商會，經營者與商會，來取
 人，專門經營這種業務的大阪的資產階級，取得了這樣的名稱。而商會，這種商會，因為接受諸侯
 們將來的米穀收入做抵押而對他們借通資金。對地防止的封建領主，出了極有力的經濟壓迫。雖然幕
 府的法令限定和「奢侈」們等，並且形式上禁止全體市民，其中也包括商人的「穿絲織物的衣服」，用金
 和銀的器具，建築高的房屋，高過兩層以上。但事實上，財富和奢侈品却都集中在大商人的手中。

商和政府的關係。法律與實際之間的顯明矛盾，即毫無辦法。

商人們現在制定武裝時代就保有的重要特權，是政府承認他們有聯合組織同業公會（米仲間）的權利。這種同業公會，有時甚至機械地由同一項職業的人們所組織（手工業者職業團體的類型）。但商人的同業公會，即享有最大的勢力。這種同業公會，是由買賣同類的商品，或在一定的區域中活動的商人所組織，如果對於手工業者所行公會不產，政府曾經實行了嚴格監督和干涉的方式。來規定市場而生產的出產品的性質的話，那末對於商人的同業公會（米仲間），他卻給予了許多的特權，並且在這種情況下，設法避免和組織的商人發生衝突。封建領主的收入份額擴大或縮小，都是和這些商人有着連帶關係的。

在蘇聯，米仲間的商人叫做米流。他們由取得米權的武士們購買米穀，對於他們，也和對於大規模的商運一樣，蘇聯很少實行濫用米價；這時，對於零售米流，政府官吏的干涉卻是普遍的現象；當米價漲到最高的時候，政府就實行了干涉並禁止販賣。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種價格的調整對於勞動的困難地學商用的，禁止任意要求很高的工資。

干涉業者及其他屬於「市民」的商人頭下的人們的狀況，比商人階級助狀況是惡劣得多的。就對他們的關係說來，法規是毫無例外地完全有效的。毫不害怕對自己有任何不愉快的後果的武士們

對於市民以擴張自己的權威，並且做出了種種無法無天的行爲。政府的官吏們自命是全國的主任，他們能輕易限制地表達自己的意志。當然，因此城市中的平民，不只是一次地對德川氏的政治制度表示不滿，並且有時甚至和農民同時發起反政府的暴動。

關於市民對政府還須說到這些知識勞動者的羣體。教師、醫生、藝術家。他們主要是由封建階級出身的者。其是在以後的時期，當時派人放了城市居民不斷的補充。這一部分是通商人和手工業者出相補充的。

這些市民的羣體，羣居在思想上和導了城市中的階級。階級城市自治的團體當有的歐商人。是他們的生產品的不吝惜的消費者。由德川氏的政治制度所帶來的思想上的壓迫，以德川氏的政治制度，是不容許任何的獨立思想。並且造成了對封建階級自的壓迫的，以通商力地限制了城市居民的思想發展和表達的可能性。當然，因此知識階級中間，對於幕府常常表現出來了反對的精神。

而且進德階級也有對自己的教育和階級教育。幕府政府公試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以絕對的自我控制而任黨的保存。這種被模範的孔子的教義，隨著自己的傳播。需要一大批幹部。因此，在一定範圍內，幕府本身需要受過教育的人們。因此幕府述的幕府就更加必要。以前在傳播學問和一般文化價值觀的獨佔者。是幕府對僧徒。他們得不到德川氏的信任，也得不到德川氏的扶助。幕府對於佛教是極

懷疑的。這首先是因為織田信長所造成之傳統的原故。此外，承認佛教不是出於本心的，因為他在民衆中間散播了「出世」的觀念。照藤川春樹的清淡的見解看來，這種觀念很不容易引起國家業務的振興。要之於孔教的經典却是「入世」的，因此能够訓練民衆，並且很適合德川氏的理想。新政府戶威丁孔教宣傳的中心運動是由哲學家、文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團體聯合起來的。在思想上，德川氏的政治制度的基礎，並且由幕府方面享有特殊的保護。

與佛教的僧徒。在德川氏治下的日本，社會階級的梯階，即由武士階級和士民階級的士人（平民）之間的中間地位。幕府因為各寺院的地方分權的心地，對他們也是不敢依賴的。雖然寺院以前的軍事勢力和經濟勢力，因為德川信長及一部分是因為豐臣秀吉所加給的破壞而澈底崩潰了，但他們却依然保有十分大的勢力，並且幕府也要經常地担負。佛教僧徒的寺院所指導的方面來的一切可能的陰謀。這些寺院是和不懂意德川氏的統治制度的封建領主及成了木偶的皇室，保持經常的接觸的。

德川家康及其最近的繼承人，對於天皇左右虛偽的政治的平等，是很疑忌的。著名的德川氏的法制，特別規定了天皇及其左右對外界的相互關係。照這些法律的意義說來，天皇不應當「降格」和自己的臣民。天皇是和諸侯們有任命的交往。封建諸侯如果有這種傾向的種種阻礙，就會受到處死及沒收領地的處罰。只許以前氏族的貴族階級少數後裔，才能出入宮廷和組織朝廷。這些人們大多數

都是和天皇有親戚關係的，他們物質上完全依賴將軍，備有很高的虛稱的職位，並且有很高的官階。這些官爵和職位，都是從漢羅德薩德薩德傳授的大並且相當地顯赫。天皇享有的那種空幻的權威也是繼承的政權一樣。於是以氏的將軍們，簡直說有六個可資利用的根據。這就為朝廷的貴族階級在制度上是有保障的。但然而將軍們却不能沒有理由。這就使德川氏的將軍們對朝廷諸侯們，有種種的困難。德川氏的將軍們雖然在法理上，就應該繼承德川氏的將軍職，但實際上，德川氏的將軍們却並沒有理由。德川氏的將軍們雖然在法理上，就應該繼承德川氏的將軍職，但實際上，德川氏的將軍們却並沒有理由。德川氏的將軍們雖然在法理上，就應該繼承德川氏的將軍職，但實際上，德川氏的將軍們却並沒有理由。

是直屬下達的目的。德川氏的將軍們雖然在法理上，就應該繼承德川氏的將軍職，但實際上，德川氏的將軍們却並沒有理由。德川氏的將軍們雖然在法理上，就應該繼承德川氏的將軍職，但實際上，德川氏的將軍們却並沒有理由。德川氏的將軍們雖然在法理上，就應該繼承德川氏的將軍職，但實際上，德川氏的將軍們却並沒有理由。

德川氏把居民中全體享有特權的成員，做幾種類別。並且把京都的朝廷貴族階級，做獨立的一類。此外，德川氏把居民中全體享有特權的成員，做幾種類別。並且把京都的朝廷貴族階級，做獨立的一類。此外，德川氏把居民中全體享有特權的成員，做幾種類別。並且把京都的朝廷貴族階級，做獨立的一類。此外，德川氏把居民中全體享有特權的成員，做幾種類別。並且把京都的朝廷貴族階級，做獨立的一類。

他專制却使他們全處於完全依賴的地位。因為如果沒有將軍所給予的俸祿，這些貴人們一定無法活下去。有趣味的是：將軍本人，認為由他所扶持的武家，正式取得自己的一切封號，却是必不可少的事。這與自願受封等就容易得多了。顯然，却依然有著某種心理上的效果，因為這使將軍能夠在那些敵視他的封建諸侯面前，顯示他由大皇帝取得的武運全權。

為諸和朝廷的貴族有區別，所有其餘的封建軍隊，取用了武家山的名稱。武家或武士是空國

統治的封建階級。武家又分有領地的諸侯（大名）和武士（御小的貴族。大名有著三種類別：（一）

一親藩。二直屬。三德川將軍本家的次子。這些是說尾張國和伊國。冰戶國的三位有領地的諸侯；在

將軍和集藩有直屬繼承人的諸侯。那末就稱這三個德川氏為幕府中的三位代表，來繼承將軍的職位；

也稱之為「藩」，是那些屬於將軍家臣的諸侯。他們是直屬諸侯；很早以來就是和德川氏有聯

繫的，在戰後關係中或在軍事關係中是幕府政府。因此他們被看做是將軍的主要支柱。政府的高級

機關就是由這些藩狀大名來組成。他們是幕府的最高會議機關（幕老中）並且佔有地方長官的職位。

此外幕府外藩。那即是那些不屬於德川氏家臣的諸侯。他們是有某種權利的封建氏族。

並且在舊領地佔據著實際的權力。外藩大名比幕府代表是更加富足的。不更加強盛得多的幕府

府如果不是把他們看做敵人的話。也是把他們看做對自己懷有惡意的天敵。並且僅有的方法，來努力

損害他們的勢力。他們不能佔有政府的職位。似乎成了通判，他們的領袖都離開中央很遠，這有力地說明了他們一定的獨立性。他說明了他們能確保自己的領袖地位，他們利用自己的軍事利用自己的家臣分佈的特殊體制，把他們包圍起來了。蘇州府在一切最重要的軍事基地都設置了軍隊，以便在外敵大名組成反叛軍的時候，來阻撓他們的行動。

大名們要必須到江戶去，帶着隨從人員住在幕府附近，幕府而迫着他們參加在江戶幕府大名在幕府附近住兩年以後，能返回到自己的國家去，但必須把自己的妻子兒女留在江戶幕府，這人與幕府。如果發生了對幕府的種種反叛，或種種實業是組織反叛的種種企圖，因此幕府就着生強迫這些人加以懲復。此外，採取參觀交代制度的用意，是使幕府經常地在旅途中，且幕府的生活和要讓他們付出巨額的費用。諸侯們不得不在江戶建築自己的宅第，並且幕府還要求他們很多的供入，以及其他等等這些事項所產生的費用，是幕府對建領臣身上的沉重負擔。這些負擔會使他們窮窮乏乏，同時却會使幕府對大名江戶富足起來。

大名們按照那時實行的非成文法，無論是定期到江戶來參拜將軍，或是根據其他種種理由，都讓幕府將軍是幕府在幕府時代，特別進行收受貨幣的貢物，物貢由。德川氏比古切其他物對

建國後，是無比地更富有的。德川氏的軍事優越，也是完全沒有爭論餘地的。因此幕府沒有對諸侯征收特別的捐稅，而從將軍向土地主支田城市及其他等地所徵收的巨款收入，已經非常富裕。但真物數實質說來，都是一種特別的捐稅。幕府努力把金銀吸收到江戶來。德川氏是日本許多地方的金銀礦的所有者，這些礦山是在佐渡國、薩摩國、駿河國、伊豆國、豐後國等國。但馬國。然而，這些礦山，依照「習慣」天均外緣大名之應當對將軍呈贈金幣，比較不大應呈的諸侯，應當贈銀幣。有時這種禮物達到了這樣大的規模，如賀國、諸侯捐助田，送給將軍秀德禮物，用他自己的名義贈送五百兩杖太的金幣，用他的兒子名義贈送了三萬金幣。幕府認為是應當有的封建領主，自然要別人，也是不提吝惜的。中等的「禮物」是四百至五百金幣或銀幣。這是和幕府富有的諸侯有關保勳。第一必須說到，雖然德川氏對於所樹立的專制政體，外緣大名的地位，靠着幕府接會來組織某種形式的聯合，仍不是十分困難的。在封建土地範圍內，諸侯幾乎是無限權力的主。幕府法幕府只以武力說過，土地是幕府領地，幕府有最高的監督權，並且因此有權收受全體封建諸侯（外緣大名也不在例外）的領地，來重新分配給他們或賜給新的諸侯。然而事實上，幕府政府的這種權力，却很少應用的。諸侯們承得了這類的河能性，由田地的產收來大顯的收入，因為不間斷的戰爭時期，這是一整個十六世紀。幕府對德川氏的獨立已經結束了。戰爭及和戰都有顯著的費用與損失。因為土地產

種得很惡劣而來的經常的歉收，也都完全結束了。所以，德川氏的政治制度存在的初期（十八世紀初葉以前），其經濟能變說，相當地堪稱才全體發展。這在收地、賦稅增加中，實是在戶口增加中，顯現出來了。

因此德川氏限制外樣大名の方策，比較說是用虛聲的手段來強制，實可說是有間接的性質。是封建領主的根本要領的武士階級，就自己的構成說來，也不是同一類別的。享有特權的武士階級的重要成層，是所謂的一「旗下」或「旗本」。他們是將軍直屬的家臣，並且是德川氏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一「旗下」大多數都佔有政府官吏的地位，實行監視農民和其他沒有全權的居民層，直接徵收糧稼，管理城市及將軍私有的領地。一部分「旗下」，是担任行政職務的，他們沒有自己的地區，而是由將軍那裏取得糧給。這些糧給主要是自然品（米穀）。另一部分「旗下」，是直接管理將軍的屬地的將軍那裏取得糧給。這些糧給主要是自然品（米穀）。別一部分「旗下」，是直接管理將軍的屬地的將軍那裏取得糧給。他們由將軍那裏，取得了很大的領地及相當人數的農民，由這些農民來供奉這一類的小封建領主。不是幕府將軍而是屬於有領地的諸侯的家臣的武士們，多數都自己耕種土地，根據其土地的地區領有一定的地區，這些地區是他們的諸侯由將軍那裏取得的。這些武士中的領地數，由諸侯那裏取得。米糧的俸給，他們是帶備軍隊的。但，自然，這些領地有能徵收有常賦的對人。這些人們被徵收的對人，是統治區域的領土層，沒有在地方武士層，他們是這些區域的軍隊的指揮者。這些人們的領地，是

在德川氏的時代惡化了。這些武士們不是都能够「在土地上安居」的。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對所處成的情況顯然不滿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得不仰給那種接傳給的形式，由諸侯所取得的緊縮的口糧了。因此，在德川氏的政治制度存在的前半期，雖然經濟上有若干提高，但封建關係本身崩解的過程，却已經開始了。浪民，即漂泊的武士的人數加多了，這些人們是被自己的諸侯遺棄了的。因為諸侯們不願或沒有力量來好好地飼養自己的家臣。在最初的時期，浪民還不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主要還是補充了城市的人員。他們中間有多數人，都拋棄了自己的貴族的特權（這種特權禁止他們從事普遍的勞動和商業），而成了「自由職業者」——教師、醫生、小職員。浪民中不多的有一部分人，還加入了一半工業者和商人的行列，跟着時間的經過，已經迫使德川氏的政廳，要擔心注意着無家可歸的沒落的武士人數增大的過程，因為他們是擴大對統治的政治制度不滿者的隊伍的因素。

目的是在於預防爆發對德川氏的「制度」的不滿。幕府創立了四處分佈了，強有力的專門的警察機關，他們執行着這樣的職能，加倍地監視農民和城市中不滿階級平民（為部分手工業者，知識階級及其他人等）及諸侯（外樣大名）。

正是在德川氏的政治制度的條件中，創造出來了那種警察的搜索，行政上的基礎和獨裁的專人的機構這些東西，以後根據繼承的，轉承着日本的資產階級服務。某些日本的歷史學家，說明德川氏

的時代，對他給與了一個美好的定義——「警察的國家」。雖然這個定義是不完全的，因為他沒有割明德川氏治下的日本的階級本性，然而這個「警察的國家」的形容辭，却有全權應用到幕府的國家機構的身上。

德川氏的國家機構的最上層，是由下述的因素組成的。主持全國規模的治理事務的及指導直接屬於將軍的領地的行政機關的首腦，是那種取得了「五老中」的名稱的元老會議，他的領袖叫做「大老」。這個會議的會員，由將軍親自任命，主要是由譜代大名中來補充。大老執行宰相的職能，並且事實上還獨立地指導政務，他僅僅對將軍個人負責。在元老會議下面，有所謂「若年寄」（青年元老）。他們執行着指導個別的管理部門的各部大臣的職能。他們實行監督和監察「旗下」，並且和地方官發生接觸。就地位說來在若年寄以下的，是管理着三個獨立部門的「三奉行」；「三奉行」是神社和寺院管理人，江戶「町奉行」是首府江戶城的首官，「勘定奉行」是財政管理人。

有一種特殊的官吏，他們擁有特別的權力，把警察官和檢察官的監察職能集於一身。這種官吏叫做「目付」。譯者註：即是偵緝隊一類的官職。「目付」是和一切其他職務的人們不准發生關係的，實行秘密地和公開地監視一切職務的人們，無論這些人們是在中央機關服務的，或是在地方機關服務的。「目付」的任務，是隨時檢舉那些違反國家，更確實說來是違反將軍的利益的人們，

並且採取相適應的鐵區。

德川氏的地方政權是這樣組成的：最重要的都市和城堡中的幕府的代表，同時也是有着大批軍隊的守備隊的長官。有着廣泛的代理全權的特種權力者，在京都都有叫做「所代司」的將官兼地方行政長官。他應當監視皇室，並且不許天皇和外屏發生任何的關係。在大阪和駿河府城中，地方的行政長官叫做「城代」；在長崎、日光、伏見、山田和佐渡，地方行政長官叫做「奉行」。在一切特殊的地點，地方的權力者叫做「郡代」或「代官」。這些職位都由「旗下」來擔任。這一切官吏，那是在直接屬於將軍的領土上活動着。在諸侯「大名」的封土上，主要地是那些屬於「旗下」的政治偵探的祕密機關在活動着。

……致令加強了德川氏的警察政治制度的，致令採取所謂的「封鎖」日本的對外關係（鎖國）的一項原因，是和歐洲人的相互關係的發展。

德川家康和豐臣秀吉不同，起初的時候，沒有計劃任何反對歐洲人侵入日本的斷然手段。和這相反，他却對於一六〇〇年重新來到日本的，歐洲最先進的商業民族的代表——荷蘭人及英國人——交往很感興趣。乘荷蘭的郵船到來的英國人阿摩士，甚至得到了德川家康的特別信任，德川家康將請有經驗的船家阿摩士，請他擔任替日本建造大郵船的指導者。如同日本以前的歷史指出的，日本因為

沒有很大的船隊，致令受到了極大的損失。豐臣秀吉對朝鮮的遠征，暴露了日本夢想和中國所有的對大船鬥爭是不可能的。豐臣秀吉廣大的侵略計劃，很大的程度是因爲日本在海上的勢力衰弱而失敗了。不大的日本船船，爲對朝鮮和中國北部沿海一帶作海賊的襲擊，這是有用的；但，牠們却不大敢於作遠洋的航行，因此和遠道國家商業聯絡的特權，時時都握在外國人的手裏。阿魯士着手做這種工作，並且德川家康方面對牠加給了不斷的注意。同時，將軍對於以東印度公司代表的資格到來的荷蘭人，給與了比他們的先驅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優惠得多的條件的通商權利。顯然，這種情形發下述的事件說明出來了：新來到的歐洲人——新教徒，就對天主教徒（即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關係說來，他們從最初就是站在敵對的立場上，這些天主教徒，在德川家康的眼中，已經是看做因他們自己的政治陰謀而人格破產了的。

然而英國人和荷蘭人，却沒有充分利用自己這種有利的地位及鞏固他們所取得的特權。他們犯的錯誤，是拒絕將軍這種堅持的提議：把商業根據地設在江戶的附近，而決定設在平戶。德川家康對這種決定很不滿意；因爲他希望經過浦賀灣來進行的英荷貿易，能够完全服務的幕府的利益，並且積極地助成首府（江戶）的富有。平戶早就是海外貿易的根據地，並且因爲這個港口離得很遠，中央政府不能把和外國通商有聯繫的全部收入佔爲己有。

歐洲人在日本進口中的一項最重要項目。這是軍火；軍火的生產，在日本本國幾乎還是不能解決的（在種種場合都是處在萌芽的狀態中）。幕府並未發覺理由恐怕發生這類事情；南方的港口所運來的這些軍火，在某種的程度中能夠無限制地落到地方封建領主的手中，這種事情就險危害德川氏的利益。此外，將軍還想到了這種事情：如果外國商人是處在政府權力所及的範圍內，那末就會大大地減少南部和西部「大名」種種政治陰謀的可能性。

這種錯誤的結果，在平戶成立了所謂的「英國人之家」的英國人，後來喪失了因為德川氏和天主教徒的鬥爭而取得的巨大利益。他們的這種鬥爭，是曾經因為指耶穌會教徒和佛蘭茨克派教士完全驅逐出境而結束了的。雖然這兩派教徒之間有着強烈的敵意，但英國人和荷蘭人在日本的出現，卻引起了這兩個敵人的強烈的激怒。西班牙人施行了各種各樣的陰謀、誹謗和密報，爲着是要使荷蘭的領事，在將軍和地方的封建領主的眼中看成壞人。因為這些陰謀沒有發生預期的結果，西班牙人就提出了這樣的草案：由日本國內把自己的競爭者暴力驅逐出去。西曆一六一二年，他們派遣了使者到自己的本國去，堅決地要求派遣西班牙的艦隊，來攔截荷蘭的船舶及在日本的經理處。德川氏知道了這種情狀，他對於西班牙人的政企圖的懷疑更加增大了。進行了的調查，發現了西班牙人通過天主教教的宣教師進行的陰謀，已經推進到十分遠了；他們的代理人，在政府機關中佔有了重要的地位，像德川氏

西班牙人不僅能開播通曉九州信奉天主教的難候（他們是因爲有利的海外貿易而證誘惑的，並且其被基督教的包圍了）來活動，而且也可以通過在中央政府機關中的他們自己的走狗來活動。德川家康撤除這些和瑪留強有親近關係的慶應節前東的職務，並且認爲任何大罪必須嚴格遵守，不去違犯。臣秀吉禁止宣教師活動的命令，爲着恐嚇他們，曾經把幾個基督教徒判處了死刑，並且在四國三島立碑，重新宣佈了完全並且絕對禁止基督教的命令。

將軍同時指出了，在宣教師後面站着歐洲的何種力量，並且儘一切可能的方法，來避免關於日本入反對天主教傳佈的消息傳到歐洲的時候，這種勢力可能表現出來的忿怒。因爲這些考慮，德川家康決定遣派使者到歐洲去，然而却不用自己的名義，而用仙台國的大卷伊達顯宗的名義（伊達氏是一位對德川氏特別忠實的譜代大名）。這個使團是在一六三三年組成的，把伊達氏的一個家臣派做這個使團的首腦（譯者註：這是對倉常孫）。這個使團到了羅馬和馬德里，在這些地方被宣教師說服了，並且受到了教皇（費利浦三世）的教誨。結果，日本的使者成了歐洲文化極熱烈的信奉者。在羅馬，日本的主要使者，根據自己本人的提議，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使團回到日本，企圖宣傳天主教，這引起了幕府很大的不滿。

復用秀忠（使團回到日本是在一六三〇年，即是在德川家康死後四年），把使團的這種結果，復許

爲必須儘快地清算基督教的過分的證據。重新對宣教師，尤其是對信奉基督教的日本人加給了許許多多的報復。

在這裏，要追述一下基督教在日本中間是怎樣鞏固起來的。大名信奉新宗教，幾乎純然是因爲商業上和政治上的打算，因爲希望享受那種有利的海外貿易，及依賴新的友人——歐洲人來脫離幕府而獨立；這些歐洲人對於信奉基督教的大名供給軍火。大名強迫自己的家臣和農奴都去信奉基督教。當將軍宣佈對基督教猛烈鬥爭並且實行反對南部的大名的時候（南部的大名有很多人信奉基督教。）所以武士們由於封建的傳統，就起來保衛自己的大名（而不是因爲保護新宗教而鬥爭）。

南部的封建領主不遵守那種瑣細的法規制度，這種制度是在將軍治下的全部領土上嚴格地實行的。所以，大部分遵照地方上封建領主的指示而受了洗禮的農民，在南部諸侯們和將軍們的鬥爭中，都起來擁護這些諸侯，因爲當時將軍會經派出了徵關隊，來肅清基督教的根據地。在這種鬥爭中，例如島原的流血事件，農民常常超出了越過的大名所劃定的狹窄的封建利益的範圍以外，並且完全獨立地喊着反封建的口號前進了。這些口號有時不過保留着神奇的「基督教」的外表。用不着懷疑，和幕府方面對自己的行動加給的重大反抗而彌突着的歐洲人（宣教師，不惜用一切手段，在「十字」的旗幟下來修葺運動全體居民，並且保護自己的並場及侵入日本南部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業資產階級的

利後。

西曆一六三二年立爲將軍的德川家光，比他的父親更加熱心武裝反對宣教師。雖然有以前一切的報復，宣教師的勢力，在幕府的權力不易達到的許多區域中，却依然沒有衰弱下去。正是在這個時期，對於被基督教感化南部的諸侯加給的懲罰手段達到了最高點，也就爆發了島原事件。位在離長崎最近的這個區域，曾經被將軍的軍隊佔領了，他們在這裏，還沒有來得及樹立那種屬於將軍的全部領土上存在着封建制度。這裏的農民，比日本中部和北部農奴的基本羣衆，是顯明地有着更高的文化的。在這裏，要指出日本的這一部分，和中國很早就發達了商業聯繫，而且以後又和歐洲發生了商業聯繫。歐洲的宣教師早就秘密地對他們供給了武器，這時暴動起來了。這種暴動的原因，自然不是宗教的迫害，而是封建的壓迫。藉着撲滅基督教邪說，將軍的官吏們在征服的區域中，造成了毫無法律保障的狀態。除力不勝任的捐稅以外，幕府還規定了十分困難的義務（賦役）。這一切使農民陷於奴隸的生活。暴動是在西曆一六三七年年底開始，在這裏值得指出的，那種使他和中世紀日本農民一切革命行動不同的特殊性，是牠的有組織和知道利用火藥發射的武器。

戰勝了人數比較不多的幕府駐在地方上的部隊，暴動者離開了自己的區域（長崎東面的平島及附近的天草島。）並且在半破壞的城堡原城中固守起來了，計劃着暫時忍受包圍，等到敵人疲弱的時候

轉到反攻。包圍大約延長到了三個月。被包圍者的人數大約有三萬八千人，和德川氏的封建家臣及荷蘭人的聯合兵力英勇地戰鬥了，荷蘭人決定對這次事件作政治上的投資，並且自己建議對將軍給予軍事上的援助。荷蘭的大砲從海上轟擊被包圍者，因為這種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預先決定了被包圍者的失敗。城堡被突擊地奪取了，牠的保衛者幾乎全體都被殲滅了。根據官廳的資料，活着的只有一百零五個人；他們都成了俘虜。

肅清了島原暴動以後，德川家光決定指日本對外國人實行「封鎖」，使日本和一切外國的影響隔離。早在派遣使團到歐洲去的第一次失敗的經驗以後，德川秀忠再度派遣了自己一個最親信的武士到那裏去，並且由他的報告中，斷定經過宣教師來活動的歐洲人方面，對日本有着致命的危險。四曆一六三四年，就頒佈了由日本的領土上把西班牙人完全驅逐出去的法令。一六三六年，德川家光採取了更堅決的手段，在處死的恐怖下，禁止日本人離去自己的國家以及建造那種用來遠洋航行的火船。僅許外國的商人在一個小島——出島（長崎港附近）上通商，而且限制的條例是十分嚴厲的。貿易只許間接通過將軍的官吏來進行。絕對禁止一切宗教的和政治的宣傳。商人們都必須提出特別的保證書，擔保不表現自己所固有的宗教上的信念，並且除通商條例所許可的純粹事務的關係外，不和日本發生任何其他的關係。

經過兩年，西曆一六三八年，鑒於島原事件，直接印象，便佈子把全體葡萄牙人逐出日本境外，命令，不問這些葡萄牙人是抱著何種目的到來日本的。所有到達日本海岸的葡萄牙的（西班牙的也一樣）船舶，隨即剽奪來毀滅，艦船歸都判處死刑。在島原暴動的時候對幕府加給了援助的葡萄牙人，便爲是例證。此外，互相競爭着的荷蘭商人和葡萄牙商人彼此間的憎惡，是知道得很清楚的，這便將幕府不致懷疑荷蘭人和其他的歐洲人會着某種共同的陰謀。

葡萄牙人與和蘭人本國遂于西歷一六四〇年，和日本的貿易，由北洋輪船至太田的黃金港這對於歐洲含有着極大的誘惑力量，因此葡萄牙人再度企圖用和平的手段，來挽回僅經歷喪失的地盤。但遭到了德川家光的毫不妥協，西曆一六四〇年，由馬尼拉來的葡萄牙船被德蘭人奪取，船中物品亦被擄掠，企圖說服將軍德蘭人，曾經被判處了死刑。屬於葡萄牙公使隨員陳某，雖保其生命，並且放歸其馬科。來佛德這樣的命令。今後還不敢越邊境，將軍法各回。對人而都一會處死刑。在日本國際交涉中，葡萄牙公使隨員保其生命的殘餘人員，帶回的文書中，曾說明明言：「葡萄牙人，不應再得到我們，把我們當做在世界上已經不存在了。」

然而葡萄牙的商人，却沒有死心，一六四七年，兩艘葡萄牙的船舶再度開到了日本。牠們企圖傳達這樣的通後：葡萄牙今後和日本人在「天然友好」的狀態中，因爲牠和對日本友好，所以西班牙進行

了戰爭。所以，對於恢復商業關係有了充分的理由。然而，葡萄牙人在處死的恐怖下，被迫離開了日本，並且對他們重新訓示了：他們必須忘記和日本人的貿易。

在歐洲大的貿易中，對於幕府最重要的，自然是奪取軍火。荷蘭人滿足這些需要，獲得了很高的利潤。所以，當軍火已經有了相當的存蓄的時候，並且當日本出現了本國的軍火工場和兵工廠的時候，幕府對於對外貿易的關心，也就大大地衰落了。適應這些情形，幕府對荷蘭人的關係惡劣起來了。曾經建議荷蘭人放棄平戶的商場地點，並且限制他們住在出島的居留地上，在出島上，可以免除他們逃避幕府的官吏而和當地的日本人民或當地的大名接觸的一切可能性。幕府公開地告訴荷蘭人，要求他們不僅放棄將軍的通商訓令沒有預先允許的一切活動，並且要積極地表明對於幕府所公佈的放棄基督教信仰的誠意（因為根據日本官吏專門的審查，認為信奉新教的荷蘭人，「根本上」也是和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一樣的基督教徒。）住在出島上的荷蘭人，曾經遭到了德川氏的警察極嚴格的監視。這些警察對待荷蘭人冷淡而且凌辱，甚至粗暴地干涉到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一年中僅有一次在警察的許可下，荷蘭人能够由出島到長崎去，爲着是對政府當局贈送禮物。一切其餘的時候，他們都是處在禁閉的狀況中。

在廢逐了宣教師以後的初年間，實行了將軍關於這事的法令：「傳染了宗教的邪說」——即基督

教士的區域中的全體居民，每年都應當用象徵的姿式，來表明自己拋棄外國的信仰，即是把十字架、聖像和福音書踏在腳下。某些歷史資料說到並且也曾經逼荷蘭商人執行這種手續。也許是因為熱望破財比這一切更不利於國有力吧。荷蘭人為着緊緊地保持和日本的商業關係，願從地忍受了德川氏的官吏一切專橫的表現。

自然，外國商人所實行的由日本輸出黃金和其他的金屬，德幕府對這種事情不是滿意的。不久對於輸出黃金就頒布了限制的法令。從十七世紀中葉起，牠完全被禁止了。和限制及後來更完全禁止輸出黃金的事件接踵而來的，是幕府實行限制輸出銀和銅。西曆一六八五年，能够輸出用來償付外國商品價格的白銀的數量，曾經縮減到了一百二千噸。一七九〇年縮減到了三千噸。適合一六八五年的命令曾經正式限制輸出銅，因為荷蘭人除金銀外，不希望就實說來也不能由日本輸出任何的東西。這是對於對外貿易的聯絡補助的打擊。在長崎的幕府期間只有兩隻艘荷蘭的船舶到來。從一七二五年起，曾經規定一年間只許兩艘船進口，而且從一七九〇年起，甚至只有一艘了。

西曆一六七三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節節船來到了日本的海岸，並且公司的代表，和日本人進行了關於解決英國人在日本經商的談判，雖然是根據很早在本國存在過的英國第一次失敗了的經理店的同款的條件。幕府拒絕了這項建議，在這裏值得特別指出：日本人的主要理由，是藉口「英國的國王登

理和葡萄牙的公主結婚，而葡萄牙却是日本的敵人。

日本在「鎖國」時期和外界的隔離，照日本的這個術語看來，自然，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是絕對的。除間接通過荷蘭人所進行的和外界的聯繫外，幕府許可中國的商人到長崎經商，自然，也是有很大限制的，雖然不像對待歐洲人那樣蔑視。幕府嚴密地注意實國政治中的一切最重要的過程，甚至有一種秘密的官員，專門從事搜集關於國外生活的情報。自然，將軍的這些秘密的使者，實行派到了中國也派到了歐洲，以便取得必要的情報。但這一切都限於十分狹窄的範圍。除自己外，德川氏努力把日本對一切都完全「封鎖起來」。幕府完全獨佔和荷蘭及中國的對外貿易。她十分注意不讓她的臣民中的任何人，尤其是不讓任何一個大名，和外國人發生任何的聯絡。甚至遭到軍海難免，雖然源源到外國的日本人，也永遠禁止回到祖國來。

德川氏第三代的將軍家光，在隔離日本的法制中，也和在其他其他的政策中一樣，頑固地表現一種指導的思想，毫不變地保持現存的封建制度，鞏固他的國家的規範，不容許有任何的維新或變。更因德川氏們會惹起削弱德川氏對封建諸侯的指導權的危險，會惹起農民戰爭的危險，會惹起外國強烈的壓迫的危險，在這些威脅面前，封建制度的日本就不知道要怎樣對付了。因此德川家光就運用他所想到的任何手段，來鞏固已經樹立了的封建制度，嚴密地保護他，使能夠免除一切對他的發生。

內部的和外部的震撼。德川氏的封建法制，甚至當他純然注意國庫收入的目的的時候，它已經是這種主要政治「智慧」的日本表現，這種「智慧」是在於「一切都應當保持不變」。

德川家光特別注意確定屬於大名領土地的正確疆界，無論這些大名是「譜代大名」或「外樣大名」都同樣辦理。將軍的官吏實行測量這些土地，編成了詳細的計劃和地圖，並監視各地都建立了刻有「寬表」及所有舊姓名的界標。日本境內的一切行旅，都以極嚴格的方式調整了。沒有預先報告將軍的官吏，任何人都不能隨意離開自己固有住所的地方。這對於市民，對於有權力的武士階級，還是一律適用的，自然，對於農民更加用不着說——也是適用的。監視和檢舉的制度，在和領事的聯繫中，在德川氏治下的日本取得了巨大的擴充。這種密探制度，正是因為政府「關懷」這事而鞏固起來了。把一切都包括在自己的監督下，並絕不許一絲一毫地違反法規。

德川家光希望社會一切階層都嚴格遵守封建關係。城市中的將軍的權力機關，應當注意手工業者、同行公會和商人的同業公會的安定。任何大都不容許任意退出自己的同行公會，也不能夠轉入別一個同行公會。每個商人都只能買賣一定種類の商品，並且只能一定的地方營業。手工業者的同行公會和商人的同業公會的這種機構，使政府更加容易監督市民。直到十八世紀，手工業者都遵照強制的程序，在同行公會中聯合起來了。

工匠和他的助手及學徒之間的關係，是照領主和他的家臣之間所有的封建關係的樣式建立起來的。富商的店員和僕人，認為是對於這個商號的附屬物，並且不能任意離開這個商號。

德川氏的制度最重要的特性，是政府努力處處推行入質制度或聯保連坐的方法，來保障不間斷的捐稅收入，以及實現經常地監督執行政府的法規。對於大名，是利用『參觀交代』的習慣來達到這種目的。對於城市的商業資產階級，實行了所謂的『自治』法規。城市中每一市區的居民，都組織了以區長為首領的自治團體，他担保自治團體的會員的品行及履行一切義務。區長普通都是最有勢力的並最富有的商人，他們的地位是這樣重要的：要有力量償付全部沒有繳納的捐稅。然而，自治團體對於區長也有責任，並且在區長有某種過失的場合，自治團體的全體會員就要對將軍負責。

聯保連坐的制度，在鄉村中有着更加明白的樣式。村長（名主或莊屋）有些助手，他們支配着一羣農戶，並且關於這一羣農戶的一切義務，都是『整批地』規定着的。即是為着履行這些義務採取集體負責的制度。為着便於監督農民，並且把『五戶』組成了一組（五人組制度）。每一農戶都要注意自己的鄰人：他們是不履行了官廳的指令？他們是否有編犯所有一切的刑法？

村長普通都是由富有的農民中選舉出來的，他們能夠設法避免一切有效的限制規範，榨取更窮的農民。把次繳借給這些貧農來繳納捐稅，以後就把這些貧農的收穫物奪取過來，並且甚至把土地奪

過來。自然，進行這種業務是違法的：土地在「贈送」、「供奉」等等的各種形式下，轉移到了實際的手裏。這種事實，因下述的情形變得更容易了：在德川氏的時期，封建地租的主要形態，是賦貢而不是賦役，因此，在估清封建領主和農奴之間的中介人地位的村長的手中，握有了用來影響農民的十分有力的槓桿，因為這些貧農要依賴村長的「幫助」來如期繳納捐稅。

像這樣，在經濟上隸屬和政治上非法的，極重的壓榨下而崩潰的鄉村中，發生了破壞德川氏的政治制度基礎的「安定性」的原因。農民的暴動忽然在這裏，忽然在那裏繼續不斷地爆發起來了。城市中，發生了商業資產階級享有特權的上層份子不斷地富有的過程。甚至是德川氏社會制度基本和主要支柱的武士階級，也表現了內部分化的標誌，而絕對不是「安定化」。

事實上，武士本身，就是在軍事編制中組織了的少數更有權力的居民。封建貴族的職業，無論什麼時候都是戰爭。武士的「勇敢和榮譽」的經典（武士道），極嚴厲地禁止武士除戰爭以外去從事別的職業。但在德川氏的政治制度的環境中，戰爭已經不再是日常的現象了。反之，幕府的目的是要盡可能地避免戰爭，像這樣，就有了武士的傳統、習慣、道德（這些東西是依然和從前一樣在訓育武士們的），和德川氏政權的對於安定與和平的傾向，兩者之間很難解決的矛盾。大名已經不需要維持大數很多的武士——軍隊。有許多武士都在經營土地，並且變成了小的封建地主（武士所取得的土地自

然同時是有着農奴的)。但絕大部分的武士……土地很少的……却都遭了很大的經濟困難，因為封建領主……諸侯減低了自己的親兵的餉額。『米的額』甚至不滿足武士階級最小限度的需要，並且在種種情況下，有一部分統治階級也要過問這種米額。因糧不斷地增大了浪人一種的人數。這種浪人即是沒有了主人的武士，他們離開了自己的氏族，用各種的方法來找尋新的生活的手段。我們已經指出了，浪人前進的主要道路，這是轉上市民的地位，來從事各種自由職業，手工業及商業。這樣看來，封建貴族的最下層，發生了不斷的崩潰。

這種過程，使德川氏的獨裁，在封建領主的眼中看來太大地失望了，因為貴族階級在日本是『主要的基礎』。貴族的優越地位沒有發生異議。貴族階級的特權，當然是完全全地的神聖地尊奉的。最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德川氏在自己的立法文卷中，以及普遍在他所確立的政治制度的一切法制中，都堅決地極力肯定地承認：屬於武士階級的人們才是『人』。從國家當局方面對於武士和對於其他其餘的人民，有着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德川氏著名的法典『百條』(御定書百箇條)，直接包含了這樣的指示：對於普通的人民，甚至用不着在法律的內容裏來敘述。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不過是以命令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就大部分說來，這些命令是包含着某種新的濫發和法制的批准。每件這樣地命令，末尾都列舉違犯這些命令的極嚴厲的處罰。德川氏時代所實施的刑罰，一般都是殘酷地和無

人道地適用於非武士的身上。德川氏的法制，是坦白的封建階級的法制，因為一切犯罪，都根據階級社會地位來處罰的。比如說，犯下殺人罪或盜竊罪，普通的人民所受的刑罰，比武士就要嚴厲得多。廣泛地應用死刑，在幕間的時候常常應用拷打。僅僅所謂的「高貴的」犯罪，算是說僥倖了武士的榮譽，如果罪人是武士的話，那末就判處死刑。在這種場合，死刑的宣告是採用名譽的方式，命令刑「切腹」的方法實行自殺。

城市的資產階級，比貴族階級是更加沒有權利，雖然他們經濟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如果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初葉，德川氏治下的日本生產力有相當的增長，那末在下一個時期，就暴露出來了衰微和退步的標誌。根據政府的調查，人口已經沒有任何的增加。西曆一七二六年，日本的人口計有二千六百五十七萬人，一七五〇年計有二千六百萬人，一七八〇年計有二千五百五十萬人，一八四六年（即是近於德川氏的政體消滅的前夜）計有二千七百萬人。耕地面積地將止了增加。農民破產了，並且因為苛捐重稅的制度，而達到了完全飢餓的程度。封建領主的「殘酷」的方法，是由農民預征了許幾年以後的捐稅。預征了好幾年以後的捐稅，封建領主在以後每年又想出了新的方法，來榨取農民殘餘的財產。所有一切的东西，每一種小物件，直到農民家庭的「小用具」都要征收捐稅。

而此不止這些事件。爲着由農民收奪一切可能的東西，封建領主更去要求商人的援助，這些商人把封建領主所需要的貨幣總額借給他們，而由自己來担任掠奪農民的任務。再度發生了足利將軍時代曾經有過的同樣的情形。農民陷入了對商人的債務的從屬性中，最後喪失了自己的地區。雖然法律禁止買賣土地，但事實上，這種買賣已經有了很大的擴張。大多數地區都轉移到了所謂的市民的手中，即是落到了商品——高利貸業者階級的代表們的手中。商人們奪得了土地，却絲毫沒有變更封建關係的性質——壓迫日本農民的農奴的從屬性。無論就實質說來或就形式說來，在這下面，都保存着確確實實的封建制度的榨取。

封建制度的日本歷史上以前任何一個時代，都沒有源德川氏時代那樣多的農民暴動。這指出了：創立幕府的警察制度的一切努力（這種制度是要除去大眾革命抗議的某種表現的可能性的）被判明是失敗了。

農民採取行動的最普遍的形態，是集體要求廢除極不公平的苛捐重稅。召集了鄉村中的全體居民，聚集地擁向封建領主的城堡或封建領主所設置的地方管理人的府第去，來對他們傳達農民的決議。這些決議是採取各種方式提出來的。有時候，這是採取恭敬地、謙虛地措辭的種種請願書，來懇請諸該或將軍的官吏對農民的眼淚發點慈悲；有時候，農民是攜着獨立色彩的要求發動起來了，爲着提出

這種要求，同時舉行了握有手製武器（棍棒）的示威運動。

保存有的關於農民暴動的記載（這些記載都是封建領主的文士，或在種種情況中都是和被壓迫階級沒有關係的人所敘述的），把農民的暴動，大部分都是當作突然加在封建領主和商人（放牧者頭上的，意外的和可怕的價格描述）。

日本封建制度的分裂性，妨礙了各個農民暴動迅速地，轉便地匯合起來，成爲反對整個封建制度的廣大的農民戰爭。然而，另一方面，這種分裂性却常常幫助了農民。在他們出面反對某個封建領主的事件中，迫使封建領主接受農民的要求。陷在敵意的環境中的，並且是沒有力量和其他封建領主談判，以便得到他們的援助的，包圍在自已的城堡中的封建領主，常常因爲要解除自己的生命危險，而口頭承認暴動者所提出的要求。例如大家知道的，有過這樣的情形：當時封建領主約定以後若干年不收捐稅，減少稅額及其他等等。但在一些可能的時候，封建領主就破壞他們被迫承認的約束，懲罰暴動者，加重壓迫。自然，有時候也發生過這樣的變形：當時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他們交出這次行動的煽動者，封建領主就同意滿足暴動者的要求。封建制度的法典，要求普通的人民絕對服從武士，甚至對於地位很高的封建領主請願，控訴自己的主人，都須被處死刑。要求交出農民暴動的煽動者，封建領主在這裏不僅是努力使暴動者的陣營發生分裂，犧牲他們的領導，而且是努力恢復封建政權的威嚴。

這種威望是因農民抗議的事實而損害了的。當常有這樣的情形，當時農民同意，甚至於依照領主的請求，把他們交給武士們去審判，藉此來滿足封建領主的審判，而改善農民一般的艱苦命運。封建領主極端殘酷地制裁了農民暴動的領導者，在這種情況下，最流行的行刑方法是磔刑；在這時候，暴動的領導者在磔死以前，還要睜眼看見他的全體家屬被殺死。

出而反對封建領主或高利貸者的是全體農民，並且包括富農的上層份子之內。比這些基本要素更有教養的富農，甚至常常領導反對封建領主的壓迫的行動，尤其是反對專賣人——一定的獨佔權的所有者——的壓迫的行動。這十分顯然，因為握在專賣人手中的封建制度的商業獨佔權，壓制下並且使富農沒有了經濟上發言權的極小的可能性，關閉了對於他們的市場。因此在德川氏時期，暴動的農民的要求中，常常能夠發見這樣的口號：「貿易自由」、「自由選擇農作物的權利」。例如在那些有積聚的獨佔權的區域中，全體農民都必須把自己所製造的紙的生產品，讓給獨佔的特種販賣人。在這下面，許多人都希望隱藏，即令是隱藏一部分生產品，以便後來自主地把他市場上出賣。專賣人若有一羣特別的偵探，這些偵探替他調查農民中有誰在出賣紙，而且專賣人更享有封建領主賜給自己的無限權力，他殘酷地懲罰被捕的農民。

陷在高利貸者和專賣人的鐵蹄下的農民，不僅喪失了土地和財產。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直到現在

廣存在的許許多多的孀戶，尤其是在那些有意值得「讚美」的封建傳統的大都市裏，正是在這個時期，作為彌補商業「設施」的種種部門而發生起來的，他們隨着商品經濟而與農民的女兒聚集來，而一些農民的女兒，是因為無力還債而被強迫奪取來的。所有凡屬最初商業發生階級的農民，勞動的圖章中，能夠找到這樣的敘述：暴動者殺死了獨立業的代理人，焚燒了封建領主的城樓，捕獲了商人的驢羈，所和堆棧，掠奪孀戶，並且把關閉在這些孀戶中的農民的女兒放出來。

西曆十八世紀，和純農民的暴動同時，自然，也是在和他的密切聯繫中，城市的平民——手工業者、小職員、僕役等——的暴動也有了特別的擴張。有時這些暴動也聯合了沒有土地的武士階級。在充滿了德川氏治下的城市的浪民，為取得「一揆」或「大一揆」的名稱的農民暴動有區別于城市的暴動叫做「打毀」。

城市中的暴動，常常是因為城市的居民不滿獨佔米糧及其他日用必需品的漲價而發生的，這種高價，是那些預先按平價或低價，把米的收成的絕大部分都據為己有的商人任意規定的。「打毀」一語，有時叫做「米糧風潮」。暴動者掠奪富有的商家，襲擊政府官吏或地方大名的代理人的府第，奪取米穀倉庫，並且把所存蓄的米散給飢餓的民衆，特別值得非出的，是在城市暴動的時候，常常提出了無向反對幕藩封建制度的廣泛的政治口號。

德川氏的政府，因為農民和城市的暴動，異常感覺不安。幕府知道：對於暴動不能僅僅採用鎮壓就算了，然而他却找不出某種根本的改良。僅在緊急的情況中，當發現了封建領主方面特別重大的罪過的時候，這種罪過是農民暴動的原因，幕府才把名譽破產的大名，由他們的領地上調任到別一國去。這種調任，自然不是表示不去制裁農民，反而可以看做是將要嚴酷地懲罰暴動的農民的表现。

在城市中，幕府企圖阻止米的投機，並且實行更嚴格地統制了米的價格。日本許多歷史學家，都描述了德川氏時代的日本經濟發展，甚至都過高估計了政府為着壓平米價而採用的，立法上和行政上固定政策的意義。德川氏的「米糧政策」的結果，還不是無論什麼時候都對政府有利的。在這下面，必須注意到：一部分封建領主都直接關心高額的米價，並且政府也是一樣的，他們為着調整自己所有的積穀的買賣事項，經常地要請求批發商的援助。

和經常地撼動着整個封建制度發生了很大的不安的，農民暴動方面威脅着德川氏的政治制度的主要危險同時，政府還遭到了和個人的憤激有連帶關係的，封建階級內部發生的軍事行動和謀叛。西曆一六五一年，曾經發覺了一次謀叛，這次陰謀是浪人組織的，牠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擁護別的封建領主來替代德川氏的將軍朝。謀叛者曾經被撲滅了，然而這種陰謀却暴露出來了：甚至在總軍的親信中，及在直接服從德川氏的家臣中，都有對德川氏的政治制度不滿意份子。

一六八〇年，德川綱吉立為將軍，他的施政方針，比他的先人所施行的嚴格的行政統制和拘束，有了一時的緩和，從一六八八年至一七〇三年的時期，這個時期在日本的歷史中，是在「元祿」的名稱下很著名的，有某些日本的歷史學家，把這個時期，描述成了在將軍高度的保護下的，科學和藝術的繁盛及特殊的「自由主義」的時代。實際上，是德川綱吉在自己的宮廷中恢復了豪華和奢侈，並且儘量促進了戲劇和繪畫的發展。封建的戲劇「能」，正是在這個時期成了特別普及的。各種可能優雅的小物件，漆器等等的生產，取得了特別的擴充。然而，環繞在這次文化興盛的周圍的人們，却是極有限的。農民貧窮化的過程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成了更加緊張的。

封建的諸侯們，都爭先地努力把那些具有高度藝術價值的各種禮品，夾贈給將軍。這些禮品的費用，自然是出在農民身上，因為大名的開支，不可避免地擴大，諸侯們就都努力提高捐稅額來謀抵償。所以，國家的總狀況，在元祿時期自然談不到有某種向好的方面的轉變。在這個時期，國內貿易大大地活躍起來了，江戶和大阪的商人的商業利潤也擴大了，這些商人是把奢侈品和文化品來滿足統治階層的需要。在這個時期，大名對於城市中的「銀行家」的金融從屬性，也顯著地增大了。這些「銀行家」對封建領主們放債，好使他們能够實行首府所創立的時興的生活樣式。因此商業資產階級都歌頌德川綱吉的政治設施。德川綱吉庇護了擺飾品的發展，因此使牠們在城市的中間成了普遍的。

這位將軍所造成的更好笑的「流行性」，是喜撒狗。德川綱吉是禁止殺害生物的佛教宗派的一位信者，他對狗加給了特別的保護，絕對禁止殺害及對狗加以一般的「虐待」。根據一位和他同時代的人的證明，江戶的街上充滿了許許多多狂蕩的狗，這些狗似乎佔有城市主人的地位。不難想到，在入民廣大羣層的意識中，關於德川綱吉的記憶，是看作一位「狗將軍」保留着的。

幕府在元祿、盛世^①所許可的奢侈和浪費的有害的結果，後來的一位將軍德川宗吉企圖把他剷除。德川宗吉在一七一六年立為將軍，担任將軍的職位直到一七四四年。他錄用了一些有遠見的並有才智的行政官吏，企圖採用新的手段，來維持德川氏的封建政治制度。

他的政策中最進步的，是部分地承認外國的歐洲文化以及解除輸入、譯述和出版歐洲的書籍的禁令，但宗教性質和政治性質的著作除外。在德川宗吉時期，歐洲的科學，尤其是醫學，開始在日本取得合法存在的可能性。宗吉親自交結了某些來到日本的荷蘭商人，並且極關心歐洲的知識在日本實際條件中實用的可能性。

根據海軍的提倡，着手緊張地建設濠洲用的溝渠。收穫量的衰落，一部分是因為不止一次發生的大水災，一部分是因為農民一般的貧窮化。幕府鼓勵由這種情況中找尋出路。德川宗吉規定了許許多多的特惠，這種特惠是給予因為開墾荒地而擴大了耕地面積和設備了灌溉手段的人們的。

和這同時，德川宗吉還改變了「參觀交代」制度。以後，每個大名都應當由自己收入的每一萬石米中，拿出一百石來繳納將軍，這種捐稅稱爲是這種事件的補償；把大名在幕府附近必須居留的期限，由一年減少到下半年。

德川宗吉的獎勵政策的結果，擴大了米的播種面積，收穫總量有了相當的增加。

然而，這却是和封建日本的環境中的嚴重農業恐慌有聯繫的。米價大大地跌落了，並且大阪的破產商人相繼對封建領主及農民放債，這使那部分按貨幣來徵收的捐稅的繳納，發生了困難。這對於政府造成了補加困難，因爲政府正在實行消除德川綱吉時代所實施的大量改鑄錢幣的結果，改鑄錢幣的目的在於使其中的金銀的成份。幕府不得不對米鹽事業實行新的干涉，並且遵照德川宗吉的命令，在大阪創設了日本第一個米穀交易所。這個交易所是政府在政府監督下的。米價比較安定了。在和親事的聯繫中，德川宗吉取得了「米將軍」的稱名。

和德川綱吉不同，德川宗吉使朝廷的儀式大大地簡單化了，這獲得了相當的節省。然而這位「理箱的」將軍的狩獵慾，却是有「很大的地位」的，他組織了大規模的狩獵，在這些狩獵中，有時候參加了幾萬人。

在德川宗吉的時期的制度中，採用了一種法典。這種法典是在「御定書百箇條」之外，「公事方定

書（下卷）的名稱下著名的。這項工作是在一七四二年澈底完成的；然而，依照封建制度的傳統說來，法律是不能公佈的，而只能發給法官和官吏作為實際的指導。牠的內容，幾乎完全相當於現在所謂的「刑法」。德川氏的政府制度的一切基本原則，以及——首先是貴族特權的鞏固性，在「御定書」中有了補充的確定。

德川宗吉是德川氏最後一位著名的將軍。他的後嗣就大部分說來都是孤立無助的，而且甚至常常是那種緩緩地進行的、德川氏政治制度的滅亡過程的毫不關心的旁觀者。

德川宗吉於一七四四年，把將軍的政權讓給了自己的兒子，並且於一七五一年死去了。

從德川宗吉死的時候起，他的比較節儉的和「矯正」封建習慣的一切政策，也都跟着消滅了。宗吉最近的繼承人，使將軍的朝廷恢復了以前的奢侈和外表的豪華。將軍朝廷下的賄賂行為和變愛主義，達到了異常的規模。對於政府的財源有了消極的嚴重反映。當時日本意外地陷在接二連三的天災的打擊下（由一七八一年至一七八九年的時期），將軍成了完全無能為力的，雖然也在某種程度中，減輕了人民所感受的災禍的破壞力量。發生了強烈的地震，伴隨地震而來的火山的噴火，在這以後，稻田因為前所未有的旱災而毀壞了。日本全國和饑荒流行病的結果，死去了一百萬以上的人口，約佔日本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四。

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的末了，曾經發生了威脅着封建制度的農民暴動的波濤，這些暴動是在「畿荒一揆」的名稱下，編進了德川氏正式的編年中的。

一七八六年，把尚未成年的德川家齊立為將軍，並且從這時起，直到一七九三年，攝政和事實上權力者是松平定信，他是和德川氏有着很近的親族關係的。松平定信是日本貴族階級的一位著名的代表者。松平定信重新企圖，使武士階級中間有更好的組織狀況和內部的紀律。他恢復了對於貴族階級的奢侈浪費的禁制，這種禁制也適用於商業資產階級。他企圖實行傾向反對賄賂行為的嚴厲的辦法。爲着節省開支，松平定信大大地減少了用來維持在京都的皇室的費用。雖然這些方案，曾經被那些反對德川氏的份子用來攻擊幕府，但他却使政府暫時改善了自己的財政事項。而且還不止這些，松平定信曾經嚴禁把一切貴金屬（主要是金和銀）用在種種不生產的需要上，用來製造裝飾品，尤其是奢侈物品。

爲着挽救武士們經濟上的完全衰微，松平定信決定應用封建政府在極端的情況下才採取的辦法。第一，政府准許幕府的武士一族下，無需繳付超過了六年時效的一切債務；第二，大大地減低了根據一切其餘的債務而必須支付的利息。這些辦法在一定的程度以前，並且僅在很短的期間內，解救了他們的境遇，然而隨即却同時加大了商業上高利貸資產階級的不滿。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那些不滿黨派的

容讓來是打擊他們的松平定信的政策的資產階級股份至。他們就趕快去和那些不贊成政府權權在幕府的皇室費用的貴族集團，建樹站在「觀念形態的」基礎上的特種同盟。

在這裏要指出這種情形：日本的商業資產階級，跟着時間的經過，對於幕府不斷變動的經濟政策（尤其是那種宣佈債務無效的政策），德川氏的官吏粗暴地干涉商業和生產範圍，以及自己在政治上的完全沒有權力，常常表現了憤慨和不满。

在這裏，資產階級的作用，在這時期，還是和佃戶作為採取手工工場的形式而工業生產的組織者的聯繫中增長起來了。德川氏的城市裏，手工工場在製造醬油的和釀酒的生产部門中，很早這已解者有了鞏固的地位。不久以後就出現了紡織的、手工工場、紡紗的和織布的、染色和製造陶器的手工工場、織布的手工工場，在越南國有了很大的發展。在鹿兒島，會經廣地發展了造糖的生產。在許多手工工場中，都有雇傭工人在工作着。在本國的織綢的手工工場中，有二十三個婦女在這樣着。大商業資產階級經濟實力和影響的加大，和他們毫無政治上的領導權，直接禁止他們參加政治活動，常常發失了衝突。富有的商人，獨佔着手工工場的所有者，都盼望平等權利及削弱封建法制的政治制度，對封建現下的制度，是壓抑着企業者的發言權的。

二、幕府形體上對德川氏的政治制度的反對，很早就發生了。他起初完全是在對建制度基礎上的

成長起來的。被魏川氏的獨裁所損害了封建諸侯，尤其是外樣大名，在「歷史的」演進上聯合起來了。他們努力把自已描寫成了天皇政權的擁護者，天皇的政權却被將軍篡奪去了。早在一六六〇年，魏川氏的一位遠房的親族、總州魏的幸系的代表者、水戶的諸侯光國，和他「素願」見解的人們，編成了一部宏大的著作大日本史，在這部書中，敘述了從日本「開基」的時候起對「四一三年」止一般「歷史」上藝術的敘述，詳細地證明日本國家制度的鞏固性，日本國家元首的「無論什麼時候都是並且應當是天皇的後裔」。這部宏大的著作，是重要的神話、傳說的和半傳說的故實，與年史祇有系統的彙集。全部都是「一部成功的」反對毀壞了日本歷史「神聖傳統」的幕府附公證狀。和這同時，魏川光國和他「的朋友們」宣佈反對那種「忘記了日本歷史的」在日本有了傳播的外國的影響。他們是提倡佛教，尤其是把孔教看作是日本民族文化最可惡的敵人，而孔教却是幕府援助的。

誠然，應當去鼓勵他們承認歷史的客觀性。佛教在日本興盛的時期，恰好是和皇室命運連繫切實聯繫著的，然而亦這種情況中，在許多別種情況中世一樣，「水戶的歷史學派」都沒有注意到事實。他們竭力強調皇室政權起源的歷史，這種起源是和神道的神話聯繫著的，並且這完全為着要把神道，即把皇室偶像化的宗教，宣佈是日本環境中唯一容許存在的宗教。

這一切，並且若其是幕府方面對神道發展的態度，創著者「水戶的歷史學派」，「熱心地去培植這

種信仰並學滅佛教。水戶的諸侯就是這種事教的直接的實例。他在自己野采島中，大約拆毀了一千多所佛教的寺院。將軍的政權爲着停止這樣的行動，詳製了鎮壓的方法。然而水戶的學派却有着一數很多的追隨者，他們都頑固地宣傳有回轉到日本「古時的」觀念去的必要。搜集了和傳播了許多古代的神話和傳說；這些神話和傳說，都是頌揚日本國民族神和天皇的。

「歷史學派」的兩位最偉大的代表者——加茂真淵（一六九七年——一七六九年）、尤其是松平定信的同時代人本居宣長（一七三〇年——一八〇五年），對於武士階級的知識份子間新的反幕府的激願，準備好了觀念的基礎。他出版了一部上古的歷史文獻古事記——是研究日本神話學的主要源泉。——並且對她給與了適當的註解。這部著作發表，助成了爭取恢復神道主義的運動更加激烈化。神道主義成了反政府的煽動的中心。自然，這種被下述的原因說明出來了：在宗教的外衣下的反幕府的宣傳，比採用其他任何的方式，有着更多的毫無危險的傳播的機會。本居宣長和他的職友平田篤胤（一七七八年——一八四三年），得到巨大的成績，因爲他們知道利用農民素來艱苦的物質狀況、武士階級的不滿、商業資產階級中間的反對的情緒。松平定信所政府，甚至因爲他的和外國人假想的合作及「開放」日本的傾向，就遭到了責難。

事實上，無論是松平定信或後來代替他站立的將軍下的領導職位的本野忠邦，都極度關心地有了

這樣的感覺。在可能的、外來的危險前面，日本本身的衰弱。他們能够設法應付破產的農民的暴動，外債大各方面的陰謀，他們能够設法壓制城市中的貧民了。雖然是暗中有着新產生的資產階級的援助的，——但他們清清楚楚地知道：這一項任務，如果德川氏治下的日本還弱和強盛的外國衝突的話，就是完全不能執行的。

在這時候，這種衝突的威脅，却一年比一年更加成了現實的。將軍德川宗吉，就曾經迫不得已部分地承認：研究某些有實用性質的歐洲科學的合法性；他明白地認識了：可惡的外國人，不僅他們的大砲勝過了日本人，而且藥學、數學、工學及其他等等的知識，也都勝過了日本人。幕府致命地害怕：這種外國的和有力的文明遲早會在日本的海岸出現，並武力強迫承認自己的優越性。這一項就是造成這種局勢；對德川氏在國內的政治制度的威望，會加給致命的打擊；並且對國內反對幕府的人們的聯合，會給與斷然發動反對政府的可能性。

歐洲的文化侵入日本，幾乎算是通過唯一的通風口——即接通過荷蘭的商館來進行的。德川宗吉的時候，就正式准許在醫學領域中專門研究的日本大學醫荷爾的證書。武士階級中的知識份子，以及那些顯然和城市及城市資產階級的利益更直接聯繫着的一小市民階級份子，藉立關心醫學，而熱心地研究工學、數學等等的荷蘭書籍。甚至荷蘭普通的地理學讀本，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他以真正革命

的方式，影響了閉關自守的德川氏治下的日本居民的意識。在日本的讀者面前，獲得了以前不知道的新世界，借新世界本身存在的一項事實，就是使他們懷疑舊習慣的標準和觀念的正確性和合理性。發生過這樣的事件：年青的日本人，在來到了日本的外國商人的援助下，逃到外國去，在大多數時候，這些逃亡的企圖，都因失敗而完結了，並且因此把這些罪犯們判了死刑。幾乎無論什麼時候，這種事件都能够用荷蘭商人的背信行為來說明：這些商人們如此重視他們所獲得的在日本的獨佔貿易的地位，對於幕府的政權，儘一切可能的方法努力表現自己的忠誠，也就故意再製造這些逃亡者。雖然有一切可能的阻礙，歐洲的文化却依然浸進了日本社會一定的層裏。例如日本的醫生移田玄白，就享有很大的聲名；他把自己的知識，提高到了他同時代的歐洲醫理科學的水準，並且著述了關於人體機構的書籍（一七八〇年出版，主要是利用歐洲現成的材料）。為着避免壓迫，著者把自己的書獻給了將軍，非常謙恭地請求將軍賜予同情。然而僅在許多年以後（一八三八年），政府才准許在大阪創辦第一所醫科學校，這所學校是完全以研究歐洲的科學為基礎的。

松平定信個人異常關心歐洲的軍事技術的問題。他的政府，曾經特別留心日本的鄰人——俄羅斯人的蠢動的報告，尤其是在薩哈連（樺太）島及千島羣島區域活動的報告。下述的事實值得特別注意：幕府的憲法階級，在這個時期，嚴重地討論了對俄國組織的預防性質一約在我們動可觀性。在這個時

期，開始了這種大規模的工程。在江戶灣的入口附近建設要塞。然而這種工作却是進行得很慢的，並且在一切情況下，都絕對不能保障首府的安全。

一七九一年和一九九二年，俄國的和美國的船艦，曾經做過好幾次的嘗試，企圖和日本的地方政權發生關係。然而，由中央來的訓令，却叫這些政權完全拒絕同意任何的談判。一七九七年，美國的船艦愛理本號，開進了長崎港，並且意外地得到了通商的許可。然而這次許可，却是因為把牠認作「荷蘭的船艦」的原故，這是日本行政機關不得已的或故意的錯誤的結果。

然而這次意外事故，却還不能認為德川氏的政府對於階級主義的總方針有了某種的轉變。幕府再度宣佈：「蓋外國人的時候，要儘可能地實行武裝監視，並且在一切情況下，都不要和他們發生關係。這種方針，對於某些俄國的和美國的捕鯨船，找到了自己的應用。」

西曆一八〇四年，俄國的從前談判的企圖，重新遭到了失敗。一八〇八年，英國的軍艦華愛頓號，藉口追捕荷蘭的船艦（這時英國和荷蘭之間發生了戰爭），來到了長崎，這種事件在江戶惹起了巨大的驚愕。這次事件的全部經過，對於幕府是十分順利的。然而，自此以後外國的船艦就常常來拜訪日本了。一八二四年，英國的捕鯨船的船員，在九州島的南部海岸（鹿兒島附近）登陸，並且對於當地的日本居民做出了許多暴行，這刺激了幕府，於一八二五年，重新（已經不止十次）宣佈自己嚴

國的命令：務須不准外國人登上日本的領土。然而幕府也早已知道：一紙命令不能嚇退任何人。曾府常接到目付（偵探）及其他官吏的這種報告：地方的諸侯企圖採用偷運的方法，來建立和來到日本的外國商船，主要是美國商船的商业聯絡。這使幕府比受到外國侵略的威脅更加不安。

西曆一八三七年，美國的船隻摩利遜號，曾經被浦賀灣的日本砲台轟擊了，並且被迫離去了。

同時，德川氏治下的日本國內政治緊張的情況，也沒有表現任何改善的標誌。反之，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無論農民方面或城市方面，都發生了反封建制度的廣大的行動。一八三二年的歉收，再度加重了饑饉和流行病。在美濃國、武藏國、上野國、甲斐國及下野國，農民都手握武器暴動起來了。商人們利用米穀供給城市所數量大地縮減的情形，提高了米價。市場上米糧的不足和很高的米價，煽起了城市中下級社會和小武士階級的憤慨，這些小的武士們，爲着補充他們由將軍所取得的口糧，也是要購買米糧的。

一八三七年，大阪發生了反對政府的暴動，這次暴動是和鹽平八郎的姓名聯繫着的。鹽平八郎曾經担任城市護兵長官的職務（奉行所的小吏），所以他是武士。然而，武士階級艱苦物質狀況，推使武士階級一定的成層走上了反動。當時大阪附近發生了饑饉，而大阪城中，却有大批發商人利用幕府的庇護，來提高米價；鹽平八郎對自己的直系長官——幕府委派的大阪市的統治者，要求取

締投機和壓抑城市中的極勢家。藉口沒有江戶方面的命令，拒絕了這種設計。那時，大鹽平八郎就深感般的出賣自己私人的財產，把這些賣得的錢幣拿來買米，並且把他散給城市中的窮人，以後，就和一羣同一意見的人們，起來準備武裝暴動，目的是要懲罰那些「城市中的主人們」。

由大鹽平八郎替民衆的檄文中，就實質說來，比僅僅把富商的存米散給窮人，他提出了更加廣大的任務。他嚴厲地攻擊整個封建制度，並且對於遭受災難的農民表示了同情。這是對於武士階級下層的心地最吻合的。大鹽平八郎的暴動，是因為內部告密而早期爆發了的，當發動的時候，政府已經準備好了可靠的軍隊，來迅速地對付這種情勢。大鹽平八郎本人和他的朋友們都陣亡了，然而他們却在城市中放了許多處的大火；放火的對象，是那些繁華的市區及屬於極可恨的大米商的氏族房屋。很有趣味的，曾經特別焚燒了三井和鴻池的房屋，他們是兩家最有勢力的商號，這個時期，就已經開始以那種就封建日本說來是異常巨大的規模，從事着工業和銀錢的活動。大家都知道，在封建制度的日本內部發生出來的三井家，後來發展成了現代帝國主義日本的最有勢力的獨佔企業綜合體。

大鹽平八郎的暴動不是單獨的。反對那些受到幕府特別保護的商業和高利貸業大資產階級的暴動，全國各地都發生了；這些暴動，對於那些傾向更直接地反對封建階級，農民暴動，是一種天然的補充。

因爲這種事實，致令恢復了那種已經廢止了的，打擊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松平定信的改革，又把牠重新加入了奔泄社會不滿意接續者的動作的行程中。

根據沒有決斷力的將軍家齊的委任實行治理國政的水野忠邦，由於害怕武士階級的下層和農民聯合行動的威脅，甚至冒險採取了這樣的極端手段：禁止商人們的同業公會及組織批發商人們舊有的一切特權。然而，經過了幾年，發現了這些手段在威脅幕府的財政破產，因此又把商業資產階級以前所享有的一切特惠完完全全地恢復了。

第五章 一八六八年的革命與資產階級的維新

（一）在歐俄封建制度極嚴重的內部危機的條件中，外來壓迫（由資本主義世界方面來的壓迫）繼續不斷地加重了。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英國在中國進行了猛烈地殖民——侵略活動。狂風驟雨般襲擊了中國的資本主義。在這個時期，俄國對中國感到興趣，極關心獲取由美國走到可能的東亞市場去的最遠途上的根據地。西北方有俄國方面來的威脅，不斷地接到外國船艦追逐的情報，在這種壓迫之下，俄國政府於一八四三年，對地方政權發出了新諭令，叫他們對於外國船艦要有敵意的行動要謹慎，在不能使俄國軍事衝突的情況下，其要謹慎。根據這個諭令，將軍的地方政權，各種糧食和燃料供給外國船艦，但和這同時，外國人關於建立商業關係的一切提議，却依然要和先前一樣加以堅決的拒絕。以此為目的方針自然是穩步。

（二）同時，水野忠邦請求任在出島上的荷蘭僑民，對他供給關於歐洲文化的一切新事物的情報，把俄國的模式、書籍和報紙的樣本送來。日本傳統的「鏡國」政策精神上的失敗，成了這樣顯然的：甚至派給因為自己的獨立地位而獲得利益的荷蘭人，也勸告將軍「開放」日本。

經過商人轉達了荷蘭國王發來的一封信，在這封信裏，他勸告日本和其他國家的人民着手交際。但這一事實，在江戶惹起了巨大的刺激，並且在長期的考慮以後，一八四五年荷蘭人才接到了簡短的答覆，請他們「停止通信」。

就在一八四五這一年，美國的國會「授權」總統建立和日本的商業關係。曾經預備了由兩艘船所組成的特別遠征隊，在海軍少將彼得的就率下，一八四五年到達了日本的海岸。海軍少將彼得受有嚴厲的訓令，要用和平的手段達到談判，不准因輕率的行動惹起日本人的敵意。然而，這種企圖沒有得到任何實在的結果。浪漚賀灣旋泊了約有一百日，彼得確信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也就回去了美國。

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江戶灣來到了資本主義美國的新使者——海軍少將白利。和美國人上次的訪問不同，這次拜訪有着對日本作軍事示威的性質。白利統率了四艘軍艦及五百六十個海軍來到了日本；他的軍艦是很好地裝備了大炮的，砲口對準着岸上。白利帶來了總統斐爾莫亞署名的信件、贈品（各種機器模型、各種小機械，牠們證明了美國技術的優越）並且對將軍的官吏預先聲明：他不急於得到答覆。他通知了呆然自失的日本人：他準備起錨開到中國去，但在下一年的春天，回到江戶來取回信。事實上，白利的船艦經過十日就離開了江戶灣。

這次拜訪，在日本政府的封鎖圍牆中間，惹起了很大的狼狽。「鎖國」的最不妥協的擁護者，夢

求採取斷然的軍事方法，以便不讓再度發生和這同樣的「烏塞」；當時外國的大砲是對着官府方面。希伊學的全體神祕中，曾經組織了特別禱告，請神對野蠻人降下和這同樣的自然力量；這是曾經一度把日本人由忿怒烈汗敵意的侵略下解救出來了。曾經把荷蘭人請來了江戶，協商日本防禦美國軍艦的方法。

然而限定答覆斐爾莫亞信件の期限迫近了。這封信是有着極誠懇的、同時却是極堅決的態度的。幕府被那些更穩健的見解的擁護者戰勝了，他們認為對美國人任何有效的抵抗都是不可能的。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初，幕府決定企圖拖延對美國國書作最後的答覆。對於這事，曾經決定避免一切糾紛和威脅，並且以特別溫和的態度來歡迎美國人。白利由中國回到日本去，比他第一次訪問日本的時候，印象是更加深刻的。這份海軍少將於一八五四年二月，統率了全隊戰艦來到了日本的領海上，有着十艘軍艦及總數兩千人的海軍。日本一切人都是明明白白的：美國異常「關心」日本，談判中一切權力的拖延，就會發生極悲慘的結果。

開始了談判，經過六個星期談判的結果，簽訂了一八五四年第一次日—美通商條約。根據這個條約，兩國之間樹立了永久友好的關係；日本的兩個海港——在伊豆半島上的下田和在北海道島上的函館——對於外國商業開放，在下田設立了美國領事館，美國的船舶獲得了在日本購買燃料和糧食的

權利，在日本海岸附近遭到了海難的美國海員，應當得到必要的援助。

將軍家簽訂了這個條約，成了各種反對派的一切代表猛烈攻擊的對象，這些人是：不滿意的封建諸侯（大名）、本朝化的朝鮮廷貴族，甚至有一部分害怕外國貿易的資產階級份子。這一切反對派，都利用和外國大簽訂條約的聲言，責難幕府太軟弱、背叛民眾利益及其他等等。

必須注意：在自利由中國回國到日本取日本政府對總統的國信以前，幕府曾經破壞了自己的慣例，徵求最大的外朝大名及京都的皇室對於這事的意見；如何應付外國野蠻人的不遜的要求，即是否和外國發生關係、這種問題是幕府策略上的錯誤，因此在一切人面前，親自證明了自己的孤立無援。這種錯誤，對這些份子給與了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的補充的機會，他們是用天皇來和幕府對立，傳播「歷史學派」暗示的思想，必須「恢復」天皇指導國政的全權。爲着理解政府所容許的步伐所創造的危險的先例的冒險性（就事實的本質說來，是在全國造成了二重政權的狀態），要充分回到德川朝的第一代將軍室康的這種命令：絕對禁止天皇干涉政治。一切反對派的團體，即刻由這種錯誤作出了適當的結論，並且聚集在京都的天皇朝廷的周圍，傳播這類的風聲；天皇堅決地反對對野蠻人投降，將軍因爲自己精神錯亂而失策應當受處罰。

反對封建壓迫的主要力量——農民，沒有參加這種展開了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只能說是統治的

封建階級陣營中的內部鬥爭。

在政治關係上薄弱的，以許多最密切的線索和封建制度聯繫着的資產階級，因為擁護誰的階級而分裂了。擁護將軍及他對外國人不得已的讓步的政策，或是擁護那些冒充保守主義原則，熱心保護舊的壟斷。在甲種領館，因為和外國通商而得到直接利益的一部分商人，變成守對於幕府政策的熱誠的擁護者，甚至企圖設法以自己的力量來壓迫幕府，以便繼續擴大對外貿易的範圍。然而必須說，商業資產階級中的這種實辦或層，在德川氏治下的日本，極少。是極少的。大部分形勢，到這時候，已經有成續地發展其工業經營，對於所發生的事件毫不熱心。或為強派派。這種情形被下述的種種原因說明出來了：第一，礦使商人，商業獨佔在封建日本的巨大擴張，是日本經濟的重要特色，礦使隨同外國通商的發展，他們在市場上的獨佔地位就會遭到重大的打擊；第二，日本富有礦產的商家，害怕會動搖他們影響諸侯們或將軍本人的財政基礎，使諸侯們或將軍本人以後能夠倚賴外國人，賦稅收入及其他等等；第三，新產生於工業資產階級，害怕外國出產的侵入，會損害日本礦的勞工市場；末了，第四，有一部分眼邊邊人的新進的資產階級，害怕這種種的現象，停止或緩和外國的擴張，以上會援助這種沒有工作着的封建的國家機構，暫時鞏固這種機構，在一個相當的期間內，延緩全部封建制度的崩潰的到來。

至於說到反對派的小武士階級，或——換句話說——沒有財產的貴族，那末他們反對幕府的情緒的力量達到這樣的程度：僅因這些情緒，絕大多數人在幕府對外國人讓步以後，都苛刻地批評了政府。這些十分廣泛地散播了滿的情緒，因為跟着美國後面，帝俄和英國也對日本提出了類似的要求，而經過一個短時期後，法國和荷蘭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使這種情緒更加擴大了。然而事情還不止這些。

一八五六年來到了下田的美國駐日本的第一任總領事達恩遜·加利斯，竭力要求擴大對於美國公民的特權。在這下面，他對日本人極雄辯地指示了：他們能够把鄰邦中國拿來做例，叫他們容易增信「輕視」「文明」的利益就會得到什麼結果。恰好這時候，中國發生了英國和法國所組織的武裝干涉（一八五六年——一八五七年），伴隨這種干涉而來的，是殖民者方面對中國居民殘酷的懲罰。十分自然，在這樣的條件下，加利斯的論證是十分確切的，一八五八年，日本和美國、荷蘭、俄國、英國及法國簽訂了一系列的通商條約，根據這些條約，外國人獲得了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日本增加開放了下列各港口：橫濱、新潟、長崎、神戶，日本喪失了提高關稅率的權利，這種稅率，是適合外國資本的要求而規定的。依照這些要求，由日本的輸出規定了值百抽百的關稅；輸入的稅率，是和商品種類有連帶關係的，但最高關稅率，曾經規定按商品的價值抽百分之三十五，最低的稅率是百分

之五。

簽訂這些不平等條約的直接結果（從實質說來，這些不平等條約使日本降到了半屬國的地位），是加劇了封建制度的內部危機。大量外國商品侵入了日本，雖然這些商品在日本找不到充分大的銷售市場（日本的農民不該是這些商品的購買者，雖然這些商品比較低廉），卻依然重重地打擊了日本工業生產——手工業和手工工場。開始大量地由日本搬出金銀。幕府努力由這種艱苦的情況中尋找出路，有系統地改鑄了錢幣，減低了其中的金銀成份。但這種方法，僅僅促使對幕府一般的不滿和失望更加增大了，因為這是和必需品價格極大的變動、生活程度一般的提高有聯繫的。

一八一七年，幕府實質上的指導者是井伊直弼，他是擁護德川氏的諸侯中的一位封建領主，是以強烈的性質及準備和反對幕府者堅決鬥爭而著名的。正式領導幕府，井伊直弼接受了大老的爵位，在幕府的政治家中，他是第一個站在和外國人徹底進行合作的道路上的。他的計劃包括如下：利用外國人，企圖加強幕府的政治權力。在這下面，井伊直弼對於建立了的封建關係，沒有計劃任何的改良、任何的變革。他努力強化幕府，專門是採取引用歐美最有限度的文明的方法，並且首先是爲着抵抗他的內外敵人所需要的軍事技術。井伊直弼負責簽訂了不平等條約，認爲在德川氏治下的日本所處的環境中，別種政策是不可能的。某些封建諸侯和武士階級，企圖組織反對外國人的示威運動，曾經被

雖然壓潰了

將軍家定生病，他沒有直系的後嗣。關於他的繼承人成了問題。井伊直弼堅持迎立他自己主張的候補老臣伊家的德川家茂。反對派的封建諸侯卻努力通過水戶家的德川慶喜。井伊直弼得到了勝利，迎立了「自己」的將軍，在這以後更堅決地鎮壓了自己的反對者。這刺激了不滿意的份子準備武裝推翻幕府。反對派的大名，嚴肅地預謀了。他們的行動，能夠得到一部分大商業資產階級及失業的武士階級。變業的擁護。十幾位封建諸侯，是訓練軍隊準備出征江戶的陰謀的積極參加者。他們和京都的皇室取得了聯絡。皇室京都，孝明天皇比他的先人進行了未得遂的政治活動，應允了籠集將軍及他所轄的大臣。陰謀的中心是水戶家，就舊的傳統說來，他被認為對於天皇政權的忠義傾向的代表者（雖然水戶家與德川朝有宿敵關係）。一八五八年底，井伊直弼接到了準備出兵的情報，不等待諸侯們行動，自己就實行進攻他們，這是利用他們還不能集合自己的力量。幕府的反對派被撲滅了；甚至京都的天皇左右都遭到壓迫。一八五九年，井伊直弼恢復了使天皇脫離一切政治的嚴峻的條例，這種條例是幕在德川家康時期就制定了的。然而井伊直弼在封建基礎上使日本部分地歐化的計劃，却沒有實現。一八六〇年，他被幕府派遺的刺客——水戶藩浪人殺死了。

井伊直弼的死，重新動搖了曾經鞏固了的幕府的地位。幕府喪失了有力的領導者，重新表現出來

了這樣的徵象：沒有決斷力及準備和外樣大名妥協，這些外樣大名如羣集在京都鬆靈殿展廳的。井伊直弼的外交政策，在武士階級中間是若其感覺失望的。因此幕府爲着挽回武士階級對自己的好感，就對外國人的關係說來，實行了表裏兩端的政策。幕府表面上繼續遵守締結了的條約，接受外國的外交官和領事，履行了早在井伊直弼時期自己所提出的一切誓約。然而，幕府卻秘密地傳播着這樣的風聲：必須準備對外國人加給斷然的抵抗。幕府會親自發出這種抵抗的信號，幕府企圖用這些手段，來擊毀所謂的「保皇黨」手中的護符；這種保皇黨因爲自己對外國人毫不妥協，在全國得到了大眾的擁護。

爲着鞏固將軍稱「保皇黨」之階在「壞表」的基礎上預定的妥協（牠的實際原因，是承認爲廢棄互相鬥爭的封建集團都比較衰弱，牠們中間的每一個，對於公然樹立自己完全的政治權都沒有準備），一八六二年，將軍家茂和孝明天皇的御妹（譯者註：是和齋親王內親王）結婚。不久，將軍爲着表明江戶和京都的妥協，作出了更加驚人的步伐。他親身到了京都，在那裏假天皇的貴賓，失約住了三個月，並且和天皇締結了正式的協定：幕府召集自己的全體的大臣，無論是在齋親大名或外樣大名，立即準備締結「外夷」所必要的方案。

因爲這些協定，幕府事實上承認了自己政治上完全破產。他不僅損害了自己的地盤，承認了天皇

實在的政治權力，而且就事件的實質說來，更吃責了自己所許可的和外國人發生條約關係的政策。授權諸侯們，即自己的敵手和惡意者，爲着抵抗外國的敵人而組織武裝力量。

一八六二年，就有一位最富足的外樣大名——島津久光，他的領地是位在九州島的極南部的（薩摩藩國），因此比其餘的封建領主對江戶有着更大的獨立性，他統率自己的軍隊，了京都，他在京都的一切行動，就是說：他以後不再認爲自己隸屬將軍了。和天皇及天皇的左右發生了接觸，諸侯島津久光，懇請正式取消許多封建顯貴們的條例，這些條例是德川氏強盛的時期所制定的。尤其是廢止對於諸侯的人質制度（大名的家屬，當大名本人不在幕府首都的時候，必須住在幕府首都。）諸侯參預交代的期限像這樣延長了：以後他們不是經過一年，而經過三年，必須到江戶去一次。

將軍和天皇的協定的最重要的結果，是承認封建諸侯有參加討論國家當前所發生的極重要的政治問題的必要。（無論他們是否德川朝的近親。）

在將軍與「保皇黨」之間的妥協的聯繫中，外國人感覺到住在日本領土上還不是沒有危險的。敵視「外夷」的自然而然的表現，常常由武士階級中間流露出來了，這些武士階級是不守法律的，對於自己的物質狀況不滿意的，同時卻又是保有自己那種封建的傲氣的。按照幕府在井伊直弼被害以後開始表現的容許外國人到日本來的「悔悟」的程度，武士階級反對外僑的叫聲更加頻繁了。自然，歐洲

入自己的挑撥行爲、他大大地促成了這種情形，主要是英國人，他們殖民者的態度和狂傲，激成了日本人的憤慨。

一八六一年時候，幕府主張相當地延期開放所謂的對於外國商業「條約的港口」，英國對於這事是比較上容忍的，這事的報酬，是把入口的關稅率降低到了值百抽五以下。然而，當發生了侮辱英國人的事件，他們和居民衝突等等的時候，英國對付日本人的政策的基調大大地改變了。

一八六二年，發生了好幾次浪人攻擊英國僑民的事件。殺死了英國人理查爾遜，因為他對諸侯島津表示了「不敬」。對這事的答覆，英國對幕府提出了最後通牒，並且於一八六三年八月間，英國的艦隊轟擊了鹿兒島——島津氏的領地薩摩藩國的中心。兩個月以前，位在下關海峽的日本砲台，他是屬於長州諸侯的（本州島的西南邊境），轟擊了外國船隻（英國的和法國的），這是把上面說過的天皇和將軍叫封建諸侯必須準備和「外夷」戰爭的指令，任意並過早應用的結果。

必須聯合一切的力量來和外人鬥爭的呼聲，播遍了日本全國。薩摩國的諸侯的軍隊，以及諸侯毛利氏（長州）的軍隊，尤其是奇兵隊，一再地以不服從和叛亂威脅將軍，如果將軍不設法把外國人逐出日本的話。幕府繼續在困難的環境中儘量敷衍。一方面，他宣佈拒絕英國要求賠償理查爾遜的死的最後通牒，另一方面卻和法國進行談判，請法國調停和英國人議和。

然而最後，幕府却決定開始對反對派的封建領主鬥爭，這些封建領主是進行着反對外國人的運動的。

一八六三年底，效忠將軍的軍隊，利用由法國取得的歐洲的軍備，並且得到那些比較更溫和的薩摩人的擁護，出兵反對情緒過激的武士們，這些武士是駐在京都市，戰爭的擁護者把歐洲人驅逐下城市，並且向南方去進攻九州藩的主力。

當幕府的軍隊向長州推進的同時，下關遭到了英國、法國、美國、荷蘭的聯合艦隊的猛烈轟擊（一八六四年）。將軍繼續進行反對毛利氏的軍事行動，和外國亦強簽訂了新的協定，把入口的高昂的海關稅率降到了百分之五以下，並且允許英國和法國在日本廣設軍隊，保護使館和僑民。這些保衛的軍隊立刻就實行了，直到一八七五年才由日本撤出。

在這裏要追述一下，如果在第一階段，強迫封建制度的日本加入資本主義世界商品流通中，完全是因為美國決定的參加才發生的，那末在六十年代，情形已經大大地變更了；美國的內戰，使他們在很長的期間內不能注意爭取遠東新市場的積極鬥爭。反之英國卻推進到了首要的地位。牠熱心地監視了自己可能的敵人的行動；俄國、法國和荷蘭。英國沒有遇到特別的困難，用經濟的手段就把荷蘭人由日本市場上排斥出去了。以後，英國人帶着某些不安的心理，監視了冒險家拿破倫三世的法國政府

國人同盟來制日本約讓侯而激為憤慨，這種同盟是明白地出賣民族利益的。資產階級，因為政府把入口稅率降到了百分之五以下，也是激憤的。這對於日本一切工業生產帶來了巨大的損害，這種日本的工業生產是極其幼稚的，沒有狀態的，站在外國商品的發賣前面是毫無保護的。農民反對封建的壓迫暴動起來了，農民暴動，北方各個反對封建的暴動，也連三不斷地爆發了。為着表現這些暴動的規模，能用用紀伊國的農夫暴動來指出了這些暴動的規模，有三萬參加者，暴動者攻擊了封建領主的城寨，把持地產佔領了，都而，也，爆發了的暴動，大名之間的鬥爭，更加猛烈地爆發了，破產的農民，不能夠忍受自己的頸項，把長期奴役的重轡解除了。

幾年前，日本各郡市反對封建社會運動，也高呼巨大的規模，日本的問題，階級，其自由主義階級，對資產階級出身，階級，自從歐洲來到日本的時候起，全盤就在廣大的規模，而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發生在接觸，資產階級接受了封建的自由的主義思想的人們，於是資產階級的神道聖教的，化發生在接觸，資產階級接受了封建的自由的主義思想的人們，於是資產階級的神道聖教的，就其思想，恢復，天皇的專制制度——混和起來的，現在從歐洲的思想，新的概念範圍方面，這些思想和觀念，現在資產階級侵入日本社會的文化階級中，這些階級，到了日本的時候，這些階級，思想的獨裁性，對封建的法制，對封建的專制，是使日本資產階級階級的前進的人們，尤其不能忍受的，就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階級，以鮮明的形態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希望和政治主張，資產階級在日本，這

時期是處於初步發展和自由建立的時期。

關於必須推翻德川氏的論斷，因此得出了若干新的意義。如果在以前，真正革命的反抗封建的基礎的自下而上的階級運動起來的農民的話，如果在以前，反對幕府的外樣大名和一部分武士階級反對派，主要是表現在封建軍營中的內部鬥爭的話，那末六十年代在自己的階級中，就已經加入了資產階級反對派，這就使反對派的旗手，是城市的平民知識階級。

必須注意：反幕府運動的許多參加者，形式上雖然是屬於封建的貴族階級，事實上卻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大家都知道，不僅有許多武士（尤其是浪人）開始從事商業和工業，而且封建貴族階級也參加了。大家知道，不僅有許多武士（尤其是浪人）開始從事商業和工業，而且封建貴族階級也參加了。大家知道，不僅有許多武士（尤其是浪人）開始從事商業和工業，而且封建貴族階級也參加了。大家知道，不僅有許多武士（尤其是浪人）開始從事商業和工業，而且封建貴族階級也參加了。

和關心自己的土地是同樣熱心的。這些地方是在日本的南部和西南部。在許許多多的情況下，武士階級和農民階級，在這些地方是在日本的南部和西南部。在許許多多的情況下，武士階級和農民階級，在這些地方是在日本的南部和西南部。在許許多多的情況下，武士階級和農民階級，在這些地方是在日本的南部和西南部。

首先決定了南部和西南部的諸族起著這種作用的，是些怎樣的情況呢？把這些情況中最重要的一項如下：（一）屬於外樣大名一類的這些無族的諸侯們的富足，很早以來就享有德川氏的條件中能够

有的最大限度的獨立，以及他們統治下所領有的日本各區有着許多優點，日本的其他區域，位置上是

對於藩府的統治更加便利的，(一)南部藩族的武士階級，把江戶看做是自己從古以來的敵人，他們企

圖在自已大名的統治下實行藩族的自治，(二)早在五十年代日本「開放」以前，非法地或半合法

地存在的日本對外的商業聯絡(尤其是和中國)，正是通過南部的港口最積極地維持了，這助成了地

方體表及和他們有聯絡的資產階級份子的富有(一八六二年「一八六三年」的事件，當時南部的

的藩族，全國在反對外國人的口號下來打擊江戶，因為武士中的年青人物參與政權的方法，助成了這

些藩族中的指導機關相當的「民主化」。這些新人物，猛烈地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影響，尤其是主張和

外國人妥協，軍備的現代化，廢止許多身分的限制(首先是廢止封建貴族階級內部各種階級之間所容

在的劃分)。

江戶在最後的時期，甚至以放棄關稅的獨立為代價，依賴外國給他的援助來保持自己的統治權，

在這種情況下，一切不滿意的份子方面對他的關係，自然而且當然只有加大起來。這種反對的關係，

他自然是在南部的藩族中得到了最大的響應，他們把別人早就主張推翻幕府統治，廢除封建身分

階級，廢除幕府反對外國人的運動放大了，及他們承認需要外國武器的援助並找尋別的方法和舉

海門等，關於這事有了相當具體的第一個象徵的時候，英國的外交官就和自己不久以前的敵人，結成

這便將海軍團，形式上著四個大名所領導：薩學、長州、土佐和肥前，是十分強盛的。第一，他
們獲其些銀錢與地方團體贊助時政支持，給款給地應富商商家三非其面的支持，留給利時與政
的儲蓄與在這種五類若類若川地與地團體者，下他應會備著。第二，薩學富士與肥前門方的時地團體

額和不在馬政府軍隊中，這包括了人數很多的奇兵隊，以及由浪人，城市的平民，甚至有其部分獨據
兵時時農民中來的其他有志國民。第三，由薩長長州與肥前軍團之組織，其組織上而支持，自先除了外國資本

即主義與否支持時地團體者(者)且，這個集團之組織並非軍事組織，不能屬於老時大會
橫濱和和他們平和平會，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

其組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
坂本龍馬

其組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
其組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

其組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
其組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

其組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
其組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其組織與組織上，是時地團體與組織之組織

府的文配，僅僅德川氏的首府——江戶的資產階級，在這個對於自己的庇護者的危險的時期，依然據
助着將軍，但這種援助已經是十分不確切的。法國與企圖來奪關係中來援助將軍，但也是毫無成就
的。

爲了平定德川氏的叛亂，幕府在元祿十一年（一六九四年）將德川氏廢止獨立爲將軍。不久於元祿十六年（一七〇九年）明憲天皇也死去
了。他的十五歲的兒子明憲天皇皇太子，就登到了后德川將軍手中，由后德川將軍攝政。
一八六七年十月，土佐的諸侯，因內亂，把自己的君尊實上皇將軍，而將軍是空口稱呼天皇的政
權。

幕府了所造的環境，將軍決定形武而接受這種權力的。他這全個重慶的君尊實上皇將軍會，在
天皇出席的會議中親自聲明放棄政權的本
願。

反對派沒有流血的勝利，因爲立即接受了將軍自願的退職，正是這種在自元祿十六年攝政的發
展中的變故，對於後來關心的。本國歷史家認爲了這種變故，當時日本沒有也不能有任何反對天皇的行動，而
至德川將軍，雖然他已經在元祿十一年（一六九四年）就立爲將軍，但直到元祿二十一年（一七〇九年）才正式
稱天皇，不過是將他所扮演的二種天皇的職責，自的是要驅掉敵人們的戒心。慶應降職以後，小居在大阪的城
堡，與德川將軍的軍隊爭鬥。雙方都反對將軍的國令，也因爲慶應不願慶應的解決而不滿意，在這種時候

意還是最大的封建領主，他既經臣屬地位有半條氏有國祚都是最顯赫的公同隊，將軍與我為榮受法法國教育的訓練，也保有充分的戰鬥準備。

相互準備斷然的武裝衝突的結果，慶喜立即集結自己的軍隊，首先向着京都推進。在伏見附近結

發的戰中，將軍被手賤了。他將自己的軍隊的殘部逃去，法皇會法皇亦被逃去的敵人所俘。慶喜降伏了。這要值得大書特書的，只是在將軍危險的時期法蘭西政府既未滿目的其保皇慶喜的

命。法國的將軍在橫須賀（江戶灣的港口）登陸，他的指揮部直地威脅說：如果將軍被殺死，法國馬上就實行干涉。進行了談判，在談判的過程中，英國的代表擔任法蘭西和俄國調會，得

到了妥協。

然而戰鬥還沒有因此就結束。在一八六八年七月八日，慶喜全部事關之慶喜的擁護者與諸侯

正確地說來是戰勝將軍的聯合的反對者繼續進行了武裝抗爭。在日清戰事起，會將義族領袖主一諸

侯松平容保，把很大的兵力圍結在皇子的周圍，阻礙地戰鬥了。為着對抗京義的軍隊，即使自己親念士

的戰戰不讓於敵人的正統皇朝，口號，松平容保把在日光和上野寺社中担任祭司的皇子，宣佈為皇帝

。這位皇子，有攝政王被稱呼了，得到了極個別企還聚集軍隊帶條條的軍隊，並且被宣佈為皇

帝。然而北部的聯合的兵力總是不充足的，於是於八年的年底，法皇逃到法蘭西，法皇的軍隊，亦被驅

逐。

法皇逃到法蘭西，法皇的軍隊，亦被驅逐。

也拒絕服從新政權，在海軍大將榎本武揚的指揮下，航向樺北去，到達了北海道島的海岸，在那裏，榎本武揚和他的戰友們，不勝決定對反幕府的力量組織抵抗，而且創立了自己的獨立國家，這個國家是有着「共和」政體的。顯然，這種情形能夠用下述的理由來說明：榎本武揚本人僅在自己出山（將軍服務）的不久以前，才由國外長期旅行回來，在歐洲遊歷了七年，感受了歐洲的思想。這個北平道的「共和國」，是封建武士的原則和某些直接由歐洲的實情轉借來的進步的資產階級的見解，這兩種事物的特殊的、奇妙的結合。在六個月的期間，榎本武揚擊退了從中央政權方面來的對自己領土的一切危害。但在最後，他實行降伏了。後來他擔任了海軍中和外交上的重要職位。

雖然幕府失敗了，主要的軍事反對者被肅清了，但獲得了政權的新政府的地位，却能夠說是有危險的。這危險在於，海軍和滿洲軍隊隨其後，並隨海軍領袖合滿軍艦，登上該島，與榎本武揚（事實上在政府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兩個人：大久保利通和榎本武揚）他們能夠看做是顯明地與階級化的貴族階級的代表。他們主要目的，是消除全國政治上的分裂性，並極迅速地恢復，自然，這種恢復，要專門看做是吸收外來的文化，首先是吸收資產階級的軍事和技術文化。

然而迅速地實行這些綱領，却有特別的困難，首先是因為推翻幕府和建立政權的新人物是十分形形色色的，並且是在各種的、常常是代表直接對立的階級利益的混合物。當共同的敵人（幕府）在

的時候，這種聯合必含有組織地向着同一的方向前進了。但在軍事勝利以後，勝利者自己的階級中，就開始了失銳的內部鬥爭。

他們已經指出了，參加反對德川氏的有三種階級：(一)反對德川氏封建制度的農民；(二)幾乎完全是在貴族的掩護下出面的，因此幾乎完全是以普通的武士為代表的，力量薄弱的並且還沒有組織的資產階級；(三)德川氏的將軍朝，自始是要用更受歡迎的但也是封建的政府來代替他的、封建的諸侯們和朝廷貴族。推翻將軍的聯合的軍隊，是上述反德川氏的第二種和第三種力量暫時的合作。

然而這些軍隊的勝利，完全地造成了獨立活動的第一種革命力量——農民——存在的條件。在推翻將軍以後，在成立了新政府的第二日，農民就出面反對他們的敵人，如果在二八六六年，即是推翻將軍的節夜，日本全國曾經記載了發生過十七次大規模的農民暴動，那末在二八八九年，即是新政權成立了一年以後，就發生過四十二次大規模的農民暴動，一八七〇年發生過三十一次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在新制度存在的第一個十年間，即是從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八年，日本記載了總共發生過一百八十五次大規模的農民暴動。這些統計材料雄辯地說明了這種事實：推翻了幕府，根本沒有變更日本農民遭受封建榨取的本質。資產階級，其建領于反幕府的聯合，和革命的農民大眾衝突起

來了，把他們看做「自己最危險的敵人」。資產階級感到危害神聖的私有權的革命勢力面臨的恐怖。

雖然封建階級也有這種恐怖，但因為日本的封建階級，還時在權杖中已經有而且大權無盡的對階級

資產階級革命的輝煌發了，趕快就去擁護封建殘酷的政策，目的是要極快地懲罰農民運動。

據說，階級自是關於這時期農民革命行動時，階級價值保衛有極大的奇觀，然而這些階級規則

階級據說能轉輸出來，一個階級是顛倒向不於階級而於於階級，階級因為階級時時變壞，其位置府

階級階級失敗。

階級階級階級一及階級，因為階級在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

階級的階級

欠不但是階級階級，這迫迫去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

階級

階級

階級

這不可階級階級促成了資產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階級

階級

益。雖然他本人是反對武士階級，却主張儘可能迅速地實行無限制的農業改革，來滿足一部分富裕的農民。這將會分裂革命地反對新制度的人們的隊伍。代表封建領主的願望的西鄉隆盛，堅決地反對這事，把全部注意都用來擴充軍備及使牠現代化，這就會給與可能性，有力量對付外部或內部的敵人。西鄉隆盛在這種傾向中發展了巨大的積極性。西鄉隆盛事實上佔有新政府中的陸軍大臣的地位，並且領有最整齊的武士的部隊（陸軍中將），他在短期間就創造了受過很好的訓練的軍隊，創造了許多專門的軍事學校，這些學校按照歐洲的樣式組成的，雖然就自己的規模的成你說來，這些訓練完全保存封建的武士性質。

政府中全體資產階級份子，很快而且很容易就實行了這種改良。牠是日本以前的發展跡象都已經準備好了的。這些改良，大體說來都不過是加以法律上的承認吧了。比如說吧，從一八六八年起，關於職業的選擇權，解除了一切限制，取消舊的同行公會和同業公會，每個人都有一種從事商業、手工業和農業等等，對和自己的出身沒有關係。一八七〇年，曾經正式取消關於封建農民，除佃租多種租和地租的封建的一切限制。農民對土地擁有權，自願與地主進行買賣。

這些這些改良對封建階級並沒的封建阻礙和果侷限制，加強了重大的打擊，而且大應產產階級在農

全國通行。對於農奴制度已經是重大原則上的打擊。但事實上，這些權利只有武士和町人才可享

受，因為農民是負擔了這種地稅，不能從封建領主分給他們的土地中獲得任何利益。

一八六九年，大久保利通和木暮實成，做到了使四個封建領主（他們是推新政府的領袖）

與封建領主島津重豪，分別簽訂了割讓書，把薩摩山地的領地，把高橋往鍋島直大，島津重豪和薩摩族

的領地上的權利，把這些土地，奉還天皇。其餘的大名也都無不割讓他們的領地為徵收地稅和木

暮實成用這種手段，準備以後完全取消封建領主對領地的權利。漸漸地，武士階級在政治上

的中央集權。大名都知道了領地稅，他們以後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在薩摩族中的權力時，使薩摩族在薩摩

的封建權利，就實地說，是在現代化的形式中，使薩摩族在薩摩族中，所獲得的米給來維持一部份

的武士，因為沒有用處而解散了。

一八七一年，在農民方面來的革命威脅的壓迫下，政府決定繼續推行某種程度的改革。即日本以前

封建區別徹底取消了，設置了由中央任命的首領的職制。

同在這一年，政府開始施行農業改良。一八七一年改良的前途上，絕大多數的封建領主，都對封建

，農民由封建領主取得了不大的分地。形式上，農民是給與了領地的權利，但實質上

，早先農民所獲得的，在大的分地。形式上，農民是給與了領地的權利，但實質上

，早在德川氏的時代，農民分化的過程就已經進行得很遠了，使用典質的方法把分地租佃，佃租佃成了十分普遍的。所謂「高租」(高農)和「一畝土」(一畝農)從事農業的武士(如同高利貸者和商人一樣，發源地在江戶)的出現，就是農民分化的結果。在幕府、豪士及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代表者手中，集中了絕大部分的份地。早在一八七一年農政改良以前，約有三分之一的農民的份地是在租佃。這些租佃訂立地的份子，事實上變成了地主，對農民的關係說來，是採取純粹封建的榨取形態的。

農政改良，根據這種主旨確定了土地所有權：這些土地事實上是一個人管理，就屬於那個人所有，並且雖然對地主自己保留租佃權。這就使地主，是近由當地的農民手中，把租佃地收回，歸於那個人所有。所以，首先歸於豪士和地主所有，法律上承認了他們對前項土地所有權的權利。

法律上根據事實上的租佃諸原則，確定了土地的歸屬權。因為絕大多數的農民都是極小租佃者的「所有者」或租佃者，而大多數的土地，即被豪士、高利貸者及新地主階級的某幾人所有。全國租佃者，即大多數的土地，即被豪士、高利貸者及新地主階級的某幾人所有。利用這個時機，豪士佔有了土地，所以，這種農政改良，在日本的農村中，沒有引起實質性的變遷。更，他不過在日本農村的土層中，引起了某些社會的變動，使舊有的農民階級，佔有了土地所有權。在封建專制下，土地所有權，都歸國家收買了。在這件事下面，封建專制對土地所有權的實質，有甚大大地超過了屬於他們的土地的實際價值。反之，以前封建地主的某部分土地，就新政府說來，是「受了救的」，這是由於各種可能的個人判斷的核計而來的結果。

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六八年的事，在日本歷史中是「明治革命」的名稱下很著名的。這名稱是

是和睦天皇（即明治天皇）始創的。在試年就叫「明治」有連帶關係的，好字的意義說來是「政

治清明」是在日本試的歷史政權中，把取稱公認權的術語叫做「明治維新」，但為着確定一八六七

年確立以新傳的性質，在更廣泛的政權中叫做「明治革命」。

在明治維新的性質，在更廣泛的政權中叫做「明治革命」。

如周天家知道維新農民因為自己的利益被殺的本性，如果沒有在入階級或者階級方面的領導

以此沒有力量，對於維新，對維新主義大的並且是和他們有血緣的日本力量薄弱的資產階級，致命

地着相農民，在明治維新中，那不能不推測農民戰爭來推翻封建制後的在階級日本的無產階級至一

八六八年的海陸軍上還差角，農民是沒有領導而自發地行動起來了。然而他們這些自然雖然在農民的

行動，因勤勞者應有的制度，利用德川氏的封建專制政權非危險中的情況（這種危機是因為農民的

運動激發本主義列強對日本的新進的，以「德川氏的封建專制政權非危險中的情況（這種危機是因為農民的

對的維新是聯合，推翻了德川氏的封建專制，替日本以後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了道路。新的資產階

級於明治維新中，農民是沒有領導而自發地行動起來了。

在山這樣看來，日本明治維新政權的轉變，到明治維新時，資產階級的聯合，日在這種階

合中。資產階級從最初就是起著從屬的作用。農工革命，即真正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日本遭到了失敗，無法展開起來。有了封建君主和資產階級聯立政府方面來的分裂的策動，致令農民對於日本農政制度的要求不能充分發揮極大的力量。得到了這樣的結果，因為全部改革的结果，日本便在可達國治階級本在經濟發展中的必要條件，但這種發展本身卻是矛盾的。有根的農地制度的建設，除聯系外。因此，以六次革命的傳佈，是半途而廢的，沒有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

在明治新編制的上，以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五年期間「革命運動」不是確證階級性質的。因為標題的「一九〇九年以後世界歷史重要資料的選輯」中，我們找到許多記載，如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五年日本革命和維新。

自保為革命和維新時代的政府，就外發發展，是封建君主集權機構。這種機構能維持其軍事專制警察的國家機構，是階級不調的。這種的權力，不是僅僅在這種初期階級的國家機關中，正是那些小武官所構成的官僚階級推進到了第一位。就以明治時代的機關是更領能力的，關心資產階級的利益。這些機關階級在階級後，新政府所行的根本改革。

長時，顯著注顯的規模的政略改革以後，繼續施行許多新的改革。這些改革是著重於有限的資產階級，但為滿洲日本資產階級發展的道路，即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政府採取了貨幣的捐稅來改革

現物的地稅。這種貨幣指稅不是按收成來計算的，而是按土地的價值來計算的，並且正式准許買賣土地。一八七二年採用了徵兵制。一八七三年，武士階級遭到了別種更重大的打擊。武士的俸給，所請的「米給」，曾經部分地取消了。爲着補償這額取消了的「米給」，政府按這種米給六年應得的價值的半數付給了貨幣（爲着救得糧食的米給）。這種價值的別一年，付給了百分之八利息的特種債券。事實上，這種手段致令大多數武士迅速地破產，這些武士是喪失了土地及以前一切身份上的特權的。一八七三年，「恩給的資本化」在公文書中是這樣稱呼的。是隨自己的意思的。以後（一八七六年，繼續按舊制的程序來實行了。一八七四年佐賀縣武裝暴動，就是許多武士方面對於這事的直接反響。這次暴動被壓潰了，然而武士的不滿却沒有被壓下去。一八七六年，禁。武士佩刀。這是他們往時的對封建特權所指定官吏穿歐洲式西服被壓潰。

一八七二年，建築了日本第一條鐵路。這條鐵路把橫戶。土確已經改爲東京。和橫濱海聯絡起來了。郵政和電報有了迅速的擴張。在訴訟中正式廢止了拷問。大多數政府機關，無論是軍事機關或民事機關，都請有外國的專門顧問。主要是英國人。日本外表上十分迅速地歐化了。這種歐化達到了極廣大的規模。雖然對於日本全國迅速的工業發展有許多阻礙，「歐化」的速度却是十分快的。這種情形能够用下述的原因來說明：日本能够按現成前樣式來吸收歐。美的技術，這使落後

計其意對家趕上資本主義，文明國家的水，所必要期限，大大地縮短了。

我們早就指出了：歐洲的技術實輸到日本國內的過程在德川氏統治的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在幕府
 騷擾中個別的封建諸侯常常跑到丁政府前面。可以舉出這個例子來說明，本家都知道一八四八年，佐
 賀的諸侯就開照荷蘭的樣式來鑄造大砲。一八六三年薩摩藩趁島津氏，就建築了第一所鐵鑄工廠，
 預先由英國買來了六千支紡錘。德川氏的政府，在自己的軍火工廠中，應用了的技术。但在幕府下幕
 府以後，明治初年間的封建丁官僚政府，比以前按更加廣大的規模，歐洲更有計劃地獎勵歐洲技術
 的輸入。政府在各種各樣的生產部門中，實行創辦了所謂的「模範企業」。這些「模範企業」，那是
 以國家的資金創辦起來的，起初幾乎都是用來滿足軍隊的需要及國家其他的直接需要。後來這些「模
 範企業」，以很少的代價或甚至毫無代價，就移轉到了資本家私人的手中，這些資本家是和官僚政府
 建立了特別關係的。屬於明治政府所建築的「模範企業」的數目的，有三個造船工廠（在長崎，橫須
 賀和神戶），十品川的玻璃工廠，新潟的紡織工廠，兩個洋布工廠（在小手和糸手），富岡的蠶絲工廠
 ，十個礦山（佐野，佐藤，小坂，三池，高島，釜石，中込坂，陸内，阿仁，大辻），其餘的製鐵和
 啤酒工廠。上述的鐵道鐵道，在一八六五年都建設了。模範企業，為着在技術上指導關係這些礦山
 ，政府裏面聘請了外國的技師。

明治政府不限於直接創辦工業企業，而且使用了巨額的資金，來補助私人合於這種傾向的舉動。這些補助金的絕大部分的分配，是依於那些營業於重要性的各種機械方面對政府高級官吏的請願案。所謂「補助金常常有領不得到的性質」。政府本身也將所賦稅之數額，直接用於補助制度存在的第三年起。這些補助金依續補助國內公債來維持。爲着保障能够應募這些公債，政府不得不自己的債權者中最強勁的財力爲擔保。銀行家法津低向在這些債權者中佔有特別顯著的地位。如前幾期在這種經過的也該研究家對該種補助金以爲公債比在年飯籌辦軍隊的劃定。如該種企業補助金歸於海關劃定。其最基礎和穩固的以後，正是參議到町三井家的手中。三井氏在雅爾賓斯基以後迅速進行着銀行家劃定。其而且也是該國的工業家和商人。

必須注意，私資本家願意接受補助，不是僅僅因爲企業需要。內是海工業。其熱烈的勞動也佔有很大的比重的企業，即是能够提供最優越的利潤率的企業。至於說開始建設，那末這些工業的這部分，即被保留在國家的手中。國家本身就是日本冶金業生產品的唯一重要的消費者，這種情形，被日本重工業有極大的增長速度有力地反映出來了。早在日本工業發展的第二個十年時，就表現出來。輕工業發展的極端，自從移轉到了私人手中的時候起，他的發展更加大大地超過了重工業。

日本現代冶金業的開端，是在一八七三年，當時冶金業在俄國開始。第一條建築了兩個鋼鐵廠。

在岩手縣)。然而，雖然有外國專家的協助，這個企業却是很難獲利的（因為燃料不足及別種原因）。一八八三年就關閉了。一八八七年移轉到了私人的手中，他重新開始工作。日本最大的冶金工廠——八幡，直到現在都屬於國家所有，是僅在一九〇二年才建築的。這種冶金業的落後，表現了日本資本主義一般的虛弱。

一八六九年，明治政府創設了調整商業、陸軍和交通問題專門的政府機關。一八七二年政府組織了國立郵船會社，然而，一八七五年才創立了私人的汽船會社——三菱會社，政府不僅給予訂正三菱會社巨額的補助金（一年二十五萬日元），而且把屬於國家的約有三十艘汽船讓給了這個會社。

明治初年間的國家機構組織上有着很大的紛亂。這是由於下述的情形所推演出來的困難的直接結果：京都朝廷的社會及擁護他們的封建領主，努力獨佔政府中的重要位置，同時却必須考慮到這種事實：大體說來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普通的武士階級，利用自己軍事的和組織者的優越地位，也希望直接參加政府機關。

結果，一八六八年明治第一次的政府機關，成了一種種架的機構。這種機構叫做「三職」(三職者：一、三職是說總裁、議定、參事)。最上層是站着總裁，這個職位是被編纂的有權川喜藏在親王佔有着。其次是有兩級參議官，一年長的一級參議官，是由十個一議定之類組成的，二年時的一級參議官

，是由二十個「參與」所組成的。以下還組織有八個行政部：(一)神祇，(二)行政，(三)外務，(四)陸軍，(五)海軍，(六)司法，(七)立法，(八)總務(附屬總務)。年長的參與官務職位，是由封建諸侯來担任。「參與」，即年青的參議官中，有些武士，明治革命時代廢禁地的古跡家，他們裏面有大公備後通、伊藤博文等人。

一九六九年陰曆六月，明治天皇在靈重的情勢中，發表了五個條目的「御誓文」：(一)應當組織議會。一切政務都依照公意來決定；(二)一切階級——無論是統治階級或被統治階級，——都應當把自己完全歸國運的隆盛；(三)應當允許全體文武官員和全體人民，都按各自的能力實現各自的志願；(四)舊時的一切陋習都應當革除，他們所承認的正義與公道，要處處確立起來；(五)為着振興實業的基礎，農商都要從全世界吸收知識。這件誓文是因為新政府內部的尖銳鬥爭而發表的。明治天皇這時只有十六歲，當然想不到這種事情。普遍的武士階級，純粹的資產階級的份子也一樣，害怕破坏了德川氏的封建諸侯，破壞不可侵地保持以前的封建——官僚的治理方式，並且照從前一樣不去考慮「下層」的利益，因此他們發誓要努力廢除大德在政治權力上的獨立地位。所以在「天皇的誓文」中暗示了這種傾向，以後選擇人員的時候，要按靈格的規範來注意每個人的能力。要趕快改革人民的代表機關的勅令，也首先是因為政府中那些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份子的懇請，才正式發表

者爲這樣的推測。天皇「誓文」的起草者是金子堅太郎，他後來對於日本憲法的制定起了顯著的作用。他在這個時期，却屬於武士的「左派」，這一派是主張大大改革的。然而在這種形式中，天皇照公佈「誓文」，表達出來了「一方面武士階級的下層及資產階級的要求，稱兵方面是封建領主及封建貴族堅定的保守主義地反對這種要求，這兩種傾向之間的妥協的成果。」左派以「武士和資產階級的團體」要求日本政治制度按英國的樣式現代化，召集議會，設立責任內閣，以及其他等等。一位政府的指導者，貴族團體的代表——岩倉具視，對這種事情激烈地反對，他害怕國家民主主義化會惹起大衆的動亂行動。木戶孝允擔任了這兩種見解的調停者的角色，他和這兩派的份子都維持了密切的接觸。

因爲政府感到有及時調停左派和右派增大的對立的必要，履行天皇的「誓文」，伴來了比這種誓文本身還要更充分的妥協。一八六八年的年度，政府機關重新改組了，並且取得了太政官的名稱。政府的首腦是「太政大臣」（首相）。他以前叫做「總裁」，而年長的參議官和年青的參議官（議定和參與）也繼續成了兩個「議院」，牠們進出了協議的甚至參議員的指導的外觀。上院（貴族院）聯合了封建諸侯，下院（衆議院）聯合了武士階級——貴族的下層的代表，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然而參

須注意：資產階級對於政府政策的影響，却不是通過這個議院來進行，這個議院僅僅存着諮詢的職能，就事件的實質說來是帶有裝飾性的性質。資產階級沒有規模的工廠行號出廠，誰接得高級官僚，內閣取得職務。省（市）的政目，在行政官下區歸屬到五個：（一）神祇省，（二）大政省（即財政部）（三）兵備省，（四）外務省，（五）農務省。這些省的首腦，都是由封建貴族或朝廷貴族時代表來担任，這些那些加入政府集團中的極反動勢力，功名心和威望，既獲上得到了滿足，履行職務的實際的指揮權，完全落在官僚的手中，他們是既顯大臣，二級秘書，三級秘書等等的權力來發動。這種行政機關，直到一八八五年都沒有特別重大的變更，一八八五年的時候，組織了新的內閣，這次內閣是完全照歐美的樣式建立起來的。

一八六九年創設了由二百七十名貴族的代表所組織的議會，這個議會既係「公議院」，（到一八六八年革命的時候，這種議院計有三〇二席）。這個武士階級的議會，由公議院與「公議院」的公議院，但他們的批評主要是海派關心無產階級利益的路線來進行，這種議院是一八七一年革命取消的。公議院常常對議事表示不滿，政治沒有充分關心「善人」上下武士，這便除了「附屬」和「大名」公議院所（後來改名「集議院」）的公議院開會討論的時候，最得注意的，是武士十分極端「民主主義」，致使貴族的代表個批評政府而地關心封建階級上層（朝廷貴族和大名）的利益，也批評政府來着。

當六和「普通的」階級——資產階級接近。武士階級爭取「民主主義」不過是爲流自己，因此當靈敏最反動的封建領主勾結着，這些封建領主，企圖最大限度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這樣看來，在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六八年的事件進程中的最初時期，如果武士階級的下層還相當地担任了資產階級情緒的領導者，他們和將軍鬥爭是在資產階級的「平等」口號下進行的話，那末，在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以後，大多數的武士階級，不能在新的國家機關中找到職務，變成了顯明地反對政府的政策的反動力量，在這種政策裏他們發見了自己的「貴族義勇兵團」的思想離得遠遠了。至於說到那些加入了國家機關中的小部分武士階級，這些人們是變成了官僚的，那末，他們大體上能够看稱是資產階級政策多少自覺的担当者。

大多數是由反對派的武士階級的代表所組成的公議所，一八七三年解放了。

一八七一年除廢了藩制，因此引起了太政官新的局部的改組。就委員會的類似說來，國家機關總共是由三個構成部分所組成：(一)正院，繼續執行着如同總執和太政大臣一樣的最高政府的職能；(二)右院，執行着執行權；(三)左院，是正院的諮問機關。

一八七四年，在大阪召集了代表大會，在這個會議中，參加了明治政府最有勢力的代表——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也參加了反對派的領導者，反對派中聯合了一部分資產階級及一部分地主份子。

他們是不滿意高額的地稅的。這個反對派的最重要的代表，是板垣退助，——他是由下層武士階級出身的，是浸透了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精神的，——以及不戶波允。在這次會議中，板垣退助執拗地說服了政府的代表，趕快設法使國家機構真正民主化和現代化，如若反對的話，他就以對政府「解散策組織公眾的同盟」絕交來威脅。他指出了：已經進到了爲着準備實現現在天皇的誓文中所約定的各種權利議會政治所必要的時期。木戶孝允以更溫和的方式支持了板垣退助的要求。然而，如果大夫保利通傾向採取從速召集議會的方向的話，那末，伊藤博文（在他後面是站着已經長成了很大的獨立勢力的官僚）却斷然反對加速實行預定的改革計劃。根據他的主張，曾經通過了這樣的決議：「人民將來要爲準備一實行議會政治，因爲這種緣故，將來要召集地方官的定期會議，在這種會議上，政府能够知道人民的需要。第一次的這種會議，一八七五年在東京召集了。十分顯然，這從任何一方面看來，都不足表示國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也在一八七五年，根據伊藤博文的提議，作成了新的，計劃起來是第三次改組國家機構的計劃。表面上，這是表示沿着實施歐洲式的資產階級制度的道路上的進步。這次是採取了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分立」的原則。太政官最後是掌管行政，立法權應當由上議院來實行，這個上議院取得了「元老院」的名稱。上議院的議員由天皇任命。末了，司法權轉移到了最高法院——大審院的手中。然而這次改革，不過形式上改變了以前的官僚政府機構的狀況。無論是右派的

、武士階級的反擊派，或左派的、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對於這次改革都不滿意。

當時，對於外交政策問題的意見不統一，在日本政府的內部起着重大的作用。對英國的趨向沒有遭受任何的變更，這種傾向反而鞏固了。然而，却不得不去考慮一項主觀的專賣。日本的軍隊，已經具有歐洲式的組織和現代的軍備，然而自己的軍官幹部，却幾乎完全是服從封建武士階級而形成的。實行徵兵制，至少會促進軍隊的民主化。這些軍隊的領袖，陸軍大臣西鄉從道（他享有武士階級中最大多數人的信仰），妄想及早讓日本軍新的武力，公然宣傳必須二次實行徵兵制。西鄉從道的出發，西鄉從道在這種事情裏是由下達的原因出發的：希望在明治政府中，保證封建武士階級的勢力，獲得鎮壓資產階級下改良主義的份子所必要的優勢。很輕便地就能達到這種目的：如果日本發動了戰爭，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軍人比武士的意見，比在和平的情況下，就有着大得多的重要性。就實質說來，西鄉從道是希望以推翻了德川朝為滿足，却不願去讓取消舊有的特權。日本政府無論什麼時候，都有充分的作戰理由。日本革命以後後路的第二步是：一八七二年合併廣證的琉球羣島，在這以前，琉球形式上是在日本和中國之間保護之下。一八七九年廢除了琉球藩，把琉球羣島改稱為沖繩縣。

一八七四年，日本軍人在台灣島上實行了規模更大的封建專賣戰爭。這時台灣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

口台灣人殺死了幾個琉球島的漂流民，日本準備了完全的討伐隊，沒有遇到特別困難佔領了台灣。中國政府提出了嚴重的抗議，僅僅沒有發生戰爭。德國出面調停才解決了這種爭端。日本的軍隊撤退了，但中國應當「賠償」日本出征台灣的損失，因為日本行動的目的是一黨謀，台灣的生命。

日本人有系統地加緊鼓吹朝鮮水師的「衰變」。朝鮮的水師對於日本海軍的擴張是表示輕蔑的，甚至是有敵意的。一八七五年，日本的船艦和朝鮮的船艦之間發生了相互的射擊，僅僅沒有引起戰爭。西鄉隆盛堅決主張對朝鮮宣戰，他以自己辭職來威脅。日本多數領袖都勸他撤着。只有大久保利通堅

持不變，他確實地證明了，在沒有完成大改革的情況中，這種戰爭是不利益的，宣佈放棄軍事活動的最後決定。一八七六年，日本用武力強迫朝鮮開放港口及和日本締結不平等條約。然而這並沒有滿足武士們的願望。西鄉隆盛在這時以前就離開了東京，回到了薩摩，公開地讚揚信條的武士階級和軍事部，以便和薩摩鬥爭。他創辦了軍事學校，在這些學校裏，和歐洲的軍事科學同時，灌輸了封建的「武士階級的世界觀」的原理。在這些學校裏，西鄉隆盛集中了大批優良地訓練了武士階級和信條的武士。

武士階級不滿足於武士們，從全國各方面來到了薩摩，他們都受到了西鄉隆盛方面的熱烈歡迎。結果推出來，西鄉隆盛所領導的鬥爭，不僅在日本的南部，而且在全國範圍內武士階級的一切地方，在其間的薩摩中，也都在同樣地準備起來。這說明武士階級，他們在進行了改革以後是不知

道組織起來的，同時又是對於由政府所取得很少的資金不滿意的。這部分武士階級，妄想恢復舊的舊制度，恢復有能力挽回武士們以前的政治特權的制度。因此，不僅薩摩是武士階級反動運動的根據地，而且還有長州藩和薩族和水戶藩。由這三個藩族中出身者，創立了統一的封建類型的反對派。然而，武士階級的這種反動運動的主要中心，卻依然是薩摩，因為薩摩的武士階級正是人數最多的。曾經最積極地參加了推翻幕府的運動，他們運用統一的軍事組織，相互之間保有鞏固的聯繫。

一 鹿兒島是薩摩叛亂的參謀本部，同時也是集合一切反對政府的、反動的勢力的中心。西鄉隆盛主要的軍事學校就是設在這裏，這個學校裏大約有七千武士。此外，西鄉隆盛還創辦了對於少年武士的學校，這個學校是和陸軍幼年學校類似的。

準備叛亂，是十分廣泛地公開地進行了。政府自然不會不知道這種準備，但在然舉事的時候以前，對於西鄉隆盛的行動只好裝做沒有看見，秘密地準備鬥爭，並且依然希望有妥協的可能。

說明西鄉隆盛叛亂的思想前題的重要文獻，這是在那時傳播最廣的橫山氏的小冊子，他也是叛亂的一位參加者。橫山氏被武士團體派去東京，是在已經壓潰了西鄉隆盛的叛亂以後，用武士的名義向政府申訴他們的狀況不堪忍受。把呈文送達了官吏，橫山氏就切腹自殺了。

橫山氏的小冊子，就形式說來，是封建領主和武士階級對明治政府的公訴狀。這本小冊子是由下

述的十項要求編成的：

(一) 以大臣的資格輔弼天皇的那些人，都大大地耽於奢侈和浪費，在上位者把皇室引入迷途，在下位者不注意軌道。(二) 大小官吏，在內者徒逞空虛的高調，在外者關心虛榮和實利。(三) 早晨頒佈的法令，晚上就取消了，人民大衆都懷疑自己的信念並且感到不安。(四) 每一個縣折徵錢的人馬增加，捐稅收到了(收錢總量的)五分之一的規模。(五) 不尊重正直，崇拜狡猾，不把謙遜認做美德。(六) 不是爲着官位來裁員，而是因人設官，所以人們在勞動機關中工作，懶惰不次是如同自己的主人一樣的。(七) 不過是根據宴席來估計友誼的價值，蔑視思想的關係。(八) 由於和外國人締結條約所表現了的輕率，公衆輿論是經常受着刺激的。(九) 殘酷的法典還沒有制定，殘暴和虛謬完全依於個人的愛或嫌。(十) 無論是在上者或在下者，都爭先地追求利潤，國家陷在危險中。朝廷的語言責人和敢於淫蕩和安樂。

這件文獻明白地說出來了：武士階級若其不滿意繁多的改革(第三項)、高額的地稅(第四項)、取消階級享有特權的封建法典(第九項)。

一就這本小冊子的形式和內容說來，完完全全地反映出來了封建的概念和見解。發行者德澤氏(藤原家的「主人」)稱他在東京所佔有的政府中的官職，成了「八七七海關始

爆發的西鄉隆盛叛亂的推動力。表示抗議採取禁止武士佩刀的禁令，諸侯島津氏實行辭職，希望朝廷常一樣走海道回到自己的領地。島津島去。然而政府卻不准他這樣做，並且不允許對他供給船艙。島津迫不得已，在長途旅行中，越時時乘舟，所騎馬到了日本的南部。屬於島津個人的親兵用刀，都解下來了放在岸邊，由島津自己拿著。

當島津帶著放在籠子裏的武士佩刀力來到了鹿兒島的時候，這在武士們中間惹起了極大的激動，這些武士們都因為他們的主受到這種禁教的屈辱而憤慨。這種憤慨加強了西鄉隆盛企圖起事動亂。雖然這種風聲是煽動起來的，然而其氣以後，漸漸發散了。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的添派了。政府企圖由薩摩的兵士中派出一部武士。把前軍官薩摩的薩摩部隊調遣，派到了鹿兒島。是為將來備出這些武器。這由武士方面起程才曉得大體做。禁止佩帶和佩帶的部隊各異，政府派來的潮潮逐漸漸漸地調到法可。

在這以後，西鄉隆盛最後決定發動起來。他把自己的軍隊派向北方法，包圍了熊本，這是整個軍部的行政中心的城市。在熊本，駐有高等政府的人數很多的守備隊。照全權研究家知歷史家的一般見解看來，圍攻熊本是西鄉隆盛極大的錯誤。他分散了自己的主力，對政府給與了好好的補給。這抗敵徒的可能性。如果西鄉隆盛把自己的軍隊更遠地向北推進，他就能够得到長州和水戶的武士階級

和薩俄方面地發動，也對維新軍有軍事上的成就。西鄉盛盛沒有氣操去做，卻把自己的行動上的自由，西鄉軍團圍困在內而發動了政變。

西鄉盛盛圍困軍團，對軍起亦有重要關係，西鄉盛盛是軍團的兵團。

政府動用西鄉盛盛阻在龍本附近，儘力召集兵力來擊潰這不叛亂。政府方面佔有許多很大的優點。第六，政府有強固和完善的武裝並且數量很多。第七，政府有金錢，西鄉盛盛對軍沒有金錢。第八，政府有軍用設備。是時西鄉盛盛開始發動以前，政府就已集中了全部艦隊。末了，政府有着現代的交通和軍用設備。雖然，這道交通線不能與那轉線路是只是些許的廣告。

軍團的叛變是很複雜的。這政府爲着政府西鄉盛盛而組織軍隊的時候，以志願兵的資格募集軍團。約由以前維新軍團試的試法而發動的而功。約由維新軍團試法中，來了人數很多的武士，他們在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六八年內戰的時候，是站在薩俄方面而西鄉盛盛哈爾濱對維新軍團。發動這些志願兵參加戰爭的動機，是他們盼望薩俄人報仇，這些薩俄人是在自己的時期對德川氏作過戰的。然而，顯然這不是這些志願兵決定了對薩俄軍團的性質。

政府的軍隊的規模，在發動開始經過兩一三個月以後，大體有六萬。主要的軍事動作，是在龍本附近進行了，在龍本進行了激進主義西鄉盛盛動員重要一戰，西鄉盛盛在龍本會戰中失敗了，龍本

雖才避免了被俘虜，逃回了龍兒島。西鄉隆盛這等一些時期企圖集合新的兵力來戰鬥，然而沒有成功。

西鄉隆盛會經受傷，不願做俘虜，請自己的一名家臣斬去他的首級，這個家臣也就真的這樣做了。

雙方面總共殺了六萬人，有一萬人受傷。上述的數字，指出了這次鬥爭是殺戮惡慘的。

西鄉隆盛約被獲擒，證明了在徵兵的基礎上所組織的軍隊的戰鬥力。

政府中的屬於封建階級的份子，雖然他們也對西鄉隆盛戰鬥了（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無疑地是內心對叛亂者同情的），都極關心這種事實。在這次戰爭中，武士階級沒有符合自己的軍人的聲望。有許多人尤其不滿意資產階級因為自己的勝利而要求加快改革。

在日本的外交關係中，尤其是在和朝鮮及中國的外交關係中的某些間隔，是肅清武士階級的叛亂的一項結果。

不久以前（一八七五年），曾經和俄國簽訂了協定，徹底確定了薩哈連（樺太）和千島羣島的局勢。承認千島羣島屬於日本，薩哈連屬於俄國。在這裏要特別注意：北方接近帝俄，使日本感到了極大的不安。承認薩哈連是俄國的領土，這要評做外交上的失敗。

第六章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

資產階級的改革仍在繼續下去，雖然官僚儘量設法縮少了這種改革的範圍。資產階級的經濟勢力，變成了政治勢力。武士階級反革命的叛亂的失敗，從封建——武士階級的份子方面惹起了許多拼死的行動，他們進行了恐怖主義的活動。一八七八年，一個武士刺死了大久保利通（譯者註：這個武士是紀尾井坂），大久保利通是一八六八年革命中的著名的政治家，是日本澈底實行資產階級改革的著名的擁護者。

大久保利通被刺死，不能阻止改革，改革依然沿着種種的軌道繼續進行了。

資產階級組織了並且鞏固了最接近他們的「自己固有的」機關。在東京和大阪創立了交易所和工商業的會所。採取了許許多多關於調整貨幣制度的法律，因為德川氏時代遺傳的關係，貨幣制度是處在混亂的狀態中。

然而主要的政治鬥爭，却不是在這這些經濟改革的周圍，而是在立憲問題的周圍猛烈地展開了。早在一八六八年公布天皇的誓文的時候，自由主義者就把天皇的含糊的聲明，解釋做對於憲法和議會的

直接誓約。政府想儘可能地維持這些希望，時時發表關於這種問題的宣言。例如一八七五年創設元老院的時候，在天皇的勅書中曾經指出了：這不過是議會制度以後發展的一個步伐。然而在宣言以後的第一個時期，事情卻沒有進行。甚至在二權分立的原則上創設的、並且應當是立法機關的元老院，甚至也被剝奪了立法權。他是變料的官僚主義的法律諮詢機關，在這個機關裏審查政府各種的方案，然而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作最後的決定。政府不過參考在元老院所發表的某種意見吧了。

一八七八年政府又作了一項誓約：召集府縣會和實行地方自治。政府曾經聲明：府縣會是以後採用議會的第一階段。正式發表了這樣的命令：人民還「太沒有知識」、「太愚昧」，所以「還不能召集議會」，然而將來要漸漸地創設某些代表機關，這種機關是特別從府縣會開始。

在爲着加快召集府縣會的鬥爭的口號下，展開了資產階級各種思想代表的活動。尤其是在地方上、在日本的各縣城中，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各種可能的「協會」和政治俱樂部，這些協會和俱樂部都是商人、工業家、律師們所創立的。在這些俱樂部中，常常發表必須加快召集府縣會的演說。

早在武士們的暴動以前，就出現了日本政黨的第一個雛型：所謂的「愛國社」，這個團體是在一八七三年創立的，還有「立志社」的組織，這個團體是以後在一八七四年設立的。然而這些組織都沒有特殊的成就。就實質說來，這不是政黨，而是人數很少的，資產階級和地主的領袖的團體，類似俱

樂部，在這些俱樂部裏計劃着將來預備呈給政府的要求的綱領。「立志社」的首領是板垣退助，他在
一七八四年大阪會議以後加入了政府。在一八七五年召開的地方官會議上，板垣退助和木戶孝允提出
了這樣的問題：在改組國家機構的時候能否加快實行選舉的原則，尤其是能告加快召開府縣會。板垣
退助建議：在組織元老院的時候，至少可以部分地採用選舉的原則，自然，在選舉的時候應當遵守維
官的財產的資格。然而地方官會議，却没有符合板垣退助及反對派的其他代表的期望：在大多數的情
況中，地方官在地方上怕改革，並不下於反動份子的代表在中央害怕改革。地方官會議反對在這個階
段上採用選舉的原則。

在一個相當的期間，板垣退助還企圖在政府的內部鬥爭，然而，他確信對於他的要求的反抗是很
有力的，一八七五年他就退出了政府的組織。

正是從這時起，開始展開了爭取實施選舉權、建立議會制度的廣泛的社會運動。板垣退助脫離政
府，開始形成了資產階級爭取議會制度的廣大的運動，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奠定了日本地主和資本家
將來的政黨的基礎。

這種反對派的運動，後來取得了「民權運動」的名稱。這種運動不僅包括着資產階級，而且也包括着
某些武士階級的份子。

必須特別注意，在這種情況下不是說大資產階級，這些大資產階級依然和政府有着密切的關係，而是說中、小資產階級，他們特別不滿意官僚的優勢，尤其因為個別的大商號享有政府的特別優遇而憤激，這些大商號是處在官僚機關的直接協助下的。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在這種運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們因為國家一般的落後及工業薄弱的發展，在日本找不着充分的適用。參加這種運動的武士階級的份子，常常都是表現得很激烈的。武士階級的破產，他們所受的貶黜和沒落，是這種急進主義的源泉。武士們攻擊官僚政府，常常把自己的批評，深深地引到了否定整個政治制度。

民權運動的一項口號，是和所謂的藩族政府鬥爭的口號。

把這種事實算做是政府的罪過：政府主要是由純粹封建階級出身的官僚所組成。這種責難是根據下述的理由：大多數大臣都是由兩個藩族——薩摩和長州——出身的人物。爲反對薩摩和長州的優越地位而鬥爭的口號，不僅在資產階級的份子中間，而且也在其他的藩族的武士階級中間，獲得了普遍的同情和極廣泛的傳播，這些武士階級，是喪失了那種由薩摩和長州的出身者所享有的特權的，根據某種原因認爲是自己受了侮辱的。

民權運動，在最初的時期，還是極有限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運動。僅在以後——在八十年代，——民權運動的內部形成了左翼，左翼裏面包括了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中的最急進的部分，而

且也包括了個別的工人代表。民權運動的主要任務，在這個運動的第一階段上，是要把官僚政府，推上加快和繼續實行資產階級改革的道路上去。

認為福澤諭吉是自由主義運動的思想上的領袖。福澤諭吉形式上不是政治家，他是文學家、教育家，也有幾分是哲學家。然而他所發表的文章，尤其要說到他的教育家的活動，是明明白白地表現了這樣的煽動：這種煽動是有助於資產階級的日本的自我決意的，是有助於肅清一切妨害日本資產階級徹底發展的障礙的。福澤諭吉在三田創辦學校（慶應義塾），這個學校後來得到了很大的名聲。這個學校以後改組成了大學，和講授各種可能的應用科學的，同時，更教育這些大學生尊重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個性自由」、「個人意志」等等的原則。福澤諭吉親自在這個學校裏教授課程。這些課程的主要的內容，是號召在日本的生活中確立個人主義的基礎。福澤諭吉認為身份的和門長的拘束勢力，是日本封建殘餘鞏固的源泉。因此爲着推翻封建制度，就必須破壞這些拘束，主要的注意是要發展個性的自由，解除一切身份的和門第的束縛。福澤諭吉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三個問題：（一）「普及教育」，（二）「人人平等」，（三）「培養個人的獨立和自由的個性」。

福澤諭吉的主要著作向青年問進，就是用來闡明他的第一個主題的。福澤諭吉在這部著作中，以極坦白的方式說明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原理，竭力說明了只有人們自己的能力和他的知識，才能

用使這個人傑出及比別人高超的基礎。

官僚政府對於福澤諭吉是極端側視的，多次企圖阻止或是限制他的活動，然而都沒成功。福澤諭吉是一個極細心的人，他知道用抽象的哲學形式來掩護自己的思想。他不想由自己的哲學中親自作出政治的結論。把這種事情交給自己的多數學生去做。

民權運動最初就從官僚政府方面惹起了反作用。西曆一八七五年，日本曾經頒佈了反動的出版法（譯者註：這是說新聞紙條例及謗謫律），規定了出版的一切報紙、書籍和雜誌，都要經過警察的嚴厲檢查。

日本出版事業的發展，是和資產階級政治的成長密切地聯繫着的。早在一八六八年的革命前後，日本就出現了第一種報紙。早在一八六一年，荷蘭人就出版了所謂的「巴塔維亞新聞」（譯者註：就是文久年間發行的文久新聞，以後改名「海外新聞」，是把巴塔維亞的報紙譯成日文出版的），是把歐洲的新聞摘要譯成日文，特別供給給船隻及他的官吏閱讀的。一八六四年創辦了新聞報紙，在這個報紙裏，除翻譯歐洲的着聞外，還刊登了日本地方的生活記載。這種報紙印刷的份數，沒有超過一百份以上。一八六八年革命以後，一位英國的宣教師出版了一種報紙，這種報紙叫做「萬國新聞」，已經大約銷到了兩千份。經過一年，英國人哈羅特爾又創辦了一種報紙，這種報紙叫做「和風新聞」。這種報紙最

先企圖廢除新政治制度的新聞情報，刊登了責難幕府和頌揚幕府制度的論文。這種報紙和以前的報紙不同，是用活字版印刷的；在這以前，日本的一切報紙都曾用木版印刷的。然而和國新聞並沒有很大的銷路，兩年以後就關閉了。在這以後，開始漸漸地出現了日本人出版的報紙。這些報紙，大多數都只有很小的發行額，並且不是每日刊行，而是一星期刊行兩次。除論文和情報外，在這些報紙中普通還有公報欄，在這一欄裏登載政府的命令。這些報紙中，如果有一個首先企圖在日本反對政府，刊載以主張改革廢除幕府體制為成的社論的時候，那末，政府幾乎就會馬上逮捕編輯，並且把這個報館封閉。

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東京大約有三十種報紙。每一個政黨都領袖，都認為經營自己的報紙是自已義務；在這種報紙上，登載他的「獨創的」政治理論。在這些新聞企業家的數內，也加入了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後藤象二郎，他們企圖領導反對派的運動，對政府中人加給壓力。一八七二年，創辦了最初「半官性質的」報紙——東京日日新聞，這種報紙就外表說來已經近於歐洲類型的報紙了。這種報紙經常地刊登了文藝作品、連載的長篇小說，因此引起了讀者的興趣，得到了固定的銷行。也在一八七二年出現了報知新聞。報知新聞希望獲得廣大的讀者層，起初不是用漢字印刷，而是用假名印刷。然而却是不見搖行的，報知新聞不久就改用漢字來印行了。一八七四年，出版了讀賣新聞。這種報

紙放棄了一切政治的言論，從最初就尊重文學。在日本那時的條件中，這不可避免地會賦予報紙專條的性質。牠登載了各種有刺激性的文章，這些文章是記載刑事案件及人世間的種種醜事的。

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發行額的第一種大報，這是大阪每日新聞，這種報紙是在一八七九年創辦的。這種報紙落入了很狡猾的企業家村山氏的手中，直到不久的時期以前，都是這個報館的所有者。

日本的出版物，在最初的時期是包括在自由主義的運動以內，尤其是包括在爲憲法的鬥爭裏面。然而出版物參加反對派的運動，因爲政府方面不斷的鎮壓，不過有着有限的性質。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逮捕編輯有了司空見慣的性質。也和帝俄一樣，出現了虛擬編輯的機關，這些編輯，是因爲違反了檢查新聞的法令，而應當受有期徒刑的處罰的。然而日本的警察却知道這種手段，所以不儘逮捕編輯，而且逮捕報紙的出版家，沒收他們的財產。

日本資產階級的社會活動和反對派的性質，在組織政治俱樂部及集會中找着自己的表現。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有系統地完成了府縣城的巡迴講演。在那裏創立了同志們的聯合會，

到了一八八〇年的時候，組織了二十七個地方的大規模的政治聯合會，牠們都是在爭取召集議會的口號下進行着活動，參加者有九萬人。一八八〇年在大阪召集了這些地方聯合會的大會，大會決定把這一切組織在總的名稱——「國會期成同盟會」——下融合起來了。

政府對這些大會是很不滿意的，很快就對他們加給了鎮壓。頒佈了特別的法律，召集政治會議要受警察的監督。一切集會，種種政治問題的演說，都應當通過相當的檢查，並且要在警官列席下才准發言。

在鎮壓的過程中，藩族的政府依然應當考慮反對派的情緒，在日本爭取議會制度的全部期間，政府的策略是和鎮壓同時配合着某些局部的讓步。然而每個這樣的讓步，都不是作為在下層的壓迫下所造成的迫不得已的行為，而是作為天皇及其政府自發的「許可」。官僚異常關心自己的政府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及保持自己的威望。

一八八〇年，使一八七八年關於召集府縣會的法律發生了效力，在這些會議中，初次採用選舉。除此以外，還次館實行了漸進的資產階級的改革，為鞏固政府的地位，而且和外國列強談判了修改不平等條約，實行改革司法制度。曾經特別編纂了刑法法典和新的刑事程序的法典，把歐洲各國資產階級的法律典範，用做這些法典的基礎。聘請法國的法學家，擔任了日本編纂新法典的主要顧問。就修改條約的問題和外國列強所進行的談判，不斷地注意到了這樣的問題：日本對於取消外國人的治外法權是否「已經成熟了」。為着對抗外外交官的法律上的一切反駁，就必須創設法院，這種法院是以資產階級的權利為基礎的，並且是有力且充分滿足外國人的。

然而實行改革的速度，却沒有滿足日本的資產階級。

一八八一年，發生了突發的事變，這裏的結果，因為大隈重信退出政府的組織，使日本的政府成了衰弱的。

大隈重信，是繼續留在政府組織中的，和資產階級有密切聯絡的，唯一的政治活動家，大隈重信是三菱商號的傳聲筒，所以他是日本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在政治開關中，比板垣退助是慎重得多的，板垣退助主要是代表農業資產階級（「耕」地主）。反映着大資產階級的情緒的大隈重信，抱着很大的保守主義，這是和下述的原因有連帶關係的：這些資產階級，從「明治」政府活動的最初的時候起，就和官吏建立了很好的關係，取得了有利益的國家的定貨，沒有理由抱怨反動的官僚的專橫。因為這種原故，大隈重信努力提高資產階級在政府中的比重，不去變更所樹立的整個政治制度的主要形式。大隈重信認為日本特別需要「伴隨」有限的議會權力而來的官僚政治制度，議會不過是專制政治的附屬品，不能拿來用做專制政治的障礙。

大隈重信脫離政府的組織，是因為主持北海道殖民問題的拓務局中，發生了大規模受賄和侵吞的醜聞的結果。因為這件事的原故，發生了很大的轟動，拓務局的全體職員都被撤職，有許多高級官吏都受到法庭的審問。大隈重信也決定辭職，因為他的一個最親近的僚屬在拓務局中工作，也被捲入了

這種罪行裏面。

大隈重信退出了政府，學福澤諭吉的樣，也創辦了私人的學校；這個學校一直存在到現在，是在早稻田大學的名稱下著名的。大隈重信是一位偉大的組織者，他旅行日本全國，發表了最有力的演說，創辦了地方的報紙，並且企圖把自己造成反對派的領袖的地位，然而他這個反對派，却是建立在嚴格合法的立場上的。他對君主政體的關係說來，這個反對派是表示十分效忠的。

在和北海道殖民的聯繫中所暴露的官僚的受賄，惹起了這樣大的激憤；政府要再造成這種情形中來找尋自己的退路，爲着緩和社會的輿論，一八八一年十月十二日，政府頒佈了天皇的勅書。在這件勅書中，會直接說到了：一八九〇年，即天體經過十年後，那時要召開議會。

這道是民權運動第一次實在的收穫。誠然，政府在這一次也依然忠實於自己的原則，和應允了召集議會的同時，却頒佈了新的警察法。根據這條法律，政府被應當實有力地壓迫反對派。然而反對派却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東西。

一八八三年十月十二日天皇的勅書，是一件很畏的宣言，徹底敘述了政府在使全國實現議會制度的原則的傾向中的一切政策的歷史。政府把「漸進地」創造繼續改革的條件，認做是自己應有的功績，勅書指出了從一八七五年創設元老院起，以後在一八八〇年召集下院議會，現在天皇認爲可以授

權大臣準備在全國規模中召集議會。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政府在這件事的極嚴重告白：天皇「保留有決定問題的權利」，天皇在如何的程度中有權能够限制或束縛議會，在如何的方式中能够創設新的議會。換句話說，這項文件規定了：雖然經過十年後將「勅許」召集議會，然而在那時期，專制的君主依然是國家的主人。

爲着實行準備不久召開議會的指令，伊藤博文奉到了天皇的命令，出國去研究其他國家憲法制度的實情。他於一八八二年由日本出發，遊歷了歐洲的許多國家和美國。在他回國以後，以他爲首腦的委員會才開始工作，編製了日本憲法的第一次的草案。

很值得注意：這種第一次的草案，比後來在一八八九年採用的和批准的以後的草案，有着大得多的自由主義的性質。顯然，和反對派思潮鬥爭的經驗，尤其是八十年代工人運動的萌芽，迫使伊藤博文和他的顧問們，甚在至憲法中拒絕採用最中庸的和極有限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原則。

一八八一年十月產生了日本第一個政黨——自由黨。這個政黨的領袖是板垣退助，他努力賦予這個政黨完全合法的性質。板垣退助這樣說明了有創立政黨的必要：因爲天皇「親自」允許召開議會，所以就應當有政黨，以便在人民中間培植議會制度的精神，養成正當地把握將來憲政原則的社會輿論。雖然「自由黨」有着異常合法的性質，政府却依然不滿意牠的活動。在這個政黨存在的最初的時期

，就和政府發生了嚴重的磨擦。這些磨擦是從瑣細的事件開始。這個政黨沒有馬上就向警察局登記，根據這種理由，政府拒絕承認它是合法的，行政當局和「自由黨」的領導機關之間開始了長期的文件往來，結果，這個政黨在一八八二年七月才成了合法的。

下述的「自由黨」的宣言，這個宣言是和關於他的創立的消息同時公佈的，充分說明了這個政黨十分中庸的思想：

「（一）我們的黨，是努力實現自由、確保權利、擴大幸福及改革社會。（二）我們的黨，是希望確立完全的憲政制度。（三）我們的黨熱望達到自己的目的，和那些具有和我們黨的原則相符合的原則的人們聯合起來。」

從起初，「自由黨」中就採用了領導機關的嚴格中央集權的原則。黨的總裁是板垣退助，此外還有四個副總裁。黨的總裁不僅是政治上的指導者，而且是黨組織的事實上的主人，因為他管理黨的一切財政事務。

雖然板垣退助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準備和政府發生尖銳的衝突，在「自由黨」各地的黨組織中，却很快就形成了猛烈的反政府的風潮，這種風潮時時很激烈地爆發了。在「自由黨」的構成中，加入了資產階級中等階層的代表，知識階級（人數很多），小地主，甚至還加入了人數不很多的前富農階層。

「自由黨」的社會色彩是這樣的：第一位是土地所有者，主要是小地主，城市資產階級的股份子是在其中佔有第二位。因他在「自由黨」的實際要求中，減低土地捐稅的要求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自由黨」有關政府數文件中，常常責難政府利用高額地稅，搶劫人民。

一八八二年，反動主義者的團體，曾經實行謀害板垣退助的生命，雖然遇刺却没有致死（譯者註：刺板垣的兇手是相原尚葵）。這如同火上加油，自由主義的運動成了更加普及的。普遍流行了一種口號：「板垣退助能够死，但自由不能死！」

一八八二年出現了反對派的第二個政黨——「改進黨」或「立憲改進黨」。「立憲改進黨」已經是很明白的城市資產階級典型的政黨。「立憲改進黨」的領袖是大隈重信，尾崎行雄及大資產階級其他的代表。「改進黨」的綱領，是更具體的和更「確實的」（在這個字的資產階級的意義中），列舉了法律草案，採用這些法律草案來促進貨幣制度的改革，改組銀行，獎勵對外貿易及其他等等。

也在一八八二年，組織了第三個政黨——「立憲帝政黨」。這個黨帶有評官性質，是根據激進的官僚們的倡議而創立的，這些官僚們不願完全保持孤立，企圖替自己創造獨立的社會支柱。在這個政黨的構成中，加入了重要的官僚及和他們接近的知識階級。「帝政黨」提出了這樣的綱領：是傾向着暗示信任專制政體的政府的。至於說到關於資產階級的「自由」的外表，那末「帝政黨」的綱領

，僅僅承認「不違背社會安寧的集會和出版的自由」。(譯者註：「帝政黨」的領袖是福地源一郎，丸山作樂等人。)

一八八二年，也創立了日本第一個類似社會主義的政黨。這是所謂的「東洋社會黨」，這個政黨是以樽井藤吉為首領的一羣知識份子所組織的。

雖然這個政黨有着合法的性質和基督教——托爾斯泰主義的調領，然而在自己成種以後經過不久就被迫放散了。

和上述的首都的黨並進，還發生丁許多立憲的小政黨。牠們都模仿首都的政黨，由首都接受思想上的營養，其至享受資金的扶助，也都叫做「立憲黨」，牠們希望用這種名稱來表示牠們熱望制定憲法。

然而政黨和俱樂部，却沒有獲得充分廣大的政治發展。甚至那種為着展開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的條件，在日本都不存在。一八八二年，頒佈了打擊種種社會活動的法律。根據這些法律，警察不僅有權檢查政治團體的會員的名單，而且還權由這些名單中把對牠不適當的人名塗銷掉。像這樣，政黨如果企圖反對政府，那末甚至不能把自己同一見解的人團結起來。政府也禁止舉行各種黨的聯合會議，顯然是害怕創立這些政黨聯合的布洛活。末了，政府禁止政黨在各地設立支部，因為這種原故，「自

由黨」在各地的聯合會，都應當以獨立政黨的權利來活動，而且要適當地通過警察登記的一切複雜的手續。

政府和反對派鬥爭，不以採用純粹行政上的方法為滿足，而且廣泛地採用了間諜的方法。因為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是反對派陣營中最重要的人物，政府常常企圖——但是沒有成績的——設法把他們拉到自己方面來。同時，政府更努力挑撥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不和。為着達到這種目的，決定收買板垣退助，用國家的經費派他到歐洲去「考察外國的政治制度」。板垣退助用國家的經費去旅行，自然不能蒙蔽反對派運動的許多參加者。關於這次旅行的消息，惹起了強烈的不滿。促成了「自由黨」——最有勢力的反對派的政黨——的分化，這正是政府所要達到的目的。

政黨因為內部分裂及警察鎮壓而來的削弱，致令反對派中的情緒更激烈的份子，脫離政黨而獨自行動起來了。一八八三年和一八八四年，發生了多次反對政府的行動，這一部分是武士們的行動，一部分完全是「平民」的行動，這些行動是和佃農的運動結合在一起的。

一八八三年，在羣馬縣和大阪縣，發生了這種類型的規模比較大的反政府的行動。急進的武士階級的社會，在這個時期企圖重新玩弄外交上的機會，企圖引起日本和朝鮮的衝突，以便把日本引入戰爭中，來撼動政府的地位。這次行動的組織者直接指出了：如果爆發了戰爭，那末政府就不得不趕快

召集議會。以重大的糾紛感着發生衝突，因為在這裏面加入了一部分軍隊，政府獲困難地才防止了他們出師。

政府和反對派的鬥爭，却沒有停止編纂憲法的工作。憲法委員會（譯者註：這是說「廣慶取議會」）的指導者伊藤博文，是資產階級化的貴族階級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位對地主貴族的德國的盲目崇拜者。伊藤博文親自承認：由自己在國外的遊歷中，僅在德國獲得了用做借鏡的最大的經驗。伊藤博文由歐洲回國以後，瘋狂地崇拜俾斯麥克及普魯士王國的全部制度。保衛封建的基礎，同時承認資產階級是最重要的經濟勢力，德國警察——官僚的政治制度，這一切，在伊藤博文看來，爲着移植到日本的土壤上來，是異常適宜的。在伊藤博文的委員會的議事錄中，及在他的講演中，都特別指明出來了：日本必需「適當的」議會，強有力的官僚政權，必須不變地認定天皇是憲法的源泉，天皇自願地把憲法「賜給」他的人民。伊藤博文特別努力不讓在任何一个臣民中，不讓在任何的情況下，發生這樣的印象：人民自己由天皇那裏奪得了憲法。憲法，根據伊藤博文的草案，應當以這樣的方式來公佈：要使大家都感覺到是天皇「賜給」了憲法，在隨便什麼時候都能够把憲法取消。

用做準備採用憲法的一種方式，伊藤博文在日本實行創造了有爵位的貴族階級。一八六八年革命以後，全權以前的封建諸侯，都在政府中佔有了很高的官職，然而却没有爵位。担任宮內大臣的伊藤

博文、認為必須創造「適當的」貴族階級，要這種貴族階級能够用做將來議會中的上院的基礎。曾經創設了專門的委員會，來決定以前的封建領主和大官的「資格」。計劃着使他們領受有繼承權的爵位。結果有五百人取得了爵位：公爵有十二人，侯爵有二十四人，伯爵有七十四人，子爵有三百二十一。人，男爵有六十九人。這些領受了爵位的人們，幾乎都是以前的大名和公家，也有一些高級官吏，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是在革命以後的時期由普通的武士階級中提拔起來的。伊藤博文自己領受了伯爵的爵位。反對派的領袖，尤其是被退却助和大隈重信，曾經受過「處罰」，沒有取得任何的爵位。在很久以後，當他們兩個人脫離了反對派的時候，他們才成了伯爵。

一八八五年，日本實行了重要的行政上的改革，創設了照歐洲的樣式的內閣。伊藤博文希望總理大臣（首相）享有全權。這種權力是相當於德國宰相的權力的。他的一切最重要的行政計劃，都是模仿普魯士的樣式。

和創設內閣的同時，更設置了關於最重要政治問題的天皇主要的顧問官職（天皇的掌璽大臣（內大臣））。此外，更創設了宮內大臣的官職，他管理宮內的經濟事務，不出席內閣會議，形式上是「不過問政治」的。一切其餘的各部，也是和以前的各部一樣的。不過增設了工部部（農商部）。

伊藤博文所實行的一項急進的驚人的改革，是獨立決定官吏担任新職務的適當性的檢定制。這種

方法是一種對反對派的讓步，因為反對派，尤其是「自由黨」，攻擊政府，常常責難政府，說政府任命官吏的時候，是濫親戚關係和擅廢所指導。然而事實上，這種關於檢定的法律，沒有取得廣大的勝利。經常地用種種方法破壞了和避免了。

一八八六年，日本實行了大規模的貨幣制度的改革。就本質說來，這也是執行反對派的政綱。『改進黨』公式化的一項要求，使幣發行權，永遠固定在日本國立的中央銀行的手中，國家銀行取得了發行貨幣的獨佔權，同時，官辦的銀行的總數也大大地減少了。規定漸漸地兌換以前一切流通的銀行兌換券的程序。

這種政策，是和全國經濟確實的進步直接聯繫著的。私人資本大大地增加了。一八八〇年，日本國家銀行所支付的資本是四千三百萬日元，私人銀行是六百萬日元。一八八七年國家銀行支付的資本是四千五百萬日元，私人銀行是一千八百萬日元。這證明，私人資本的增加有了很快的速度。以後，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以後，私人銀行的資本份額，更大大地增加了，遠遠地超過了國家銀行的資本。一八八六年同年，在日本政治生活的舞台上，重新提出了為取消不平等條約而鬥爭的問題。政府號召權力來維持取消外國人的治外法權，擁護了外國列強的反抗，這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不滿。政府努力的失敗，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努力利用這種事實，來證明政府的虛弱和無力。像這樣，外交政策

的問題，終得了樹大蔭的政府難辦。一九一六年五月，在東京舉行的會議，於此種不平等條約的政治團體和俱樂部會議。議決會議通過大士議的決議案，政府組織機關不能解決這項問題，政府將採取防範罪過。

批評政府外交行動的失敗，採取這種擴大規模，這種運動沖破了檢察和警察一條條的障礙，可的一切範圍，外務大臣井上於應官辭職。這是在日本第一任發生的大臣在與論的壓迫下不得不辭職的著作。

必須認明：爲着修改條約，一九一五年在倫敦舉行的第一次全聯，當時岩倉身副會經負責這項使命被派去歐洲和美洲，然而這次旅行却毫無所獲。以後在這種傾向中做過好些次的努力，也都注定了失敗：日本政府每年開始談判，都遭到了列強方面的拒絕。

一九一八年，政府企圖召集國際會議，來討論修改條約的問題，然而這一次也沒有得到任何具體的結果。列強拒絕修改條約，政府陷於下危險的地位，國內創立了所謂的一大同盟結，這是建立在反對政府沒有條約取消不平等條約的總綱領上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團體的聯合會。

政府更加重壓迫來實行改革。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了治安條例。警察又取得了新的補加的權力，一切社會團體都被禁止了。東京會經宣佈戒嚴，在二日以內逮捕了五百人。經過三

自以後，又頒佈了新的更加猛烈的新法律，具有政府的或絕對君主政府的機關，才有出版刊物時可出版。

這些建議，由一部分反對派的運動方面，引起了進行地下工作的企圖，發生了許多秘密的團體，這些團體的目的，是以秘密組織的手段來和政府的專制主義鬥爭。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這些組織中，很流行以前俄國人民主義的口號。支那波夫的條者，作為秘密的密結社者，常常出現在日本秘密團體活動者的文件中。然而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對於這種地下活動，却沒有取得特別的發展。一八九九年頒佈了憲法，資產階級也就幾乎完全改取合法的方式來爭取政權。

跟着資產階級的成長，同時也進行了日本工人階級實質的成長。

早在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就記載了日本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榨取的好幾次獨立的行動。一八七三年，高島嶺山的織工們的行動，認為是日本工人記錄的第一次行動。這個織山屬於英國人租借者。織山中的兩百工人之提出，要求他們的物質狀況和增加工資的要求，對於那時期最特別的，是對自己的行動增加了反外國人的色彩。工人們是在這樣的口號下行動起來了：「反對企業主和反對外國人」。英國大企業家政府雙方防範嚴厲保護。日本政府對英國人給予了保護，織工們的行動被無情地壓下去了。

以後經過了六年，一八七八年，在這同一個破山中，發生了日本工人十分大規模的行動。大久保利通有一封信致伊藤博文，在這封信裏面，表現了和這些工人的行動有連帶關係的不安，請求採取行政士的「警察的『感化』方法」。

就時間說來，工人們以後記錄的行動是：一八八一年久米紡績工人的行動，一八八六年和歌山木工的行動和山梨紡績女工的罷工。把工人一日的工資降低到十錢（一角）和實行十五小時的工作日；是騷擾最後種支行動的動機。在這次罷工中參加了一百以上的婦女，她們集合在神樂堂，聲明直到沒有充分滿足她們的要求以前不離開去。這是第一次得到了成功的女性的罷工，因為罷工者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滿足。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一八八二年曾經組織了「東洋社會黨」。然而這個政黨却是脫離了工人運動的。一八八二年出現了取「東洋漁夫黨」為政黨。這個政黨和水手、漁夫有着相當的聯繫，然而完全是在愛國主義的情緒的支配下，帶有同業公會的性質。

一八八三年，東京曾經組織了第一個國立企業工人的團體，聯合了六百個工人。這個團體不久就被警察禁止了。一八八四年曾經企圖組織印刷工人的團體。根據在印刷所工作的兩個職工——池田和佐久間的發起，會集召集了好幾個企業的印刷工人，和他們進行了這樣的談話：工人們應當互相共

持，只有這時工人們才能和資本家鬥爭。又經過了三年，曾經企圖創立金屬工人的團體，然而沒有得到實在的結果。

關於日本那個時期無產階級的人數，給出了下述的數字：的表現，一八八九年根據官廳的統計，計有十二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個產業工人。一八八九年已經大約有三十萬產業工人。工人問題，已經開始使日本的統治階級感到了重大的不安。政府發給縣知事和地方政權其佈的代表者的訓令，固執地指示了有「監視庶民」的必要。

繼續進行的行政的改革，雖然允許了將來採用憲法，却完全是傾向繼續鞏固君主制度的官僚政治的。

一八八六年，曾經創設了樞密院——直到現在都存在的最高的官僚機關。樞密院形式上是作為天皇左右的諮詢機關而設置的，事實上却起了大得多的作用，牠不僅壓迫議會，而且常常壓迫政府。一八八六年所規定的樞密院——專門任務，是最後批准憲法草案。

一八八八年，在通過憲法的不久以前，曾經實行了地方上的行政改革，最後確定了府縣的界線。曾經制定了三個特別市區——東京、京都和大阪——叫做「府」。一切其餘的轄區都叫做「縣」。在縣的構成中加入了「市」和「郡」。郡以下分做「町」和「村」。在每個區域內都創設了地方自治的

選舉機關，有將自治的幹部會的府縣會。在町村制實施前創設了規模更小的和道州縣的會。不過這些町會和村會沒有自己的幹部會，而是由町長或村長來領導。府會或縣會，如果在這一區域裏沒有超過七十萬居民，那末就是由三十個議員來組織，以後每超過五萬人，就增選舉一個議員的權利，市會是由三十至六十個議員來組成。

這一切機關，就實質說來都是各級純粹的諮詢機關，是處在同樣的即地方官的完全監督下的。表面上的「自治」，事實上絕對沒有限制官吏的專權。除此以外，在第一次地方機關選舉的時候，選舉人要有很高的財產上的和年齡上的資格。

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一日，最後把憲法公佈了。

公佈憲法的前夜，政府企圖不縮小警察監視「叛逆」的範圍，和資產階級反對派忠順的上層份子謀議某種妥協。抱着這種目的，開始和大隈重信進行了請願重新擴大政府的談判。長期商談的結果，大隈重信同意加入政府，取得了相當的尊位。和資產階級領袖，政府發展了巨大的威力，不讓大隈有任何的革命行動。內務大臣梅田喜三郎，在公佈憲法以前對地方官發出了特別的訓令，在這種訓令中，就召發警力的權力「要緊張起來而且不要鬆懈」。這件訓令的摘要說過：

「自本日起要實施憲法，快從達到我對所盼望的國家繁榮的時期。然而從另一方面說來，人們都很感

藩地討論政治問題，政意之間互相爭吵，發生了狂瀾激浪般的破壞力量。三三每一村的居民，都應當發展自己的權利，每一郡的官員，都應當發展自己的本部的權利。……現在給給相投，在每個村落中，都左擁右擁討論中央政治問題，這樣就漸漸利用了。如果將來開闢了討論的原野，那末政黨就會對純粹的人類擴大和顯出影響。……最後的結果，這就會造成中央政務和地方行政問題有害地的混亂的原因。1

公佈憲法的儀式，是隆重地舉行了。天皇在皇宮的正殿親自誦讀了憲法，以特殊的勅令指示了。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召集議會。這又重新復習了一次一八六八年的「誓文」。對祖先「發誓」一舉奉古代勅尊神朝政的方式。這在政府方面預先考慮了的行程，政府努力用這種方式來表明，雖然「了憲法」，但皇室沒有變遷這種事實。天皇依然還是神聖的象徵，這種政體依然和先前一樣保留在天皇手中。

一八九九年日本憲法在世界引起，其發展條件所造成的一八九九年的九十年代，資本主義類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適應，已經進到了完成向神聖。在明治憲法的影響下，加強了國家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日本資產階級統治的加大自己獨斷專制的影響，日本在整個時期社會、經濟結構的變更，要求那些資產階級階級和國家機關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半封建地主，和資本家更趨密切地結合。因此

日本的君主政體同意採用憲法，這是用做半封建的君主和資本家之間政治上的平權和同盟的一種證明。就實質說來，一八八九年的憲法，沒有損害日本君主政體的專制政權。

日本的資本家們，把半封建的專制的君主政體，看做是自己的主要保護人和庇護者。君主政體常常用國家的資金補助私人的工業（這種補助是藉那種由勞動者居民榨取的捐稅來開支），對私人的工業給與有利的定單，創造侵略殖民地市場的武裝突擊隊（陸軍和海軍）。因此十分自然，日本的資本家們滿意一八八九年狹窄的憲法，這種憲法承認資產階級享有一定的權利，同時卻把全部政權保持在專制的君主政體的手中。

一八八九年日本的憲法（這個憲法直到現在都是有效的），就事件的實質說來，是特別關心保護天皇無限的權力。憲法上規定了：批准法律、頒佈具有法律的效力的勅令、任命和罷免民政和軍政的官吏、召集和解散議會、宣戰及締和、宣佈戒嚴的權力，都屬於天皇。憲法也把決定武裝力量的編制和人數的權力賦予了天皇。天皇也是海陸軍的大元帥。

在日本的憲法中，有一章說到「臣民的權利和義務」。這一章的內容，列舉了資產階級的若干自由，然而享受這種自由，當然是和「臣民的義務」結合着的。第一種「義務」，就是承認天皇「有權利對這些『自由』」。

日本憲法第二十九條說明：「日本臣民在法律所規定的範圍內，有言論、著作、印行、集會及結社的自由。但第三十一條就預先警告、取締及其他非常的情況下一切自由都依天皇的裁量。」

一八八九年的憲法，預定了日本的議會僅能實行「督政府」的政策。大臣不是對議會負責。若在如吳議會拒絕政府所提出的國家預算案。那末這也不應當因此引起內閣當然的辭職。在這種情況下，憲法預先規定了：給予政府採用去年度預算的權利。在頒佈法律的關係中，政府也僅在很薄弱的程度中依屬議會。政府有權利用憲法適當的條文頒佈天皇的勅令，這種勅令具有法律的效力。因這些勅令僅在事後需要議會的批准，所以在她沒有被取消的時候，事實上能夠經過很長的時期。因為日本議會的會期，依照憲法規定一年不能繼續到三個月以上，所以，在其餘的九個月期間，能夠毫無阻礙地施行天皇的勅令，這保證了充分獨行的專制。

和憲法本文同時，還預佈了別種法律，這些法律也是有着憲法的意義的。這些法律是：議事法。對於上院和下院的權力和職能給與了嚴密的規定；下院的選舉法；財政監督法；規定皇位繼承人地位的法律（皇室典範）。這一切法律，事實上都加入在日本的資產階級地主的憲法以內。

日本的議會是按兩院的編制組織的，上院（貴族院）是由這些人員所構成：（一）（業主）（二）（有爵位的貴族階級）（三）全體公爵和侯爵，以及伯爵、子爵、男爵的代表；（三）因為對國家有功績而被

天皇任命海軍大臣，（一）首領與生院的代表，（二）為領事官者，即是天皇任命數和大地主。選舉尚代表。王院是社會黨或議會，其其浮形地表現中，對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在日本的特權地位。這些地主的和金礦產產權及着來政體國官階級階級地結合着。自然，上院的議員，從最初是階級是導制政體的發展，對於社會內閣不會有甚大的影響，這雖內閣，是維持在選權日本廣大的人數家最起碼的權利。

關於本院（參議院）的選舉法，所規定的年齡資格，要三十歲的人才有被選舉權，二十五歲的人才有選舉權。婦女完全喪失了選舉權。財產的資格，要選舉以一年所繳納的直接稅不少於十五元。這甚至使居民中的男子部份，都有很多人不能參加選舉。在第一次選舉中，總共大約參加了日本全體居民數的百分之十。選舉法也指示了這樣的記載：每個選舉人都要有高貴的貨幣保證。嚴格遵守居住資格，就實質說來這是資產資格特殊的顯式。

雖然一八九九年修憲有籍反動的性質，但在公約憲法至一八九〇年召開第一次議會之開野經過的時期，却發生了反動主義反對政府的多次行動，這些反動主義甚至不滿意這種設置的憲法。這些行動，也和以前一樣，應當應用極端主義的方式，因為這物中偏愛上歐洲的文化。有一位大臣，森有禮，曾經被刺死。一八九九年十月，大隈重信被刺未死，他這時租狂外務大臣（有人對他鄉評彈

結果把他的權炸掉了。

在大多數情況中，這些謀殺的發起人，都是那種就自己的成份說來屬於武士階級而反對的。他
被稱為團體，頭盧滿那時候在這種團體中起了顯著的作。他是後來享有巨大的聲譽的。支洋社和
而這種會中他創業者

購山濤一國進發到現在，現代在國內八尋為備是比本流西主壽時之盛騰就血而做表者。

準備第... 的政府是主要注意... 團體... 的... 他以後，反對派的其他重要代表，也都接二連三地轉入了政府
種轉變的顯現。

一八九〇年一月，恢復了「自由黨」(在事實上漸進了一切政黨時期以後)。在他的積極參加
下...

地監視了這些委員會的活動，但沒有封閉這些委員會。政府用那種方法達到了對於自己滿意的選舉結果。

一九〇〇年七月一日實行選舉。選舉的結果完全符合了政府的預定。徹底實行了的分化反對派的工作。結果，在第一屆議會中，只有十幾個小的政治團體，因為大多數議員都沒有參加政黨，站在所謂「超然」的立場上。

無論「自由黨」或「改進黨」，在議會中都沒有獲得領導的地位。「超然的」議員佔大多數。這異常減輕了他們對政府的機謀。十二月二十五日，莊嚴地召開了日本第一屆議會。上院的議長選定了憲法起草人伊藤博文擔任。幾季順次地領導了日本一切高級的國家機關。在他的身上，落下了「試驗」他由西所創造的國家機關的任務。

日本第一屆議會開始工作是在一八八七年禮讓到一九〇〇年的產業繁榮的背景上，資產階級鞏固的情況中進行的。在在一八八九年一年間，日本的新投資就有七千二百萬元，其中有五千萬元是投在主要方面。其超過了自一八八六年投資額的十倍。緊跟地發展了鐵路建設。自一八九九年七月，在名古屋市中，進行了日本第一條一條一英里長的鐵路開工典禮。最大的鐵路——京滬道線已經動工。總共鐵路總長有五英里半英里，私人經營的鐵路有六百七十一英里。這樣看來，在鐵路建設中，私人資本

超過了國家資本，但在軍人團體的壓迫下，政府強迫收買了私人經營的鐵路，交通手段，電報和電話也和這一樣，牠們都因特殊的法律而國有化了。自然，對於牠們以前的所有者，給予了充分的賠償。

必須注意，在一個時期，日本工業的發展，已經被農業的落後所束縛了，農業阻礙了全國經濟繁榮的進度。一八八九年，因為米穀的歉收，農業的狀況是尤其痛苦的，這惹起了米價大大的高漲。有半數的米穀要由國外運進來。這造成了日本對外貿易的入超，政府要付出大貴的黃金，這又造成了財政上附加的困難。

一八九九年的年初，出現了恐慌的第一個信號。全部猛烈的恐慌，在日本主要的紡織工業上反映過來了。主久極可憐的工資，當然更加降低了。在棉織工人聯合的企業中，一八九九年，男工的平均工資一月是十八圓，女工的平均工資一月是九圓。(一圓等於中國一分)。

在恐慌的情況中，致令日本工人運動滋長起來了。發生在爲改善工人生活經濟情況而鬥爭的職工聯合會。

一八九九年，已經創立了兩個職工聯合會，兵工廠金屬工人聯合會和印刷工人聯合會。出版印刷工人組合。這兩個組織全國都存在着兩年，也在一八八九年同一年。在自由主義的雜誌國民之

友中，刊登了這篇第一篇論文。紀念五一節日本勞動者。在這雜誌中絕享欄中連續刊登開辦召
組織工會辦法等，並且明白地指出了：爲着每個工人的利益，每個工人需要和各個企業的五六個者們
携手地前進。

一八五九年，第一次企圖創立全日本兩工廠工運動的中央。根據地聯軍入聯合會的發展。自東京
團體正聯合會的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出席了五百多個工人。主要地中心區域——東京，大阪和橫
濱——的工人。雖然大會沒有做創立經常的職工聯合會的中央。但是集這大會的實質。已經顯明
了工人運動有了巨大的成就。

日本議會的第一次會議，和政府的期望相反（這時政府的總理大臣是山縣有朋），雖然議員們因爲
屬於各種黨派成了四分五裂的，却表現出來了議員和政府之間尖銳的衝突。官僚政府把議會看成了罪
惡，從他存在的時候起就必須剝離他。他卻儘量設法加以壓抑和限制。

然而另一方面，議會的議員們却對這種事實極其憤慨。政府對待人民的代表規避，並沒有想辦法
自己狂傲的和顯然不信任的態度。

標成日本專制政體國家機關最重要部分的日本軍人的上層份子，對於議會是尤其深惡痛絕的。因
爲在這些軍人裏面，深藏——其羈絆聯系和傳統是極有力的。陸軍的領袖，集中在那裡，深藏其

者的手中，海軍的領導權集中在薩摩人的手中。議員方面不滿意異常龐大的軍事預算，是政府和議會衝突的主要原因。從一八八五年起，日本支出在軍備上的費用，尤其是支出在建造軍艦上的費用，是異常龐大的金額。一八九一年三月議會所審議的第一次預算指出了：軍費不僅沒有減少，而且加大了。議會（下院）利用自己憲法上規定的權利，縮減了預定用來建造軍艦的預算項目。這在政府的陣營中初次惹起了相當的混亂。編製預算草案的大藏大臣實行退職。但政府却依然決定堅持自己的主張。新任首相松方正義，在伊藤博文的支持下，運用種種的權衡，來保障在議會的下一次會議上能夠通過軍事預算。伊藤博文建議直接收買一部分議員，對於那些最頑固的議員，就採用種種的威脅來強迫他們讓步。然而反對派也準備了衝突。老的政略家板垣退助開始和大隈重信談判這事；要大隈重信退出政府機關並加入反對派。考慮了所造成的情況，也因為這樣能夠容易恢復自己暫時動搖了的聲望，大隈重信同意了這種主張，他們兩個人——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共同領導了議會戰鬥爭，以便由政府獲得繼續的讓步。

結果，在一八九一年十二月的議會第二次會議上，發生了更大的騷動。議會兩度拒絕批准建造軍艦和補助軍用鑄鋼工廠的費用。海軍大臣樺山資紀在議會討論的時候聲明：「薩摩和長州的藩族認為日本的發展是自己的義務。」這刺激了那些抱着反對藩族的傳統的議員們。這惹起了反對派方面的激

怒。因為發生了的妨礙，會議被解散了。日本議會第一次解散，是在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是在牠召集以後經過了一年。

一八九二年二月，實行了議會的新選舉。政府發動了自己各地所有的行政——警察機關，以便使政府所歡迎的議員能夠當選，不讓反對派當選。警察對競選運動的干涉是這樣明顯的：甚至平常順從政府的資產階級的出所，也都喧噪起來了。競選運動抗議警察的行動的結果，內務大臣高田勲一郎應當辭職政府自己也承認：在競選的時候，牠濫用了自己的職權。

一八九二年五月十四日召集了新的議會。召集了的議會的第一個動作，是表決不信任政府，這個政府，就是在選舉的時候用干涉的手段創造了這屆議會的。政府手慌腳亂起來，宣佈議會休會。在休會的期間，大臣和議會的各個團體之間進行了緊張的祕密談判。伊藤博文主張和反對派領袖締結確定契約，並且實行若干的讓步。

長期討論的結果，政府決定忽視不信任的表決，把下院拒絕了的預算項目，送到上院去請求批准。發生了嚴重的衝突。下院對天皇控告，請天皇干涉政府這種不合法的行為，因為根據憲法，下院享有首先審核預算的特權。議會對天皇的申訴，在樞密院受到了特別的審查。

在這時候，日本的憲法遭到了極大的危險，因為許多大臣和大官吏，都認為議會本身是「不能無

罪的」，應當趕快結束議會，回到以前的「君主政治」。很困難的，是政府中那些眼光更遠大的份子，尤其是伊藤博文，主張保存憲法。他聲明用不適當的行政反對派去面對「廢議」，將來能夠找到方法，去鎮定那些極端煽動的議員們。承認下院的請願書是有理由的，召集了「新議和上院之調查委員會」，再再度正式說明，不曉得是否預算的懷疑這種樣看來，由第一次的鬥爭中，議會成了勝利者。

同一政府趕快利用憲法第七十二條，用天皇的名義宣佈政府採用去年度的預算。然而，同時，政府企圖利用議會中那些「超然的」議員們，來組織自己的政府黨或團體，因為過度謹慎地，不待選舉而退出政府的前任內務大臣田中，海軍大臣，海軍大將西鄉從道，組織了所謂的「國民協會」。這個「國民協會」進行「國民主義的宣傳」，在反動的「擁護天皇政府」的口中，說兩派準備着新選舉的社會輿論。然而「國民協會」的行動，因為發現了牽涉到政府個別份子的許多「大罪行人」致令人格確在地位結束了。反對派在這一次依然是勝利者。這一次並且對付了「議會黨」。

一九三三年，根據議會團體的發起，組織了特別的「取消新聞條例鬥爭聯盟」。政府毫不重視這個聯盟的行動，並沒有卸去出版物檢查的壓迫。然而聯盟受了「多條經驗教訓的反對派的報紙」計劃以隱蔽的「宣言」方式，來記載使政府感覺有愉快的事情。這「宣言」一再命令「國際天皇前」議會第四次會議，重新提議縮減軍事預算，在拒絕政府的海軍預算的理由中，包含着有精確的指

示：議會「不信任海軍當局」

政府因為這種操縱與否憤慨，決定採用下述的手段。用天皇的名義頒佈了一件勅令，說到天皇由自己的意志中，「捐助」一筆萬元用來建設海軍。提議在去年期間，由自己的「條約」中，是預備劃地扣除海軍金額，藉此來補充海軍準備不足的金錢。同時，天皇命令由全體政府官員的條約中，也預備十分之一用來建設海軍。政府用這種手段達到了成功。議會「慚愧了」並且實行了相當的讓步。內閣的預算要求，幾乎全被推過去了。

但政府和議會之間的鬥爭却沒有因此而中止。關於下院議長選舉的事，也成了以後的衝突的根源。依照議會的法律規定，議長的職責是由議員推選，但要天皇批准。下院前議長長澤厚，犯有許多不光彩的行動的罪過。新議會的會議上，發現了長澤厚會同大臣後藤鐵齋，都接受了交易所人員的賄賂。並且和他們一同交雜著想操縱種種預備，議會絕無信任長澤厚。要求他辭去議長的職務。並把他由議會開除。政府拒絕這種決議，認為這種決議，將推展到在下院議選的天皇的次權。

議會固執自己的主張，開除長澤厚。把這作為通過軍費預算的一部分的報復。並且依據這樣說算，議會更對天皇陛下，不信任長澤厚請求處罰大臣後藤鐵齋。即和首相伊藤博文，因為他操縱議會，使議決之。選擇至文派有傳到等事。

七六年，日本第一次強迫朝鮮締結了不平等條約，由朝鮮獲得了爲日本通商而開放最寶貴的港口釜山。這個港口位在日本羣島的對面。一八八〇年，日本又由朝鮮獲得了開放兩個港口——元山和濟物浦。在這以後，朝鮮被迫幾乎和一切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列強都締結了不平等通商條約，其中也包括希俄在內（一八八四年）。

日本支配朝鮮的其他外國列強中，半分鐘地就進到了第一位日本無恥的行爲，粗暴地破壞了種種穩定。在朝鮮滯滯不食心的商人，粗野的軍官和種種的冒險家，他們搶劫朝鮮的人民，參加朝鮮宮廷的一切可能的內部陰謀。對於沒有決斷力弱和貪受賄賂的朝鮮的封建貴族，他們獲得了極優越的影響。

——致冷發生了兩次公然的叛亂。一八八四年和八四年，日本駐滿洲的公使館遭到了焚毀。這兩次事變後自然，日本利用來更容易地恐嚇朝鮮的當局，更深地地在朝鮮植下根基。一八八二年，日本藉口有保護使館的義務，取得了在漢城駐兵的權利。甲午之戰，因爲甲午之戰的軍事活動，日本得到對於遼東的同意：如果沒有取得日本的同意，中國就不能把軍隊派到朝鮮去。一八八五年和中國之間在天津簽訂了爾時，朝鮮撤退日本軍隊及中國軍隊的條約，兩國都允許平等尊重朝鮮的獨立。還有條約，日本方面簽字的是伊藤博文，與中國方面是李鴻章。在這些條約中，日本方面簽字的是伊藤博文，與中國方面是李鴻章。在這些條約中，日本方面簽字的是伊藤博文，與中國方面是李鴻章。

使的一切影響。

日本的軍人，在取消一八八五年的天津條約很久以前，就把軍隊派到朝鮮，利用「東學黨」的暴動，找到了一八九四年派遣軍隊的適當藉口，好像這種暴動威脅了「日本臣民的利益」。

「日曆不勝懷疑」在「東學黨」反對封建領主官吏及外國人的壓迫的旗號下，暴動起來的朝鮮的農民大衆，表現了朝鮮社會進步勢力的政治傾向。然而有着平分確實的養料，證明「東學黨」的領袖中間，也有日本的直接代理人，他們努力把「東學黨」的行動，引到適合日本參謀總部所策動的軍事計劃的要求，好使日本的軍官必須隨同特派團派遣到朝鮮來，以便「研究」因「東學黨」的暴動而造成的情況。雖然朝鮮政府擊潰了「東學黨」的主力軍隊，日本却趕快對「東學黨」的殘餘軍隊供給新的武器，並利用着朝鮮的混亂，藉口朝鮮政府「沒有能力應付這種局勢」，把自己的軍隊開到了朝鮮。

日本對朝鮮的侵略達到最高點的時候，是一八九四年的夏季，日本政府獲得了外交上很大的勝利，是在這種條件下獲勝了。英國同意修改舊的不平等的日英條約，適合日本以前所提出的請求，來簽訂新的條約。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政府同意修改不平等的日英條約。在這下面，英國主要的目的，是要實行援助日本人在軍事上政治上來牽制帝俄，帝俄是英國在亞洲的主要競爭者。俄皇政府，

雖然俄國並欲滿地駐紮視察日本對朝鮮的活動。

（一九零九年六月四日）日本政府決定派海軍陸戰隊到朝鮮去。七月二十日俄國和英國簽訂了新的通商條約。

八月二十日日本對朝鮮宣戰，因為中國拒絕承認日本進入南滿洲領朝鮮的合法權利。日本對朝鮮宣戰。

自從日俄戰爭日本軍隊佔領漢城及朝鮮最重要的港口蔚山後，日本軍隊開始了其在日本陸軍對朝鮮

提出了最後通牒，要求中國放棄在朝鮮的一切權利，但中國拒絕了這種要求。俄國的外交團，竭力煽

動中國趕快閉關反對日本的事務行轅。中國政府正式抗議。八月九日日本派遣軍隊出征朝鮮政其威

勢顯赫的在漢口和旅順等處大臣陸奧宗光在東京對總理特別代表聲明。日本派遣軍隊好幾是關東軍保衛東

方的精華要地而着眼的。以後，當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戰爭已經達到最高點的時候，東亞國際報紙的通信記

者對系統地發表了觀感通信。在這個通信中猛烈地批評了日本。引證日本軍隊所發現的特別殘忍的

事實。例如日本在佔領旅順的時候，在德恩看狗。在旅順被擊殺的婦女屍體的活劇。這種活劇是極端殘忍

的。日本軍人佔領旅順時，英美軍隊據這種殘酷而來的憤慨。這強烈地激發了對日本陸軍威嚴的憤慨。東

亞在對這種事實的報導中，在旅順佔領旅順正式宣佈。日本派兵到旅順。

八月九日日本對朝鮮宣戰。日本軍隊佔領旅順。日本軍隊佔領旅順。日本軍隊佔領旅順。日本軍隊佔領旅順。

的旅順中。這種類的封建領主不能創造統一的有能力抵抗日本人的武力，雖然在個別插話性質的戰爭中

也表現出來了。中國的士兵訓練有成績，地租和武器精良的日本人博戰。日軍圍攻威海衛，繼續了三個月（統率中國軍隊的是海軍提督丁汝昌）。東軍團軍表現了確實的疲勞。一九〇四年九月十七日，在膠州灣的戰鬥中，中國回教徒的軍隊，沒有把日軍強地讓給日本人，當時沒有完全陣亡。

然而戰爭的繼續，却長對中國不利的。

一八九五年三月三十日，在威海衛失陷以後經過了若干日，中國政府派李鴻章簽訂了休戰條約。開始了和平的談判，在談判的時候，日本人依然是異常無恥的。一九〇五年四月廿七日，在馬關（即馬關）簽訂了和約。這個和約的主要條款是這樣的：

第一條 中國承認朝鮮獨立國，所有從前向中國納貢的朝鮮等國一律廢除。

第二條 中國割讓奉天南部與日本，自鴨綠江口溯至平河口，從該河口折線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為止。所有在該線以南地方，及遼東海東岸，黃海北岸屬於奉天諸島嶼，南方之台灣島嶼，澎湖羣島，以及澎湖列島，應歸屬於日本治理。所有以上地方之中國人民，願遷居者，須於二年之內，遷往其變賣產業，遷居以外；但二年期滿，遷徙者，即認為日本人。

第三條 中國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自本條批准後，十二個月內分期交還一萬萬兩。

條一海軍日本約批准後，七年內分六期交還。第五條

第四條 中日兩國從前條約一概無效，根據現在中國與列強通商條約，重訂中日通商條約、航船

章程及陸路交通貿易章程。

第五條 中國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准日設領事官。

第六條 自宜昌至重慶之楊子江航路，自上海及吳淞江，入運河至蘇州，杭州之航路，准日本

船自由通航。

第七條 日本人民在中國內地購買貨物及輸入之運送物，皆不租棧房存貨之權。免除該物運費。

第八條 日本人民在中國商埠得自由從事各種製造，各種機器運入免納進口稅便得自由裝運。

第九條 日本人民在中國內地製造物品，其一切稅課及租借棧房之利益，均照日本輸入貨物之例

辦理。

第十條 日本軍隊暫時佔領威海衛，但所駐軍隊不得越一旅團，限於威海衛沿岸四十里之地，週

年軍費由中國津貼庫平銀五十萬兩。俟第一、第二兩次賠款交清，所餘賠款之元利以關

稅作抵。及通商行航條約成立，交換後，日本即行撤退軍隊，交還中國土地。

註：本約日本歷史原文記載頗不完全，譯者根據中國外交文獻引述如上。

雖然關稅和對日利益是異常有利的，日本軍人甚至還不滿足戰爭的這種結果。日本偏僻的將官挑釁，伊藤博文這般退讓的好像伊藤博文不知道去實現戰勝中國的成果。然而，不久就表現出來了。伊藤博文外交上的成就就是過度偉大的。四月二十三日，日簽訂馬關條約以後，經過了六天，俄國、德國和法國曾通過駐東京的正式代表，把照會送達了日本政府，這件照會裏「勸告」日本政府避免國際紛爭，不要去佔領遼東半島。這件照會是以友誼的態度寫出的，然而同時却是堅決的，顯然以這種「友誼的勸告」還是隱匿着三個強國壓制拚命突進的日本人的決心。

如果對中國的戰爭使日本能夠獲得勝利的話，雖然他付出了內部極度緊張的代價，（那末日本却不曾夢想：武裝抵抗集體手續遼東事件的三個偉大的強國。五月十日，日本的天皇頒佈了勸令，在這件勸令裏面表示了「感謝俄國和法國有益的和不諱的勸告」也表露了願意接受他們的通告。帝國政府了。誠然，為着補償把遼東半島交還中國，日本要求帝國增加賠款三千萬兩。這樣看來，賠款的總額應當是一萬三千萬兩。三萬五千萬兩。日本保存了其餘所獲得的領土。日本由中國接收了台灣、澎湖羣島，並且在朝鮮佔有事實上海優越地位。」

這樣看來，雖然有三國「干涉」，但是說俄國、德國、法國的干涉阻礙了戰爭的結果，日本的收穫，仍然是極大的。戰爭迫使日本的工業有了更加迅速的增長，她鞏固了在半封建的君主政體庇護下的地

主和資本家早就形成了的聯盟。日本資產階級領袖很早以來就渴望「用軍事手段振作殖民地的事業，來克服日本國內和資本主義在落後國家的發展和聯繫的矛盾。」¹¹得到了具體的實現。儘管日本陸軍和海軍的領導權對封建武裝階級的股份（長州和薩摩的藩族），有了保全及更加鞏固自己的地位的可能性。軍人領袖們資產階級方面絕望的「不承認」。日本議會選出改選的選舉，是在宣戰以後馬上舉行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三日，日本國會因日本皇室的行營已移到了廣島，也就將廣島召開了新議會的議會的第七次會議和以前各次會議的會議不通過這次會議表現了日本統治階級的統一。在國家軍中，日本國主義和高揚的氣氛中，政府開始提議選出被議員們全體不通過了。從這看來，薄弱的政府和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反對派關係的短期的階段，是政府勝利來結束了。

議會獲得了戰爭勝利後，除開資產階級和政府之間相互關係的突然轉變，還是不正確的。雖然在議會中的衝突，但從一九四九年採納憲法的時候起，是就記下了資產階級反對派漸漸地放棄和政府嚴重鬥爭的記號。

資產階級能夠在這種原因來證明。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九年間的期間，在民權運動中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思潮對資產階級的修正和他們日本這個時期發生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兩者間的劃分。……

爲着證明這種修正的特性，最典型的是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九年間的這種項目。日本社會主義

種代表我黨黨的印中主義，是不二致。這一年在自由黨內應強項地位，顯明了其對保
護勞動階級以及以勞動階級的民氣迅速增進地，改變自己以前的原狀，以完全同意其政體的官僚政治
。能運用上述的原則來證明工人運動迅速的發展，顯明了自由黨內應強項地位，顯明了其對保
護勞動階級以及以勞動階級的民氣迅速增進地，改變自己以前的原狀，以完全同意其政體的官僚政治

（主要是在明治三十二年）的民權運動中，中心地位，在自由黨內應強項地位，顯明了其對保
護勞動階級以及以勞動階級的民氣迅速增進地，改變自己以前的原狀，以完全同意其政體的官僚政治
。能運用上述的原則來證明工人運動迅速的發展，顯明了自由黨內應強項地位，顯明了其對保
護勞動階級以及以勞動階級的民氣迅速增進地，改變自己以前的原狀，以完全同意其政體的官僚政治

（主要是在明治三十二年）的民權運動中，中心地位，在自由黨內應強項地位，顯明了其對保
護勞動階級以及以勞動階級的民氣迅速增進地，改變自己以前的原狀，以完全同意其政體的官僚政治
。能運用上述的原則來證明工人運動迅速的發展，顯明了自由黨內應強項地位，顯明了其對保
護勞動階級以及以勞動階級的民氣迅速增進地，改變自己以前的原狀，以完全同意其政體的官僚政治

研究了個別空想社會主義代表者的作品，也做出了討論日本的現實力量薄弱的企圖。然而這些團體都僅僅聯合了知識份子，和城市及鄉村的勞動者的羣衆運動沒有連絡。這時候，這種運動却在繼續擴大起來。

一八九三年，岐阜縣建立了佃農的聯盟（「耕作同盟」），這個團體企圖組織農民運動，提高了降低租額及禁止沒收租地的要求。

一八九二年結束了經濟恐慌，開始了工業繁榮的新時期。工人階級的人數大大地增加了。一八九三年登記到的大約有三千萬產業工人，事實上他們的人數比這還要多。

一八九三年，日本開始用比索米爾的方法提煉高質的鋼，煤炭的採掘地擴大了，達到了五百萬噸。一八九三年，日本開始自己製造機車（火車頭）。所謂「模範企業」，完全轉移到了私人的手中。主要是轉移到了康採恩的鐵車。屬於政府的官岡的模範工場，這是一個規模最大的模範企業。以十萬萬的代價讓給了李萊康採恩。大大地擴張了郵船會社的業務。

在修改不平等的條約，大大地擴張了日本的對外貿易。在修改條約以前，一八九四年初，日本出口總額僅及百分之七十。入口總額的百分之七十。地盤在外國人手中。這指出了資產階級反對派，在修改條約的問題中壓迫政府，不僅是根據「愛國主義」的理由，而且是根據更加重要的經濟上的理由。

而活動了。在二六九四年至二八九五年以後的短期間，對外貿易就移轉到了日本人的手中。

第一、日戰前是日俄戰爭異常重要的劃時代的事件。這次戰爭首先把看做帝國主義列強在太平洋殖民政策的對象的、半獨立的國家的日本全部存在時期，和新的時代分割出來了，在新時代，日本已經變成了對其他民族的壓迫者，變成了更有勢力的列強競爭者。雖然日本在社會主義經濟關係中，到甲午中日戰爭的時候，依然是落後的和力量薄弱的國家，但戰後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強國了。第二、如果提出這樣的問題：日本因為什麼原因最後沒有變成半殖民地呢？雖然構成這種半殖民地的情況的要素，在不平等條約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了，那末主要地能夠給與上述的答覆，第三、對建國度的日本。對列強「開闢」是在五十年代，不是在列強相互間爲爭奪權取中國的優先權而發生的鬥爭的極盛期的遠勝的「鴉片戰爭」的結果，在十九世紀的後半年代簽訂了天津條約，開始了奴役中國的一連串的協定，外國資本侵入日本的第四個經驗，指出了日本比中國更將國家注對於資本主義強盜般的「活動」，這比中國利益更深的地盤。就那種利用誘導外國人的財產的嚴重的金屬證來說，日本是將其資本之對於外國商品的銷售之進不是十分富足的市場。雖然外國資本在資本對外貿易中的比重是半分大的，但這種貿易的絕對數字並能值能和中國境內對外貿易的統計資料比較。日本當作殖民地來開發，這需要巨額的費用的。而且得不到很快的效果。因爲這種原因，帝國主義列強最後考慮的結果，才決

的條件。

「自然」去積極地保存日本農村中的封建關係，這不能保證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並且這造成了國內尖銳的矛盾，國內矛盾的毫無性，阻礙了日本經濟已往工業的發展，但日本卻在政治階級，却用最嚴密的向然膨脹的方法，藉以發殖民種及進而侵略國際市場以求努力克服這種束縛。

無論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力量也不希望損害地主的利益，和軍人締結了密切的同盟。這些軍人恰是地適宜實行侵略政策的。由這裏推演出來了這種熱忱：日本努力改善了自己的武備，要成了先進的「文明」國家。」

部長是抱着封建的起義的軍事機關「改組了」軍國學，並且使日本的武備階級和地主利用來國外擴張。這種日本國內的殘暴起子與政府相離，戰爭在日本歷史以後的十年期間，都佔有着日本全國政治上的領導地位。

以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在二八年四年以前中，有種種原因對政府中反動官僚和軍國主義者的優勢，反對過度的軍事專制，下日資產階級黨在首相辭職後，徹底衰落了。看出了日本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黨團的歷程，這種自由主義在以後的兩三年間徹底死滅了。如果在以前，看到了個別的國會議員轉入官僚階級的黨派的事實，那是在村裡資產階級地主政黨活動家和官僚之間的界線，漸漸地更加。

被掃掉了。政黨領袖常常出任政府的官吏，反之，那些暫時退出了政府的官吏，也常常轉入領袖的行列。

一八九八年，日本創立了第二種所謂的「政黨內閣」。加大這個內閣的構成中的，幾乎都是先前以無限重信和板垣退助為領袖的，議會中反對派的代表。但如果不認這個內閣是真正政黨內閣，這却是錯誤的。因為議會中的反對派和官僚之間的界線，到這個時期幾乎完全消除了，這應當看做是普遍的官僚內閣，無論在什麼情況中，這次內閣都不能看做是政黨內閣。

重要的政黨，在每個時期都遭到了許多外蒙上的改變——更改名稱，但他們的實質却變很少變化的。一改造黨改名「進歩黨」，「自由黨」改名「憲政黨」。議會中團體引起了一些併合，「分離」和改組，這都沒有原則上的意義。

伊藤博文在每個時期，是握權的官僚們的最著名的代表，他決定把這些團體中的一個團體，變成政府經常的支柱。一八九八年，伊藤博文開始了關於創立這樣的政黨的談判。「憲政黨」的領袖星亨，提議伊藤博文擔任「憲政黨」的總裁，伊藤博文拒絕接受，因為他希望有建立在別的某些原則上的「自己的」政黨。一八九〇年，再度提議「憲政黨」的領袖的邀請，伊藤博文才實行談判他擔任政黨領袖的條件。會經組織了特別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的構成中，參加了黨中的四個指導者和四個最有

勢力的議員，是以西園寺公望爲首領的委員會作成了加入新政黨的特別條件。

這些條件引述如下。黨中收容這些份子：（一）不屬於任何團體的、無黨無派的議員；（二）議會的前任議員（也是無黨無派的）；（三）市長或町長，他們的助手，市議會的議員，地方行政的活動份子；（四）商會的會長和副會長；（五）有資本五萬元以上的大股份會社的社長；（六）高額的納稅者；（七）各地府縣會的議員；（八）律師；（九）有資本十萬元以上的大銀行的理事。

由上面列舉的伊藤博文入黨的這些條件中可以看出來，他企圖創立對於官僚政府的保守主義的堅固支柱，這種支柱，是明明白白地計算到了能夠獲得資產階級方面擁護的保證的。一九〇〇年的這樣的政黨是在「政友會」的名稱下創立起來了，這個政黨的首領是伊藤博文，新的政黨——「政友會」的會員，大多數都是由「自由黨」（「憲政黨」）出身的。根據這種理由，新的政黨——「政友會」，認爲自己是「第一個政黨」——「自由黨」的傳統的繼承人。實際上，任何的「傳統」都是根本談不到的。

伊藤博文親自擔任新黨的總裁的僅到一九〇三年。在他確信「政友會」成了嚴密的機構，有了支持政府的力量以後，他就把「政友會」委託了「自由黨」的傳統的繼承人，尤其是西園寺公望。西園寺公望擔任「政友會」的領袖，是過了十二年。

能立「厥友會」，是經濟發展階級主義過程上的完成，這是在日本資本主義轉入了獨佔階級的資本主義上發生出來的，也是和日本帝國主義「外擴張的發展階級的」。

第七章 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

一九〇〇年，大約是和「政友會」組成的時候，政府頒佈了兩件法律。一件法律是相當地擴大了選舉議員的選舉權的範圍，（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把財產的資格，由總額直接稅十五元，減低到了十元。）政府藉這件法律來迎合加強了勢力的資產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的中等階級的要求。但同時爲差不致把這種事實看做是對不滿意的人們的讓步，政府又頒佈了治安警察法，這件法律對於一切有關政治活動的事件，例如選舉，出版及其他等等，規定了警察有全權任意處理。這件反動的法律，僅選到了無產階級份子方面的抗議；在這些無產階級份子中，這時恰好透入了社會主義的思想。從議會方面及議會外政黨方面，治安警察法都沒有遭到任何的反抗，他們反而採取了極溫和的態度。這十分自然，因爲在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充分的理由，來和專制政府進行嚴重的鬥爭。

在日本的鄉村中，老的和「新的」地主們，保存了很多封建榨取的方法。日本的工業是建立在國外市場上，這是在向外擴張的打算上，在這種基礎上，鞏固了兩個階級——地主和資產階級。地主和資產階級，統治着向布哈林的這階級份子之陣，已經沒有「顯重大」的矛盾。

和一九〇〇年的治安警察法同時，更頒布了天皇關於這事的敕令：罷工「違反日本國家組織的原則」，所以要受法律的制裁。反動主義的政府的這種政策，顯然是傾向反對日漸加強了勢力的工人運動。

中日戰爭，開闢了新的殖民地市場，這加快了日本工業的發展，尤其是紡織工業的發展。一九〇〇年，日本登記了的七千工業企業中，有四千以上屬於紡織生產。日本工業會社（公司）中的投資，一八九四年是四千四百五十萬元，到了一八九九年，即是中日戰爭以後經過了五年，已經增加到了二萬四千七百七十萬元。從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八年，創辦了二千三百所以上的工業企業，同時在這以前的四年（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三年），却不過創辦了一千五百所企業。

中日戰爭以後，日本的資本主義不僅數量上增大了，而且質地上也發育了：他進到了自己發展中的新階段，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帝國主義階段，就在日本發生了的獨佔，例如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等，在中日戰爭後取得了新的性質和新的內容。和三井及三菱平行，發生了新的大規模的廣採恩：大倉、森田等等大規模的獨佔體的利益，和軍人——官僚的國家機關及議會的政策，比以前更加結合起來了。伊藤博文所創立的政黨——「政友會」，是和三井廣採恩密切地聯繫着的，由三井廣採恩接受了物質援助。「政友會」也就儘力保護這個廣採恩的利益。從另

方面。大隈重信說各種名稱的政黨——「進步黨」——中意欲本黨對於國民黨與帝國議會以「憲政會」——現在的了民政黨——取中而後三黨探想代理及中他個保護田產權利益與改良經濟等事。

「日本帝國主義」從最初的時候起即帶着其專制與帝國主義的性質，即是這般變遷與變化的。資本主義，是和封建的帝國主義的關係密切而聯結着的。在日本和俄國，——列甫一九一六的寫過，——武力獨佔異族，帝國等無限制的領土及種族他們的特權與領土部分地補充其部分地補充了現代最新的全體資本的獨佔。列甫全集，第五卷，三三〇頁。

「日本帝國主義軍事上封建的性質，因為由本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意識而先銳化，其資產階級的利益之基和軍火，為保護地主份子的利益密切地聯繫着。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上封建性質所達成的生封建殘餘，對於日本經濟的發展關係很大的影響之尤甚於於日本主義的構成與斷斷其很大的影響。」

影響

到了日本的工業才雖然有發展的數目據據亦是在這同時，却依然僅有不高的技術水準。右着應托發顯的企業的數目是不很多的。例如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五年，日本工業的工廠只有百分之四十五，但日本工業企業的去類別，從經濟先鋒一類是小規模的企業。

一八九五年日本正式登記的工人計有四十三萬八千人，一八九七年計有四十三萬九千人。日本工業發展的最初，對於地持有功，就是女性的無產階級佔優勢，這是因為紡織工業佔有很大比例的原因。一八九四年，女性佔有產業無產階級由百分之六十二，一八九五年以後，這種百分比逐漸降低，但女工在工人中面依然保有絕對的優勢。

選擇日本的工人階級，採取了極端的方式。工人中的絕大多數，都是來自農村的農民，他們都是著重於工廠於地主及技師的其種代變的階級。這種階級工人階級的階級反抗性，加重了權取。一八九五年，紡織業的工資比日本其他工業的工資是百分之三十七，女工的工資是百分之十二。一八九七年，因為物價高漲的連帶關係，這種可憐的工資稍地提高了。鐵工人工資比女工得十二元，而紡織業的職工取得了四元。女工取得了十七。

兒童的勞動也是佔價最低的。這種勞動者幫傭夫的應用，尤其是這種類型的工業比如在火藥的生產中。男孩之月得五至五元，女孩之月取得五至六元。

工作時間的長短，導着更遲沒新限制的。在乳玉子的紡織工廠中，五種日從早晨五點鐘繼續到夜間九點鐘，即至五小時。在京都的丹後至廣紡織工廠中，工作時間由早晨五點鐘到夜間十點鐘，即是十點鐘。在新瀉的製絲企業中，工作時間由早晨五點鐘到夜間十點鐘，即是十小時。

日本工人被榨取的程度，是與空殖民地。在國際化之形式下，廣泛地採用工廠中買賣男孩和女孩的方法。

有極味的，是在那時日本資產階級的文獻中，曾經認為大規模的兒童勞動是「正當的」。以前著名的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例如田口卯吉，在報紙上寫道：「如果禁止雇用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勞動，那末這就會阻礙日本工業的發展。則一個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村田寫道：兒童的勞動，在工業中促進了工業的發展」。

關於「學徒」的封建行的規則，也廣泛地在工業中應用了。在學徒或了慣例，學徒一日都推備領取八錢的工資，因為他們「學費」，也就應當「感謝」對他們的「指教」。這是補充的榨取方式。

在日本極廣泛地發展了。

異常流行的是罰款制度，尤其是在礦工業裏。礦業的工人常常完全領不到工資，因為根據每個機會對他們罰款。當礦山和沖鋒隊隊第一次有組織的大規模的行動，就是因為工人們對於罰款制度的憤怒所惹起的。

制度所惹起的。

味了，嚴打工人的事實，在日本成軍司空見慣的現象。

在野在縣奉行。由一所有著注的松共宿給的紡織工廠中，送出來了一個十六歲的女工。每個

警察的幫助而被捕了，把她交還了廠主，她得赤裸裸的，用竹棍來毆打。她第二次又逃跑了，第三次又被捕了，剝去了衣服，使她保潔受冰凍。在許多其他的情況中，也記載過和這一類的事實。

關於從一八九七年起，按年別的罷工運動的官廳統計，提供了關於這種事件的間接的（但不完全）表象：日本工人階級對於這種侮辱的反抗。

年 度	罷 工 的 次 數	參 加 罷 工 的 人 數	
		總 數	每 次 罷 工 的 平 均 數
一八九七	一	三	三
一八九八	一	二	二
一八九九	一	四	四
一九〇〇	一	六	六
一九〇一	一	二	二
一九〇二	一	九	九
一九〇三	一	三	三
一九〇四	一	八	八
一九〇五	一	四	四
一九〇六	一	一	一
一九〇七	一	五	五
一九〇八	一	三	三
一九〇九	一	八	八
一九一〇	一	四	四
一九一一年	一	一	一
一九一二年	一	九	九
一九一三年	一	三	三
一九一四年	一	八	八
一九一五年	一	四	四
一九一六年	一	一	一
一九一七年	一	五	五
一九一八年	一	三	三
一九一九	一	八	八
一九二〇	一	四	四
一九二一年	一	一	一
一九二二年	一	九	九
一九二三年	一	三	三
一九二四年	一	八	八
一九二五年	一	四	四
一九二六年	一	一	一
一九二七年	一	五	五
一九二八年	一	三	三
一九二九年	一	八	八
一九三〇	一	四	四
一九三一年	一	一	一
一九三二年	一	九	九
一九三三年	一	三	三
一九三四年	一	八	八
一九三五年	一	四	四
一九三六年	一	一	一
一九三七年	一	五	五
一九三八年	一	三	三
一九三九年	一	八	八
一九四〇	一	四	四
一九四一年	一	一	一
一九四二年	一	九	九
一九四三年	一	三	三
一九四四年	一	八	八
一九四五年	一	四	四
一九四六年	一	一	一
一九四七年	一	五	五
一九四八年	一	三	三
一九四九年	一	八	八
一九五〇	一	四	四
一九五一年	一	一	一
一九五二年	一	九	九
一九五三年	一	三	三
一九五四年	一	八	八
一九五五年	一	四	四
一九五六年	一	一	一
一九五七年	一	五	五
一九五八年	一	三	三
一九五九年	一	八	八
一九六〇	一	四	四
一九六一年	一	一	一
一九六二年	一	九	九
一九六三年	一	三	三
一九六四年	一	八	八
一九六五年	一	四	四
一九六六年	一	一	一
一九六七年	一	五	五
一九六八年	一	三	三
一九六九年	一	八	八
一九七〇	一	四	四
一九七一年	一	一	一
一九七二年	一	九	九
一九七三年	一	三	三
一九七四年	一	八	八
一九七五年	一	四	四
一九七六年	一	一	一
一九七七年	一	五	五
一九七八年	一	三	三
一九七九年	一	八	八
一九八〇	一	四	四
一九八一年	一	一	一
一九八二年	一	九	九
一九八三年	一	三	三
一九八四年	一	八	八
一九八五年	一	四	四
一九八六年	一	一	一
一九八七年	一	五	五
一九八八年	一	三	三
一九八九年	一	八	八
一九九〇	一	四	四
一九九一年	一	一	一
一九九二年	一	九	九
一九九三年	一	三	三
一九九四年	一	八	八
一九九五年	一	四	四
一九九六年	一	一	一
一九九七年	一	五	五
一九九八年	一	三	三
一九九九年	一	八	八
二〇〇〇	一	四	四

在日本工人運動的發展中，一八九七年是很重要的。在這一年，第一次創立了有生命的工人的職工組織並且做出了把這些組織按全日本的規模聯合起來的步伐。

一八九七年，日本的工業爆發了恐慌，恐慌的結果，對於日本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有了異常病態的反映；沒有這種現象的時候，日本工人階級已經就是生活得很艱苦的。

一八九七年的恐慌，是一種外來的推動力，牠加快了早就成熟了的日本無產階級形成階級團結的過程。一八九七年七月，片山潛發起組織日本第一個職工聯合會的中心，取名「勞動組合期成會」。這個團體經過很短的時期以後，到一八九七年的年底，就團結了三千會員。這個團體立起了自己的任務，是首先積極地促進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幫助工人們在職工聯合會的範圍內團結起來，對無產階級說明他們本身的階級利益。

在片山潛的參加領導下，一八九七年，開始出版了日本第一個工人的機關報——「勞動世界雜誌」。

一八九八年組織了前進的知識分子的團體（也是在片山潛積極的參加下），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

這個團體作出了最初的企圖，在緊張地發展着的工人運動下奠定理論的基礎。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〇年，日本出現了許許多多職工團體（礦山工人的、印刷工人的、金屬工人的、及其他工人的職工團體）。

這大大地擴張了「勞動組合期成會」的活動。一九九〇年，這個團體的會員增加到了五千五百人。

在日本各區分設了四十二個支部。

對於日本工人階級的這種活潑性的直接後果，政府於一九〇〇年頒布了這種反動的法律，加緊整

察的監視和禁止罷工。一九〇〇年，「社會主義研究會」被解散了。稍後，在縮小的規模中恢復了自已的活動，縮小以後的團體叫做「社會主義協會」。

日本的資產階級，完全維護一切傾向反對無產階級的極嚴格的警察政策。

日本政府在外交上的冒險，也得到資產階級方面的擁護，這種冒險因為中日戰爭勝利的結果，而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中日戰爭」使日本轉向軍事，日本連續不斷的陰謀的基礎，使那邦朝鮮段可能迅速地完全服從日本的勢力。雖然日本在二八九五年由三個強國方面遭到了「一些抵抗」，然而他們却沒有停止自己侵奪朝鮮和滿洲的計劃，首先是要侵奪朝鮮。（譯者註：朝鮮於一八九七年改稱為韓國，被日本合併後又恢復舊名——朝鮮）。

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由中國的壓迫下「釋放」朝鮮的假面具，繼續推進着自已的計劃。到這時以前，在遠東就有著紀念日本「解放」朝鮮人而建立的紀念碑。在和中國的戰爭以後，朝鮮在日本人的指揮下進行了「改革」，這些改革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加強日本在朝鮮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地位。日本駐遠東的公使，縮小日本的軍隊，不惜運用任何的手段，甚至運用強暴和暗殺的方法，來努力撲滅中國和俄國對於朝鮮封建上層社會的殘餘影響。

一八九五年十月八日，根據日本公使三浦梧村所命，在漢城佔領了朝鮮的王宮，殺死朝鮮的

王妃，朝鮮國王也被拘禁。日本人殺害朝鮮王妃，是這侵略的利無忌憚的證據。甚至日本的庇護者

中國，也不得不因為日本的這種行動而提出抗議。韓國國際聯盟於八月日本迫令停泊由朝鮮回海

浦公使及使館的全體人員，他們是參加了這次流血事件的。朝鮮國王經過四個月後，由拘禁中逃出來

了，躲藏在俄國公使館中。帝俄趕快利用這事來削弱日本人在朝鮮的勢力，及鞏固自己在朝鮮的政治

和經濟地位。

一八九七年，根據帝俄的勸告，朝鮮國王宣佈自己是皇帝。這種意義是在這慶典並這時以前，朝

鮮國王廢品級說來是在中國的皇帝以下，雖然從一八九五年起，朝鮮形式上認為是獨立國，朝鮮國王

却依然不覺得自己已是中國皇帝的臣屬。按說這獨立國，皇帝的尊號，朝鮮國王對中國及日本的

統治者站在不等的地位上。

帝俄鞏固了自己在朝鮮的地位，同時更準備奪取滿洲。一八九六年，俄皇敕將給與中國大皇帝李

鴻章的賄賂的幫助下，和中國締結了這種條約，允許俄國有權在滿洲的領土上建築鐵路，領事機關

及最要的最短的路程。把滿洲和沿海各城聯絡起來的所建築這條鐵路新通綫的端，就新俄國滿洲的

全的利無忌憚的實理權。俄國取得這在這種地帶，以所謂的租借地，而對滿洲的權利。

日本不願意和俄國在朝鮮及滿洲域天著的勢力妥協。雖在英國方面直接的維持下，準備進行分劃遠東殖民地的鬥爭。下述的事實若其證明了日本所刺激。一九九九年政府俄國由中國取得了遼東半島上的租借地。遼東半島是因爲修改馬關和約的結果而由日本國奪去了的。此外，日本入因爲俄國在滿洲建築上述的鐵路極其不安。這條鐵路是在「中東鐵路」的名稱下著名的。這條鐵路的前途通到守旅順口，這便使俄國能對中國方面繼續膨脹。

列強在對中國的關係中，帝國主義傾向的積極化，是中日戰爭的一項直接的結果。列強根據這種理由，明白如繪地這樣寫道：

「日本變成工業的國家，德國在中國的最長城主持開一獨缺口，却發現這樣美好的食物，已經被英國、德國、法國、俄國、甚至意大利的資本家們奪到口中去了。」（列強全集第四卷，一六五頁）

1903

中日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各國瓜分中國的鬥爭加強起來了。在租借地的形式下奪取了中國最重要的港口。在帝國以後，首先要提出德國來做實例。德國一八九七年奪得了青島膠州，以後一八九九年奪得了威海衛。法國在中國南部奪得了中國二部分領土（廣州灣）等日本一八九九年奪得了威海衛。是願這些政策特別不同的。美國那時就宣佈了自己著名的理想：「中國門戶開放」。

機會均等。」這種「理想」，是希望先發在美國的敵手們，不許劃定各自獨佔的勢力範圍，瓜分中

國。一八九九年，美國國務卿海伊，美駐各國的公使，對列強表達了「作照會」把這種「理想」是像

下面這樣公式化了的：

(一) 不得把中國劃分為各國之間的勢力範圍

(二) 各國的商人在中國經營是一律平等的

(三) 旅順口應當是自由港

(四) 中國的海關稅率對於各國的商品應當是一律的

(五) 青島應當是「自由的港灣」。

這更明白地表現了對俄國和德國的不滿，俄國和德國是最先走上了侵奪中國一定領土的道路

的。美國宣佈了自己不承認這些侵奪行為的態度，同時表現了美帝國主義希望將來保有獲取全部中國

的「權利」。這個猶豫期間，主要能由這種事實來說明：美國這時正在和西班牙作戰（一八九八年美

國、西班牙戰爭，這次戰爭是因美國奪得了菲律賓而結束了的）。因此在這時候，美帝國主義不能直

接參加瓜分中國的領土，只好保留將來應得的「權利」。

一八九九年美帝國主義奪得了菲律賓，使美國十分接近了中國，也就擴大美國對遠東事件的關

「據最近菲律賓的報導是台灣島，這個海峽是因中日戰爭的結果被日本奪得了的。」

這種報導的論調中要特別指出來：日本爲着使台灣島及和他鄰近的澎湖列島的居民泰國化，費了很大的力量。無論是台灣或澎湖列島，都是住人很少的。他們的居民，主要是中國人和馬來羣島起源的土著民族。但從樹立了日本的統治權的第一天起，日本的壓迫就是這樣殘酷的。至今開始了連串的反抗日本的極頑強的暴動。台灣一天最大的暴動，這次暴動是在「黑旗」暴動的名稱著名的。是在一八九八年爆發的。關於這次暴動的規模，根據下述的事實能夠判斷出來：爲着鎮壓這次暴動，日本人把十萬軍隊派到了台灣。雖然當地的居民沒有任何將武器，也沒有任何嚴密的軍事組織，他們對日本人都顯出了十分有力的抵抗。這次暴動最後被「亞細亞式的」殘酷所壓潰了。在這裏所建立的制度，僅有不大的變異，上面在卷到了今日。正是在那備時期，在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〇年的期間，台灣本地的居民，都逃到海上去了。這對於殖民者在推測到的地方去了，在幾十年的期間，都終年進行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海陸鬥爭。

日本欲使參加露西亞的(C)給再蘇聯的論調給通曉說這使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繼續實行。最重的事。是中國人民對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日簽訂的二十一點要求權利的反對，以及俄國在遠東的侵略。

領土上的行爲的直接報復。因本國的統治者殘酷的封建權取而憤激的中國民衆，（中國的統治者是取
 仿外國的國體而來的，使帝國主義列強方面來的無恥的却發展到了極度的地步）起來反對這些殘暴的壓
 迫者了，雖然在這種鬥爭的個別事件中，「義和團」的口號就外表面看來是一反動的，但總算總算來
 ，這都是革命的無道無義的民衆的行動。正是因為這種原因，帝國主義各國都抓住在內亂中聯合全部力
 量來反對「義和團」了。列強利用這次暴動，作為武力干涉的很好的理由。日本參加這次干涉的比重
 尤是被登這個時期派遺到中國去鎮壓「義和團」暴動的日本軍隊的天數所決定。帝俄派遺了四千八百
 人，英國派遺了三千人，美國派遺了二千五百人，法國派遺了八百人，日本却派遺了八千人。
 要得承認這種情形：日本人在鎮壓「義和團」暴動的時候，利用自己的軍隊駐在中國領土上
 本來加強培植自己的特權的間諜網。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尤其是對滿洲所獲得的權報，在日本戰敗
 登輝時候，對於日本是復有用的。日本在中國所獲得的特權機關，主要都是在鎮壓「義和團」暴動時期
 年間（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二年）建立起來的。

帝俄方面，也立即利用中國所發生的這種形勢，利用俄國的軍隊佔領滿洲，以鞏固俄國和滿洲
 的關係。在「義和團」的消滅之後，常常加紧了擴張俄國在滿洲的勢力。在滿洲，常有俄國要領俄
 國及不遠千里地。俄國資產階級，編造了在滿洲創造「黃俄羅斯」的計劃。（「聯共黨史簡

果敢，五十二頁。

帝俄在朝鮮的政策，也帶有顯明地劫奪的性質。——強盜般的冒險家——商人、帝俄的武官和武官，——很快就將朝鮮的一切重要自然資源都奪到了手裏：森林、金礦、煤礦、及其他等等。——俄皇政府吞下了朝鮮。——聯共黨也簡要教程，五十二頁。——俄皇政府的遠東總督亞列克塞夫，露骨地煽動着對「小小的」日本作戰，因為日本也「膽敢」覬覦「強大的」俄國的殖民地掠奪的對象。兩個帝國主義的衝突，——一個是根本朽腐了的，同時却是異常貪心的並誇耀自己的「強盛」的，別一個是年青的、更圓滑的却也是同樣貪婪的，——當然不可避免地要用戰爭來解決了。

——血的殘歷——義和團暴動。——把日本帶到了其他帝國主義的同等地位。因此日本簽訂「義和團議定書」(辛丑條約)的時候，也取得了和其他同等偉大的「強國同等的權利和特權。這大大地提高了日本統治階級的勇氣。

在這以後，以更加迅速的速度，進行了締結英、日同盟的談判。日本帝國主義，準備在在簽訂一個方便的機會的時候，就把俄國由朝鮮和滿洲驅逐出去。然而爲着實行這種計劃，日本却必須外來的強有力的支援。正是因爲這種原因，日本使用了種種直線的和「曲線的方法」，要求締結英、日同盟條約。

保障英帝國主義同意和日本締約的主要原因，是英國關心削弱帝國的勢力。誠然，俄帝國主義和英帝國主義之間的主要矛盾，不是在遠東，而是在近東和中亞細亞展開了。一九〇二年的時候，英國和俄國之間沒有武裝衝突的直接威脅。在這個時期，英國已經嚴重地考慮到了法俄協定，也要注意德俄的威脅。因為這種原因，英國不願趕快和日本締結同盟條約，日本人在英國人決定走上這一步伐以前，早就長期在嗚呼着倫敦內閣的門戶。日本在同盟的條約中所要求達到的，是要英國在遠東進行的任何戰爭中援助日本。英國人對這種請求，願意。一九〇二年簽訂英日條約，預先規定了：締約國的每一方，僅能在這種情況下加入另一方所進行的戰爭：對於這種戰爭，如果聯合了第二國來反對同盟者。所以，如果在日本對俄國作戰的情況下，在俄國方面加入下列二個強國，僅在這時候，本國才有義務實行援助日本。在一切其他的條件下，英國只能對日本加給「精神上的」和外交上的援助，却不應加給軍事上的援助。

一九〇二年締結英日同盟條約的情況是很有趣的。傳播極廣的是關於這事的言論。侯爵伊羅連文，是和英日締結條約的反對者，來到了彼得堡，以便達到締結俄日同盟。有許多資料，說到這事全是一項外交上的威脅手段。正是因為英國不願趕快和日本締結同盟條約，日本人不得不用和俄國談判的方法來引起英國。當伊羅連文確信：因為他在彼得堡和俄國談判「同盟」而使倫敦發生不安的

時終，他就平穩地停止了自已和俄國外交官的談話，來到了柏林。這十分明白地指示出來了：英國人很躊躇地進行同盟，日本却運用了。一切手段，企圖達到同盟的目的。

英日同盟條約，加快了日本進攻帝俄的準備。牠給與了日本信用放款，並保障了戰時的資金融通。一九三六年被法內主義者所刺死的高橋是清，那時擔任日本的財政代表，他在倫敦的西德締結了信用放款的契約，和英國的銀行家進行了談判。

用不着懷疑，日俄戰爭的爆發，兩方面——俄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是同樣有罪的。「日本，帝俄也一樣，努力把朝鮮和滿洲占為己有。日本那就已經妄想占領薩哈連和遠東區。」（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五十二頁。）然而日本帝國主義却發起了攻擊，所以牠成了挑戰者。「沒有等待帝俄政府宣戰，日本就首先發動了戰爭。日本在俄國配置有很好的偵探，牠認為在這次鬥爭中是有着毫無準備的敵人。」（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五十二至五十三頁。）

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日本駐彼得堡的公使（栗野慎一郎）接到了命令，申請發給自己的旅行證書。二月八日，日本的水雷艇，沒有宣戰，就實行偷襲沒有防禦地（因為帝俄海軍大將廢登盧爾的大意）駛在旅順港中的俄國艦隊。二月十日，日本正式對俄國宣戰。

一九〇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發生了第二次海上決戰，戰鬥的經過，起初俄國的艦隊是有成績的。

因爲旅艦彼得羅波洛夫斯基號偶然擋着流動的水雷而遭到沉沒。變成了失敗，旅艦的沉沒，一下就大大地變更了兵力的相互關係，變得對日本有利，使俄國的艦隊喪失了指揮部（在旅艦上死去了俄國的指揮官馬卡羅夫海軍大將）。在這以後，俄國的太平洋艦隊退入旅順口事實上也被日本人封鎖了。

主要的軍事動作在陸地上展開了。

軍事活動的舞臺是在滿洲。日本三路軍隊，在大山巖的總指揮下，向着滿洲推進。

無才能的和貪受賄賂的俄皇的軍事指揮部，他的首領是庫緬拔特金將軍，無用的參謀工作的組織，供應組織中的混亂，沒有好好地調整的偵探勤務，——這一切致命俄國的士兵有很高的戰鬥力，雖然他們在反對日本人的個別的戰鬥中表現了很大的英勇。

在一九〇四年八月底所進行的巡邏附近的戰鬥中，有充分的資料證明日本人遭到了確實的失敗。兩日間日本人猛烈攻擊俄國軍隊鞏固的陣地，各處都攻擊退了。在這次戰鬥中，日本軍隊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大約犧牲了二萬四千人。俄國軍隊的損失是小的。只要俄國指揮部方面極小的攻擊的倡議，就足夠覆沒和殲滅戰慄着的和幾乎沮喪了的日本軍隊。然而俄皇的總指揮庫緬拔特金却發出了撤退的命令，是恐怕「被包圍」，把很容易就能得到的勝利變成了可恥的敗北。

俄皇的參謀長斯捷潘諾夫將軍，把十分空虛的旅順口反叛地讓給了日本人，在旅順口長期圍攻以後，暴露了日本軍司令官（乃木失將）在有系統地擊退了的戰鬥的襲擊下，來奪取這座要塞是沒有力量

的。
一九〇五年一月三日旅順口的投降，是俄國朽爛了的專制政體的破產，却絕對不是日本軍事學家的成功。

列甫在自己著名的論文將順口的陷落中竭力說出了：「不是俄國的人民，而是俄國的專制政體，開始了這次殲民戰爭，這次戰爭是變成了舊的和新的資產階級而世界戰爭的，不是俄國的人民，而是俄國專制政體，受到了可恥的敗北。俄國的人民慶祝專制政體的敗北，旅順口的投降，是俄皇政府覆滅的序幕。」（列甫全集，第七卷，四十九頁。）

一九〇五年三月十日，庫羅拔特金將軍，完全因為自己的遲鈍和卑怯，在一次最大的血戰中遭到了敗北，這次血戰是在「奉天血戰」的名稱下著名。

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波緞的海調來援助旅順口的，海軍大將羅姆斯特羅斯芬統率的俄皇的海軍艦隊，在對馬海峽遭到了滅滅。

到這時候，戰爭事實上已經結束了。

帝國主義戰爭在俄國人民大眾間的失望，按照上述的事件所表現的程每度天都在加大起來：為着
一、獲得權利的利益而加大戰爭的俄皇政府有罪的冒險主義；對於戰爭完全沒有準備；俄皇的軍司令部
的無能，註定了俄皇軍隊的失敗。

「日本帝國主義者自俄國戰爭中得到了勝利，完全是因為帝俄落後的原因。」因為帝俄的落後，致
使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五十三頁。）

一九〇五年夏天，作戰的兩方面，都喜悅地接受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狄多爾關於和平調停的建議
，實戰急於退出戰爭，是為着好趕快去制裁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日本進到了緊張的程度，戰爭每經過
，對俄國經濟更加殘酷地惡化着總的說，經濟狀況（不用說，俄國的軍隊不會徹底被撲滅，而且對於
日本仍然是可怕的力量。）

一九〇五年戰爭總費了日本二十萬萬日元，傷者和死者大約達到了七十萬人。

日本進到了經濟破產的境地，一九〇五年八月，在撲茨茅斯（美國）開始的和談談判期間，他
不能提出很高的要求，讓停火美國總統，在談判的過程中，又對日本的代表團施了極有力而壓迫，

迫使他們儘可能作了最大的讓步。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簽訂了和平條約，根據這個條約，日本取得
了薩哈連島的南半部（由緯度五十五度廣南）、南滿洲（遼東半島）、「中東鐵路」的南支，改名為「

南滿鐵路，」以及俄國以前所享有的一切權利和利權」及在俄國領海上的捕魚權。俄皇政府也承認了日本在朝鮮行動的自由。

到了日俄戰爭結束的時候，國際情勢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成了不順利的，這是因為日本的勝利所惹起的，幾乎全體資產階級的大國，都處在很興奮的狀態中，都因為「黃種」的小國日本的軍事成功而受了刺激，在這種事件中，不僅是看做帝俄的威望受到了一定的損害，而且看做歐洲一切反動份子的威望都受到了損害。在樸茨茅斯和平談判的時候，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對於「敗」的俄國專制政府，比對戰勝者的日本，給予了大得多的同情。如同列寧所指示的：歐洲的資產階級，害怕「在國際關係中發生不可避免的勢力配置上的變更，致令增大了威力的年青和新生的日本，在歐洲喪失了軍事上的同盟者。」（列寧全集，第七卷，三三六頁。）因此出席和平會議的俄皇代表維特，在相當的程度上利用了這種事實。來由日本的代表獲得更大的讓步。日本所有做倒堅持俄國付給巨額軍費賠款的要求，都帶着損害了的財政和異常增大了的債務的沉重負擔，由戰爭中走出來了。

日俄戰爭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的狂熱，十分有力地毒害了國內的氣氛。然而在這下面，他却沒有取得普遍的「愛國主義高潮」的性質，這種「高潮」，是日本的統治階級徒然無益地勉強加在他身上的。日本正入階級的絕大部分，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是非常消極的。

這種關係，是日本工人運動高漲的一切先行的時期所養成的，日本工人運動的高漲，從九十年代的末葉就開始了。到了這個時期，關於組織上最重要的企圖，是在創造社會主義的政黨。

一九〇一年，在片山潛的參加下，日未組織了第一個「社會民主黨」。這個政黨是合法的，照牠的創造者的意見來說，牠應當是在工人大眾中間傳播革命宣傳的發展中的第一個階段。

「社會民主黨」在君主政體的日本看來，依然是不堪容忍的。這個政黨在自己出現以後，馬上就被當局解散了，牠的全體發起人都遭到猛烈的迫害。

在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發展中的一切階段所構成的「平民運動」是更有成績的。

「平民運動」是發生於九十年代的末了，但牠的極盛時期，是在日俄戰爭的標誌下所經過的各年間，——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七年。「平民運動」對於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牠先促成了整理這以前日本知識份子零零碎碎的社會主義的小組織、及日本工人職工會的組織。

九十年代日本工人運動發展的特殊性，這是職工會類型的純粹工人的組織，和企圖研究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的知識份子的團體及聯合會，彼此之間沒有任何的關係。「平民運動」的任務：就是要使這些知識份子的社會主義的團體去接近工人羣衆。

就自己的性質說來，「平民運動」當然還不是馬克斯主義的運動。這個運動的領袖，是以前「民

種運動「左翼的急進主義的指導者，他們在日本所通過的社會經濟過渡的形勢下，企圖用自己的行動來反映日本大眾「下層」社會——勞動者的抗議。然而，企圖真正站在日本勞動者階級利益動保護者的立場上，却使這些主要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被他們由「民權運動」繼承下來的，種種思想上的及其他的偏見的全部置於拖住了。

「平民」(出版)社是這種運動的中心，他在平民的標記下出版了各種各樣的書籍，一九〇三年，「平民社」着手出版報紙平民新聞。這種創辦的時候起，這個運動的原則，能够看做是日本社會主義歷史中的獨立的階段。

一九〇三年這種報紙創刊的時候所發表的宣言，現在引述如下：

「(一)自由、平等、博愛，是人類生存的最重要的原則。

(二)我仍提出民主的原則，是為着實現人類的自由。因此我們希望消滅產生不平等的根源，財富集中、性的差異的階級，也希望解除種種的暴力和壓制。

(三)我們宣佈社會主義的原則，是為着要達到人類財富平等的分配。因此我們認為分配、運輸和生產手段都必須社會化，也認為必須管理和指導他們來實現全社會的利益。

(四)我們宣傳和平的原則，是為着使人類走上友愛的道路。因此我們渴望不問人種和政治的

差別，全世界都解除武裝，也渴望禁止戰爭。

(五)我們認為完全的自由、平等和博愛，是大多數人類的理想。因此必須在國家法律的範圍內，來發動大多數人的輿論，藉此種手段來達到上述的理想，把大多數人聯合起來。在這下面，我們堅決排斥訴諸暴力的必要，即令是暫時訴諸暴力的必要。

——平民社聯合會——

「平民社」的文件，劃明了這種運動的理論基礎的全部折衷性。許許多多由資產階級的「民權運動」繼承下來的、平和主義的、托爾斯泰主義的態度、守法主義，——這一切，大大地妨礙了「平民運動」變成真正的革命運動。

「平民運動」的指導者，與出版所謂的「平民文學」和報紙同時，更創立了政治團體類型的「地方支部」。「平民運動」主要的活動份子，是城市中勞苦的知識階級和一部分無產階級，更確實說來，是無產階級中識字的上層份子（在那些年頭，日本工人階級中識字者的比率是很低的。）然而「平民運動」，也同時大大地反映了農民的不滿。在「平民社」的文件中，表現了許多人民主義的立場：農民的理想化，努力把鄉村生活的「健康」條件，和城市中資本主義榨取的壓迫對立起來。

大體說來，「平民運動」是三種不同的成份的綜合：第一，是由「民主運動」繼承下來的小

資產階級的急進主義，第二，是社會主義，這是工人大眾政治覺悟增大的結果。第三，是農民自然而然的民主主義。「平民運動」的活動份子說到社會主義，說到社會的正義，是限於朦朧地號召改變現存的制度。甚至「平民運動」最偉大的活動家，都隔「馬克斯主義很遠，甚至自己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馬克斯主義。在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增長的全部過程中，極病態地表現出來了：這種運動沒有真正地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理論。

「平民運動」自己的綱領的一切朦朧性和曖昧性下，却是這個時期在城市和鄉村中增長起來的、自發性的革命情緒的積聚者。

反戰的宣傳，是「平民運動」的活動的一項最積極的因素。「平民運動」從最初釐在異常艱苦的環境中，主張並堅持反軍國主義的立場。早在發生日一俄戰爭以前，「平民運動」個別的領導者，就在自己的論文中寫過：軍國主義在日本抬頭了。他們竭力指出了：這不僅在國家軍備費用的增加上表現出來了，而且也在日本公式科學頌揚兵士們「勇敢」的武士精神中表現出來了。「平民運動」的代表們，在自己出席演說的時候竭力指出了：對於這種惡劣的現象必須進行最堅決的鬥爭。誠然，「平民運動」方面對於軍國主義的批評，是以托爾斯泰主義——和平主義的立場來進行了的。但就那時說來，這已經是很大的進步，尤其在日一俄戰爭開始以後這更是很大的進步，當時日本散播了愛國主義

的情緒，當時只有「平民運動」才理解進行反對這種思潮。此外，「平民運動」還進行了反戰的宣傳，這是和爭取日本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聯繫着的，是和反對軍閥——官僚的鬥爭聯繫着的。

「平民運動」的領導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在這個運動活動的第一個時期，是幸德秋水 and 堺利彥。以前他們兩個人都是屬於「民權運動」的左翼，那時就已經表現了不確定的、溫和的社會主義的見解。

和反戰的活動同時，「平民運動」還為國際主義的思想而進行了鬥爭。一九〇四年三月十三日，在平民新聞第十八號上所發表的、提議日本和俄國工人締結友愛同盟的、致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信件，能夠用做這種國際主義的表現。在這封信裏這樣說過：

「同志們！日本和俄國政府作戰，都是為着滿足自己的帝國主義的利慾。我們，社會主義者們，不承認任何人種的區別、任何國家的區別、任何民族的區別。我們——同志們、兄弟們和姊妹們，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要彼此互相戰鬥、你們的敵人，——這不是日本；你們的敵人，——這是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我們的敵人，——這不是俄國人，而也是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這是我們的共同敵人。我們應當和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一同進行反對這種共同敵人的英勇戰爭。同志們！當你們被殘酷政府，不知道慈悲的憲兵所迫害的時候，當你們為社會主義而不得不受苦難的時候，你們要想到在遠東還有幾千同志們、兄弟們和姊妹們，以極偉大的同情，希望你們在你們的鬥爭中能夠得到勝利。

一九〇四年的年初，「平民運動」促成了在日本組織所謂的「日本人社會黨」。這個政黨為著進免政治上的迫害，曾經在美國的領土上，創立了以片山潛為領袖的日本僑民的團體。「日本人社會黨」聲明自己參加第二國際，這個政黨出席第二國際的第一次代表是片山潛，他以日本社會主義者代表的資格，出席阿姆斯特丹的大會。這次在日，俄戰爭時期所召開的大會，表現了日本社會主義者的代表片山潛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普列哈諾夫互相握手的有歷史意義的場面。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平民新聞的第五十三號上，在日本第一次發表了共產主義宣言的譯文。誠然，以後發現了此種譯文中有着很多不正確的地方，因為這種原故，重新把他翻譯了和改版了。然而出版共產主義宣言的事實本身，却奠下了日本社會主義者更親近地直接認識馬克斯主義的基礎。

一九〇四年的年底，因為警察的迫害，平民新聞停刊了。然而即刻就開始出版了一種新的報紙直言。直言報的出現，是和俄國開始革命同時的，在直言報的創刊號中，鮮明地反映了日本社會主義者對於俄國革命事件的巨大興趣。由於檢查上的考慮，編輯抑制了對俄國革命重大的政治評價。然而，對於俄國革命者的同情，甚至在直言報刊登純粹記事的一欄中，也都流露出來了。

在締結了樸茨泰斯約以後，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東京發生了一次規模的混亂。日本帝國政府
屬地礦產，企圖把他們儲備成爲對於這種條件的變國主義的不滿的表現；利權的條件是爲日本
有利益的人。事實上，東京這次行刺的原因，據有着痛登別稱的性質。這是幫助着自發性的行動，是
藉此來表示自己對於米價高漲、生活艱苦、統治階級的憤慨的。與會的組織者協助了東京的警察當局，
謀殺帝國政府內務省的官舍。

一九〇六年三月，日本出現了一種社會主義的雜誌社會主義研究。在這雜誌的第三號裏，一
次刊登了共產主義宣言的全文。在第四號裏，發表了恩格斯的論文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論文。在一九〇
六年同年，足尾礦山工礦工人中間成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團體。

一九〇六年三月，社會主義者，利用反動的軍國主義的樺末郎的政府於一九〇六年比較上是自
由主義的西園寺公望的政府所代替了，也就創立了「日本社會黨」。這個政黨的任務，是「在法律範
圍內努力達到社會主義」。新的政黨舉行了許多黨衆的集會，尤其是提議提高電車票價的集會。這是
和上述的事件聯繫着的；據有電車線，及因乘客搭乘電車而取得了很高的代價的私人會社。對市政府
送給了賄賂，爲着是要使市區的電車也提高票價，好使市區的電車不致和私人電車的所有者發生競爭
。這種情形，是「日本社會黨」組織黨衆大會的原因。開過了會以後，組織了舉着旗號在東京

市街遊行的示威運動。這以後，在秘密的場所召集了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了普選權的問題。

一九〇七年二月，召集了『日本社會黨』第二次大會。在這次大會上發生了兩種領導的衝突：幸德秋水提出了有著無政府主義的精神的『直接行動』的綱領，和田添鐵所提出的改良主義者的綱領。

此外，在大會上還出現了中立派（是堺利彥領導的），他們企圖調和幸德秋水和那些爭取議會主義的改良的擁護者的見解。

『日本社會黨』的第二次大會，是在日本大規模罷工，尤其是足尾礦山的罷工的情況中進行了。在足尾礦山上，在這以前，就有『日本社會黨』的代表在那裏進行了社會主義的宣傳。

在大會上，曾經討論了下述的這些問題：（一）如何組織修改警察法的運動，這種法律是限制了日本公民的權利的；（二）如何組織爭取普選權的運動；（三）如何提高反戰的運動；（四）如何提高反宗教的運動。

幸德秋水主張大會通過這樣的決議：『爲承認議會政治的無力和不需要，』他證明了：在議會中佔有很大的勢力的歐洲的社會主義者，例如在德國、法國、英國，無論他們願意或不願意，却都必須阿諛統治階級，他們自己的工作，絕對不是促進羣衆革命意識的增長，而是分散工人階級。幸德秋水指出了西歐議會政治的危險，他主張只必須完全拒絕利用這種鬥爭方式的一切企圖。自然，這在當

時的環境中是深覺錯誤的立場。幸德秋水不理睬：日本那時當前的任務，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他起初正確地批判了改良主義者，但走上了偏向，陷入了無政府主義的泥沼中。

堺利彥和石川三四郎所提出的妥協性的綱領，在大會上得到了勝利，他們當選了黨的書記。擁護改良主義者的田添鐵，總共不過得到兩票。然而黨却没有存在很久，在這一年就被禁止了。對於社會主義的出版物，尤其是對於曾經封閉過的平民新聞（第二次出版），加給了許許多多的政治上的迫害。

從一九〇七年起，日本工人運動暫時衰落下去了。罷工的次數減少了。堺利彥和幸德秋水企圖在各種名稱下重新出版報紙，都沒有成功。日本最積極的革命份子，都不得不或是去進行極秘密的地下工作，或是亡命國外。片山潛早在一九〇八年就企圖組織「平民公會」，然而沒有得到許可。幸德秋水徹底陷入了自己的宗派主義中。他也沒有做到和日本的工人羣衆取得聯絡。

片山潛仍然是日本社會主義優良傳統的繼承者，他和自己不大的團體，在爭取普通選舉權的鬥爭上，集中了自己的煽動工作。

一九〇八年，桂太郎政府恢復了政權，伴來了兇猛的要惡恐怖的新波濤。許多社會主義者都被逮捕了。一九〇九年七月，發生了所謂的「幸德秋水事件」。幸德秋水無政府主義的行動，被日本的

統治階級巧妙地用假控告使俄有恐怖主義的企圖。幸德秋水的「罪狀」是作爲對於日本天皇的生命的組織恐怖主義的威脅來定讞了。事實上，幸德秋水不是恐怖主義者，也不是「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在自己一切無政府主義的錯誤下，他是創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擁護者。承認工人階級政治組織的必要性，決定了幸德秋水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

幸德秋水案件秘密審理的結果，有十二人（其中春幸德秋水本人不在內）被判處了絞刑，十二人被判處了徒刑。審判幸德秋水的滑稽劇，由許多國家的社會主義者方面惹起了多數的抗議，他們在這種事件上，正義地注意了日本專制主義裁判日本社會主義一個最優秀的領袖。在日本本國，關於這個案件，出版物上沒有登載一個字。警察絕對禁止傳達關於這個案件的任何消息。僅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以後，才解除了記述幸德秋水案件的禁令。

日俄戰爭以後，日本資產階級和地主的議會政黨，對於軍人官僚政府的專制主義，澈底並毫無放棄了任何的抗議。這是和上述的情形有聯繫的：日本的經濟中，在日俄戰爭以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對於統治階級的政策顯出了自己的影響。日俄戰爭，比中日戰爭更加大大地促進了日本工業的發展。和紡織工業增長的同時，紡織工業依然和先前一樣佔有日本工業中的第一位。還大大地發展了其他的工業部門。開闢了新的工業中心（在九州島的北緯——八幡、門司、等等。

一九〇六年，創設了「南滿鐵路會社」，成了經濟上奴役滿洲的主要工具。

獨佔資本太未增加強起來了。

用在工業中的股份資本，由一九〇三年的一萬七千萬元，擴大到了一九一三年的八萬二千四百萬元。一九一三年，百分之〇四的太政債公司，有資本五百萬元以上的公司，手中持有全體公司資本的百分之三十七。

就大規模的康探恩，在日本的經濟上，取得了更大的推進勢力。在日俄戰爭的時候，因為獨佔軍事供應的結果，發生了新的康探恩。日本專制主義的國家機關，積極地協助了資本主義康探恩的富有利強化。日本許多政治家，都把自己的政治工作，和為資本主義聯合社中的工作結合起來了。議會中政黨的活動份子，都担任大商號的法律顧問。

日俄戰爭以後，日本隨著階級，在地主和資本家的統治的聯合中，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在這種聯合中，有時發生了重大的鬥爭，這種鬥爭，通常都是犧牲勞動者大眾而得到的妥協來結束了。

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八年的期間，因為輸入日本的農產品課稅的高度的問題，日本發生了資本家和地主之間的公開鬥爭。日本的工業聯合會，在議會中提出了必須降低輸入農產品、尤其是米穀上的入口稅的提議。一國民黨一保證這些工業聯合會的利益。和這一方面對抗，一政友會一出面保護大地主。

利益。要求對農產品課以高額的保護關稅結果，在對農產品和工業產品都課以高額關稅的基礎上，成立了地主和資本家之間的新的妥協。

○對殖民地之侵略。及我時地奪殖民地台灣、朝鮮和南滿。地地主和資本家反對的聯合運動起來了

日俄戰爭一項最重要的結果，這是日本徹底奴役朝鮮。雖俄國以後英國也承認了日本人在

朝鮮的優勢。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締結了所謂的「日韓協約」，這準備好了日本帝國完全合

併朝鮮。這個條約，規定了建立日本對朝鮮的外交政策上的監督，對朝鮮的行政上的監督，對朝鮮的

財政上的監督。在朝鮮的一切行政機關中，都聘請了日本顧問。日本已經把朝鮮看做是自己的殖民

地。率直地看，越朝鮮的居民。一九〇七年，朝鮮的皇帝作過一次最後的企圖，請求列強，尤其是美

國援助他解除日本的保護。朝鮮的一位親王，在海牙會議（創立永久和平的會議）的時候，祕密地派

武去出席，在列強面前宣佈反對日本壓制的抗議。然而，在這種抗議並沒有得到絲毫結果。日本的主要敵

人，在當時，已經被擊敗了，致使其餘的國家甘願都承認國為朝鮮而和日本發生衝突。

對朝鮮的侵略。這就是這次沒有效果的反訴的結果。朝鮮的皇帝在死的威脅下，為着自己的

兒子的利益，不得不放棄王位。一九〇七年，日本和朝鮮締結了新的「協約」，根據這項協約，全國

一切權力事實上完全移轉到了日本統盟的手中，公爵伊藤博文（他於一八九五年陞授侯爵，於一九〇七年陞授公爵）是日本站朝鮮的第一任統帥。朝鮮的軍隊被解散了，駐在朝鮮的日本政府成了唯一合法的行政當局。一九〇九年，伊藤博文在喀羅濱被朝鮮的愛國志士刺死了。伊藤的繼承者藤田的楚安重復了遺傳來了日本人在朝鮮遺傳了更大的惡權。日本帝國主義，是伊藤這大領袖一終任統帥的善性正統。在朝鮮樹立了殘廢殘暴的制度，甚至不容許朝鮮土著政權。虛擬的存在。一九一〇年，日本帝國主義，朝鮮最後的皇帝，舉行了「莊嚴的典禮」，把朝鮮的王位讓給了日本天皇。朝鮮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然而這並非一切：一、是為來帶長官對朝鮮的，免責書。二、是內政改革。三、是朝鮮的總督。在九年前餘的期間，是朝鮮無限制的和全權的主人。土國對內政是日本站專人與專的代表，他甚至絕不容許日本國內的輿論，事實上把朝鮮變成了半軍事化的殖民地。在朝鮮樹立了殖民地，得到了形勢得從信實的名稱，叫做「指揮刀制度」。日本的殖民者努力消滅朝鮮各種的民族文化，實行使朝鮮居民完全日本化。『嚴厲禁止在學校裏教授朝鮮的語言和朝鮮的歷史。日本警察有權任意逮捕和審問朝鮮人。春間的時候，能按應用種種肉體上的拷問。任便的日本警察，能隨意奪去特殊的權利。同時，朝鮮人却都遭到了嚴罰，是看做絕對的下等人。做同樣的工作，日本人却比朝鮮人得到高幾倍工資。不用說，一切稍稍負責的職務，都只有日本人才

能的工作，日本人却比朝鮮人得到高幾倍工資。不用說，一切稍稍負責的職務，都只有日本人才

責任

日本歷史

所謂的一東洋殖民會社之稱，朝鮮銀行，是經濟上掠奪朝鮮的一種準備機關。這種劫掠採取了同十公厘唐的規模，在極短的期間，朝鮮人都因沒有履行某種條件，而由最好的經濟中被驅逐出來了。朝鮮的農民，受盡了種種建築道路的義務的壓榨，受到了朝鮮本國的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半壓榨，得到極少的代價，把自己的土地讓給了日本的購買家。有時朝鮮的農民簡直被發家，由土地上驅逐出來了。朝鮮的商業，是種種方法的制度所迫害着的。這些方法是上自特別的捐稅起，直到軍經濟以外，朝鮮的專政（商人的沒收，被日本士兵的長靴壓榨的種壓制的朝鮮人民，作出了自然而然的企圖，對自己的壓迫者發動起來了。然而這些行動，一般說來都是沒有很好的組織的，沒有特別的困難就破產，長途鐵路，丟了，朝鮮最富的皇帝，舉行了一種種的朝。對朝鮮領袖，對日本天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以朝鮮的獨立，日本帝國條約，被朝鮮的條件所代替。這種種的條約，更確實地損害了，在第三國攻擊的條件下，日本為獲得獨佔權的義務。這種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是特別重大的成功。因為以前的條約，先規定，日本在這種權利及外國人債權給予外交上的援助。此外，在這種條約中，曾承認，英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權利，由日本指導的手，這樣看來，一九〇五年所完成的朝鮮的合併，也是和英國的國條約，無異。這種種的條約，

因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在日俄戰爭後，滿洲國以前，俄國在滿洲的勢力範圍，在日俄協定中，已歸於日本。日本在日俄協定中，已將滿洲的勢力範圍，歸於日本。日本在日俄協定中，已將滿洲的勢力範圍，歸於日本。日本在日俄協定中，已將滿洲的勢力範圍，歸於日本。

大清帝國領土不可侵犯性之義務。這項協定，規定了滿洲與俄國和日本之勢力範圍。承認北滿主要鐵礦的勢力範圍。這項協定，規定了滿洲與俄國和日本之勢力範圍。承認北滿主要鐵礦的勢力範圍。這項協定，規定了滿洲與俄國和日本之勢力範圍。承認北滿主要鐵礦的勢力範圍。

第三國方面來的威脅的時義。這項協定，規定了滿洲與俄國和日本之勢力範圍。承認北滿主要鐵礦的勢力範圍。這項協定，規定了滿洲與俄國和日本之勢力範圍。承認北滿主要鐵礦的勢力範圍。這項協定，規定了滿洲與俄國和日本之勢力範圍。承認北滿主要鐵礦的勢力範圍。

倘如希冀收回滿洲的完全主權的情況下，共同對付中國之條約，也等於是共同對付美國的條約，我們不能不認爲，美國企圖阻止俄國和日本在滿洲權力的侵入。

一九二二年，日本政府沿著和帝俄協約的線，進行得更加遠了。這項協定，規定了滿洲與俄國和日本之勢力範圍。承認北滿主要鐵礦的勢力範圍。這項協定，規定了滿洲與俄國和日本之勢力範圍。承認北滿主要鐵礦的勢力範圍。

這項協定的原文，在過去分成了兩部分：東部承認日本利益，西部承認俄國的利益。這項協定，規定了滿洲與俄國和日本之勢力範圍。承認北滿主要鐵礦的勢力範圍。這項協定，規定了滿洲與俄國和日本之勢力範圍。承認北滿主要鐵礦的勢力範圍。

本和俄國之間存在着重大的帝國主義矛盾的時候，他們在關於瓜分中國的方針上，却是精神一致的。這項協定，規定了滿洲與俄國和日本之勢力範圍。承認北滿主要鐵礦的勢力範圍。這項協定，規定了滿洲與俄國和日本之勢力範圍。承認北滿主要鐵礦的勢力範圍。

美國固不滿意地察視了日帝國主義在遠東的膨脹。早在一九〇五年十月，美國人就企圖削弱日本在滿洲的勢力。這項協定，規定了滿洲與俄國和日本之勢力範圍。承認北滿主要鐵礦的勢力範圍。這項協定，規定了滿洲與俄國和日本之勢力範圍。承認北滿主要鐵礦的勢力範圍。

在滿洲的地位。美國大鐵路企業家加利曼，發表了提議創立收買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新提議的演說。

加利曼提議日本參加這個新提議，但日本，俄國也一樣，拒絕了這種提議。本埠新聞：聞者亦非重大的帝國主義提議，而是加利曼大提議。

一九〇七年，日本的移民大批地來到了加利福尼亞，而在美國引起了刺激，因為這種種關係，對日本和美國之間發生了重大的磨擦。

加利福尼亞州的當局，根據日本橋長不願入美國籍，經過一定的時期又回到日本去為理由，禁止日本移民進入加利福尼亞。

這項禁令，遭到了日本政府方面的嚴厲抗議，長期正式談判的結果，一九〇七年締結了所謂的紳士協定，根據這項協定，日本政府自己允許限制日本移民。

加利曼的移民說，歐美國和加拿大。

一九一〇年，美國南滿洲的秘書諾克斯，提出了滿洲可陶鐵路中立化的草案。這個草案的要点，是歸納到加利曼同樣的目的，是要避免日本在滿洲的鐵道在滿洲繼續發展的目的。

草案：日本和俄國在滿洲的鐵路利權，應當讓給滿洲國辦理。特設滿洲國聯合銀行。

日本在滿洲的鐵道和俄國在滿洲的鐵道，其管理權應當歸滿洲國辦理。

日本對滿洲的鐵道，應當實行一統的標準。一九〇九年，日本對滿洲的鐵道，應當實行一統的標準。

對於滿洲的鐵道，應當實行一統的標準。一九〇九年，日本對滿洲的鐵道，應當實行一統的標準。

方因交換條約而有聯繫的強國的戰爭，這道強約的英日通商條約，不能自動地產生效力。此外，在滿洲

條約的本文中，包括了這樣的條目：「用保障中國獨立和完整及對各國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的方法

，來完成列強在中國的共同利益。」這項條目，是表示在日本對美國作戰的情況下，英國希望留有

法律上的退路，來維持自己的中立。英國不願更加受到束縛，因為日本對於英帝國主義，已經不是以

前那種絕對有利的同盟者；英一德的敵意，把英國一切其他的外交上的打算，逐到了次要的地位。

反之，日本在中國的經濟地位的強化，使英國的資產階級，不得不有着相當的疑慮，來對待自己

這位在遠東的同盟者。

一九一一年，把日本最初加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時期和日本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最後的殘餘，

完全肅清了：把自由提高輸入日本的外國商品上的海關稅率領域中的，對於稅日本形式上的限制取消

了。

這樣看來，日本變成「全權」的帝國主義強盜的過程，已經徹底完成了。

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死了，結束了所謂的明治時代。

列強和滿洲林不只一次地指出了：日本，正好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等性和

彈性的實例。十九世紀的末葉，日本還是極落後的和貧窮的國家，那時，她從其餘的資本主義國家

方面，甚至從相當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方面，比如從帝俄方面，都常常遭受着經濟的壓迫。雖然歷史

上一個短時期以後，日本在自己的發展中作成了巨大的飛躍，向前突進了。起來「合法地」主張佔別人的領土。根據這種理由列甫烏過：「一八七一年以後，德國比英國和法國要快三十四倍地強盛起來了。日本比俄國要快十倍地強盛起來了。爲着檢查資本主義國家實際的力量，除戰爭外沒有也不能有別種手段。戰爭不是私有財產的基礎的對立物，而是這些基礎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發展。在資本主義時代，個別的經營和個別的國家的經濟發展，平均地成長是不可能的。」（列甫全集，第十八卷，二二三頁。）

斯達林論到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時候指出了：「例如德國，他在半世紀以前，比法國和英國的落後的國家。在這裏，也必須同樣說到日本和俄國的比較。然而，大家都知道，在二十世紀初葉的時候，德國和日本已經跑得遠遠了。德國在世界市場上已經跑到了法國的前頭，差不多要趕上英國，日主已經跑到了俄國的前頭。如同大家知道的，由於這些矛盾，也就發生了不久以前的帝國主義戰爭。」（列甫主義問題，第十版，八十二頁。）

第八章 世界大戰時期的日本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過程，顯出了巨大的影響。

日本入努力擴張了關於滿洲的執着；日本加入一九一四年的戰爭，這是因爲容在英日同盟條約的原故；這是和實際情形完全不適合的。

到行英、德帝國主義矛盾極度尖銳化的時候，兩個同盟國——英國和日本——在遠東的利益，因日許多問題已經分道揚鑣了。中國成了他們之間磨擦的主要泉源。英帝國主義那時在中國機會佔有獨佔的地位，日本已經認爲：在「對中國的政策」中，自己極有力的同盟者的監視，是使自已受了壓迫的。

英國和日本不友誼的關係加大可。按照上述的真實的程度成了更加顯然的；少壯的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奪領土的要求，違反了英國的利益，兩個同盟國之間的商業鬥爭，有許多機會轉在公開的衝突。

26, 在一九一四年的戰爭的前夜，日本的「輿論」公理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英日同盟條約繼續存

在是否合理。

日本的統治階級的上層份子中，有了關於這事的十分有力的思潮：利用和英國的主要敵人——德國的接近，來共同努力破壞英國在中國獨佔的支配權，解除英國壓迫日本的「友誼」的運籌。傾向於持這種觀點的思潮並不是別人，正是日本的首相犬養毅。

日本議會中下述的事件是，日—英關係惡化的第一個正式的象徵：在世界大戰爆發以前的兩年——

一九一三年二月三日，在議會的會議上，示威地熱烈歡迎了外務大臣內田康哉演說的演說。他聲明日本在中國的政策，不能因為外國的壓迫而變更。這次演說，有着正式答覆英國政府反對日本在滿北積極活動的抗議的性質。

日本改變了對英國的態度，不能歸過德國和俄國。在大戰前夜俄皇的外交官吏對彼得堡的報告中，這樣鮮明地指出了日本和英國之間增大着的疏遠，甚至舉例說俄國的大使瑪列夫斯基在馬列維斯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即在爆發世界大戰前三個月以前，對彼得堡這樣報告了：

「英國和日本在中國的競爭，是他們之間經濟接近的主要障礙。出版物絕不隱晦地指出了：在中國，英國人比其他外國人更加反對日本的成功。一般說來，英國在中國不是日本的同盟者，曾可說是牠的競爭者。由這裏得出了結論：如果日本和英國之間不能在中國事件的基礎上建立經濟同盟，那

末他們兩政治同盟就會失掉一切意義，日本就要我與俄國或其他歐洲強國——例如德法——更加密切的接近，這些國家是對中國很關心的。

德帝國主義的指導者，的確相信英日目的矛盾會深化，相信能夠把日本吸引到準備為奪取世界霸權而決鬥的「三角同盟」方面來。

努力在英國煽動反日的情緒，影響英國的海軍界，這是威廉二世在一九一三年五月，就公開地宣佈：英國實行了錯誤的政策，因為他把自己的艦隊集中在北海，同時，日本却絕對不是英國在大平洋上所動力的安全保證，恰恰相反，日本會實行反對英國。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德國駐倫敦的大使李赫諾夫斯基，拍給威廉的電報中，有下述內容：「德皇陛下，日本會實行反對英國。」

我們應當和保加利亞及土耳其締結軍事協定，我們也應當和羅馬尼亞締結軍事協定。我們應當和日本締結同樣的協定。我們應當利用能夠幫助我們的任何一國。這是對於德國有着生死關係的問題。

這樣看來，德國外交部的秘密文件，明明白白地顯示出來了：威廉對日本的估計，不是單純地用敵來恐嚇英國人的外交手段，而是德帝國主義戰略計劃的一部分。然而直到爆發戰爭的時候，德國關於

見

題

題

題

題

題

日本的這些計劃，還是隔離實現的。

同時，日本帝國主義，也害怕破裂和英國的同盟關係及公然轉到德方方面去。在軍事關係中，站在這樣的敵人——英國和俄國的聯合面前，對於日本顯然是危險的（和德國離得很遠。）反之，德國在遠東的武力却是不很大的，日本，就對同盟的關係說來，做一下可敬的忠實的。勢，出面反對德國在太平洋上很薄弱的勢力，這對於日本是有利的。這就能够在英國受到了歐洲鬥爭的束縛，而繼續向前地實行侵略中國。

一 戰爭的開始，日本的「輿論」是大大地對外的。一九一四年八月最初幾日，情勢表現出來了外表的曖昧性。甚至傳播了皮協約國的消息，這就德國的通訊社所發出的。司法大臣尾崎行雄，在刊物上發表了公然親德的聲明。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的總方針，却是已經根本決定了的。日本政府趕快就通知了「列強」，「只要英國加入戰爭，他就準備履行同盟的義務」。

雖然存在英日同盟條約，日本却有保守中立的完全可能性，不僅因為德國政府趕快就聲明了：對待日本不改變自己友誼的情緒。英國政府也正式通知了日本：「雖然英國還沒有決定在這次衝突中對自己的立場，但如果能參戰的話，那末一定參加法國和俄國方面。在這環境中，英國不打算請

日本作為同盟國來加以協助。

美國的外務大臣威爾遜，一九一四年曾要金國阻止日本履行同盟國的義務，不讓日本過境。威爾遜氏曾率直地說明了：恐怕日本利用這種便利的機會，來採取在太平洋上行動的過份自由。

事實上，英國和德國之間剛正式宣戰，日本方面對中國侵略行動的危險，已經就成了這樣顯明的：中國政府請求美國出面提議限定在歐洲作戰，有違意不要進行軍事行動。至於說到英國，他既與日本同結了日本政府，就不希望日本履行同盟國的義務。

但日本帝國主義，已經最後決定了自己的選擇。八月間，日本的重慶在山東海面出現了。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沒有得到同盟國的同意，日本就對德國提出了最後通牒。

這項文件，因為自己的態度，是不值得重視的。現在引述如下：

「爲着維持東亞的永久和平，日本帝國政府良心地想到了：牠的義務是要警告德意志帝國主義執行同盟的義務：(一)撤除膠州灣的軍隊及各種的砲臺鐵船，立即退還日本和中國的領海，其中如有不能退還的，就要馬上解除武裝；(二)不得遷於九月五日，把膠州灣的全部租借權，無條件地或有條件地移交日本帝國政府，以便有可能把膠州交還中國。」

提出這種不容推諉地接受的，最後通牒經過了八月，這時期指出了：「日本不得不採取適合這種新

成局勢的認為必要的行動

因爲這件接續而感不安的英國政府，強迫日本發表「共同聲明」，在這種聲明中竭力指出「大不列顛和法國政府相互協商得到了這種同意」，他從每一方面，無不須設法保證遠東因英日同盟而鞏固的共同利益，尤其要設法保證中國的獨立和完整。關於這事，曾經繼續過種種遺憾的協定。

在這種「聲明」中總亦指出「日本絕不進行動」，拒絕德國在東亞大陸的佔領地外，不得觸及任何外國的領土。

雖然發表了這宣言，英國却沒有力量阻止日本實行自己的計劃。

日本和德國締結秘密協定，使日本獲得理察德意。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就正式對德國宣戰。九月五日，日本的外務大臣加藤高明，出席議會說明日本的外交政策，極詳細地說到了「德國熱心本在遠東的利益之間有着『深淵的』矛盾」。

因爲日本的行動惹起了美國方面的敵意的反應，日本的首相犬養毅，在宣戰的那天曾經通電美國，「日本是絕對自己同盟國的完全同意才行動起來的。日本沒有領土上的野心，是希望担任東方和平的保護者」。

一九一四年九月二日，日本就把人數不多的、用半個師團編成的出征隊派到了山東。日本人圍攻青島於十二月七日奪取了這個要塞。當時英法美平洋作戰的英國艦隊，沒有特別的困難不就擊破了德國少數的軍艦。這些軍艦是駐在屬於德國的太平洋羣島的區域中。這些海島也被日本人佔領了。佔領了青島，就確實說來，日本武力參加世界大戰就此完結了。

日本對世界大戰所付出的代價，大約只有兩千死者和傷者。如果把這種損失，和別國由戰爭所遭受的人口的犧牲來比較，那末日本的這種損失是亦得很微的。甚至等到一九一七年才參戰的美國，也損失了三百萬死者。而俄國則損失了九百萬，法國有損失了六百萬人，以及其他等等。

一九一四年年底，當時歐洲的戰事已經達到了極大的規模，協約國的許多政治家，提出了把日本的遠征隊合理利用到歐洲來的問題。當然，薩摩剛非正式地徵求日本人的意見時候，就表現出來了。日本不願真正作戰。日本政府藉口日本士兵不服歐洲的水土，拒絕派遠征軍團到歐洲去。在送達法國政府的特別照會中，日本的外務大臣提示了：日本在太平洋上保護同盟國的利益，也遭受了重大的犧牲。

269
中國很快地就理解了：日本和德國軍國主義戰鬥的極可畏的準備，是用來掩護日本侵略中國的計劃。因為這種原因，早在日本軍隊在山東登陸的時候，中國政府就企圖避免日本挑戰者的攻擊，聲明自

已準備加入協約國方面。中國政府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就沒有了侵略中國領土藉口。中國準備對德國宣戰的聲明，恰如如同預料的，惹起了日本方面「很大的憤慨。」日本的刊物一致地斥責：中國這種不遜的詭計，中國加入戰爭沒有也不能有任何的利益，日本不得不抗議在太平洋區域這樣地擴大戰爭。在幾年的期間，日本的外交對中國實行最大的壓迫，爲着是不讓中國宣佈參戰。僅在戰爭的最後，在英國的支持下，中國才「做到了」加入協約國方面對德國作戰。

日本對中國的關係，正是把中國作爲侵略的對象，這是誰也用不着任何懷疑的。日本人在這個時期，極無恥地公然提出了征服中國的綱領。

一九一五年的年初，日本就決定充分利用對俄勝利地形成的國際形勢，來使中國奴隸化。一九一五年二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對中國提出了下述的「二十一條要求」。

「第一號關於山東條約」

第一款 中國政府允諾：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政府享有之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處分，概行承認。

第二款 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并沿海半帶土地及各礦山，無論何項者，自應概不讓與或租借他國。

第三款 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龍口接連膠濟鐵路之鐵路。

第四款 中國政府允准：為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為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規定。

第五款 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者：

第一款 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期九十九年。

第二款 日本國人民在南滿洲及內蒙古，為營業商工業應用之房產，或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債權或所有權。

第三款 日本國人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意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

第四款 中國政府允將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許與日本臣民。至於擬開各礦，另行商訂。

第五款 中國政府允諾關於左開各項須先經日本國政府同意而後辦理：(一)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准他國人建造鐵路或為建造鐵路而向他國借用款項之時；(二)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課稅作抵向他國借款之時。

第六款 中國政府允讓：如中國政府在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稅
 習一必須先向日本政府商議。

第七款 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約期對押之日起，以五年
 九年爲期。

第三號 關於漢冶萍公司者：

第一款 兩締約國互相約定，俟將來相當機會，將漢冶萍公司作爲兩國公辦事業，並允如未經
 日本政府同意，所有屬於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公司任意處
 分。

第二款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該
 公司以外之人開採，並允此外凡欲舉辦無權直接或間接對該公司有影響之事業，必須先經該公司
 同意。

第四號 關於中國沿岸者：

第一款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橋樑，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 關於全國者：

第一款 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任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

第二款 所有在中國內地設立之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

第三款 向來中日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造成輾轉之舉，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權

作為中日合辦，或在此等之警察官署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籌劃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第四款 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須聘用日本技師，

並採買日本材料。

第五款 中國政府，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路線之鐵路，及南昌、杭州、南寧、瀾州

各路線之鐵路建築權，許與日本。

第六款 在福建省內籌辦鐵路、礦山及整理海口（解在內）如雷外國資本之時，先向日本國

協議。

第七款 中國政府允許日本在中國有佈教之權。（照錄中國外交文獻 譯者。）

這二十一條要求，是要中國完全服從日本統制的總領。利用歐洲的軍事在這個時期達到了極度的

尖銳，所以，歐洲列強對於遠東的事務談不到任何干涉，利用美國這個時期正在忙於對交戰雙

方進行其大財供應，日本帝國主義為定力求實現自己征服中國的計劃。二十一條要求，分處于五

上階級和平及階級合作的道路。然而，早在世界大戰以前，「友愛會」就在工人的壓迫下，不得不在某種情況下去領導經濟的罷工了。一九一八年，「友愛會」成了羣衆組織，有了三萬會員，在全國有一百二十個分會。

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在各種的工業部門中創立了許多新的救濟會。創設了團體企業救濟工人聯合會，小石川卷工廠的工人聯合會。以後還創立了機械工人總工會聯合會，運輸工人和交通工人的聯合會，及其他等等。

一九一九年，日本出現了罷工運動的巨大高潮。罷工運動取重工業運動的性質。工人們不僅提出了經濟的要求，而且提出了政治的要求。礦山、造船廠中的工人與在棉織工廠中的工人們在日本最初獲得八小時的工作日。

工人運動的高潮，很快就引來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活躍。

一九二〇年，日本創立了「社會主義同盟」。在這個同盟中聯合了許多社會主義的團體。社會主義同盟中，努力加強了社會主義的組織建設和去，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的聯絡，通過他們也加強了和工人羣衆的聯絡。

「社會主義同盟」以鼓動工人運動的加次派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在政治階級的陣營中引起了極

上階級和平及階級合作的道路。然而，早在世界大戰以前，「友愛會」就在工人的壓迫下，不得不在某種情況下去領導經濟的罷工了。一九一八年，「友愛會」成了羣衆組織，有了三萬會員，在全國有一百二十個分會。

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在各種的工業部門中創立了許多新的救濟會。創設了團體企業和工人聯合會，小石川卷工廠的工人聯合會以後還創立了機械工人總工會聯合會，還擁護工人和交通工人的聯合會，及其他等等。

一九一九年，日本出現了罷工運動的巨大高潮。罷工運動取重工業運動的性質。工人們不僅提出了經濟的要求，而且提出了政治的要求。礦山、造船廠中的工人和在日本最複雜的工廠中工作的工人們，八小時的工作日。

工人運動的高潮，很快就引來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活躍。

一九二〇年，日本創立了「社會主義同盟」。在這個同盟中聯合了許多社會主義的團體。社會主義同盟中，努力加強了社會主義的領導階級和去，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的聯絡，通過他們也加強了和工人羣衆的聯絡。

→ 來發動和以強工人運動的加次派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在政治階級的陣營中引起了

世界大戰，在資本帝國主義的發展中，開闢了這樣的新地帶。日本要出賣資本的國家。由日本投在中國的去萬萬元債額中，有七萬一千萬元是在世界大戰的時期投去的。在這個時期，日本借給中國所剩的三萬餘借款，這筆借款事實上是用來收買中國軍閥的。

中國的第二劫區是軍閥，滿洲和內蒙給它受到日本膨脹方面來的最大的影響。日本在滿洲和內蒙的投資，是建築活動的發展，後有達到很大規模，主要是跟於建築動工廠，或鋼鐵廠，所謂的中日合辦的紡織企業，因為日本在中國中東路內的投入大批資本額的投資，日本到不能不進行這種投資。日本在滿洲的最低限度而進行的，日本到守滿洲和華北的原料資源，在中國其餘的部分，其限於把抽回來的自己，的滿洲獨佔的銷售市場。

日本在華南的獨佔的銷售市場，在英國引起巨大的不滿。日本知道得很清楚，在世界大戰還在繼續的時候，沒有理由會抽美國方面來的重大的壓迫，因為這種種原故，日本政府比較冷靜地反應到美國因為日本在華南的獨佔的銷售市場。

然而，日本卻依然認為，必須除去美國對於日本在華北的企圖的懷疑。以這種目的，日本政府於一九二七年，藉口祝賀美國參加反對德國的戰爭為理由，派遣了特使石井菊次郎子爵到美國去。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在華盛頓簽訂了美國對滿洲的權利和石井子爵之間的，關於滿洲問題約

專門協定。依照這個協定，美國承認了日本在中國的一部分有一「特殊」利益；是和日本租借地關係的部分。因為日本在中國租借地是在南滿，這個協定承認了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因為這德原故，日本人把牠劃歸了，甚至把這個協定據做日本外交的最大勝利。然而同時，在協定中竭力指出了，美英和美國承認中國在內已領土上所有任何一部分都有領土的主權，承認中國的領土完整。甚至看義務「保護」中國的領土完整。華盛頓協定的主要意義，確是要這樣來解釋。

然而這種情況，日本人却故意地沒有加以考慮，在日本人看來，僅僅這個協定的第一條才是重要的。

當世界大戰結束了，決定了協約國得完全勝利的時候，這些戰勝者之間開始了長期的和複雜的、關於如何瓜分勝利果的談判。

雖然日本直接參加戰爭是異常小的，日本在和平會議上的要求却是過份大的。日本真正把自己算做協助滿鐵締結了德意兩主義的國家。在凡爾賽的會議上，日本的代表要求：日本不能「忘掉」在分配德國的遺產的時候，領取自己應完全份額。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弗爵牧野伸顯出席凡爾賽會議。在聲明日本要求承認日本在山東及太平洋德領以前領有地長的權利。在「四人會議」上，兩度提出了這種要求。日本的代表接到了東京

來的訓令：在沒有滿足這些要求以前，不簽訂和平條約。

中國出席凡爾賽和平會議的代表，堅決反對這種要求。中國代表願帶聲明：一九一五年日本對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是用武力強迫中華民國接受的，所以，這種條約應當無效。中國代表的抗議，得到朝鮮民族主義者的擁護，朝鮮的這些民族主義者是到凡爾賽來送特別的請願書的，在這種請願書中說到：日本人在朝鮮所建立的野蠻制度，促成了朝鮮人民的退化。

用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名義發表一聲明：凡爾賽會議應當注意朝鮮的命運。這時候，日本人對大會提出最後通牒，如某朝鮮的請願書受到討論的話，那末日本就完全退出會議，不簽訂和平條約。因為會議的指導者對於朝鮮的人民是毫不關心的，所以朝鮮的請願書就被「束之高閣」了。

中國的抗議，僅從美國的代表方面得到「精神上的」支持。

在克列孟梭、勞合·喬治和威爾遜所組成的「三人會議」中，決定接受日本關於太平洋上的羣島及以前德國在山東的權利的要求，這在凡爾賽和約第一五六條至一五八條中得到了表現。根據美國的要求，對於所接受的日本的要求，作了唯一的修正，這是關於雅浦島的若干保留條件。美國人要求：禁止日本在這個以前屬於德國的、位在太平洋羣島中的、靠近菲律賓的小島上設防及把牠變做海軍根據地。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協約國的「最高會議」最後批准了德國殖民地的分配，委任日本代管

由赤道向北的以前德國在太平洋上的羣島。這樣看來，日本帝國主義取得牠所要求的東西。

因爲凡爾賽會議拒絕討論「二十一條要求」的問題的連帶關係，中國拒絕簽訂凡爾賽條約。

第九章 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日本

世界大戰各年間，使日本的工業和商業達到了巨大的增長，使日本的統治階級達到了空前的發財，同時，這些年間却是日本廣大的勞動者羣衆極度貧窮化的年代。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〇年的年初，日本所遇到的投機性的工業興旺，是完全建基在國外市場的好景況上的。

然而這種興旺却是在極不安定的基礎上發生出來的。日本本國的勞動條件，在世界大戰的各年間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惡化了。和軍事時期的物價騰貴不可避免地聯繫着的物價高漲，痛苦地打擊了日本的居民，首先是痛苦地打擊了工人們。世界大戰的各年間，工資的提高，遠不及零售物價的增長。這種差額，在大戰最後的年間——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是尤其大的。一九一七年，工資（以一九〇〇年的水準作爲一〇〇）是一八一，物價已經達到了一九六。一九二八年，工資是二〇三，物價是二七九。事實上的差額還要更大，因爲日常必需品價格的騰貴，比工業商品的漲價是更加有力的。投機，尤其是米穀買賣中的投機，達到了巨大的規模。

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艱苦的物質狀況，在大戰末了的時期，使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達到

了日本空前的規模。在日本的工業中心，發生了許許多多的同盟罷工。一九二六年，全日本記錄了罷工，總共是四〇八次，參加者的總數是八千四百人。一九一七年，罷工的數目已經有七十九次，罷工者的數目是五萬七千人。一九一八年，罷工更趨增加多了；罷工的數目加到了四十七次，參加者的人數加到了六萬六千人。

以前是經濟性質的罷工，很快就染得了政治的色彩。一九一八年秋明間的罷工的風潮已經是和黨有力的，雖然也是自然發生的革命運動直接聯繫着的。這種革命運動，在日本是以「米穀暴動」的特殊形態燃起了的。

這一切可能檢查、警察的難關，關於俄國勝利了革命的火樣的消息，沿着各種孔道流入了日本。引起了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作出了重新創造社會主義革命的細胞的企圖。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在日本社會主義者（大多數都是東京和橫濱的大學生和知識階級）的祕密大會上，通過了上述的決議案。

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的聯繫中，東京的社會主義團體，對俄國革命表示自己的同情，及對極致送熱烈的戰鬥的歡迎。……俄國社會主義黨的任務，而且也是一切國家社會主義黨的任務，是要把這種革命任務到社會主義的勝利。我們信賴俄國社會主義黨的鬥爭，希望俄國的革命會引到社會主義

革命的完全勝利。

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對於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繼續向前發展，有着巨大的

影響。

俄國革命在日本的直接感應，這是一九一八年八月，日本全國以巨大的力量展開的所謂的「米穀暴動」。

「米穀暴動」是勞動者自發發生的行動，在這種暴動裏面，結紮着農民的農業運動和城市工人反對資本家的運動。米穀投機者人工地造成的米價高漲，是這種行動的直接原因。在富山縣的一個小村中，漁夫們的妻子起來搶起米穀的倉庫，要求降低米價及把米穀無代價地散給貧困的窮人。地方上的政權不能容許這種行動，召集警察和軍隊來武裝保護私有財產。軍隊和羣衆之間發生了衝突，這惹起了羣衆更大的激怒。參加行動者的人數，如同雪球一樣地增加起來了，這項運動很快就由小村推到了全國。到處都得到勞動者的同情，運動迅速地就擴張到鄰近的各區。「米穀暴動」參加者的總數，最後達到了一千零八。運動幾乎包括日本全國三分之二的領土。暴動者的行動，幾乎到處都採取了一律的方式。採取米穀的倉庫，把米穀給貧困的窮人，破壞特別可惡的富人和投機者的房屋，從警察分署，以及警察署這次運動中曾經發動了軍隊和警察。開始了真正的內戰。城市中的工人們，在和農民採

取一致行動的標榜下，組織了同盟罷工。城市中的窮人們，狂熱地歡迎了暴動的農人和工人，和他們結合起來了。

在日本的大工業中心，尤其是在大阪，發生了許許多多革命的行動。統治階級十分困難地才用武力把暴動鎮壓下去了。懲罰暴動者是異常殘酷的。許許多多的人都被殺死了和被打傷了，許多人沒有經過審判就被槍斃了。在壓潰了暴動以後，還逮捕了許多人，幾乎全國到處都有許多人成羣地被關進了死刑。根據日本官廳的、大吹大擂不了的統計資料，被檢舉的人在七千以上。然而大部分暴動者，沒有經過審判就受到了嚴酷的刑罰。

「米穀暴動」註定了自己最後失敗的特殊性：這是運動沒有統一的組織力量——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這也就致令在農業鬥爭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農村中的暴動、和城市居民、尤其是工人們的暴動、兩者之間沒有組織上的接觸。全國工業中心的同盟罷工，和農民及城市中的貧民革命行動之間的聯絡，不過是在鬥爭的過程裡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的。運動帶有自發的、沒有組織的性質。日本這個時期所有的不多的社會主義的細胞，就自己的構成說來是知識階級的。他們和工農業界很少聯絡，沒有力量領導鬥爭。這預先決定了這波廣大的羣衆運動的失敗。

然而，「米穀暴動」的意義卻依然是極偉大的。

「米穀暴動」指出了：階級階級達到了極端系統化。資本家和地主們的軍事「搜捕」的幸運，是建立在極端階級的基礎上的。他們指出了：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在世界各國帶來的偉大革命的確在俄國，也震動日本統治了。共產國際的綱領編方指出了：一九一八年日本的「米穀暴動」及這個時期的同盟罷工的鬥爭，是對於世界各國所特有的戰後革命的浪潮的表現。沒有組織的失業、和糧食、軍隊、憲兵隊武裝鬥爭的教訓，創造了以後勞動者革命「普遍運動」的前提。在「米穀暴動」以後經過了二十二年三三的轉換，日本創立了工人和農人之間的緊密組織，在這些組織中的「社會主義的奮鬥」落到了更先進階的基礎上，因為一九一八年八月的戰鬥，明明明白地指出了統治日本的整個制度的本質。

「米穀暴動」對於日本工人和農人運動繼續的新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九一八年，日本的工人運動中有了巨大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在工人階級廣大的職工組織的創立和空前中實現出來的。

早在一九一二年，在發達和資本家的直接參加下，曾經創立了「托夫武的工人組織」——「友愛會」。「友愛會」的領袖，是一位資產階級的律師，自命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鈴木文治。執行資本家的任務，在「友愛會」創設的時候，大資本家發揮了顯著的作用。鈴木文治努力把工人們引

上階級和平及階級合作的道路。然而，早在世界大戰以前，「友愛會」就在工人的壓迫下，不得不在某種情況下去領導經濟的罷工了。一九一八年，「友愛會」成了羣衆組織，有了三萬會員，在全國有一百二十個分會。

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在各種的工業部門中創立了許多新的救濟會。創設了團體企業救濟工人聯合會，小石川卷工廠的工人聯合會。以後還創立了機械工人總工會聯合會，運輸工人和交通工人的聯合會，及其他等等。

一九一九年，日本出現了罷工運動的巨大高潮。罷工運動取重工業運動的性質。工人們不僅提出了經濟的要求，而且提出了政治的要求。礦山、造船廠中的工人與在基本建設部門中的工人們在日本最初獲得八小時的工作日。

工人運動的高潮，很快就引來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活躍。

一九二〇年，日本創立了「社會主義同盟」。在這個同盟中聯合了許多社會主義的團體。社會主義同盟中，努力加強了社會主義的組織建設和去，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的聯絡，通過他們也加強了和工人羣衆的聯絡。

「社會主義同盟」以強工人運動的擴大為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基礎，在政治階級的陣營中引起了變

停。資產階級加緊逼迫政府，開放那種緩和軍事的革命情緒的合法的通風口，重新實行「自由主義的方針」，「資產階級」——地主的議會政黨，聲明國內有相當擴大民主主義原則的必要，宣佈排斥寺內正毅將軍的軍人——官僚政府。在可怕的政治形勢的壓迫下，反動的支配者的團體，不得不同意暫時改組。寺內正毅的政府，在壓迫了「米穀暴動」以後，立刻就辭職了，成立了以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的與烈代表、律師原毅為首腦的自由黨的政府。在日本歷史中，第一次任命了「自由職業」者的擔任首相。

在軍事的壓迫下，原毅政府實行了改良。首先是擴大了選舉權。一九一九年五月，議員選舉的財產資格降低了，一年繳納直接稅三元的日本公民——男子就有選舉權。一九一九年秋季，原毅政府對於日本在朝鮮的殖民政府，實行了「反軍事化」：「取消了朝鮮總督只有現役將軍才能擔任的規定。這種改良，是上述的刺激影響的結果：這是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朝鮮人民反對不堪忍受的日本的壓迫而爆發的羣衆暴動的事實，在日本所惹起的刺激。把朝鮮的暴動放在血泊中沉沒了以後，日本的資產階級，決定使用給予朝鮮封建——資產階級上層份子某些空虛權利的辦法，企圖分散朝鮮的民族解放運動。（這些權利使是在日本的總督下由朝鮮人組織諮問機關，在朝鮮形式上取消純軍人的、所謂的「指揮刀」的制度。）

一九一八年在反動的寺內正毅政府時代開始的對蘇聯遠東區域的干涉，惹起了日本廣大羣衆極大的

不備。

俄國剛剛簽訂了明神諭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就決定：利用年青的蘇維埃國家力量薄弱的時機，儘早實現自己奪取俄國遠東方面土地的很早的計劃。

一九一八年二月廿一和廿二日，日本政府就正式建議俄國：「立即恢復西伯利亞的秩序。同時，日本駐倫敦的大使館就在新聞：爲着和蘇維埃鬥爭，日本的軍隊派到俄國的領土上去的可能的行動，同盟國對於這事將來採取如何的態度。早在三月廿五號，日本的首相就在「政府」關於日本預備干涉俄國的風聲，然而，三月三十一日，日本和中國之顧就已經簽訂了這樣協定：共同軍事「合作」反對蘇維埃共和國。日本要求這個協定，是爲着把滿洲正式變成日本展開干涉蘇俄的軍事根據地，因爲在「二十一條要求」的基礎上締結中朝和日本之間的條約還有餘。所以，中國政府不容抗撤地就接受了日本的這種提議，「參加了」反蘇維埃的共同活動。

日本準備發動，通常都是假手挑戰的行動做工具的。

一九一八年四月四日，海參崴在不可思議的情況下，殺死了服務於石田商號的日本人，這個商號裏還有兩個歐亞訂者。第二天，不等特調查，日本駐海參崴的總領事，就請求日本艦隊的指揮官「設法保護在俄國遠東區的日本人的利益。」四月五日，日本的陸戰隊就在海參崴登陸，在海參崴的街上

張貼了下述的佈告

「我，日本艦隊的指揮官，對於俄國現在的情況懷有深刻的同情，希望立即撲滅內亂者及美好好地實現革命。因為這種原故，到現時以絕對避免干涉俄國內政行動。然而，因為這種情形深深地感到驚愕：現在，繼續進行的政治爭論成了更加尖銳的，結果不免發生混亂……我不能不關切住在城中的日本帝國和友邦的臣民的生命財產。值得拘謹的，是現在城中白雲發生了殺傷日本人的事件，使我不得不設法負責保護日本帝國臣民的生命財產，所以，日本不得不派遣我所統率的艦隊的陸戰隊登陸，採取認爲適當的辦法

「英國、法國、日本、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們，沒有宣戰就開始了軍事干涉。雖然這種干涉是對俄國作戰，然而這却是一種卑劣的類型的戰爭。秘密地、用竊盜的方式，掩護這些「文明的」強盜，把自己向軍隊派到了俄國的領土上。」（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二二七頁）

日本的陸戰隊，以後也有英國的陸戰隊，在海參崴登陸的事實，列甫和斯達林把牠正確地估計爲干涉已經開始的信號。

四月七日，海參崴的同志們接到了列甫和斯達林簽名的電報：「我們認爲形勢是非常嚴重的，並且以最決斷的形式預先警告同志。你們自己不要幻想，日本人的確會進攻。這是不可避免的。德約國

全無例外地都會幫助他們。因此不要稍有延遲，應當立即開始準備起來。認真地準備起來，發所有的力量準備起來。

一九一八年夏季，日本政府盡了全力，以求由英國、法國及美國方面，獲得對蘇俄干涉的「承認」。必須指出來：美國政府，因為日本陸戰隊在俄國的領土上登陸的事實，及日本準備派大軍到俄國去的消息，即刻就異常不安。美國政府決定參加干涉。這裏是有着兩重理由：一方面，美國政府反對參加較殺無產階級的革命及享受戰勝俄國工人和農人的成果，但另一方面，在這裏干涉的這種恐怖却起了不小的作用：美帝國主義的最危險的競爭者——日本也許能夠對俄國而在亞洲大陸上真正地鞏固起來，也許會成爲對美國比以前更大的威脅。

六月十日，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按下述的條件「批准了」日本對俄國的干涉：（一）不干涉俄國的內政；（二）尊重俄國領土的不可侵犯性；（三）把自己的軍隊派向國防法約可以達到這樣的目的，使他們有去對抗德國武力的可能性。

這一切「條件」日本都是完全「承認的」。因爲任何的條件，一般說來總是不預備遵守的。根據美國人的要求，日本在特別的照會中再度無恥地聲明了：日本政府「希望和俄國建立鞏固的友誼」，「保證自己」承認「尊重俄國領土完整的政策」。

日本人漸漸地把自己的兵方聚集到了蘇維埃的領土上，日本軍隊的總數，最後達到了十五萬人。

日本反對蘇俄的工人和農人所進行的主要軍事動作，是利明泊倫軍來實行了。日本反對白衛軍給付了金錢和軍火。強盜、匪徒、殺人犯、一羣賊黨的頭目「謝米諾夫」得到了最大的聲名，他是由每人手中玩弄的傀儡。這個匪黨的活動是這樣令人憤慨的：帝國主義列強也不得不對日本人指出：謝米諾夫所表現的獸性不能忍受。以後，在華盛頓會議上，日本的外交官儘量努力避免和謝米諾夫發生關係。謝米諾夫僅在某個時期支持了謝米諾夫。

以後，日本人更利用了這些白衛黨：卡爾米科夫、末爾庫洛夫兄弟及其他等人。日本的代理人、白衛軍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世特爾堡的貴族維爾拉明姆，他特別引導日本人到了蒙古。把外蒙古（現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哈爾濱的救護活動，而是一九二二在開始的，就很快就被蘇聯紅軍和蒙古國民革命軍的聯合力量肅清了。

日本人雖然費了極大的氣力，却沒有達到在蘇維埃的邊境鞏固其邊境。由蘇聯革命軍隊方面來的抵抗，及由當遊擊隊方面來的抵抗，是這樣有破壞力的：外國帝國主義（英國、法國和日本的）的一切傀儡，都接連連地遭到了撲滅。如同以後所闡明的，日本軍隊的司令部，懼怕日本的正規軍隊和紅軍的部隊直接衝突。直到最後的時期，日本人都努力把白衛軍派上前線，武裝並積極地支持他們。當

...

白衛軍被遷遷至的時候，顯出了這等的前途。其在國爭的初期階段，日本軍隊和抵抗的經營部隊，顯露在兩端，地愈著越正面的衝突。日素本隊開始變為起來了，走得很快或是開始撤退。這能够用下述的

原因來說明：(1) 和証多日本軍隊，(2) 以總表現的命運顯露的標誌。本氣都領著，(3) 且充一部軍隊

；最初隨在沿海處，可以從調到深海處。甚至調回日本。因食認爲他們傳播軍用部卒應有的義務。

；(4) 列電指出了帝國主義者們于波羅海失散的原因。波羅海。王英國海軍艦隊，(5) 在俄國海軍去

上，(6) 戰艦與日本艦隊不相衝突；(7) 這三個原因，(8) 爲在俄國海軍中，(9) 如果不足於俄國艦隊的(10) 艦隊，(11) 則只

要稍稍加以(12) 勞務，(13) 是充分的。如果我們能够操抗這種攻擊，(14) 是俄國海軍中，(15) 的(16) 艦隊，(17) 這

種(18) 艦隊，(19) 和(20) 日本也在開始艦隊(21) 艦隊。一列(22) 艦隊，(23) 艦隊。二(24) 艦隊，(25) 艦隊。

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在蘇聯與朝鮮半島駐紮。而(26) 艦隊。一(27) 艦隊。二(28) 艦隊。三(29) 艦隊。四(30) 艦隊。五(31) 艦隊。六(32) 艦隊。七(33) 艦隊。八(34) 艦隊。九(35) 艦隊。十(36) 艦隊。十一(37) 艦隊。十二(38) 艦隊。十三(39) 艦隊。十四(40) 艦隊。十五(41) 艦隊。十六(42) 艦隊。十七(43) 艦隊。十八(44) 艦隊。十九(45) 艦隊。二十(46) 艦隊。二十一(47) 艦隊。二十二(48) 艦隊。二十三(49) 艦隊。二十四(50) 艦隊。二十五(51) 艦隊。二十六(52) 艦隊。二十七(53) 艦隊。二十八(54) 艦隊。二十九(55) 艦隊。三十(56) 艦隊。三十一(57) 艦隊。三十二(58) 艦隊。三十三(59) 艦隊。三十四(60) 艦隊。三十五(61) 艦隊。三十六(62) 艦隊。三十七(63) 艦隊。三十八(64) 艦隊。三十九(65) 艦隊。四十(66) 艦隊。四十一(67) 艦隊。四十二(68) 艦隊。四十三(69) 艦隊。四十四(70) 艦隊。四十五(71) 艦隊。四十六(72) 艦隊。四十七(73) 艦隊。四十八(74) 艦隊。四十九(75) 艦隊。五十(76) 艦隊。五十一(77) 艦隊。五十二(78) 艦隊。五十三(79) 艦隊。五十四(80) 艦隊。五十五(81) 艦隊。五十六(82) 艦隊。五十七(83) 艦隊。五十八(84) 艦隊。五十九(85) 艦隊。六十(86) 艦隊。六十一(87) 艦隊。六十二(88) 艦隊。六十三(89) 艦隊。六十四(90) 艦隊。六十五(91) 艦隊。六十六(92) 艦隊。六十七(93) 艦隊。六十八(94) 艦隊。六十九(95) 艦隊。七十(96) 艦隊。七十一(97) 艦隊。七十二(98) 艦隊。七十三(99) 艦隊。七十四(100) 艦隊。七十五(101) 艦隊。七十六(102) 艦隊。七十七(103) 艦隊。七十八(104) 艦隊。七十九(105) 艦隊。八十(106) 艦隊。八十一(107) 艦隊。八十二(108) 艦隊。八十三(109) 艦隊。八十四(110) 艦隊。八十五(111) 艦隊。八十六(112) 艦隊。八十七(113) 艦隊。八十八(114) 艦隊。八十九(115) 艦隊。九十(116) 艦隊。九十一(117) 艦隊。九十二(118) 艦隊。九十三(119) 艦隊。九十四(120) 艦隊。九十五(121) 艦隊。九十六(122) 艦隊。九十七(123) 艦隊。九十八(124) 艦隊。九十九(125) 艦隊。一百(126) 艦隊。

日本海軍海軍，在這種危險的境況中，(127) 艦隊。一(128) 艦隊。二(129) 艦隊。三(130) 艦隊。四(131) 艦隊。五(132) 艦隊。六(133) 艦隊。七(134) 艦隊。八(135) 艦隊。九(136) 艦隊。十(137) 艦隊。十一(138) 艦隊。十二(139) 艦隊。十三(140) 艦隊。十四(141) 艦隊。十五(142) 艦隊。十六(143) 艦隊。十七(144) 艦隊。十八(145) 艦隊。十九(146) 艦隊。二十(147) 艦隊。二十一(148) 艦隊。二十二(149) 艦隊。二十三(150) 艦隊。二十四(151) 艦隊。二十五(152) 艦隊。二十六(153) 艦隊。二十七(154) 艦隊。二十八(155) 艦隊。二十九(156) 艦隊。三十(157) 艦隊。三十一(158) 艦隊。三十二(159) 艦隊。三十三(160) 艦隊。三十四(161) 艦隊。三十五(162) 艦隊。三十六(163) 艦隊。三十七(164) 艦隊。三十八(165) 艦隊。三十九(166) 艦隊。四十(167) 艦隊。四十一(168) 艦隊。四十二(169) 艦隊。四十三(170) 艦隊。四十四(171) 艦隊。四十五(172) 艦隊。四十六(173) 艦隊。四十七(174) 艦隊。四十八(175) 艦隊。四十九(176) 艦隊。五十(177) 艦隊。五十一(178) 艦隊。五十二(179) 艦隊。五十三(180) 艦隊。五十四(181) 艦隊。五十五(182) 艦隊。五十六(183) 艦隊。五十七(184) 艦隊。五十八(185) 艦隊。五十九(186) 艦隊。六十(187) 艦隊。六十一(188) 艦隊。六十二(189) 艦隊。六十三(190) 艦隊。六十四(191) 艦隊。六十五(192) 艦隊。六十六(193) 艦隊。六十七(194) 艦隊。六十八(195) 艦隊。六十九(196) 艦隊。七十(197) 艦隊。七十一(198) 艦隊。七十二(199) 艦隊。七十三(200) 艦隊。七十四(201) 艦隊。七十五(202) 艦隊。七十六(203) 艦隊。七十七(204) 艦隊。七十八(205) 艦隊。七十九(206) 艦隊。八十(207) 艦隊。八十一(208) 艦隊。八十二(209) 艦隊。八十三(210) 艦隊。八十四(211) 艦隊。八十五(212) 艦隊。八十六(213) 艦隊。八十七(214) 艦隊。八十八(215) 艦隊。八十九(216) 艦隊。九十(217) 艦隊。九十一(218) 艦隊。九十二(219) 艦隊。九十三(220) 艦隊。九十四(221) 艦隊。九十五(222) 艦隊。九十六(223) 艦隊。九十七(224) 艦隊。九十八(225) 艦隊。九十九(226) 艦隊。一百(227) 艦隊。

列甯，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第八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俄羅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黨團上說過：「西東、堪察加和一部分西伯利亞，現在事實上是在日本的佔領下，因為牠的軍力在這些地方支配着，如同你們所知道的，因為這種情況不得不創立緩衝的國家——遠東共和國，因為我們清清楚楚地知道：西伯利亞的農民，由日本帝國主義遭到了如何令人難信的不幸，日本人在西伯利亞演出了如何多的沒有聽到的殘暴行爲。」然而，在這些最壞的我們却依然不能和日本作戰，並且應當完全做到這種事情，不僅企圖遠東和日本的戰爭，而且，如果可能的話，還要避免陷入這種戰爭，因為就明顯的條件說來，我們現在是無力進行這種戰爭的。」（列甯全集，二十六卷，六六頁。）

以革命的利益的觀點看來，那時（一九二〇年）是完全不希望捲入和日本的戰爭中的。然而，蘇維埃政權却不準備承認日本人佔領蘇維埃的領土，必須延長時間，以求取得治癒自己的創傷的可能性，來聚集力量，以後就據日本人由蘇維埃的土地上驅逐出去。根據這種理由，就不不得不創立緩衝國家，這個國家應當預防發生日本和蘇俄之間的直接衝突。且日本人同意創立緩衝國家，這遠東共和國的建議。日本帝國主義依然懷着這種希望：在布爾塞維主義改變了，發生內部的崩潰。這時，緩衝國家，就會成爲日本佔領土很便利的掩護。

自一九二〇年在大連開始了日本和遠東共和國之間的談判，一九二一年又在長春進行這種談判。

在這些談判的時候，日本人提出了這樣的請求：就這種請求的無恥性說來，只有一九一五年對中國所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才能相等。日本帝國主義者搶劫性質的要求，遭到了遠東共和國政府方面堅決的反抗，這個政府的首腦是共產主義者，他們後面是跟着蘇俄政府。

到了這個時期，消極地反映着日本計劃的兩個新因素，以很大的力量在起作用。這些因素是：(一)日本國內對於干涉的不滿（維持佔領軍的巨額費用，日本士兵「傳染了布爾塞維主義」及其他等等）；(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加強了對日本的壓迫。正是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美國政府提議召集華盛頓會議，在這個會議上來規定海軍軍備的基準及調整列強和中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從最初，就在華盛頓會議的議事日程中，包括了討論「西伯利亞問題」。

日本帝國主義，陷入了極困難的地位。燃惡干涉的氣氛，包圍了布蘇維埃遠東的日本軍隊；以砲火的圍剿包圍着蘇俄的內戰戰線，漸漸地肅清了對日本這一切外造成了這樣的前途：日本人「佔領者」不可避免地會由蘇維埃的土地上被驅逐出去。日本資產階級希望蘇維埃政權迅速的破滅，也毫無顧慮地被否定了。日本本國革命情緒的增長，極嚴重地壓迫了日本軍人。

日本國內對於干涉西伯利亞的不滿，一天比一天成了更加有力的，包括了居民的各種階層。甚至那些安於殘酷剝奪蘇俄遠東資源的日本工業家，也理解到：日本人要想保持佔領着的蘇維埃領土，

已經沒有了任何的希望。日本的財源陷入了悲慘的狀態。干涉的費用，根據大概的計算，達到了七萬萬元以上。

同時，除這以外，自然，日本人在華盛頓會議上，也不能通過從蘇俄的領土上維持這樣大的佔領軍。

因為這種原故，在華盛頓會議上，通過根據日本公使的請求，日本軍隊由西伯利亞撤退的「情報」的決議案以前，日本的佔領軍已經開始漸漸地撤退了。

末了，一九三二年十月至十五日，海參崴被紅軍奪取了。在日本人的手中，僅僅留有薩哈連島的北半部。直到一九二五年，日本軍隊才由這裏撤退。一九三〇年三月，在軍艦「阿摩羅」的襲擊時，以後，日本所展開的尖銳經濟恐慌的重者後果，對於日本政府最後決定由俄國撤出軍隊的舉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這種恐慌是世界大戰的「一項直接的結果，這是和上述的懷有過當關係的：戰爭的結束，暴露出來了因爲戰爭而顯顯子的生產和大地減低了的需要之間極大的不平衡。戰爭的結果，絕大多數的農民都異常地貧窮了，他們的購買力也太大地降低了。

日本海出口額也大大地縮小了。日本的老鑛業者——在第二列的是海關人，向到了遠東的市場上，消滅了日本工業在這些市場上的獨佔地位。

從一九二〇年春起，各種產業公司的股票，開始了猛烈的下落。銀行接二連三地破產，企業接二連三地倒閉。盛產大地地產了，失業大大地增加了。

大規模的獨佔聯合體三井、三菱、大倉、淺野、古川康探恩，利用恐慌，來奪取和吞併許多被恐慌壓潰了的中小公司和銀行。

國內艱苦的經濟狀況，不能削弱日本在華盛頓會議上的地位。

在華盛頓會議的討論繼續中，從日本方面爆發的狼狽，日本依然根據十一條要求，『拒絕對支配中國之華盛頓會議，提出其取消遠東中國的要求的問題。日本人不能拒絕討論滿洲問題。嚴格的結果，美帝國主義異常強盛了。在世界大戰最後結束的階段，美國參加了作戰，美國在這次大戰中，賺得了巨額的貨幣，在他們的戰爭者談話有了決定的力量。在華盛頓會議上，日本帝國主義陷於事實上的孤立，甚至日本的同盟國——英國——也都斷然出師反對日本對中國經濟的要求。』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在華盛頓會議上所簽訂的，觸犯了日本的利益的一項重要文獻，這是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和日本之海軍限制條約（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簽字）。這個條約的第四條，規定了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和意大利戰鬥艦的總噸位的比例：中

• B. S. L. 條約的這個項目，不僅對於締結這個條約的時候有價值，而且對於將來也有價值。在這個條約中指出了：在締約的時期列強所有的六切戰鬥艦，牠們能够保存，但在將來的時候，退出艦隊的戰鬥艦，只有適合這個條約的此例子能實行補充代替。這在將來的時候，就對英國和美國的比率說來，確定了日本帝國主義一定形式的不平等。

關於中國的五國公約，惹起了日本方面極大的不滿。九國公約的參加者，除中國外是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日本、比利時、荷蘭和葡萄牙。九國公約的第一條說過：

「除中國外，其餘的締約國都同意：

(一) 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及領土和行政的不可侵犯性。

(二) 給予中國極充分的和毫不壓制的發展的可能性，並維持一個有生活能力的和鞏固的政府。

(三) 利用自己的勢力，以便實際建立和維持各國在中國全部領土上經營工業和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

(四) 抑制利用在中國現存的情況，來獲取那種能够損害友邦臣民的權利的特權和優先權，或支持那種敵意地危害友邦的活動。

九國公約的這一條中所有的四款，都是傾向反對日本的這種「理論」的。日本在中國有特殊的利益。『確定第一條所規定的第一條，禁止締結破壞第一條的規定的條約。這樣看來，根據第二十七條要求』所締結的中日條約，破壞上述一切原則，宣告以後完全無效。

日本不得不特別承認：他放棄『第二十三條要求』。他立即開始由山東撤兵，他放棄繼續干涉西伯利亞。在自己對希爾維維克主義十分極惡的狀態下，華盛頓會議的指導者，却要求日本確實規定預備由西伯利亞及沿海省撤兵的期限。日本人不得不聲明：他們立即着手撤兵，不過要遵照一定的次序。

華盛頓會議，是太平洋國際關係發展中極重要的階段。

世界大戰時期異常強盛了的美帝國主義，暫時限制了自己很早以來的競爭者——日本的殖民地影響。美國的資產階級，完全不能容許日本對中國獨佔支配的強迫要求。

美國方面壓迫的結果，日本在華盛頓會議上成爲事實上孤立的。英國沒有對日本給予任何的支助。這是太平洋上帝國主義矛盾尖銳化的直接結果。

英日同盟的廢止，是華盛頓會議的重大結果。在會議上，關於這事沒有正式提出討論，但美國的代表，却造成了會議前有成績的工作，使英國人廢止了與日本同盟的條約。自然，這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是極大的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政策的削弱，也反映了牠伴隨革命運動確實的高潮而來的內部

的轉變。

在一九二二年五月間，禁止了「社會主義同盟」以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領導作用，暫時移轉到了「曉民會」的手中。這個團體起初是在早稻田大學創立的，主要是聯合黨報編輯。然而，不久就在「曉民會」的釋放中，加入了個別的最近進的工人代表。「曉民會」在和那些與工人運動分離了的無政府主義勞動組合運動者對峙中，站在正確的立場上，同時出面反對職工會中央的「日本勞動總同盟」和改良主義的勞動家。一九二二年八月，「曉民會」改組為「曉民共產黨」，他是日本共產黨的先驅者。

日本第一個共產主義團體——位最前進的和最積極的活動家，這是日本無產階級優秀代表，就職業說來是全屬工人的渡邊政之輔。渡邊企圖把宣傳者共產主義團體的活動工人組織成極其聯繫起來。並轉上對國家的煽動。一九二二年，日本共產主義者通過了這樣的決議：和國際共產主義中央機關——共產國際建立聯繫。克服了警察的阻礙了日本共產主義者的代表團秘密地來到了社會主義的莫斯科。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正式創立了日本共產黨。

不少壯健的黨黨了於必須表現日本工人運動的黨勞動黨勞動組合主義的團體的聯繫中，展開了從大海上一作。在日本的工人會運動中應當有勞動的。一方面是非政府主義者，另一方面是改良主義者。這兩派都

企圖把日本勞動者同盟變成純粹經濟的組織，不讓出任何重大的政治任務。山田說他拒絕了這種弱的共產黨，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的鬥爭。就其困難的，是共產黨在每個地區都派了代表，現了各種機會主義的份子。加進行的警察對工人運動的嚴密監視，是共產黨鬥爭的重點。日本的警察，首先是把白色恐怖的重加在日本共產主義者和有組織的工人身上。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日本發生了極大的地震。這次地震幾乎毀滅了東京和橫濱。這次地震中被當局利用做在日本各地實行警察恐怖藉口。好像這次地震是敵對朝鮮人的暴動。煽動地組織起來的。在東京，組織了對朝鮮人的傳教，同時進行了對革命運動活動者的極殘酷的制裁。無政府主義者的領袖大杉榮及其全家都被殺死了。殺他的凶手，經軍事法庭宣告有罪，得到了「赦免」。在反動軍人中間獲得「愛國者」的榮譽。曾經殺死以平澤——礦工——為首的共產黨的十個活動份子。

一九二三年以後，共產黨必須完全進行極秘密的工作。活動的偶然加入的或短期地讓留在黨內份子，趕快就和共產主義者分離了，共產黨人數就減了更少的，但清除了黨內的份子。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却依然繼續地保留有機會主義者，尤其是山川均。他在革命組織破壞以後，起來宣傳必須取消共產黨，代替共產黨而創立合法的，就實質說來是改良主義的廣泛的政黨。山川均利用黨的削弱，通過了把黨「自動解散」的決議。（因為這種原因，日本的取消主義，得到了山川主義的名稱。）從一九

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日本共產黨形式上沒有了，雖然共產主義的工人們依然繼續進行了革命鬥爭，一九二六年的年底，在共產國際的援助下，正式恢復了共產黨。

一九二三年的地震，伴來了大量的人口犧牲（大約死了十萬人），使日本工業關係中一個最發展的區域，遭到了極大的荒涼（東京—橫濱，在關東的名稱下著名的）工業區。在這個區域中，破壞了百分之七十的工業企業。根據日本的估計，因一九二三年地震而來的物質損失的總數，達到了日本國富總額的百分之七。

統治階級努力把恢復破壞了的經濟的一切重担，都轉嫁到勞動者大眾的肩上。這在大眾中間引起了巨大的不滿。警察對革命份子的鎮壓，更加擴大了這種不滿。

地禍以後，日本重新揚起了爭取擴大選舉權的運動。統治階級中眼光最遠大的代表者，知導專用暴力和恐怖三項方法，很難抑止這種羣衆運動。根據日本資產階級一位眼光最遠大的代表，後藤新平的倡議，（他暫時擔任了內務大臣的官職），創立了這樣的委員會：沿着使議會「靈活」的路線，來編製改革的草案，創立有陪審官的法院，組織地方自治。這種編製的草案，也擴大了男子的選舉權。

在後藤委員會工作最緊張的時候，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因為企圖謀殺攝政親王（代德惠精神病的大正天皇管理國政的），引起了內閣總辭職。委派反動主義者、老官僚清浦奎吾組織新的閣

，他立即拒絕他的先行者所計劃的一切改良。清浦奎吾沒有能力處理嚴重的政治局勢，造成了害怕民衆運動的資產階級方面的激怒。一九二四年五月，爲着議會的選舉，組成了「憲政會」和「政友會」的布洛克，他們是傾向反對清浦奎吾政府的。清浦奎吾政府成了孤立的，他們辭職了。新政府的首相加藤高明（憲政會的領袖），一九二五年三月通過了新的選舉法，所謂的（普選權）的法律。（這項法律的實施，曾經延期了三年，根據這項法律的第一次選舉，一九二八年才實行了。）同時通過了日本採用陪審裁判制的法律，以後又通過了擴大府縣議會的權力的法律。這些改良，當然是希望把增大的少壯的工人運動，引上合法的軌道前進，當然也是援助改良主義的份子誘騙無產階級放棄革命鬥爭的方法。同時，爲着壓制真正的革命份子及削弱資產主義者的影響，一九二五年同一年，通過了很著名的所謂的「危險思想」法。

一九二五年的選舉法，是離開「普選性」很遠的，雖然資產階級的刊物把牠作爲最新的民主主義褒揚了。和以前一樣，依然保留着很高的年齡的資格，（二十五歲才享有選舉權，三十歲才享有被選舉權。）和以前一樣，婦女依然沒有選舉權。沒有一定的住所的人，一切服軍役的人，預備兵和學生，都完全被褫奪了選舉權。每個候選人應當有兩千元的高額擔保的條文，也依然發生效力。是「危險思想」法，（一九二八年，這項法律被田中義一將軍的政府修改得更加「強化」了。）是

反動的警察法制繼續向前的發展。傾向反對革命運動。這項法律以嚴厲的懲罰威脅着共產黨黨員。在這項法律中，特別竭力指出了：反對日本君主政體及激進財產制度的鬥爭的犯罪性。」

在加藤政府的時候，建立了日本和蘇聯的外交關係。

不僅是日本的勞動者大眾，而且日本資產階級中很大的階層，都希望蘇聯建立和蘇聯的征實關係。此外，日本的統治階層，看到和蘇聯建立這樣的關係，就能够克服那種在華盛頓會議以後所發生的、日本在國際舞臺上所陷入的孤立狀態。到這時候，蘇聯政府已經被絕大多數大資本主義國家（包括英國和法國）所承認了。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在莫斯科簽訂了恢復兩國間的外交關係的日蘇條約。

條約本文及和牠同時簽訂的補充的備忘錄，規定在雙方國家一九〇五年對英締結的條件。日本軍隊由北極哈連撤退，蘇聯政府給予日本在極東經濟上的利權。

在加藤政府的時候，日本在中國遭到了很大的困難，中國發生了大規模的革命變遷。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開始了在日本紡織品會社（「內外棉織會社」）中工作的中國紅旗隊大規模的罷工。中國工人抗議日本管理員虐待工人，用婦女和兒童代替被開除的男工。罷工很快就擴大到了日本在上海的全體主要企業中，包括了四十萬紅旗隊。日本的廠主們，因為害怕大規模的運動，實行了

一些罷工，尤其允許取消對工人帶罰的制度。然而，一九二五年四月，不僅在上海區域重新爆發了罷工，而且在青島也爆發了罷工。

日本帝國主義者，決定用武力來鎮壓罷工。許多地方，罷工的工人都遭到了掃射。爲着報復這事，上海的工人和學生，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了盛大的示威運動。外國巡捕掃射了示威者，有些人被打死了或受了傷。這在全中國激起了人民大眾的憤怒。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事變，奠下了中國盛大的反帝國主義革命運動的基礎。

日本帝國主義在自已反對中國革命民衆的鬥爭中，和直接採用武力的同時，即刻就建立了活動的特別機關，利用中國的反動勢力：封建領主、軍閥及其部分反革命的官辦資產階級。依藉日本，親日的軍閥——滿洲的張作霖和山東的張宗昌，企圖撲滅中國最重要的革命策源地，把華北的北平——天津區（張作霖）和上海（張宗昌）奪到了自己的手中。

然而中國大眾反帝國主義運動，却繼續不斷地成長了和發展了。在中國許多地點，都擴大了反日的絕交運動。

因爲這種原故，在日本資產階級極力戰鬥的團體中間，增大了對於在「憲政黨」內閣中沒有更替過的日本外務大臣所謂的「幣原外交」的不滿。幣原喜登郎關於中國的方針，是儘可能地避免日本方面

赤裸裸的武裝干涉，限於積極支持中國某個軍閥團體，來保障日本帝國主義膨脹的利益。幣原喜重郎認為：在中國革命高潮的環境中及在華盛頓會議以後對日本所造成的一般不順利的國際形勢下，實行赤裸裸的暴力政策是異常危險的；用『友誼的』姿式，『準備』同意表示最大限度的融洽和適應環境，這是十分合理的。

但日本帝國主義的某些團體，對於幣原的這種政策是不滿意的，要求恢復對中國『積極的』政策。換句話說，就是對中國改取干涉的政策。『政友會』是這些團體的政治機關，就對憲政會所加藤高明政府及以後的若槻禮次郎政府的關係說來，是站在敵對的立場上。

一九二五年，政友會邀請著名的軍閥田中義一將軍（西伯利亞干涉時期的陸軍大臣，）担任黨的領袖，他牽閣下『政友會』和反動的軍人——官僚團體早就存在的聯絡。

一九二六年的年底，嘉仁天皇（即大正天皇）死了，他的兒子裕仁親王登了皇位，裕仁天皇治世的年間，取得了昭和的年號。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間，日本的工業中有過一度短期的繁榮。這主要是一九二三年地盤以爲計劃的大規模恢復工作所形成的，這指出了日本不能够恢復『繁榮』的『黃金』年代——世界大戰時期——的幻覺。日本工業外表所增加的指數，證明日本作爲大工業業國家繼續發展了。

斯達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了：到了一九二六年的時候，日本的工業和商業超過了戰前的水準，除美國外，「趕過了」其他帝國主義的大國。

然而，一九二六年的年底，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就表現出來了日本工業中嚴重蕭條的標誌，這是國內市場更加縮小（日本農民更加貧窮化）和出口的困難（中國反日絕交的強化、因為日本工廠陳舊的設備而來的日本工業出品相當高的成本）所造成的。

一九二七年，多數日本工業企業，都以百分之二十五的運轉不足率而工作了。重工業，都廣泛地依賴着政府的這種援助：種種補助金和政府擔保的銀行借款。

工業本身的流動資金不夠，引來了信用——放款業務非正常的大大的發展。這惹起了銀行方面的投機，許多銀行決算極緊張的狀態，存款失去了保障。存款者方面對銀行信心的降低，惹起了扶量提取存款，更加有力地傳播了最近規模破產的恐慌的風聲。

一九二七年開始了所謂的「金融恐慌」。若槻禮次郎政府，企圖用國庫基金來維持陷在恐慌的威脅下的台灣銀行。多數大貴族所組成的樞密院，他早就不滿意過度「自由主義的」憲政會內閣（主要動機是因為對中國的政策「軟弱」。）利用這種方便的藉口，使若槻禮次郎政府陷入了困難的地位。

樞密院拒絕批准政府關於「救助」台灣銀行的提議。這事的結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憲政會的若槻內閣實行辭職。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憲政會」和地主團體「政友本黨」合併了，改名「民政黨」。

政友會的領袖——田中義一將軍組成了新政府。田中義一政府憑藉政友會和軍人，代表着日本獨佔資本和地主極反動的團體的利益。

在一九二七年金融恐慌以後，引來了十幾個大銀行和多數地方銀行的破產，日本的資產階級，爲着由所造成的總危機的威脅下找尋出路，實行了資本主義的產業「合理化」。

日本的資本家們轉來進攻無產階級，降低日本工人本來就不高的生活水準，企業家縮減了工資，用採取自動工作機的方法擴大了工人的勞動強度，開除了熟練工人，用低報酬的工人和黨工來代替他們。

爲着力求提高日本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日本的資產階級，努力把日本無產階級的生活水準，引到殖民地奴隸的生活水準。

目的是要緩和日本農村的緊張狀況，田中義一政府編製了補助「安定的」農場的法案，是企圖擴大日本帝國主義國內的社會基礎。這種企圖的反動性，因上述的情形更加強化了；在日本的條

件中的，富農和小地主對乎毫無區別，廣泛地應用前資本主義的方式來榨取勞動者農民。

和資本家對工人實行經濟的壓迫同時，反動的田中義一政府，用鎮壓的手段破壞了工人和農人的革命組織。

這些組織，大多數都是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猛烈爭取普選權的時期——出現的。一九二五年的年底，在通過一九三五種大男子選舉權的法律的聯繫中，工人和農人組織中間就揚起了創立工人聯合法政黨的運動，這個政黨要能够脫離老的議會政黨而獨立地參加當前的選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作出了創立日本第一個工人農政黨的企圖，左派職工會組織「評議會」，招負了關於這種問題的發起責任。在這個新政黨成立的那天，警察當局把牠禁止了。一九二六年六月，因為某些工人職工會組織和農民聯合會（「日本農民組合」）的共同努力，創立成功了「勞動農民黨」。因為黨的領導機關中左派和右派職工會中央（「日本勞動總同盟」）的代表之間意見的大不一致。結果，右派退出了黨的組織，創立了另一個政黨，這個政黨叫做「社會大眾黨」。左派所領導的政黨——「勞動農民黨」，把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有覺悟的代表們，吸收到了自己的行列中。處在極端秘密活動中的日本共產黨，對於「勞動農民黨」顯出了很大的影響，通過這個政黨，維持了那些和這個政黨有聯絡的廣大勞動者羣衆的經常聯繫。

一九二六年的年底，被取消派解散了的「日本共產黨」，重新恢復起來了。一九二七年，日本共產黨克服了早已行列中的左傾，宗派主義的危險傾向，牠的代表者是福本和夫。福本和夫和他的擁護者，企圖使黨脫離羣衆，要求黨採取敵視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宗派主義的立場。

在共產國際的積極援助下，（一九二七年所作成的論綱，明明白白地規定了日本共產黨的任務，）福本和夫的「左派」機會主義，也和原則的擁護者的右派機會主義的立場一樣，都被日本共產黨暴露出來了。

從一九二七年的年底起，日本共產黨成了深入羣衆的，創立了許多工廠支部，把前進的工人和農夫廣泛地吸入了黨的行列中。在職工會、農民聯合會及勞動農民黨的某些團體中，都組織了共產黨的黨團。

一九二八年，共產黨出版了不合法的、黨的中央機關報——「紅旗」。

一九二八年，進行了根據擴大選舉法的第一次議會選舉。全體合法的工人政黨，都提出了自己的黨員候選人。在選舉中，勞動農民黨在共產黨的支持下，取得了極多的選舉票，當選了好幾個議員。日本共產黨，利用選舉，由極秘密的活動下，把自己的口號和綱領告訴了廣大的羣衆。這在統治階級中間引起了極大的驚恐。

田中義一將軍的政府，趕快用殘暴工人運動中革命份的手段來加以破壞。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日本全國實行了大批逮捕和共產黨有聯繫的嫌疑的人。被捕者的總數在一千人以上。四月十日，警察封閉了並破壞了「勞動農民黨」、「左派職工會的中央」、「評議會」(他的全名是「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及「無產青年同盟」。同時，某些農民聯合會、很多的左翼文化團體和學生聯合會，也都被逮捕了很大的鎖鏈。

一九二八年十月七日，日本共產黨傑出的領導者波邊政之輔，在臺灣被警察殺死了。一九二九年三月五日，法西斯主義的殺人犯，用刺刀屠殺了根據勞動農民黨的名單選出的工人議員——山本宣治。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田中義一政府再度大批逮捕革命工人。大約逮捕了三百名同情共產黨的人。

田中義一政府這種殘暴壓迫的內政方針，是和他的政策——干涉的外交政策完全適應的。

一九二七年，田中義一對天皇呈上了一份很長的奏議，在這件奏議中，詳細地證明了必須趕快實行日本在亞洲的侵略計劃。

在田中義一的奏議中指出：日本不能被本國所有的地理範圍所限制。日本應當實現當今君主政體的創始者明治天皇的「偉大遺訓」，建立東亞的指導權。爲着這種目的，日本首先應當在滿洲和蒙

「建立自己的支配權。這種奏議中則一章這樣地號召道：『滿洲和蒙古，這不是中國的領土。』」

然而奪得滿洲和蒙古，應當僅是作爲繼續向前侵略的階段，保障征服中國的必要前提。

『爲着征服中國，——在這件奏議中說道，——我們應當從征服滿洲和蒙古開始。爲着征服世界，我們應當從征服中國開始。如果我們能够征服中國，亞洲其餘的國家和南洋各國就會畏懼我們並對我們降服。那時全世界就會了解：東亞是我們的，不敢破壞我們的權利。明治天皇遺命交給我們的這個計劃，他的成功，對於我們國家的存在有着極重大的意義。』

田中義一的奏議，宣傳進攻蘇聯。「如是我們展望日本的將來，——田中義一指出了，——那末我們就應當承認：在北滿的原野上有和俄國發生戰爭的不可避免性。……滿洲和蒙古，牠們是還完全沒有發展的東方國家。我們遲早會在這和蘇俄發生戰爭。」發展了必須在滿洲建築軍略鐵路的意見，並特別詳細地研究了經濟開展滿洲和蒙古的問題，田中義一將軍的奏議極力表明了這種見解：如果日本不能把蘇聯由太平洋岸驅逐出去，那末任何重大的成功，日本都是不能實現的。

「在我們國家成長的綱領中，顯而易見的，必須加入重新用我們的劍在蒙古的地盤上把俄國剷除掉，目的是要佔有北滿的富源。當這種隱患沒有解除的時候，我們的船艦就不能迅速地向前推進。」

在田中義一的奏議中，包含了對這事的直接指示：在日本繼續向前的侵略計劃中，不僅包括了現

在仍係中國構成部分的內蒙古，而且也包括了蒙古人民共和國（所謂的外蒙古。）

「最後，內蒙古和外蒙古會完全落入我們的手中。因為關於主權的問題，這些地方是不十分明白確定的，而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却都在進行別種事情，所以我們就能够安然擴大我們的勢力。當大部分土地落入了我們手中的時候，就不會發生蒙古是屬於日本人或蒙古人的爭論了。憑藉我們的軍事實量，我們能够實現我們積極政策。」

田中義一的奏議，起了日本軍人關於這事的宣言的作用：要求在亞洲及世界其他的部分，立即改取所謂的「積極」政策，即是進攻的政策

獲得了政權，反動的田中義一政府立即着手實行其已的侵略綱領。一九二七年春季，田中義一（這時他兼任首相和外務大臣）公佈了自己對日本外交官的訓令，說到他應當被這種原則所指導：承認「日本在滿洲和蒙古東部享有特殊的利益。」這是日本傾向修改華盛頓條約的規定的第一個外交上的舉措。

南京政府的軍隊向北進攻，成了日本對中國開始新干涉的理由。以日本在川東省的僑民受到了「生命安全」的危險作為藉口，田中義一於一九二七年五月把日本軍隊派到了濟南，他們在短期內就佔領了全省最重要的軍路地點。日本的外交權術，得到中國政府承認適合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要求」

精神的許許多多可恥的要求（放棄滿洲和蒙古的主權及其他，）田中義一政府的強盜政策，在中國惹起了巨大的激憤。中國人宣佈了廣泛地拒用日貨的運動，就日本資本家的利益說來是受了極大的打擊的。田中義一的政策，在日本本國也惹起了極大的不滿。佔領山東也惹起了列強的不滿。因為這些不滿的連帶關係，日本軍隊由山東撤退了。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軍隊第一次佔領山東的企圖，也以失敗來結束了。

田中義一提出了使滿洲在經濟關係中完全隸屬日本資本的任務（首先是南滿鐵路會社。）統治滿洲的軍閥張作霖，很早以來，就是和日本人有聯絡的，也是享有日本人的扶持的。漸漸地起來反抗日本的強迫要求，害怕日本資本家、首先是南滿鐵路會社，會剝奪他的收入的絕大部分。因為這種原故，張作霖甚至去請求美國顧問和英國顧問的協助。顯而易見的，是預備遷徙日本帝國主義的競爭者的支持，來背數自己以前的主人。田中義一決定除掉張作霖。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在張作霖的專車進過日本衛兵守護的橋樑的時候，對準拋擲了炸彈。爆炸的結果，張作霖因傷致死了，不願再服從日本入的滿洲統治者張作霖，被日本人過份的不名譽的謀死，在日本本國惹起了巨大的興奮。田中義一用種種方法，企圖由自己身上免除阻礙這次謀殺的責任，但在這種事實中，要想否定日本的罪惡却是不可能的。

因爲干涉中國沒有好的結果，也因爲謀殺張作霖，田中義一的名譽遭到了極大的損害。對田中義一的「積極」政策增大的不滿，惹起了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政府的辭職。田中義一辭職以後經過幾個月星期就死去了，對這位軍事冒險家的「怒吼的」激憤的攻擊才結束了。

民政黨的領袖濱口雄幸政府獲得了政權。這個政府重新實行了迂迴的外交政策，來掩護日本對中國的進攻。濱口內閣，撞着了日本的主要敵人——英國和美國方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新的強化。一九三〇年在倫敦召集的重新限制海軍軍備的會議，不僅沒有改善日本的位置，反而更加惡化了華盛頓會議上加給牠的精神上所失敗。根據這個會議的決議，對於戰鬥艦的五—五—三的比率，又補充了對於巡洋艦的這樣的比率：十—十—七。日本在英國和美國共同進攻的壓迫下，不得不同意這種規定。

日本軍人因爲倫敦海軍會議的結果而異常憤慨。整黨的海軍將官都示威般的實行辭職（加藤寬治、末次信正等人）。雖然那時的陸軍大臣宇垣一成，藉軍備的現代化實行裁減陸軍，及在國民學校中實施軍事教育，日本軍人中間却開始了反對宇垣的猛烈的運動。種種法西斯主義的和反動的「愛國主義的團體和俱樂部，如同呼菌一樣成長起來了，牠們正是把所謂的一可恥的」倫敦協定，作爲自己煽動反對政府的出發點。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日本首相濱口雄幸，在東京車站遭到了法西斯主義的恐怖主義者方面來

的聲譽，這些恐怖主義者決定替簽訂倫敦海軍協定「復仇。」濠口雄幸受了重傷，治愈了，他在一個相當的時期恢復了政治活動，但經過幾個月以後，就因為受傷的結果而死去了。

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內代理了總理大臣的職務，然而，當判明了濠口雄幸沒有能力恢復工作的時候，若槻禮次郎當選了民政黨的總裁，他於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組織了新政府（第二次若槻內閣。）

第十章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新階段

一九二九年的年底，爆發了世界經濟恐慌，在日本表現了特別大的力量。對於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所特有的農業恐慌和工業恐慌的綜合化，在日本獲得了特別銳利的形態，因為日本農村中有着的半封建關係，使恐慌的出現成了更加特別尖銳的。日本窄狹的國內市場，無產階級有限的半殖民地的生活水準，農民主要大衆更加低的生活水準，註定了經濟恐慌在日本有着尤其嚴重的形態。日本帝國主義，無論什麼時候都是處在對國外市場的特別依存性中。因為這種原故，國外市場上世界物價的低落，日本出口額從一九二九年底開始的太大的縮減（尤其是輸出到美國去的生絲的出口額，）對日本的全部經濟顯出了破滅性的影響。

一九二九年的年底，日本發現了許許多多中、小銀行破產的事故。一九三〇年，恐慌在日本工業和對外貿易中達到了巨大的力量。極多數的中、小工業企業，陷入了尤其艱苦的狀況。根據日本統計學家的資料，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間，有一萬以上的中、小企業破產了和倒閉了。失業者的總數，在恐慌最惡點的時候達到了三百萬人。一九三〇年的年底，農業恐慌異常尖銳化了。農業恐慌在日

本有着特別尖銳的形態，因爲在恐慌爆發以前，農民主要大眾的狀況就是異常艱苦的。米價跌落了百分之五十，絲價跌落了百分之七十。這致令那些陷於飢餓生活的農民，爲着不喪失自己極小的耕區及繳納地租、各種捐稅和債務的利息，只好去吃真正的草根和野菜等東西了。日本平常把農民的女兒賣給娼戶的事件，獲得了普遍的性質。

勞動者大眾的狀況成了異常艱苦的，階級矛盾，無論在城市中或鄉村中都銳化到了這樣的程度：有了轉上直接革命衝突的危險。統治階級唯恐階級的矛盾，也是極端尖銳化的。

不僅農民的主要大眾因爲恐慌陷入了艱苦的狀況，而且有一部分農村中的上層份子——中，小地主和富農，也也因爲深入的恐慌而陷入了艱苦的狀況，因爲他們沒有力量對他們繳納租費。這些地主和富農，表示了自己的不滿，竭力指出了：雖然資本家也因恐慌而受了損害，但不像「農民」那樣自然，他們所讚的「農民」這不過是說自己和自己的私有的利益，而不是說真正農民大眾的利益。

這些情緒，在各種法西斯主義的團體的綱領和要求中，得到了自己的表現，在這些團體中，也包括着軍人——法西斯主義的團體在內，地主和富農份子起了顯著的作用。「救濟農村」成了法西斯主義團體中主要的口號，在這下面，是暗示救濟地主和富農。

法西斯主義的情緒，在所謂的「少壯軍官」中間是尤其有力的，就他們的社會出身說來，接近農村

中的上層份子

這些「少壯軍官」，他們的領導者是荒木貞夫，曾經聲明：「農村受到了損害，」農村的苦難影響了士兵的情緒，因此軍官們不能容忍這種狀況，「不得不」出面反對政府，這個政府是由議會政黨的代表所組成的，在和金融康探應當地聯繫的。法西主義者和法西主義的軍人們的這種「反資本主義」的宣傳，自然沒有妨礙日本金融資本最反動的集團爲着自己的利益來利用這些法西主義者。

荒木貞夫將軍所領導的「少壯軍官」，積極地出面反對和議會的政黨，聯繫的政府，反對議會及這些政黨，反對資本主義社會個別的代表者。他們視「少壯軍官」認爲是軍人，法西主義集團的冒險主義政策的反對者。甚至在日本軍隊自身中，有一部分將官和老軍官，他們是和金融資本及康探恩更密切地聯絡着的，例如中條實重及他的團長，也遭到了「少壯軍官」方面很深的敵意。

在要求國內清除「民政黨」政府的「自由主義」方針的同時，法西主義的軍人們要求更「剛毅的」外交政策，據此說，就是展開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及武力進攻蘇聯。法西主義的軍人們，把戰爭看做是逃出恐慌的出路，同時也存在着這種的可能性：把軍人的作用，提高到日本國家命運最高決定者的地位。

日本法西主義軍人們冒險主義的進攻的政策，得到了金融資本最反動的份子的擁護，他們在這種

戰爭中，看出了在軍事併吞上，或在直接擁護被日本進攻的國家上，有着獲利的可能性。

由民政黨的代表們所組成的若槻禮次郎政府，反映着更穩健的資產階級的見解，認為公開的軍事侵略的冒險主義政策是不合時宜的，因此遭到了法西斯主義的軍人方面來的不斷的攻擊，也遭到了反動的金融資本集團方面來的強有力的壓迫。情形銳化到了這樣的程度：政府事實上喪失了監督軍人的力量，軍人們比以前的任何時期，都更加獨立地開始行動起來了。

日本的軍人們，執行日本金融資本最反動的份子的意志，決定開始和中國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看到歐洲列強和美國都完全忙於和經濟恐慌有聯繫的自己的內務，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企圖壓迫保護力量薄弱的中國使中國隸屬自己，在中國建立支配的地位。不對中國宣戰，無恥地利用自己所製造的『地方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者『偷偷地把軍隊調到滿洲。日本軍隊完全佔領了滿洲，替自己準備了佔領華北和進攻蘇聯的有利的陣地。』（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二八八頁。）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隊開始作戰，一九三二年春季完全佔領了滿洲。日本對中國開始了的戰爭及佔領滿洲，由太平洋上日本的資本主義敵人方面，幾乎沒有惹起任何的抗議。

美國陷在極殘酷的經濟恐慌的鐵的壓榨機下，整個地都在忙於設法解除自己內部的困難。

因為這種原故，美國政府限於對日本作外交上的表示，宣布不承認日本人在中國領土上用暴力所侵害的「權利」(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史汀生的照會)。

美國政府不僅沒有抗議，而且事實上的掩蔽的方式支持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

在開始佔領滿洲以後不久，不適合新的干涉主義的方針的若槻內閣，在軍人的壓迫下不得不辭職。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政友會的大總裁政府代替了若槻內閣。大總裁政府的陸軍大臣，就是在任命法西主義的荒木貞夫將軍來組任。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軍隊在滿洲區域開始了軍事活動。一月十八日日本人在上海挑釁了這次的「事變」，導演了一齣中國人襲擊日本僑民的「戲劇」。一月二十七日，日本對中國當局提出了最後通牒，一月二十八日就開始了軍事行動。

出於日本人意外的，是在上海遭到了中國正規軍——十九路軍方面斷然的和堅決的抵抗，十九路軍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主要是閩北的工人)。

日本軍隊遭到了巨大的損失，(在軍事開始以後不過經過一個多月，)才在上海克服了十九路軍英勇的抵抗。在上海的戰鬥中，日本軍隊損失了六千死者和傷者。

美國調停的結果，一九三二年五月間，日本軍隊由上海完全撤退了。

在滿洲的戰爭，更加展開了反動的——民族主義的激刺和團體的活動。法西斯主義的軍人，努力散播這些組織的對立的氣氛；照「少壯軍官們」的意見看來，他們是站在軍人們的道路上障礙，妨害了把全部政權都移到軍人的手中；他們攻擊的對象是議會、議會的政黨，甚至是大憲政政府，在軍人們看來，大憲政政府是屬於「自由主義的」，因為牠和議會的政黨——政友會有關。

戰爭開始時大資本家帶來了巨額的利潤，同時，地主和富農狀況，在不停止的農業恐慌的聯繫中，却依然是艱苦的。這種種差起了一少壯軍官們的不滿，加強了他們「反資本主義的」宣傳。不久以後軍人——法西斯主義的團體，就對「資本家個別代表者的關係疏遠，轉上了恐怖主義的行動。

一九三二年二月九日，刺死了著名的銀行家、前任的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過了一個月，三月五日，又刺死了最大的康採煤三井會社的理事長國孫權男爵。這些恐怖主義的行動，在日本資產階級的上層引起了極大的驚愕。不久就發生了所謂的「一九三二年的「五卅事變」。「五月十五日，陸軍和海軍的少壯軍官的團體，刺死了首相犬養毅，實行了許多謀刺日本政府其他領袖的企圖，襲擊了政府黨——政友會的中央委員會的會所，襲擊了朝日新聞的編輯部，散佈了許多傳單，是要藉此引起「社會注意」。日本陷入了不幸的狀況。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軍人——法西斯主義恐怖行動的參加者，交給了法院處

與此

大修改憲條供招待，在陸軍大臣荒木貞夫擔任師團長的時侯，他們就和荒木貞夫商議過這種精
得被賭網供出了。在賭網不樂定則除打「能幼孱弱的機會主義內閣」的一切代表者以後，應當創設以
荒木貞夫將軍為首腦的軍人政府。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事變的結果，日本成立了海軍大將齋藤實的新內閣。海軍大將齋藤實的政
府，是在一方面站著日本主要的政黨階級，地主團體的頭腦機關，另一方面站著軍人，兩階之間互相繼
步的結謀而產生的。齋藤實的政府，企圖被組織成爲「超越黨派的」，「因爲齋藤實不是任何一個議會政
黨而黨員。然而事實上，無論首腦齋藤實本人或他的次弟數閣員，都是與常接近兩綱黨階級的地主
的政黨。」「民政黨和救國會的。齋藤實本人接近民政黨團體，而政府中最重要的人物，吹噓大極端
稱是「御」即是救友論一位嚴格的領袖，他很早以來就因自己和銀行有密切的聯絡而著名。

日本新階級黨團間的時變，軍人表示了自己的力量，海軍大臣荒木貞夫和海軍大臣次納壽造，都聲
了自已的官位，然而照軍隊的慣例說來，他們辭職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爲暴動的參加者與現職軍人

在齋藤實政府的新的政策中，雖然齋藤實本人始終被認爲自由主義者，「却實行有極情地擴張

種革命、法西主義和反戰激動的方針。共產主義者、革命的職工會和農民聯合會的會員，遭到了尤其殘酷的迫害，日本共產黨，從日本在滿洲開戰的時候起，就進行了反戰的鬥爭，高高地舉起了自己的國際主義的旗幟，同時，日本的社會大衆黨却馬上就轉入了社會主義的旗幟，他擁護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社會大衆黨中的某些有勢力的團體，都直接轉入了法西主義的陣營，脫離「社會大衆黨」創立了日己的法西主義的政黨（例如赤松克廣等組織）。

然而，如果反對革命份子前鬥爭領域中，蕭耀賢政府做了法西主義軍人所要的一切，那末在經濟政策的範圍內，政府却沒有進行法西主義軍，所提出在何冒險主義的試驗。蕭耀賢，尤其大膽大臣，蕭耀賢，都儘可能不容許日本軍人干涉國家經濟的指揮權。

在對外政策的問題中，更明確地說來是在對外侵略的問題中，是徹底實行了軍人和日本帝國主義最好戰的份子們的路線。

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廿日，日本宣佈滿洲「獨立」，創立了新的「國家」——「滿洲國」。日本軍隊所佔領的滿洲，就實質說來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把全中國都變黑的，一九三一年推翻了滿清最後的皇帝溥儀，扶做了「獨立的」滿洲國的領袖。日本人起初宣佈他是滿洲的「執政」，從一九三四年起宣佈他是「滿洲帝國」的「皇帝」。

日本在滿洲的佔領軍，因為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所謂的「日滿協定書」的效力，變成了駐在滿洲的「友邦」的軍隊。

關東軍總司令成了事實上滿洲的獨裁者及一切軍政和民政的首腦，他同時取得日本駐「滿洲國」的特別全權「大使」的頭銜。經濟生活一切部門的管理權，都集中在關東軍參謀部的手中。這首先就決定了滿洲國組織和鞏固日本在滿洲的統治權的事件中，軍人佔有指導的地位。「滿洲國」的經濟建設的全部行程，是完全是適應着解決把滿洲的領土變成軍事準備地的任務。

日本軍隊佔領滿洲及以後宣佈「滿洲獨立」，成了國際聯盟各種審查委員會中長期討論的對象，中國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總在那裏以時侵略國的資格提起了控訴。

幾乎全世界的輿論都鮮明地叱責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行動。這在國際聯盟對於日本外交官發言的「辯護」採取否定的態度上表現出來了。日本外交官企圖指出挑戰者不是日本而是中國。日本不得不同意派遣國際聯盟的特別委員會到滿洲的地方去，他們完全權進行適當的調查並繼續報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在日内瓦成立了這個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加入了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意大利的代表，（雖然美國沒有參加國際聯盟，却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這個委員會的委員長是由英國人李頓爵士擔任。一九三二年春季，李頓調查團遊歷了日本滿洲和中國，在這以後編成了廣大的報告，一九三

二華十月，把這種報告提交了國際聯盟會議。

委員會證實了日本在滿洲進行戰略性實地特別指出了：強迫滿洲的領土由中國分割開來，那以中國在國際不平等地盤說日本的行動是十有九無的。

滿洲國政府速快派遺特命全權代表——松岡洋右到日内瓦去，他應當努力達到：使李頓調查團報告的基本立場完全被國際聯盟會議批准。松岡洋右在這種傾向中努力了，然而沒有得到成功。松岡洋右發表了對黃大權答復的聲明，就態度說來是挑戰的演說，對國際聯盟提出了最後通牒的要求：宣稱日本的侵略，否則日本就退出國際聯盟。因為這種威脅沒有發生效力，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發表了日本滿洲地退出國際聯盟會員國的宣言。

國際聯盟委員會頭承認日本是侵略者，然而對於被侵略者、國際聯盟會員國的中國，却沒有採取任何實際的步驟。

英國保守黨政府，堅決反對關於國際聯盟方面援助中國的任何切實的决定。

日本對內蒙古和華北繼續的侵略，迫使中國政府（他在這時候，還沒有力量對日本的侵略作負責的抵抗）走上了和日本獨立談判的道路。

一九三三年五月間，在塘沽簽訂了所謂的中日和平協定。在這個文件的本文中，日本強迫中

即政府事實承認日本在滿洲的戰利品，中國軍隊應當長城（把滿洲及膠濟古稱中國本論分際）來的（向華後遷三部五折英重。撤兵的地區，取得了「緩衝地帶」的名稱，而在事實上，牠變成了日本經常據險築壘之地，被利用儲備軍械，維持領土上的出發點，也被利用做無法無天般偷運的根據地！

把日本商賈送滿洲不納鹽稅就輸入中國。

滿洲的戰爭和滿洲政府所施行的通商政策的结果，使日本經濟有了相當的躍進，這種躍進有着軍事——通商膨脹的空氣的性質。這種活躍主要歸於軍事工業部門。

斯達林在第十七次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說明一九三三年主要資本主義各國工業相對繁盛的一切現象，都不過是軍事——通商膨脹的空氣，在這種關係中把日本除外，這是一種錯誤。」據此指出了軍事——通商膨脹的空氣一般「本質的作用」。斯達林同時更說到：「這關於日本尤其是正確的，在日本，這種人工的膨脹，是某些部門——主要是軍事工業部門——相當滿躍的重要的決定動力。」（列寧主義問題，第七版，五四二頁。）

通商膨脹及和通商膨脹的日元行市的跌落，促成了在國外市場上出口額十分重大的增加。極度榨取工人們，使日本資本家有了這樣的可能性：大大地減低生產的成本，把自己的商品在國外市場上按時的、傾銷的價格來出賣。這使日本的輸出業者有了這樣的可能性：日本的商品不僅侵入了中國的市

場，而且均侵入了英屬印度、荷屬印度、澳洲、非洲和南美洲。

日本的傾銷，惡化了日本和許多國家、尤其是和英國的相互關係。日本的商貨侵入那些認為是英國的獨佔市場。這惹起了英國方面對日本相當的敵意。

從一九三二年開始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攻擊，更加鮮明地帶有反蘇聯的性質。

一九三二年的年底，蘇聯政府對日本政府提議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但日本政府拒絕了。這種提議在以後又再度重新提出了，但依然沒有結果。

奪得了滿洲，因自己的成功及自己增大的政治勢力而陶醉的日本軍人們，已經公開地說過：必須在短時期內進攻蘇聯。

斯達林在第十七次黨大會的報告中（一九三四年年初），特別指出了日本好戰的軍人們所號召的關於蘇聯的行動，同時說過：「日本一部分軍人，在刊物上公開地宣傳必須和蘇聯作戰及佔領沿海省，得到了一部分軍人明白的贊成，而日本政府，却號召制我戰爭的煽動者，好像這種挑戰的行動是和牠沒有關係似的。」（列寧主義問題，五五二頁）

日本的軍人們在滿洲對於蘇聯所屬有的中東鐵路，組織了許許多多的挑戰，停止交通、沒收貨物、逮捕和毆打線路上蘇聯的工人和職員。（荒木貞夫發表了許許多多演說和小冊子，毫無例外地都

露骨地說，日本必須和蘇聯鬥爭。蘇聯本竭力指出了。在布爾維克主義依然存在的時候以前，日本無論在中國或在亞洲的任何角落，都不能有任何確定的收穫。

關於和蘇聯戰爭的問題，是正確地說來，是關於日本進攻蘇聯的日期的問題，在日本政府和統治階級的內部惹起了確實的不一致。當荒木貞夫及擁護他的法蘭主義的軍人們，直接提出必須立即發動反蘇聯的戰爭的時候，那末他們就由於日本資產階級更穩健的部分及他在政府中的代表者（高橋是清、齋藤實等人）方面，碰到了很大的抵抗。這些穩健份子認為：日本和這樣強盛的敵人進行「大戰」，是還準備不夠的；日本艱苦的財政「狀況」、農民的貧窮化及城市印幕村中等級矛盾的尖銳化，都不能許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就進攻蘇聯。

長期爭論的結果，採取了折中的路線。實施了準備進攻蘇聯的軍事方案，然而，却沒有採用好戰的份子所要達到的那種迅速的速度。

政府中的主要方針，是由大藏大臣高橋是清來決定。他在三井和安田康探恩中長年服務的時候，由大資產階級方面獲得很大的威望。高橋是清絕對不是平和主義者。反之，他本人就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擁護者。他承認軍事領袖的必要性。他不過表示：反對實現這種綱領的、對於日本經濟力不勝任的和過份的速度。這等於反對軍人們在國家經濟生活中起指導的作用，反對軍人們利用這種地位來壓制金

應百頭的自由海軍。

一九三三年一月，海軍省對日已益加失望，遂擬來海軍部處理日本海軍擴張政策。海軍省加在德索上，使德索與海軍省實行關係了。

一九三四年一月間，海軍省與陸軍省創立了退避的海軍大臣岡田。岡田與海軍省領袖岡田西，我義軍人極端嫌惡的份子，他較溫和的「帝國主義團體之間迂迴的齟齬政府的妥協方針，由軍人——法西主義係我方選選了不辭職的職。在濱木貞着退避政府以後更加厭棄了。和和收受賄賂的案例的聯繫中，海軍省與陸軍省都不得不辭職。

但海軍省與海軍大臣繼岡田的政府，全國繼續自己卷在軍的旋渦中，努力限制軍人。法西主義的團體慾望。比這比與辭任了更大的困難。

在辭職政治問題中，岡田與內閣，不得不辭法西主義軍人的強迫與強迫辭職。這種辭職與海軍省所作的進步更加大得多。

還在金藏資產階級的團體中，引起了極大的不安，他們不願把自己的全部權讓給軍人。根據這些金藏資產階級的要求，一九三三年年底，法西主義者與海軍的妥協政策的策動者高橋是清，重新任命了大藏大臣的官職。高橋是清加入政府，策動引起了內閣中一切政策的指導者的作用。

在俄戰而陸軍團體感壓迫下，岡田政府組織會議上，就海軍軍備問題，拒絕一九三三年華盛頓會議上所通過的以限制軍艦的比率。倫敦的談判破裂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政府通知廢止一九三三年的華盛頓海軍條約。

在岡田政府時代，關於中東鐵路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日本軍隊佔領了滿洲的全部領土，到了一九三三年中佔領了對蘇聯所屬的中東鐵路正線活動，已經造成不穩定受前艱苦滿洲鐵道中東鐵路，是極腐敗日本鐵道中的滿洲唯一鐵路幹線。日本軍人以關東軍指揮部出面，提出了自己擔任三葉中東鐵路發展日本和蘇聯之間經營與蘇聯的來源。日本人有系統地攪亂該鐵路正線，但本欲將地確據自蘇聯的後則，對於該路線上蘇聯的職員做出了無數的暴力的行為，明白張胆地煽動：則是蘇聯廢棄鐵路，或是進行武裝衝突。

蘇聯政府是採取這種政策，一九三三年對日本和滿洲國提出抗議出賣中東鐵路蘇聯的這次提議，攪亂了日本軍政府許諾，但日本政府規則不得不接受這種提議，然而關於出賣鐵路的事務正談判，或推到了日本政府方面顯明的怠工。

因為日本的罪過，談判延擱了一年半，且其價值在一九三五至三月間，若達到出賣中東鐵路的最後的同意。

然兩國在處理中東鐵路的問題，却沒有引來日——蘇關係的正常化。一九三五年，繼續發生了日本軍隊對蘇聯的邊境守備隊挑戰的攻擊。日本反動的刊物，繼續進行了反蘇聯的煽動，鼓動軍人們進行新的反蘇聯的冒險。

準備進攻蘇聯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繼續展開了更進一步的侵略。日本已經把中國看做是自己的殖民地，看做是第二個朝鮮。一九三四年四月間日本的外務省，極的首腦是接近法西斯主義者的廣田弘毅，叫自己的屬員大羽發表正式的聲明：中國的外交政策是經和日本一致，如果沒有經過日本同意，那末日本就不承認中國的任何第三國締結條約。

在一九三五年上半年的期間，日本帝國主義用自己製造挑撥的事變及跟着實行干涉的方法，在華北兩省——河北和察哈爾——獲得了事實上尚無治權。

一九三五年七月，日本軍隊的指揮部提出了組織華北五省——河北、察哈爾、綏遠、山東、山西——完全「獨立」的計劃。

同時，日本參謀總部編製了照「滿洲國」的樣式組織「蒙古國」的計劃，「蒙古國」預定以蒙古的封建領主德王為首腦。

此外，日本的軍人對政府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要須使中國更加服從日本的監督。這事的結果發生

一九三五年九月，在東京規定了所謂的「對華新政策」，是由下述各條所構成的：

「(一) 中日滿經濟和政治完全合作，包括南京承認滿洲國。

「(二) 滿洲和共產主義運動相爭，三國在華北共同行動。」(日本對軍隊加以監督及聘任日本

軍事顧問)

「(三) 在華中和華南肅清一切反日運動。」(日本監督中國的警察)。

「(四) 排除在「中國發生的及外方面獨動的皆切反日陰謀。」(日本監督前線的外交政策，要求

締結中日軍事同盟)

日本實行這種對中國的新政策，却遭到了美國方面相當的抵抗。日本帝國注重撤消着把美國由中國完全排斥出去。美國決定支持中國政府，相當地鞏固了中央的經濟陣地。

日本美國的財政顧問李滋羅斯派到中國，依據他的建設，中國用白銀國有化及把普遍的銀幣強制兌換紙幣的方法，實行了幣制的改革。實行這種改革，當時鞏固了中國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日本在這種改革的實現，無疑地打擊了日本在華北的計劃。

日本遭到了英國的干涉，也遭到了反日民族運動增大的嚴重的前兆(特別重要的徵候，是一九三五年

十一月十四日在蘇聯的發射。他是國民黨中親日派的領袖。日本參謀總部，當時擱置了預定實行監督

整個中國的「對華新政策」的具體方針。然而張學良雖進了第一領計劃，但曾漢賊華北五省官獨立的任務。

一九三五五月間，華北五省的主權，在日本當局的重迫下，不得已來到了北平，為着是莊嚴地宣佈「華北的獨立」。張學良在華北的日本軍隊的司令官田代隆一郎發表了犧牲性的聲明：「日本當局不容許有反對自治運動的軍事行動。」

曾漢賊華北一獨立其即及張學良中因這四個自治條件，在一個自治條件之外是不「莊重」的。這時，日軍決定開始在防備隊組織華北的自治運動。一九三五年的年底，日本對張學良入張家口，宣佈河北省東部第七十五縣政府「自治」，創立了「冀東反共自治委員會。」

利用張學良的發動中，日軍採取極端可憐的藉口，對張學良的兵助操縱在張家的格調，張學良成着開始新的張家口行動。同時，日軍外交士，即張學良的時期，日軍人放棄了華北各省對張學良中國的要求，為張學良他們在河北和察哈爾兩省自由活動，並且準備和南京尋求妥協。

河北和察哈爾兩省中，張學良所謂的「張家口自治委員會」，他形似在張家口自治委員會，在倫宋哲元將軍擔任張家口自治委員會委員長，在張家口自治委員會通過四日，就對日本在華北的特務機關長，北平原將軍加給了「在張家口自治委員會」。

這幾年來，一九三五年年底，日本就取得了這樣的可能性，事實上控制了河北和察哈爾，威脅着把這種統治權擴張到華北的其餘三省去，綏遠、山西和山東。

同時，日本軍人又在外蒙古的邊界開始製造國際糾紛，準備進攻外蒙古。

日本進攻外蒙古能够用兩項主要原因來說明：（一）準備和蘇聯的戰爭，日本軍人努力替自己創造儘可能更加廣大的作戰根據地，牠不僅包括着滿洲，而且也包括着蒙古；（二）在日本軍人所計劃的廣大侵略計劃中，替日本創造大規模的新殖民地，思想佔有顯着的地位，這個大殖民地取名「蒙古國」，牠一方面包括着由所謂的内蒙、綏遠的中國各省（察哈爾、綏遠），而且另一方面也包括着外蒙古。

一九三五年一月間，在滿洲國邊境發生了一次重大的事變，這次事變是日本軍人所煽動的。

在這以後，日滿軍隊常常越過外蒙古根據外蒙古的發展造成了緊張的狀況，爲着努力用和平方法調整經常發生的衝突，滿洲里，開了滿蒙特別會議，其會議的任務，是要和平處理國境的事變，消除關於邊境附近領土管理調整談判的原因，然而談判的過程中，蘇聯訂結在滿洲國一代表的身後，日本軍人，不是努力消除緊張衝突的原因，他們反而使這種衝突激化了，在滿洲里會議的第一次會期中，就顯明地可以看出來，日本軍人自己創造在蒙古領土上取得特權地位，滿洲里也的代表提

出了這些無窮的要求：允許日本軍事代表團自己到蒙古的領土上去，允許這些將校，建立由蒙古的首領和日本軍隊，在滿洲的參謀部所在地直接的電報聯絡，末了，在蒙古政府，滿洲里，政府之間交換正式代表以前，拒絕處理國境的糾紛。日本軍人所揭發的這些要求被拒絕了，因為外蒙古當然不能容許日本公開的間諜機關在自己的領土上存在；不同意法律上承認日本的傀儡「滿洲國」。對這事的報復，日滿當局發表了許多挑戰性質的聲明：他們要強迫蒙古人接受自己的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應用武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滿洲里車站上的談判最後破裂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日滿軍隊在喀爾喀區域，對蒙古的國境守備隊實行了新的武裝攻擊，這時日本方面應用了機關槍，並且有大批機械化的步兵參加作戰。

一九三六年的年初，日軍人繼續對蒙古的邊界進行了武裝的挑戰，在這種過程中，日本軍隊遭到了重大的打擊。

日本軍人傾力反對外蒙古省的侵佔計劃，使斯達林不得明確地預警日本帝國主義者：如果蒙古運到日本方面的攻擊，蘇聯就不能不關心他的命運。

斯達林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日和美下院記者羅恩·德羅爾特有名的談話中說過：

「若日本決定進攻蒙古，蘇聯將視其獨立的情形下，我們就會援助蒙古。李維諾夫的代表斯托羅拉

科夫關於此事，不久以前對日本駐莫斯科的大使羅明述指出：「從一九三二年以來，蘇聯扶助蒙古的友好關係沒有改變，我們現在也和一九二一年援助蒙古一樣，來對他加以援助。」

斯達林的警告，對和平事業顯用了巨大的作用，他阻止了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蒙古的企圖。

蘇聯的堅毅的政策，迫使日本政府由比較溫和的團體，儘可能抑制法西斯主義的軍人關於蘇聯的冒險提議。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事實上的首腦高橋是清發表了一種演說，在這篇演說中嚴厲地叱責了軍人中的冒險主義的份子。這篇演說暴露了日本資產階級的領導者，害怕走上反對蘇聯的「大戰」的冒險。

陸軍當局和海軍當局，——高橋是清說，——中應當謹慎地預先考慮一下我們國家所處的環境。在現在這種情況中，甚至報紙都不敢談，他們希望談論陸軍和海軍當局。事業團體也沒有力量自由地表示自己關於這種問題的意見。軍人們應當考慮到這種事實。如果在這種形勢之下，軍人們仍舊要同魏巴見，他們將會喪失國民的信任。我承認有可能地支出一千萬萬日元交給陸軍和海軍當局，然而超過了這個數目就是絕對付不出的。

在現今的國際形勢中，沒有任何這類的危險。美國在蘇聯援助對日本的戰爭。他們須殖民地和廣

大的領土，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會發動爭端，因為這就保證日本海軍避免種種刺激他的行動。儘管沿着和平的道路前進。

高橋是清以這種演說，事實上動搖了敵自己的生命，幫人法西斯分子，把他看做是阻礙進行他們的領袖的重大敵人。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日本議會進行了選舉。選舉的結果證明了：民眾都反對軍人們及和軍人有關的法西斯分子的冒險主義政策。法西斯主義的軍人們，害怕選舉會鞏固自己敵人的地位，會阻止實行他們進攻蘇聯和中國的政策，於是軍人法西斯派中最冒險的分子（這些人就是「少壯軍官」）就組織了武裝暴動，目的是要推翻政府，把全部政權都轉移於法西斯軍人之手。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約有三千個「少壯軍官」，在黎明時候，從軍營中把他們所統率的士兵帶領出來了（總數在一千五百人以上）；佔據了陸軍省和警察局的房屋，向法西斯派所最厭惡的政府要人們實行襲擊。首相岡田的官舍，以及總相高橋，均內相齋藤教育總監渡邊及侍從長鈴木的住宅，都遭到了襲擊。岡田因為偶然的原因避免了死亡，齋藤和渡邊當時就被刺死了，年老的岡田，因為受了致命的重傷也死去了。鈴木受重傷。

實行了這一項謀害，法西斯主義暴徒們大佔據了首都中大部分的領地，和以前的軍方代表進行

條件以下的條件之組織軍人。法西斯黨的新政派和黨內改革派

出這些黨則繼續了三月。政府不敢採用武力來對付這些暴動者，祇限於訓戒和用飛機投下傳單。這種傳單的內容，是號召暴動兵士去散燬自己的營中。

然而，雖然其他的軍隊並沒有支持法西斯暴動者，他們最後是降服了：交給軍事法庭審判。

然而，雖然暴動時所宣布的戒嚴，直到中央召開了告終除。雖然暴動沒有成功，十一月二十六日軍事變

的壓力。兩田將公政府當然即刻就辭了職，創立了前任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的內閣。他是對於軍人法四

的壓迫。兩田將公政府當然即刻就辭了職，創立了前任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的內閣。他是對於軍人法四

的壓迫。兩田將公政府當然即刻就辭了職，創立了前任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的內閣。他是對於軍人法四

的壓迫。兩田將公政府當然即刻就辭了職，創立了前任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的內閣。他是對於軍人法四

的壓迫。兩田將公政府當然即刻就辭了職，創立了前任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的內閣。他是對於軍人法四

的壓迫。兩田將公政府當然即刻就辭了職，創立了前任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的內閣。他是對於軍人法四

的壓迫。兩田將公政府當然即刻就辭了職，創立了前任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的內閣。他是對於軍人法四

的壓迫。兩田將公政府當然即刻就辭了職，創立了前任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的內閣。他是對於軍人法四

的壓迫。兩田將公政府當然即刻就辭了職，創立了前任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的內閣。他是對於軍人法四

政府增加了警察「本部」的人數，實行了國民教育制度，軍國主義化，採用了監視教師的偵察制度，禁止軍事企業組織職工會以及其他等等。

不限制警察領銜左翼團體，廣田政府還編製了縮小議會權力的方案，甚至不惜在共產階級地主的「主要政黨」——民政黨和政友會，他們是在議會中佔大多數的。

在對外政策中，廣田政府公然主張和蘇聯作戰。由於這一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和法西斯德國在柏林簽訂了「日德共同防共協定」。事實上，這個「反共產主義」的協定，是締結傾同反對蘇聯同時反對民主國家的「日德軍事同盟」的單純掩護。

軍人們是在絕無秘密的情況中準備這種同盟的。日本參謀總部所代表在柏林所進行的談判，甚至連日本政治最高級的指導者也不知道的。由於這種緣故，締結「日德反共協定」，使那些屬於日本溫和的陣營中的許多人，都是感覺不愉快的，出於意外地。在日本，卻依然有些議員們出面斥責廣田，對內的冒險主義的政策。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間第七屆議會開大會上，議員們好幾次把廣田政府的閣員們，包括陸軍大臣寺內，由議會前旁聽席上強行驅逐出去。

第七屆議會議案批評的尖銳，迫使軍人們要求解散議院。然而民衆的憤激之烈，使得廣田弘毅

被放逐後去處。這陣軍人們就實在碰頭再內閣。結果是陸軍大臣寺內壽一辭職。引起了軍閥內閣的辭職。

資產階級的反對派，企圖鞏固自己的勝利——推翻廣田內閣。組織新的政府，這個政府是要有力。給實行比較溫和的政治方針的。爲着這種目的，推舉最嚴的宇垣將軍來担任首相。他是以接近議會政黨及藤澤法內主義者荒木而著名的。然而宇垣內閣的切努力，竟碰到了軍人領袖方面之實的反叛。他們拒絕了推舉宇垣將軍去担任了自由主義者宇垣內閣中的陸軍大臣。所有的將軍，對於宇垣邀請他們出任陸軍大臣的提議，都表示拒絕。這種結果，這種宇垣不得不放棄組織政府的企圖。其當選了八位閣員。

一九三七年三月間，成立並推舉十郎將軍的政府。就實質來說，這個政府繼續了以前廣田內閣的政策。

爲了想在短時間內使資產階級政黨對軍人完全投降。林銑森郎的政府走上了和議會鬥爭的道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陸軍省宣佈重議會。雖然議會是特別反對，但批准預算和政幣許涉種重要法案。法案大部分都是軍事性的。議會爲外也遭到解散。軍閥們在林銑森內閣背後的心靈。這能保證軍閥中的反對派頭腦。而使其自取敗壞決定。勝利終於而遲疑。然而警察的恐懼行爲。

選舉的結果，完全根據上述種種因素在新議會的發展，因極大數目的選舉人，都投票反對林義的
 階級政黨——日本無產黨，提出更無組織的反法階主義的黨綱額頭出法

養茂林純一郎反對政府的，只有比一百萬稍多些的選舉人；反對的却有八百萬以上的選舉人。
 社會大眾對在選舉中獲得不很大的勝利，他大約得到六百萬票，竟當選了三千七個議席。一九三六年的
 選舉上，他只當選了十八個議席。

一九三五年三月初一，一九三七年四月議會選舉指出了，甚至日本在嚴格的條件下被限制的議會
 政治，也未能反映出人民大眾反對法西主義的憤慨。
 對蘇俄日本資產階級不滿主義為餘的，再由國土而發動的暴徒，造成了日本勞動者大衆努力
 聯合鬥爭的力點，雖然極端階級鬥爭並法階級中最好戰的階級方面，而建立革命。法西主義獨裁的發

在種種的警察恐怖及絕對違法的嚴苦條件中，日本共產黨為着對戰爭及法西主義鬥爭，在日本勞
 動者中間，組織了爭取創立廣大的實法階主義的運動。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七年運動中，共產黨

加了工人、農民勞動的知識階級，而且也參加了某些因為軍火工業而主義危險的派別而康黨不安的資產階級的階層。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議會的和市縣的市縣的選舉，是日本民衆中反法西斯主義和反專制情緒高漲的政治上的鮮明表現。

在這些年間，日本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大大地加強了。日本農民農村運動也更加緊張起來了。一九三七年日本正式登記的罷工者大約有二千萬人。一九三六年是日本鄉村中租佃糾紛最發展的一年，發生了五千五百次的農村糾紛。

雖然碰到了選舉各方面一致的責難，林銑內閣依然企圖在相當時期內保持自己的政權，甚至計劃重新解散議會，以備根據法西斯的精神改變了的選舉法來籌備新的選舉。政府同時更準備改革議會，目的是要限制牠的權力。然而對於林銑十郎的軍人上官僚因開業場的激憤，却達到了這樣大的程度：大資本家和大地主的指導階層，甚至軍人本身，在這種失去了榮譽的和不圓滑的政府的權力的存在中，看出了極大的危險。這個政府的喪失了策勵的能力的，因此完全沒有力量來實現準備「大戰」的準備。

林銑十郎不得不實行辭職，一九三七年六月八日組織了公辭近衛文麿的政府。他的使命是要恢復資產階級軍人上官僚階級的責任，及保障以前那種進攻的政治領袖領導地施行。在自願擔任首相

以前，近衛文相公擔任貴族院院長的議員。他雖認為是這樣的人物，是有巧妙的能力的外交官，設想，同時又是法西主義的傾向及和軍人們接近的人物。然而和村龍十郎不同，近衛文相抑制了自己的反動的政治見解的公開表現，甚至宣言「政府和議會必須密切合作。」此項宣言，受到了資產階級議會政黨方面極熱烈的歡迎。

由於這個緣故，在很短期間內，日本統治階級中各個派別就得到了妥協。這種趨勢立即被軍閥所利用，他們得以順利地展開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大規模的繼續進攻。

根據許多原因，使日本帝國主義大大地關心着快對中國實行新的軍事進攻。這些原因中，最重要者有如下述特點：

(一) 一九三七年春季，中國在建立反帝的民族陣線中，得到了第一次很大的成就；這一陣線的首要任務是在組織抵抗日本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看到中國全民族的反日陣線有着繼續鞏固的前途，而感到極大的不安；於是決定採取新的武裝干涉敵方法——「先發制人」(二) 法西斯國家——德國和意大利——反對西班牙人民的帝國主義干涉的發展，造成了歐洲異常緊張的情勢。同時暴露了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法國和英國——完全的被動性，雖然對於他們本身安全的威脅加大了。毫無疑問是英國、法國或美國，都表現了完全不願對這種搶奪作任何反抗。這種情形大大地鼓勵了日本帝國主義

趨進及中興。偷傳斷定。從太平洋上陸自稱的鐵腕方面。其本會運轉靈敏的。(三)一九三六年簽訂的日德軍事協定刺激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自己的法理主義的盟友面前來表演一下自己的「軍事實力」。日本參謀本部認為無庸特別努力。就能佔領華北各省。在華北地方完全執行自己舊有的戰略計劃。而後種種計劃的實現是在一九三五年中斷了的。

如果日本軍人。在佔領華北的事件中。首先看的是擴大進攻蘇聯及進行「大戰」的大陸上的作戰根據地。那末日本資產階級。就希望開發華北的天然富源。也直接關心獨佔地奪取巨大的新市場。

這一切條件。構成一九三七年七月間。在反動的近衛政府的領導下。日本對中國開始新的干

涉。

一九三五年日本法西主義的軍火專家。侵入了華中。佔領了上海。日本軍隊侵入華中。也和馬年匪徒入海洲一樣。就日本的用法說來。也是使用了盜竊的方式。使藉了藉口日本大自己所得小惠的各種「地方事務」的蒙昧手段。不使用了事實上破壞種種國際法規。條約。協定等等的手段。佔領了天津和上海。也就是抓住了全中國廣大貿易市場而鎖鑰。這就是說。當日本把上海和天津掌握在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守備隊在北平附近蘆溝橋所挑起的和中國軍隊的衝突，成了日本軍隊開始廣泛地干涉中國的理由。這種最初極小的結果，接連發生了多次的戰鬥，在這些戰鬥中，進犯的日本人，由中國不大的部隊，三十三九團方面，遭到了堅強的抵抗。在這些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動員士兵和軍官，在和武器優良及人數大大地超過了他們的敵人的鬥爭中，已經表現了英雄的英勇。

但日本軍司令却繼續增加了華北佔領軍的人數，戰鬥地佔領了北平、天津區許多軍路重要的新據點。同時，一九三七年七月底，日本人在上海製造了挑釁性的日本海軍士兵的「失蹤」事件，在這一事件，在海軍中將長谷川統率下的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接到了東京的命令，準備奪取上海。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在華北海區域中開始了武裝干涉。

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估計相反，這番對中國的干涉變成了「大戰」。在這番戰爭中，圍繞着中國人民對日本侵略者表現了英勇的抵抗，給予日本侵略者以許多重大的打擊。

日本參謀本部不得不繼續不斷地增加自己在中國作戰的軍隊的人數。日本在華北的軍隊的首腦是寺內壽一將軍，他集結了大批的各種技術的戰鬥手段：飛機、坦克車和天德。一九三七年十月間，寺內將軍所統率的軍隊的人數，超過了二十七萬八千人。

走上了長期戰爭的前途。日本政府付出了所有的力量，努力使自己保障統治階級各種團體方面。

大隈內閣的擁護。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近衛內閣為滿蒙而自己的權威。對軍人對大資本家社義發覺。當所長有勢力的代表中，選任了十個臨時閣員發言，他們裏面包括了統派階級與各種不同階級。至是互相敵對的價值代表，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包括法西主義的將軍荒貞夫和他前政要野田。野田一處有接近法西主義者的金融家池田成彬和內閣和的。對本案無疑在野田辭職以及其他等人。這說明了近衛政府的努力，是要表示在戰時的條件下各種政治派別的統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政府宣佈。然而國家的實際政權，却漸漸地更加轉移到了軍人的手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政府宣佈。組織了大本營，這就是說，名義上確立天皇對一切軍事問題直接指導權。然而事實是，却是表示軍部政權轉移到了軍人手中。

在上海附近，松井將軍統率下活動的日本軍隊，遭到了堅決的抵抗。日本軍隊對中國軍隊技術上大得多的優越性，最後命令中國軍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起不得撤退上海。然而以保衛上海的大約覆沒了三個星期，使日本帝國主義付出了生命和物質的巨大的犧牲的代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日本人佔領了南京，他們用凶惡的獸性對待無辜的中國居民，成羣地屠殺，姦淫婦女和任意擄掠。

一九三八年春，在中國國內戰事斷了後，在瀋陽鐵路兩區域和在遼寧城內，經過了兩個月，日

本軍隊企圖攻破中國軍隊保衛徐州的防線，都沒有成功。日本海軍方陣軍備技術優越，以及松井將軍和寺內將軍的日本軍隊共同行動加諸中國軍隊的包圍威脅，致令中國軍隊被迫轉入新防線。但日本軍隊巨大的損失和日本軍隊主戰的軍心許難維持，包圍和掃蕩中國軍隊的惡務，降低了日本及所獲得的勝利價值。

日本參謀本部無法迅速準備在敵陣前線的任務，這可從日本起加強大量地使用毒藥來對付中國軍隊這一事實上看出來。

日本佔領了中國大部分領土（一九二八年秋季，日本軍隊佔領了廣州和漢口），都是極不鞏固的。因為日本軍隊佔領的各省中，滿洲省與膠濟居民對於侵略者深惡痛絕，而經濟敵意的煤礦鐵樹地參加和協助抗戰。後者散布在日本軍隊後方，不斷地予日本以重大而損害。一月二十一日，日本海軍

在中國所進行的殘酷戰爭，使日本帝國主義帶來了巨大的內部困難。到一九二八年時，日本已經對其對華政策的失敗。一九三七年用在戰爭中的費用已經達到了三十五萬萬圓而且日本過去幾年所積蓄的軍火原料存貯密實而儲藏大部分消滅了。這引起了由國外購買原料各種糧食材料等的必要。由於這種種理由，對外貿易的入口趨達到了極大的數額。一九三七年對外貿易的入超大約等於七萬萬圓。日本要求近鄰政府，文明實施他領土變遷的許多方案，把國家的一切經濟生活都完全

服從「大戰」的要求。資產階級土地主的政黨，不敢反對政府。維護了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度秋
天和冬天在議會中所提出的非常法案：國家統制個別經濟部門的法案，全國總動員的法案，禁止進口
的法案，這項法案對軍事工業部門不適用，以及其他等等。全國經濟極大的緊迫，伴來了日本勞動者
生活水準極端的惡化。物價漲高了，同時和降低了工人的工資水準。對工人的榨取異常加大。使他們
是在軍事工業中做工的。是屈服在反動軍人們的絕對專橫的條件下的。

一九三八年海軍中，失業達到了很深的規模。這是縮小非軍事工業部門（主要是紡織工業）的
生產所引起的。根據日本官廳的小冊統計資料，失業者的人數大大地超過了二百三十萬人。這
更更加壓低了日本無產階級的生活水準。同時也加緊了日本農民的貧窮化。因為召集預備兵及把
青年大數入軍隊中的關係。日本農家的工作表，就大大地減少。同時人造肥料價格異常的騰貴（
漲百分之五十），馬匹的徵發及其他等等。使日本的農民生活陷入空前艱苦的條件中。這樣看來，中
國的戰爭，在日本的農民和工人（他們的境況在戰爭未發生時本已極端艱苦）的生活上，有着極慘痛
的反映。

這在極廣大的日本民族中，創造了展開反戰反法西斯運動的鞏固前提。

本式說說數日後，就對閉了日本無產階級的政黨。日本無產黨和在黨外工會，大約逮捕了四百

人，他們的罪名是於一九三八年二月間，繼續實行「新滿洲」大捕，被捕人數達幾千人。

軍隊中而反戰運動採取了以下的一些形式：自陸軍中士兵成羣地向中國投降，大批的自殺，拒絕執行司令部所發的上前線的命令及其他等等。末了，在特別的情況之下，日本士兵中反戰的情緒，有時甚至發生整個部隊的直接的暴動（七年日本兵在大坂的暴動）。

在中國的最初戰爭，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退却和內政的巨變困難，致使日本經濟階級只好採取「非常手段」以這種手段，主要是從法西斯主義國家仿效來的。經濟經濟退却的完全軍事階級，採取對勞動階級的法西斯主義的統治制度。

一九三八年五月間，近衛政府實行改組，在黨的近衛政府末加派重砲位將軍三十箇處（成和荒木貞夫）和代表以浦田將軍中間互相鬥爭的兩派心非這這想空其清位獨佔的廣德黨（廣德黨）與既無斯相似之組織，而直要欲要取池田成彬（在議會社會服務了四十一年之久），他兼任了大

海軍相和工商相兩項重職。此外並任命法西斯主義的公認軍官的候補領袖板垣征四郎大担任陸軍大

近衛

改組的近衛的閣，更加激化了政府注議的軍隊瀾激這些運動軍團是為盛極難的其本獨佔各資本的利益服務的。新閣編實行了限制，其完全禁止供給非軍事工業的原標標準，限制人民消費各

種商品和食料品，在戰時「經濟制度」的外觀下，對勞動者居民實行了大量加多爭掠奪。文部大臣荒木貞夫宣布對科學和文化進攻，解聘了大學中的左傾教授，對於學生實行了軍營化的制度。對於日本的出版規定了的極嚴厲的檢查，完全禁止發表關於日本經濟和社會狀況、關於在中國的軍事活動的進程的任何正確的情報。

在這種情況中，一九三八年七月，使無恥的日本軍人對蘇聯進行了挑戰性質的叫聲。駐在朝鮮的日本軍隊（所謂的「朝鮮軍」）在日本駐滿洲的領軍（所謂的「關東軍」）的積極支持下，企圖佔領蘇聯沿海省南端的一部分領土（在哈桑湖區域）。被侵略均爲境守備兵擊退了的日本挑釁者，二次進行了自己的企圖，佔領了蘇聯的張鼓峯，參加作戰的大約有兩個師團的日本正規軍。蘇聯政府把日本進行行動，看作是一部分失去了理智的日本軍人方面有意的挑釁。當時蘇政府對沿海省的紅軍部隊發出了命令，叫他們把侵略者從蘇聯領土內驅逐出去。

這項命令光榮地執行了，並進行了的戰鬥中，紅軍示威性價的英雄、技巧和熟練，使日本軍隊受到了巨大的損失，蘇聯艦的領土並被驅逐出去了。因爲這種殘酷而感覺不安的日本政府，趕快採取外交上的措施，來處理這宗曠境「事件」。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一日停止了軍事行動。

日本在哈桑湖區域的挑釁，使日本帝國主義遭到了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不小的失敗，暴露了日本

軍事力量的薄弱，到內部的不鞏固。這原因爲其海軍中將總士義俊子的事務而擴大。這些戰爭把日本帝國主義推上了經濟確定的境界，他異常鮮明地暴露了日本內部極深刻的矛盾，這些矛盾，日本在無節制地擴張的時代，內部社會不經濟的顯露性，雖然他在進行着大規模的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在日本全部歷史中，日本人民所着大規模的勞動，無論什麼時候都是本國統治階級極其殘忍地榨取的對象。日本在經濟以前，是封建時代和現代獨佔資本主義的情況中所進行的境况性質的戰爭，無論什麼時候都給日本人民帶來大衆的貧困，破產和死亡。在不遠的將來，當日本人民決不願承允被榨取和壓迫的對象的時候，他們將會變成支配自己命運的主人。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452.....

4767

登錄號數.....50870.....

日本歷史叢書

每冊實價國幣一元

原著者：

巴

如科夫

翻譯者：

胡

明

發行人：

黃

新

發行者：

四

新

新

經售者：

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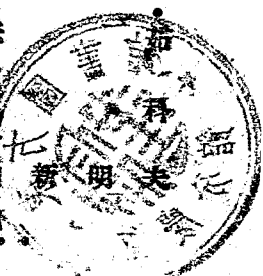
大書店

印刷者：

三

戶印刷社

桂林桂甯路德美大樓



版權所有
文不 准翻印

